



李大釗研究論文集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

k822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下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6.27.17/25



河北人民出版社

李大钊研究论文集

下

韩一德 王树棣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20.875印张 518,000字 印数：1—3,6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86·46 定价：2.65元

目 录

-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许德珩(1)
-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李葆华(10)
- 李大钊——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熊怀济(21)
- 李大钊同志与青年……………马模贞(29)
-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
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张静如(35)
- 试论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李世平(57)
-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谭双泉(69)
-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叶桂生(93)
- 李大钊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上海师大图书馆学系(116)
上海师大图书馆
-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戴鹿鸣(131)
- 解放思想的先驱 坚持真理的典范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朱乔森(172)
- 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袁 谦、吴家林(184)
-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
李大钊同志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林家宥(200)
-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历史地位……………肖超然、沙健孙、梁 柱(222)

“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李大钊同志是怎样看待个人与群众的关系的 ……朱维真(249)

李大钊同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郭 焘(257)

五四前后李大钊哲学思想探讨 ……武 仁(270)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吕万和(288)

试论李大钊同志人生观最显著的特点 ……陈 勇(292)

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 ……黄 真、姚维斗(306)

关于李大钊的生年问题 ……黄 真、姚维斗、朱乔森(309)

李大钊同志被捕和就义纪实 ……李义彬(312)

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 ……韩凌轩(319)

李大钊与鲁迅 ……运 之、江 棣(327)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周子信(336)

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韩一德、杨树升(351)

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

早期组织 ……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371)

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 ……黄 真(381)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 ……郝维民、其其格(397)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接触 ……吕明灼(421)

李大钊前期的民主思想 ……任建树(431)

李大钊对“好政府主义”的认识

——兼论其“平民主义”思想 ……吕明灼(443)

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初探 ……杜蒸民(459)

李大钊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大贡献 ……傅绍昌(476)

李大钊在开封 ……张 绛(490)

李大钊与冯玉祥 ……杨荣华(499)

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 ……韩 翼(503)

试论李大钊的反帝思想·····	朱建华、何荣楦(515)
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	吕明灼(530)
试论李大钊思想转变的主观条件·····	王永义(548)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韩一德(558)
李大钊与蔡元培·····	姚维斗、黄真(573)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历史观·····	曹木清(579)
李大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王世儒(602)
李大钊研究综述·····	韩一德、王树棣(619)
附：李大钊著作系年目录·····	(638)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 李大钊同志

许德珩

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深切怀念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二年了。每当想起这位革命先驱者光辉的革命业绩和崇高的革命形象，就不禁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而肃然起敬。反动的军阀虽然夺去了他的生命，可是他的革命气节和革命功业，却永远存留在我们心中，为我们所怀念。正如他在《青春》一文中所说：“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大钊同志号守常，河北乐亭人。他早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救国救民、“再造神州”的宏伟抱负和坚强决心。1913年，大钊同志留学日本，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他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组织了神州学会，团结一部分知识分子，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当时，大钊同志在章士钊在日本主编的以反袁为主旨的《甲寅》杂志上写文章，他每发表一篇文章我都要阅读。我对大钊同志那些热情洋溢的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敬佩，也很受教益。例如，1914年11月，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行径，驳斥了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有贺长雄鼓吹的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打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毁新复古”之徒，并告诉人们，不应当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存在幻想，不管它是

日本的或是欧美的；“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皆“非吾之纯确国情也”。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发表于袁世凯称帝的一年以前，这就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阴谋，向我国人民发出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大钊同志在政治上深湛的远见，和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使我当时读之获益非浅。

大钊同志对于我国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是有信心的。他认为我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广大的国土和四万万人民，只要人民觉醒，尝胆卧薪，发奋图强，就可以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前途将是无限光明的。1914年10月间，陈独秀以仇恨军阀的偏激之情在《甲寅》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说我们国家极端黑暗腐败，根本没有可爱之处，甚至说什么与其如此，还不如当亡国之民为好。大钊同志从另一角度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他对于少数青年因悲叹国事不振，外祸日亟而自杀的现象，更大不以为然。他说这些青年“爱国之诚，至于不顾生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则至可闵，而亦大足戒也”。他认为这些青年即使“怀必死之志，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大钊同志希望我国人民都要自觉自勉，“勿灰心，勿短气”，发奋图强，勇往直前，突出地表现了大钊同志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折服。

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大钊同志在日本时写的《青春》。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大钊同志在文章中鼓舞人心的警句，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激励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

荡历史之积秽”，不要让“僵尸枯骨”把自己束缚起来；同时还要摒绝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不受“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摆脱那营营扰扰的追求个人利禄之途。他认为，青年应当不断地以“青春”的精神来改造自我，“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篇文章，在当时对激发广大中国青年的革命进取心，起了很好的作用。今天我们读起来，它那种气势磅礴、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也仍然鼓舞人心。

总之，我在见到大钊同志以前，从他的文章中对他早已十分敬佩和神往了。

我和大钊同志认识是在1918年的春天。那时，大钊同志刚来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素仰其人的我，能够得以亲聆教益，十分欣喜。在图书馆里，他总是身穿一件褪了色的布袍子，含着微笑的诚朴谦和的态度，热情地接待向他求教的青年，诚恳地细致地畅谈自己的看法。北大图书馆原为藏书楼，设在马神庙的校址内，1918年10月才迁到刚刚建成的沙滩红楼新校址。大钊同志到职后，即着力于图书馆的整顿和扩充。著名藏书家江西九江李盛铎（木斋），是我的远门亲戚，他因我的关系把一部分藏书让给了北大图书馆。通过这件事，我和大钊同志就更加熟悉起来。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军事秘密协定举行集会，遭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残酷镇压，全体留日学生反抗这种暴行，罢课回国。5月中旬，留日归国学生代表李达（鹤鸣）、王希天、阮湘、龚德柏来到北京和我们见面。大钊同志由于曾经留学日本关系，同他们很熟，特别是黄日葵同志归国后，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来考入了北大文预科英文学门。他与我极为相投，也与大钊同志熟悉，因此我们常到大钊同志的办公室聚谈。这时大钊同

志与我已成为师友之间的交谊了，虽然从年龄上来讲他只大我一岁。

1916年以前，北京大学的校风很腐败，学生年纪大的相当多，其中还有举人、秀才出身的学生。校内工友称呼他们为“老爷”，以后也是管他们叫“先生”。学生大部分住在公寓里，一般穿长袍马褂。学生除了少数死读书不问外事的人以外，当时打麻将、捧戏子、逛妓院成为风气，生活自由散漫，谁也不管谁。蔡元培先生于1916年冬到北大任校长。他来北大以后，发起成立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遵守这三个戒条而加入的称为甲种会员，加上不做官，不做议员为乙种会员，再加上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条为丙种会员。蔡校长以“不参加”的办法来抗议旧社会的腐败恶习。我与大钊同志先后都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在1918年6月还当选为进德会的纠察员。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传到中国，大钊同志兴高采烈地欢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他在天安门前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接着又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光辉论文，热烈地歌颂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十月革命以后，大钊同志很快地成为我国思想界的领袖。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五四”前夕，北京学生成立了许多爱国的或讨论新思想的团体，有许多都和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例如：大钊同志于1918年6月发起建立了少年中国学会。我和黄日葵同志都是经大钊同志介绍入会的。“少中”在大钊同志的倡导下，把“创造少年中国”作为一个理想提出来，当时还是发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五四前后，在许多有关社会活动的记载中，都能看到大钊同

志的名字。通过这些活动，他和周围群众有了密切联系，为进一步开展革命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这里要着重一提的，是大钊同志和我们“国民杂志社”的关系。国民杂志社成立于1918年10月20日，它是当时的爱国团体“学生救国会”办的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担任导师的大钊同志对杂志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进行过热心的帮助和指导，并为杂志撰写文章。

国民杂志社与新潮杂志社和国故月刊社是当时北京大学“鼎足而三”的社团。这三个社团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新潮》提倡白话文，反对旧礼教，但绝口不谈政治；与之对立的《国故》则专门反对白话文，鼓吹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而《国民》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表了不少政论文章。这些言论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国民杂志社对于五四运动的准备和发动是起过促进作用的。

1919年元旦，大钊同志在《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尖锐地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钊同志还鲜明地提出必须要“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中国和亚洲，然后与世界各民族结成“大联合”，从而“益进人类的幸福”。

与此同时，大钊同志和陈独秀又创办了《每周评论》。鲁迅、高一涵、张申府等人都在这个周刊上投稿，对五四运动也起了积极作用。

五四前夕，北大虽然成立了若干社团，但是由于各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因而彼此之间隔阂甚深，甚至不相往来。偶一发

生问题就写出揭帖来贴在墙上（犹如今天的大字报那样），赞成的，反对的，你唱我和，张贴满墙。例如，《新潮》是傅斯年主编的，傅也是国文学门的，和我同班。胡适来北大后，我和傅等几个学生对他不满，后来傅倒戈了，倒到胡适那边去了。1918年5月，傅斯年不赞成我们搞反日运动，竟跑到公府（即总统府）去告密，从此我们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适，并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汪敬熙等组织了新潮杂志社。由于我们与傅斯年不对头，他们干的事我们就不干。傅斯年反对我们抗日，就不加入学生会。《新潮》提倡写白话文，我们《国民》的文章就用文言体裁，当然这与我们刊物是全国性的，当时社会上对于白话文还不易接受有一定关系，但是也有与《新潮》搞对立的成分在内。到了五四以后，《国民》杂志就改为白话文。最令人折服的是，大钊同志把北大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以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共同点团结起来，组织在一起。如五四前，他动员新潮杂志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大学生会，并说服我们允许他们参加。由于大钊同志的调解和促进，从而北大学生团结起来了，成为五四运动的一股主要力量。

团结在大钊同志周围的、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一部分爱国青年，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等，这时已经经常在一起活动。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越来越露骨，咄咄逼人，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和严重；由于军阀政府腐败不堪，软弱无能，我们深感宣传、教育、出版等等行动不能满足斗争形势的需要了。我们在大钊同志的办公室里，越来越经常地讨论着一个问题——“直接行动”。“直接行动”，是大钊同志向我们介绍国际工人运动情况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同意批准，发动群众，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斗争的实践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同帝国主义和军阀搞合法斗争是行不通的，1918年5月请愿运动的失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直接

行动”的思想振奋和鼓舞着爱国青年中的核心分子，从而迅速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即将到来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大风暴就是这样在酝酿着。而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夕的文章中，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地提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五四运动到来前的一个信号。

五四前，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钊同志，通过学校、报刊、社团以及到各地的讲演等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在为五四运动进行思想准备的同时，也在这个运动的组织准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中，大钊同志发表文章，正确地指出我们的仇敌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卖国的也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几个人。所以，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们必须“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把这强盗世界推翻”。这种看法，对于五四运动坚持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方向是大有益处的。

五四运动的斗争，致使北洋军阀政府恼羞成怒，进行反扑。在他们的逼迫下，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辞职出走。爱国青年的活动内容，又加上了挽留蔡校长复职，反对胡仁源来校（反动政府派胡仁源代北大校长）这一强烈要求。大钊同志等北大教职员代表，于5月10日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元培先生，更广泛地发动教职员，和广大学生采取同一步骤，把学生和教职员也团结在一起了。

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就号召我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五四运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北京学联派我和黄日葵同志南下，同各界联络。于是“六三”以后，参加五四运动的就不只是知识分子了，而成为一个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妇女界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蓬勃进展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迫使反动军阀政府在6月7日释放了几千名因街头讲演

而被捕的学生，10日批准曹、章、陆“辞职”。

在此期间，北京城里出现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这是大钊同志和陈独秀等散发的。宣言中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废除反动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订立的密约；指出卖国贼除了曹、章、陆之外，还有经手向日本借款和购买军火的徐树铮，镇压群众运动的段芝贵、王怀庆；并提出取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的集会、言论自由权。最后宣告：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劳工、学生、商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6月11日，大钊同志带领两人去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同时，陈独秀、邓初（内务部金事）、高一涵三人去新世界散发传单。就在这天，陈独秀被捕。大钊同志立即设法营救陈独秀，于当年9月出狱。及至阴历年底，陈独秀仍为警察厅所监视，呆不下去了，大钊同志挺身而出，化装成北方商人模样，驾上一辆骡车，让陈独秀坐在车里，顺利地护送陈独秀出京。大钊同志这种有勇有谋的革命精神，真令人钦佩。

我对陈独秀由于他的文人习气严重，私生活又不严肃，所以最初不大赞成他。五四以后，陈独秀赞成我们搞爱国运动，他本人因散发传单又被捕过，所以我对他的态度也有了转变。

大钊同志热心帮助和接济同学的事迹，常为大家所称道。大钊同志经常把自己的月薪拿来帮助清苦同学。记得刘仁静同学因经济上拮据，一时交不了学费，大钊同志就出具证明，请学校准予缓交。这个证明现在仍然保存在北京大学的档案之中。

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我赴法勤工俭学之前，大钊同志对五四运动给予的高度评价。1919年10月12日，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举行纪念会，并欢送我和陈宝锜赴法勤工俭学（陈宝锜后来并未去法，而是到了英国）。是日到会者除社员七十余人外，尚有来宾李大钊、陈独秀、蓝公武及徐宝璜。大钊同志在会上发表演

说，大意谓：“此次‘五四运动’系排斥‘大亚细亚主义’，即排斥侵略主义，非有深仇于日本人也。斯世有以强权压迫公理者，无论是日本人非日本人，吾人均应排斥之！故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此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勉旃！”

但是，这次欢送会上同大钊同志聚会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1927年4月底，大钊同志死难的噩耗传来，宛如青天霹雳，使我悲痛异常。当年欢送会一别，不料竟成永诀。

1927年5月，我正在武汉，大钊同志牺牲的消息传来，在武汉的同志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我以北大校友的资格，在会上讲了话。诚如何香凝同志回忆的那样：当我们“在武汉开会，听张太雷先生报告李大钊先生殉难的经过，我们都不能遏制地流下眼泪来”。

1933年，党通过北大师生和他的生前友好，发起为他举行公葬。为这一公葬捐款的知名人士，有鲁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我当时不在北平，回来后，特地到香山之下万安公墓去凭吊大钊同志，以表示我对大钊同志的深切怀念和爱戴。

陈毅同志在纪念大钊同志的文章里，对于大钊同志的一生概括了十六个字：“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革命先驱，大节不辱”，我觉得十分中肯恰当。

大钊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10月27日，

本书据作者的修订稿排印。）

回忆父亲李大钊的 一些革命活动

李葆华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一

1918年7、8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1925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1919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从1922年底到1924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

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父亲很敬佩孙先生，认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1925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父亲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后不久，孙先生不幸病逝，父亲异常悲恸。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大规模的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在开追悼会那天，《晨报》上专门刊登了父亲步出中山堂的照片。

四

1924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建立，使北京的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

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然而，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北京政变的消息使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11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战斗激情，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父亲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1924年底到1925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广大北方地区大力开展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着非常活跃、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也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它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1926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1925年12月30日到1926年2月3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五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段祺瑞虽是临时执政，但他手中无兵，只有一个几百人的卫队；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公开打出反直倒曹的旗号后，还有一点同情革命的表现。他的国民军曾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并从故宫中轰出清末皇帝溥仪，一时颇得社会上好评。北方区委分析了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认为应当争取冯玉祥，特别是国民军，经过做工作之后，有可能争取它倾向革命。因此，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是党组织统一布置的，我也参加了。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

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党对国民军的一系列争取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国民军的驻防区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往往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三·一八”惨案后，冯玉祥解除了段祺瑞的卫队的武装，对段屠杀人民群众表示抗议。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父亲牺牲以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父亲。国民军同情革命的倾向，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父亲牺牲前的一段时间，由父亲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领导。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很多要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带来了革命的生气。其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们在谈话中，常常称国民党是“民校”，共青团是“中学”，共产党是“大学”。这些表明了在那时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推进了革命向前发展。

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父亲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清楚了。他们处处同共产党和革命的左派作对，使用种种手段破坏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要取消父亲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父亲代表我党同志发表

了“意见书”，坚决回击了右派的进攻，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立即“宣布开除”父亲等共产党人，同上次一样仍然未能得逞。1926年年初，国民党市党部在翠花胡同一号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父亲在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后来在国民党市、区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

在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派的代表人物曾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分化以后，他同共产党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三院召开大会，曾琦要发表反共讲话，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发动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前去参加。曾琦刚上讲台讲了几句反动话，听讲的群众就高喊“打倒国家主义！”的口号，随后大家又“嘘”又“轰”，曾琦十分狼狈，连忙从讲台上溜下来，偷偷地逃掉了。其后不久，还是在这个礼堂里，父亲发表讲演，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国家主义派捣乱，大会开得十分成功。

六

“五卅”运动前后，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新的高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异常。尤其是北京，几乎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游行、示威或请愿、集会。父亲是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者，他总是亲自参加重要的群众运动，做实际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重实践不尚空谈的革命活动家。

1926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父亲始终同

群众战斗在一起。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由于前一天曾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政府，竟然动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

血腥的镇压完全是段祺瑞执政府精心策划好的。段对国民军十分不放心，把门卫全部换成他自己的卫队，还预先埋伏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有一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头狮子上讲演。就在这个时候，段政府的卫队朝这位青年开了一枪，成为镇压群众的信号，于是一场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爱国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避开了刺刀和枪弹，跑了出去。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大部分人是从东口跑出来的。

回到家里，听母亲说父亲也去了，而且一直没有回来，她和妹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很晚了，父亲才进门来，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和赵世炎同志在天安门前主持完抗议帝国主义挑起大沽口事件的十万人大会，也赶到铁狮子胡同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听完父亲的讲述，他那种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为了革命的利益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们全家。

七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入低潮，段祺瑞执政府再三通缉父亲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北京的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父亲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这时我们的家几经辗转搬进了朝阳里三号，父亲虽然不在家里住，但每天仍有许多书信寄到朝阳里来，其中有每周一期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其它许多国家的革命书刊，各种文字的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积存很多，由我送给父亲。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给要求同父亲谈话的人传信。来见父亲的人很多，除了青年人外，还有一些进步教授、军人等。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忙，但对每个要求见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要尽量挤出时间来接待。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很想同父亲谈谈，父亲把他请了去，谈话后，又把他介绍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三·一八”前后，李立三同志从南方到北京来办事，住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得知反动派发现了李立三同志的行踪，立刻派我到北大送信，让他立即转移，使李立三同志安全脱险。

反动的军阀政府极端仇恨燃烧在它身边的革命火种。1927年4月6日，敌人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大搜捕，父亲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那天我偶然因事到西郊去，才免遭这场横祸。

父亲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以昂扬的斗志，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父亲的朋友们把我隐匿在他们家里，我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当时所谓的“党案”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每

天报上都登载有关的新闻。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父亲在敌人法庭上大无畏的革命形象。报上说：“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等等。

父亲一生热爱真理，崇信真理，曾为寻求真理历尽辛苦，走过不少崎岖的路。但只有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才真正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谛。从此，他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正象父亲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27年4月28日，父亲正是怀着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父亲是为建立新中国为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他死的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等千百万革命先烈英勇牺牲、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他们为之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继续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李大钊——中国工人运动的伟大先驱

熊怀济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十月革命后在我国最早接受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而且也是我们党最早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先驱。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中国共产党，以及在党成立后领导工人运动的事业中，李大钊同志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寄希望于新兴的无产阶级

从1918年7月到1919年1月，李大钊同志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文章，高度评价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热烈欢呼人类新纪元的开始。他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无产阶级掀天揭地的雄伟力量。他说：“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因为“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大多数”。他把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打倒资本家与贵族，看作是“世界的新潮流”。从此，“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在这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潮流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

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象这样不再把少数地主资产阶级的志士仁人看作是“再造神州”的英雄，而是把备受欺凌、蹂躏和压迫的无产阶级看作是无坚不摧的革命元勋，社会的主人，世界的创造者，这就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帮助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于十月革命的直接的响应。在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突兀而起，上海、长辛店、唐山等地工人纷起罢工，迫使反动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免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没有敢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从此，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李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和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从工人阶级勇猛坚决的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这个阶级的革命威力。他们把实现中国的回春再造的希望，寄予新兴的无产阶级。这时李大钊同志已迅速地从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他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由发生、发展到消灭的客观进程，然后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那就是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表明李大钊同志已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

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尚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这个阶级是中国最革命的阶级。李大钊同志为了唤起人们对工人问题的重视，怀着炽热的阶级感情，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诉说了工人的非人的待

遇。他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中告诉人们，那里的工人“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工资却低得可怜。他们不仅受到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而且还受到包工头的敲诈勒索。李大钊同志愤怒地把那些靠榨取工人血汗养尊处优的资本家斥责为“不做工吃干饭”的强盗。他教育青年看清世界发展的潮流，明确努力的方向。他说，现在世界上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就是那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

1919年5月1日，北京的《晨报》副刊在李大钊同志的直接帮助下，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李大钊同志的短文《五一杂感》，扼要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希望中国有更多的人“注意这纪念日”。纪念专号的其他文章从不同的方面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和中国社会的黑暗，说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甚至提到只有实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才能推翻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是中国报纸上第一次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节日，影响是深远的。到了1920年的“五一”节，全国许多城市都举行了集会、讲演和游行。各种报刊也发表了许多纪念文章。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文中详尽地介绍了各国工人阶级纪念“五一”节的斗争历史，鼓励中国工人阶级起来斗争；同时着重向当时的知识界发出了这样的敦促：纪念“五一”，不要“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而应该是工人群众团结奋战的壮烈的日子；“五一”运动，不要“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只是报面上的笔墨运动，而应该是“劳工阶级的运动”，“街市上的群众运动”。这篇文章当时曾在许多报刊上全文转载。“五一”那天，李大钊同志还在北京大学亲自主持召开了纪念大会，有工人、学生五百多人参加。工读互助团出动两辆汽车，

车上插着“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等旗帜，沿街散发《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宣言》号召工人快快起来，把“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不准他留存在我们的社会里来剥削我们，所以我们要联络起来，把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的手里……”。拿《宣言》的内容与李大钊同志写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对照一下，其精神是一致的，就是要“走俄国人的路”，建立由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

李大钊同志的一个突出的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同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他从来不把革命理论当成只是书斋的供奉。他不仅是一个思想家，而且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把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帮助革命青年掌握马克思主义。9月，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同志是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立即深入到工人中去，向工人群众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组织和发动工人，领导工人的实际斗争。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了《劳动音》，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北京的《劳动音》和上海的《劳动界》、广州的《劳动者》一样，刊载大量材料，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反映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报道国内外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工人阶级求解放的道路。与此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发起筹建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并

于1921年初正式成立，主持人是邓中夏同志。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创立，就是李大钊同志这一主张的首次实践，也是我们党从事工人运动的起点。李大钊同志和小组其他成员也都来校视察或讲课。

李大钊同志特别重视建立工人的组织。还在1919年3月，他就曾经为唐山煤矿工人罢工因没有“工人组织的团体”领导而失败感到惋惜。此后，他多次强调“自觉的团体活动”对于工人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活动，也把团结工人、聚结力量、组织工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以浅显的语言讲明“工人阶级为什么要有政党”，工人为什么要组织工会。他们在课后还到工人家里去访问、谈心，有意识地从接近工人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筹备成立工会。当时，上海《劳动界》曾报道：长辛店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而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到了1921年的“五一”节，长辛店工人一千余人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举行纪念大会时，会上就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工人们在会后游行示威时举着“工会成立”、“工会是最好的法子”等旗子。“五一”过后即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实际上就是工会。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对北方以至全国的工人运动都有很大影响，许多地方的工人都曾派代表来学习，回去后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从此，“‘工人俱乐部’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①

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使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组织程度日益加强，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1920年春，共产国际派代表来中国，首先在北京找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到李大钊同志，又经李大钊同志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同他们交换了建党问题的意见。1921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等十二位代表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组织和领导北方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把发展工人运动，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当作全党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党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全国各重要工矿区开展工人运动。由于有了党的领导，中国工人运动起了根本变化，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展开了猛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罢工高潮。

李大钊同志不仅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而且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负起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重任。李大钊同志首先以“正太路工业研究会传习所”的名义，在石家庄建立了工人组织，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当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豢养的各派军阀，都以残暴的手段来镇压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但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尖锐的矛盾。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李大钊同志利用直系与奉系军阀的矛盾，通过吴佩孚的交通总长，派了六个共产党员到京奉、京汉、京绥、正太、津浦、陇海六条铁路去工作。李大钊同志坚持让这些同志下去做铁路调查工作，反对把他们留在总长室或秘书厅作秘书，并在事前嘱咐我们的同志要用半年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后来，被派去的同志就利用铁路“密查员”的身份，在各路工人中进行活动，帮助工人建立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进行斗争，使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得到迅速的发展。其中，以京汉路沿线发展最快，工人俱乐部在1922年已有16个。李大钊、邓中夏同志还亲

自在天津和开滦煤矿的工人中开展了工作。

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的第一次罢工高潮中，全国各地罢工一百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三十余万。其中，李大钊、邓中夏同志领导的以北方铁路工人为中心的罢工，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以安源煤矿为中心的南方工人罢工，最为突出。在北方，著名的罢工有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和唐山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正太铁路石家庄罢工，最后是震撼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这些罢工由于有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工人斗争非常坚决，其特点是参加罢工的人数多，声势大，对全国的震动和影响也大。

工人的罢工高潮，引起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惊恐，他们密谋策划对工人斗争实行血腥的镇压。1923年2月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政治大罢工，就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同志是“二七”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二七”罢工的前几天，他就亲临汉口。罢工爆发后，他“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自始至终参加了罢工的领导。这次惨案，京汉路各地工人共死四十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入狱四十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的一千余人。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抄（后迁往上海），工作人员被通缉，各铁路工会及武汉工会均被封闭，工会领导人被通缉。在罢工被军阀吴佩孚镇压下去后，李大钊同志积极参与了救济被害同志家属和失业工人的善后工作。

“二七”罢工虽然由于军阀的镇压而失败了，但在这次斗争中，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坚决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担当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可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却被反动派的暴力吓破了胆。“二七”罢工后不久，他就在《向导》和《前锋》上分别发表文章，一面把资产阶级捧上了天，一面诬蔑工人阶级“不

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斗争之需要……都不曾感觉。”针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谬论，李大钊同志指出：“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李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坚持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正确路线，维护了工人阶级独立自主地进行斗争的革命原则。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被北洋军阀逮捕。北方铁路工人曾经准备冒险劫狱来抢救自己爱戴的领袖，但李大钊同志不愿为了个人的安危而使党和工人弟兄遭受损失和牺牲，坚决阻止了这一行动。4月28日，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为党和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3月27日。

收入本书编者作了个别删节。）

李大钊同志与青年

马模贞

李大钊同志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导师和楷模。他一生诲人不倦，一片赤忱，深得广大青年的爱戴和尊敬。五四时期，一代青年在他的关怀、帮助和影响下成长起来，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今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中，重温李大钊同志对青年的一系列教导，必将鼓舞广大青年，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为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愿，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

李大钊同志对于青年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对于青年的责任，作了明确而具体的阐发。他始终把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并鼓励青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振奋精神，勇往直进。

十月革命前，作为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大钊同志对民族的孱弱痛心疾首，对祖国的危殆忧心如焚。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泣血陈词，号召青年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发奋为雄，再造神州。1916年，他在《晨钟报》的创刊号上，铿锵有声地写道：“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因此，“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明确

地指出，创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青年之觉醒，而觉醒之青年，才能担负起创造青春中华之重任。他认为，青年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大钊同志从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出发，要求青年把握现在，敢于创新。他认为“今”最可宝贵。在《今》这篇文章中，他写道：“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因此，他要求青年应该珍惜现在努力工作。他认为社会生活充满着重重叠叠的新与旧的斗争，而“创新”正是青年的“特权”，是青年的责任。他热切地盼望我国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大钊同志这些寓意深刻的教诲，对广大青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大钊同志从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对青年寄予更殷切的期望。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中国青年的责任不仅要从事精神改造的运动，而且要从物质改造的运动，即“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他强调经济制度的改造，是改造一切上层建筑的基础。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青年奋斗的目标，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改造中国就是“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大钊同志认为，中国青年不仅应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且应该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应该和全亚洲、全世界的青年联合起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全人类的解放。

党成立后，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反帝反军阀的怒潮滚滚向前。大钊同志明确指出，广大知识青年应该积极投入革命运动，忠于民众，作革命群众的先驱，并“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他对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写道：“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是

全国学生反对卖国军阀的纪念日，是对帝国主义发动总攻击的纪念日，是争自由求解放的纪念日。他“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他多次号召我国青年继承五四光荣传统，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保卫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二

李大钊同志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他循循善诱，经常勉励青年为国家自重，告诫青年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什么是理想，什么叫革命，怎样才能“饫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

大钊同志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因此，他要求青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为了帮助和引导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918年，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补充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把图书馆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后来，他又在北大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青年讲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帮助青年学生进一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师大等校的教授，他利用这些合法的讲坛，更系统地向青年介绍马克思主义，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重大意义。他曾语重心长地向青年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大钊同志曾多次指出，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五四运动前夜，他发表了著名论文《青年与农村》，号召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宣传群众，“开发农村”。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

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没有农民的解放，就没有全体国民的解放。因此，有志的革命青年，应该离开家庭，离开父母，到农村这个天地里去锤炼自己，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他批评有些青年畏惧艰苦，在都市中混日子，在官僚中讨生活，“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的怠惰现象。大钊同志恳切地向青年指出：“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同时，他还教导青年要树立革命的苦乐观，认识到一切物质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因此，要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参加劳动。他说，“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青年如果只知道吃喝玩乐，“把宝贵的人生，都消磨在这个中间，岂不可惜！岂不可痛！”

大钊同志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我们民族生命的进展，曲折回环，我国的历史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就需要我国人民和广大青年，有一股迈远腾高、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犹如长江黄河，流过沙漠，冲出峡谷，浩浩荡荡，一泻万里，“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高唱着进行的曲调，走过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大钊同志强调青年还必须具备求真的科学态度，学知识、做工作，都应该扎扎实实，造成认真的习性。他教导青年说，“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

在尖锐的革命斗争中，大钊同志极力表彰为革命为人民英勇献身的英雄人物，引导青年树立革命的生死观。他对“二七”大罢工中林祥谦、施洋烈士的壮烈牺牲，给予崇高的评价，指出：

“他们的精神，还是象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象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 前进。”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爱和庞人铨在湖南慷慨就义。大钊同志怀着崇

敬的心情，亲自为《黄庞流血记》写了序言，他赞扬这两位烈士“是为救助他的劳动界的同胞脱离资本阶级的压制而死，为他所信仰的主义而死。”“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大钊同志教育青年，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流血的事，非所必要，然亦非所敢辞。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它必将“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三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他的严以律己，言行一致的高贵品质，为广大青年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大钊同志从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经历了艰巨的转变过程的。通过刻苦的钻研，特别是革命实践的检验，他逐步地放弃了进化论，接受了阶级论，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接受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否定了唯心史观，接受了唯物史观。他虽然是一位在大学任教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热爱并尊重劳动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工农群众联系在一起。早在1919年，他就极为关注唐山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义愤填膺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的罪恶。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书记，更亲自领导了长辛店、唐山、北京等地工人的斗争，特别是领导了著名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大钊同志对农民群众的伟大作用，也给予充分的估价，他亲自培训农民干部，并选派不少农运工作的同志，到毛泽东同志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冬，大钊同志和赵世炎同志亲自到张家口，领导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人制服，和工人代表一起，睡在只铺了一层稻草的地上，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大家都觉得他既可敬又可亲。

大钊同志是享有盛名的思想家、理论家，但是，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到他朴实诚恳，表里如一，肝胆照人。鲁迅在回忆大钊同志时写道：“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大钊同志处处顾全大局，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1927年初，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钊同志把许多同志转移到其他地方，但却多次拒绝了亲友们要他离开的劝告，坚持领导北方党的地下斗争。他身任高等学府的教授，薪俸本不算少，但是，他自奉菲薄，艰苦朴素，不求享受，常年过着“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的清贫生活，把节省下来的钱，资助穷苦学生或作为革命事业的经费，以致每月发薪时，往往同时送来一堆预支的借条，结果薪金被扣得所剩无几，家里还要为油盐柴米而发愁。

大钊同志不愧是一位用纯钢铸成的英雄，在面临死亡的尖锐考验中，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他身陷囹圄，仍继续领导北方党的工作，敌人对他严刑逼供，甚至用竹签敲进他的指甲缝里，也改变不了他的铮铮铁骨和耿耿丹心。在狱中十余日，他“绝口不提家事”，把自己的一切，妻子、儿女，个人安危，统统置之度外。1927年4月28日，大钊同志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今天我们纪念大钊同志，对广大青年来说，就要铭记大钊同志的教诲，以大钊同志为榜样，把青春献给祖国，把青春献给人民，把青春献给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让青春插上翅膀，“惟知跃进，惟知雄飞！”

“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

（原载《北京日报》1979年4月30日）

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 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张 静 如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是1918年下半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到党成立前夕，他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研究大钊同志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特点，有助于了解五四时期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转变的规律。

一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有不少反封建主义的战士活跃在文化斗争的舞台之上。以著名的《新青年》来说，经常撰稿的，就有陈独秀、高一涵、易白沙、吴虞、刘半农、钱玄同等人。这些人在当时都与大钊同志齐名，但十月革命的炮声，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反响，而只有大钊同志却为这炮声所震动，毅然踏上新的征途，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

诚然，大钊同志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时候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由于中国社会开始具备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问题在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不是别人，譬如不是当时更有名气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而是大钊同志呢？这就只能从大钊同志自身的革命经历和思想认识上寻找原

因。

在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无论是谁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自身的思想中必须存在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相同的因素，必须有为祖国为人民而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不能设想，随便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思想基础的时候，只要他看到报刊上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或偶尔读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就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那么，在大钊同志的思想里，究竟有些什么积极因素促使他在十月革命之后不久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在他的思想中已经树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所起的作用。

从整体说来，大钊同志的世界观，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境界。但是，自1916年开始，大钊同志则力图用辩证的和唯物的观点去观察宇宙，分析问题。尽管其叙述不够系统，论证不够严密，仍然应该说，到1918年上半年，在大钊同志的思想中，已经初步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大钊同志认为，宇宙是“自然的存在”，是“真实本体”，而不是什么“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这种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实在”，既无始，也无终。他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

大钊同志认为，人的认识是以客观的“事实”为基础的，真理必须“据乎事实”，凡违背“事实”的就不是真理。所以，他说：“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①

^① 《李大钊选集》第79、66、87页。

大钊同志认为，客观存在着的物质世界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他说：“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自然现象如此，社会现象也这样。“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而事物之所以不断变化，则由于宇宙间充满着矛盾斗争，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消即有长，有吉即有凶，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盖天地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①。正是矛盾着双方的相互作用，推动着过去变化为现在，现在发展成将来。

那么，大钊同志的这些认识，对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呢？上述基本观点，使大钊同志坚信经过斗争，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得到解放，未来是属于人民的。所以，他在困难面前不气馁，在挫折面前不灰心，积极探索前进的道路。这种精神导致他能够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倾听十月革命的炮声，“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上述基本观点，也使大钊同志坚信旧东西一定要被新东西所代替。所以，他在前进的道路上不保守、不固执，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他认为：“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②。这种精神导致他在最短时间内放弃固有的不适用的信仰，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上述基本观点，还使大钊同志的思想，在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看法上，在观察世界的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最本质的共同点。这就有利于他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在理解的基础上接受下来。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大钊同志对进化论的逐渐怀疑和否定，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作用。

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后，曾经对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

① 《李大钊选集》第95、96、68页。

② 同上，第104、88页。

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不但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它当作鼓吹社会改良的理论基础，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拿它为宣传革命服务。十月革命前，大钊同志也是进化论者。他所写的著名论文《青春》，就以进化论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在该文中，大钊同志认为：“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①由此出发，他指出，要使中国避免灭亡，唯一出路是致力于“青春中国”之再造。应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大钊同志的思想里，有着积极的作用。他正是用这种学说中的发展观点，鼓励自己也鼓励青年不灰心，不丧气，勇往直前。但是，这种学说没有也不可能给大钊同志在寻找中国出路方面提供什么新的内容，相反有时会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青春》中对德意志民族赞扬之词，就是从进化论中导出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据物种的发展和变化的观点，正确地解释了物种的起源，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看作毫无联系的不变的東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它同时却夸大了生存斗争在有机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断定种内斗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把这种学说用于解释社会现象，必然产生荒谬的结论。恩格斯曾经指出，用贫乏而片面的生存斗争公式概括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多种多样的内容，是十足的幼稚之见。而“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②。这就是说，要正确解释社会现象，必须用阶级论代替进化论。马克思主义者是阶级论者，毫无疑义，只有否定了进化论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

① 《李大钊选集》第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3页。

十月革命前，大钊同志在革命实践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进化论的弊病，并对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了尖锐的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者为掩盖其侵略实质，起劲地宣传“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的谬论。大钊同志明确指出：“此其所据，全根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同时，他列举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四大缺点，并点明：“有此四者，野心家乃取之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以有今日之惨祸。”事实证明，战争并不能解决饥饿的问题，相反，从当时各交战国粮食异常紧张的情况看来，“足知饥馑之来逼，全为战争之所赐”。虽然大钊同志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的阶级本质，但却指出战争的真正原因，不在人多缺食，而是“贪”、“惰”的根性未除，并解释“贪”乃“欲强夺他人之所有”^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对侵略本质的揭露。

大钊同志对于进化论的怀疑和否定，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阶级论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年半以后，大钊同志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对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作了阶级的分析。他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前后对比，大钊同志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飞跃进程，一目了然。

最后，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大钊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他对人民群众的看法和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是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武器。因此，只有真正站在工农大众一边，不仅是同情而且是决心把一切献给工农解放事业的人，才能够被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3、84、85 页。

马克思主义所吸引。大钊同志正是这样的人。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从大钊同志对争取中国人民解放问题的一些认识中，可以看到他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他对人民群众作用的理解。

他认识到，经过辛亥革命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的国家，而是少数剥削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在反动统治之下，“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莠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正是：“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①。大钊同志所以能够在1913年，即中华民国创建之初，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个政权的实质，并感受到人民的痛苦，正说明他是和人民同呼吸的。

他认识到，只有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才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当然，这种认识并不正确。因为即使建立了纯粹的欧美的民主共和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农群众仍然受剥削和压迫，何况这种“理想”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根本就不能实现。尽管如此，大钊同志这种认识的出发点却是可贵的。与资产阶级力图掌握政权以实行本阶级专政的愿望迥然不同，大钊同志是真心实意地希望依靠这种政治制度使国家富强，人民解放。可见，大钊同志要求人民得到幸福的愿望极其强烈。

他认识到，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靠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大钊同志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成，由人创造”。所以，他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时说：“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之前”^②。不能

^① 《李大钊选集》第3、1页。

^② 同上，第29、27页。

说，大钊同志这时已经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不过，他在分析问题时，确实总是把人民群众作用的因素放在重要位置上。

大钊同志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革命实践家。为了人民的解放，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神州学会”，编印材料，散发《警告全国父老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卖国罪行。为了人民的解放，他公开在报刊上宣传民主政治，反对君主政治，严正驳斥帝国主义分子古德诺所谓中国国情不适合民主政治的谬论，抨击那些拥护袁世凯称帝的“毁新复古”之徒。为了人民的解放，他不辞辛苦地繁忙工作着，编报纸，写文章，搞翻译，积极投入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借以教育人民，启发人民觉悟。

对人民的深厚感情，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大钊同志把全部精力投入人民解放事业之中。可是，实际情况的发展并不象主观所企求的那样。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接踵而来的不是真正民主共和制度的实现，而是南北大小军阀更加激烈的争权夺利。对此，大钊同志在1917年春曾敏锐地感受到中国前途的危机。他说：“袁氏既死，政局宜稍有光明之象矣。顾乃反是，新旧之争哄未绝，党派之轧轹未已，接触愈多，排挤益烈，长此以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以后，益以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而非吾国今日之能堪。”^①怎么办呢？从不灰心的大钊同志以战斗来回答，继续探索着前进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了，工农掌握了政权，人民得到了解放。这个消息一经传来，立即吸引着大钊同志去研究它。既然这个革命能够使工农当家做主人，有利于人民，那么它就有被研究被重视的价值，不管反动派如何诋毁它，舆论界如何怀疑它。为了寻

^① 《调和之法则》，《言治》第8期，1918年7月1日。

找中国革命的出路，为了人民的解放，大钊同志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对十月革命的起因、经过、结局及其内容作了细致的研究，并对比了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和二十世纪俄国革命的本质差别。在此基础上，他毅然宣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由此而引起的革命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可见，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解放的强烈愿望，对人民在革命中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争取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实践，是大钊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除以上分析的三个方面之外，大钊同志的个人经历及其所处具体环境，对于他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有作用的。如，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这提供了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方便，因为当时日本在输入新思想方面较为先进。虽然大钊同志在日本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读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等人介绍马克思的经济学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作，这对其后来的思想转变是有好处的。回国以后，大钊同志确实从进步的日本书刊中得到许多教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就是依据河上肇的译文。再如，大钊同志先毕业于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知识使他有可能把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与俄国革命后的情况作比较，有可能把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作比较。又如，大钊同志居住的北京和工作的北京大学，在当时是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方，而他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又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这也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总之，大钊同志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对这些原因的分析中看出，大钊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极其牢固。

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所具备的思想基础，一般地说，对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说来，也不可少。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了，从而使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条件较之大钊同志那时要好得多，类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数量，前后相差极大。较好的客观条件，的确使一部分思想基础较差的人，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总的来说，大部分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具备了与大钊同志大致相同的思想基础。如毛泽东同志，到1918年下半年，在世界上已走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面前，而政治上在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同时，又提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的论断。这些再加上他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为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良好基础。历史表明，只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具备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才可能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逐步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否则，只是由于潮流的影响，骤然转变，必然会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缓慢，甚或停步不前，即使因一定的有利的客观条件而完成转变，也完全有可能在另一种环境下，发生倒退现象。

二

大钊同志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开始了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一般说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意味着在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初步了解的基础上，相信共产主义，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暴力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努力为此而奋斗；但同时仍然保留着若干民主主义观点。这就是说，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头脑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主义是并存的。有的人可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多一点，有的人也可能民主主义的观点多一点。两者的比重，因人因时而异。但不管是

谁，要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同民主主义彻底决裂，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大钊同志思想发展的过程，正是这样。从1918年下半年到党成立前夕，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有时出现反复，而总的是前进，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不断被抛弃，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增长。通过这种变化，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第一，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无庸赘言，作为共产主义者，一定要有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而这种信仰也只有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认识的基础上才能牢固。在这个问题上，大钊同志思想发展的脉络极为清晰。

在1918年，大钊同志主要是从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直观感受里，预见到“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还谈不上在理论上已经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明确的认识。理论上的研究，对大钊同志说来，是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始的。这篇系统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长文，引用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叙述，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规律的叙述，并作了说明。大钊同志写道：“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根据这个原理，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发展趋势，指出“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这说明，大钊同志已经弄清楚社会发展的原因，懂得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虽然这些解释还很一般，而且就全

文来看，有些分析并不恰当甚或有错误，但倾向是鲜明的，信念是毫不含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发展，这种信念在大钊同志的头脑中，愈来愈坚定了，愈来愈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以后，他在《再论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论述新亚细亚主义问题，主张亚洲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全文来看，他提出的一些具体论点，都是以坚信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前提的。所以，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强调：“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据此，他号召人们，拿出勇气，坚定信心，“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在党成立前夕，大钊同志曾经与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起，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斗争中，他明确指出，在中国不能搞资本主义，只能搞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够实现。他说：“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①可见，大钊同志已经树立起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不移的信仰。

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他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筹组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他不顾个人安危，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认真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他在敌人屠杀革命者的绞刑架面前，毫无惧色，视死如归，从容就义。

第二，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认识。

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并不否认阶级斗争，并以此为手段推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6、211、281、357页。

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但当资产阶级成为统治者之后，则极力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宣扬改良主义以代替暴力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不少人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欣赏和平改造而鄙视阶级斗争。大钊同志也是这样。当他作为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往往在谴责反革命暴力中一般地否定了暴力手段，而把抽象的互助、博爱观念当作所谓人类本性来宣传。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错误的东西，并不是一下子被清除的。开始，大钊同志接受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把“阶级竞争说”看作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条金线”，并运用阶级观点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妇女解放等问题。然而就在此时，他又对别人攻击马克思主义抹煞伦理观念，感到不好解释。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他尽力为马克思主义作了辩解，并明确认为互助、博爱精神的实现，只能在消灭阶级之后。由于抽象的互助、博爱观念在他头脑中曾经占有重要位置，因而这种辩解又不能不最后导致“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二元论。当然，在这个时候，从大钊同志一再强调“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来看，应该说他更多地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但又不能完全摆脱民主主义的束缚。随后，胡适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宣扬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挺身而出，予以驳斥，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这场争论的实质，是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还是要实用主义指导下的改良。大钊同志坚决反对一点一滴的改良，主张根本解决，并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作指导，“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①。显然，这里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几乎找不到什么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东西，而且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4、224、233页。

大钊同志明确把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区别开来。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前进中往往有曲折。在稍后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和《双十字上的新生活》等文中，我们又看到类似上述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并列的论述，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抽象口号。这个问题更彻底一点的解决，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特别是经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之后才达到的。这种研究可以说是从1919年12月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开始的。这篇文章具体分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辩证关系，正确指出了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政策产生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这较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所作的一般说明，有很大的不同。此后，在大钊同志的文章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日益鲜明，并力图用它分析实际问题。譬如，在揭示孔子学说的阶级本质时，他指出：“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的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又如，在分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时，他驳斥了所谓中国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的错误说法，指出：“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本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大钊同志的思想在前进中。到党成立前后，他能够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上，强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①。

至于无产阶级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的问题，大钊同志在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他谈到俄国十月革命推翻反动统治以后，建立了“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这里显然是说的苏维埃政权。此后一段时间里，大钊同志的文章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原因主要是由于这个问题在中国

^① 《李大钊选集》第301、328、376页。

并不那么现实。只是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矛盾表面化的时候，这个问题才重新提上争论的日程。所以，1920年底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大钊同志和其他成员一起，反对了小组成员黄凌霜等人的观点，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写给费觉天的信中，大钊同志也指出必须组织生产者的政府。党成立后不久，他在一次讲演中专门谈了“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的问题。他援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区分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论述，揭露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骗人本质，并明确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①当然，至于在中国怎样达到这一步，大钊同志还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说明。这个问题是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解决的。

为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推翻剥削者的反动统治，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大钊同志多次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以资借鉴。他积极从事建立共产党的筹备工作，使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开展斗争。尤其是党成立后，大钊同志所进行的一切工作，诸如同国民党搞合作，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领导北方人民革命运动等等，无一不是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为目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中，大钊同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三，是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的认识。

大钊同志对于人民群众的正确态度，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有了新的发展。五四运动前夕，随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他开始注意工人的问题。他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中，指出在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工人生活不如骡马。他提倡劳动教育，强调

^① 《李大钊选集》第397页。

工人提高知识的重要性。同时，他还要求重视农民，指出“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从工人和农民是人民群众的主体的认识出发，他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① 这些思想，在当时都是极可贵的。它对在不久发生的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有指导意义。但这些思想，还没有能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加以说明，即使有时以俄国十月革命作借鉴，又误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粹主义者“到民间去”的结果。这既说明了大钊同志对十月革命的来龙去脉还弄不十分清楚，更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缺乏研究。五四运动的浪潮，显示了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这就使一向重视群众作用的大钊同志得到新的启发。随着从1919年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大钊同志从理论上弄清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力所造”。“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历来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总是采取愚民政策，欺骗群众，企图使人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天命”注定，不可改变的，一切努力不过白费力气，只有忍受下去。这种愚民政策，必须彻底揭穿。大钊同志写道：“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谈到中国近现代历史，他举例说，清朝统治了三百年，却抵不住人民的革命而被推翻；袁世凯则因为伪造民意而垮台；段祺瑞反抗民众，终归一败涂地。可见，“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据此，大钊同志得出革命者应该遵循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46页。

两个行动准则：一是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一是必须懂得“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①。这就是说，在革命过程中，真正的革命者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解放事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

大钊同志正是依据这样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行动的。他在党成立以后，深入研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把发动工农群众当作革命的基础；他亲自到工人群众中去，把工人组织起来，并积极训练干部，派往农村，开展斗争；他为了发展人民革命事业，自己省吃俭用，而把薪金的大部分拿出做党的活动经费；他在群众斗争中，无视危险，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他在敌人屠刀面前，坚守党的机密，尽力保护同志，宁死而不屈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心中有人民，相信人民，为了人民。

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解决了上述几个关键性问题，并在实践上自觉奋斗，这说明大钊同志已经勇敢地同障碍他前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旧传统观念实行了彻底的决裂，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大钊同志的这一思想转变的过程，带有典型的意义。一般说来，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实际斗争的磨炼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解决了上述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就都能够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与大钊同志经历完全相同的过程，只是大体上差不多，因为每个人的转变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譬如，有的人原来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则主要任务是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大钊同志在思想转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曲折性，

^① 《李大钊选集》第 339、338、340、330 页。

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动荡不定和国外多种学说涌入中国的反映。这种不稳定性、曲折性，在其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也都有类似的表现。从现有不多的有关毛泽东同志早期思想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保留着很多民主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并在此三者之间不断摇摆，只是经过领导湖南人民的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和读了《共产党宣言》等书籍之后，才最后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的发言，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确实有了坚定的信仰。当然，象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同志，在当时属于青年一代，所受旧东西的影响相对少一些，因而转变的过程可能短一些，但前进仍然是曲折的。在曲折中前进，并不是坏事。只有在转变过程中的不稳定，才能保证转变后的稳定。陈独秀在1920年初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其观点上的变化之快给人以突出的印象。可是，这种变化的基础并不牢固。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譬如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陈独秀并没有根本否定其错误观点。虽然不久他也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许多没有解决的不正确认识，终于成为后来犯路线错误的根源。大钊同志与此不同，他在曲折中前进。没有弄懂弄通的问题，积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探索；已经弄懂弄通的问题就努力着手实行。他脚踏实地，稳步前进，“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①，走着一切共产主义者应该走的道路。

三

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以后，大钊同志并没有放松改造和提高自己，以适应不断发展的革命斗争的需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4页。

要。

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并不是说一个人的思想已经纯粹又纯粹，达到什么“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境界。这种神话，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因为人的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复杂的外界事物总要给人的思想以影响，何况原来思想中的旧东西只是被否定不是被消灭，其重新恢复活力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使树立起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随时都面临正确对待客观世界，排除错误思想影响的任务。同时，实践又总是不停地向前发展，新的实践必然提出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需要新的认识。对此，大钊同志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既懂得旧意识对自己的影响，时刻警惕它，又明了革命将不断提出新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解决。这就是说，要革命，就不能在思想上停步不前，而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使主观符合客观，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永远前进。大钊同志在党成立后所走过的道路证明，他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无论在成绩、胜利取得的时候，还是在错误、挫折发生的关头，甚或在危险面前，他从不停留，坚持在斗争中前进。

大钊同志为什么能够这样呢？从党成立以后他的革命生涯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使他永远前进的重要因素：

他努力学习。这是他一贯的优点。早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认真读书、深入钻研、一丝不苟的学习态度，就得到老师和同志的赞扬。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他总要翻阅许多书籍或向别人请教，从不懈怠。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这种优点得到发扬。他非常注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工作多忙，每天至少要学两、三个小时。在党成立以后的繁忙工作中，他更感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认为不提高理论就无法完成战斗任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研究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组织问题，驳斥了资产阶级学者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污蔑；

他考察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明确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他学习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加深了对“工人政治”必将取代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理解；他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写出专门性著作《史学要论》，用新史观研究历史，指出历史发展的光明前景。同时，大钊同志也注意向无产阶级导师和革命烈士的光辉实践活动学习。黄爱、庞人铨同志牺牲后，他甚为悲痛，著文悼念。他崇敬两位烈士为“信仰的主义而死”的高贵品质，表示要“奋勇上前，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列宁逝世后，他“感伤无已”，认为是“全人类的损失”^①。他高度评价了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贡献，把列宁当作自己学习的模范。大钊同志努力学习的精神，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革命过程新提出的问题的态度。当碰到新问题时，他不懂就学，善于思考，不拘泥于旧的认识，力求得出正确结论。譬如国共合作问题，在当时党内有很多同志不同意，党中央的意见也不一致。在1922年8月的杭州中央会议上，对此争论很激烈。对这个问题，大钊同志既不草率同意，也不简单反对，而是经过认真学习和思考，听取各方意见，形成自己的见解。从当时北京党内情况看，绝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大钊同志没有被多数人意见左右，而设法说服这些同志，力求达到统一。在北京党的负责人会议上，他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说明了国共两党的现状，论证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使很多同志提高了认识。在这崭新的问题面前，大钊同志的努力学习精神，保证了他站到斗争的最前线，为促成国共合作，发展革命力量，作出极大的贡献。

他面向实际。这个优点在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显得很突出。当时，他不但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及一切旧势力阴

^① 《李大钊选集》第553、282、501页。

谋复辟封建制度的政治斗争，而且很重视社会情况的调查，向实际学习。1917年夏，他回乡省亲时，对当地农民生活、生产情况以及农民对政局的见解进行了深入调查。他发现广大群众对政局变化的一些正确看法，是那些住在城里的有名望的人士认识不到的。所以，他得到结论，认为真正的社会舆论在乡间、在群众中。这个结论对于他进一步认识人民群众的作用很有帮助。面向实际的优点，在大钊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得到发扬。他认为，研究理论和研究实际是交相为用的。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大钊同志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时候，从未离开过实际斗争。他写的文章，除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类属于系统介绍理论的文章外，大部分都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党成立以后，大钊同志面临着许多新的实际问题。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国共合作、军事斗争，一切都是新的，需要从头学起。对于这些不熟悉的实际，大钊同志的办法是走进去，探索和提高，力求正确解决问题。除了同国民党打交道是他的很主要的一项工作外，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中，都有他的足迹。他的工作很忙，往往研究和处理问题到深夜，可是凡认为有必要参加的群众示威游行一类活动，都亲自到现场直接掌握情况。对实际斗争中提出来的问题，他总要收集材料，加以研究。他研究过劳动问题、童工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红枪会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学生运动方针问题，等等。正因为大钊同志面向实际，从实际出发，在研究实际的基础上提高，才使他在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有正确的认识。如在农民问题上，自幼生长在农村的大钊同志很早就提出要重视它。后来，一段时间，大钊同志很少有机会接触这方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0页。

面的实际，所以也就没有深入的研究。随着斗争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农民问题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促使他去研究这个问题。他阅读了大量的公开的历史和现实材料，参考了各地党组织上报的有关农村情况的内部调查，经过去伪存真的鉴别和慎重周密的逻辑推理，写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得出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的正确结论。

他有错必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不会犯错误。很多事实都说明，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会犯小的错误，而且也可能会犯大的错误，问题是如何对待错误。一个革命者能不能永远保持前进的活力，关键在于能不能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大钊同志对于自己的一些错误认识的态度是明朗的。他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一经认识到自己确实错了，就立即决心改正。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大钊同志对于胡适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主张，一时没有认识清楚，参与了他们的一些活动。这在当时是个较大的政治性错误。不久，党发表了第一次对时局宣言，批评了“好人政府”一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革命精神。大钊同志看了这个文件，经过思考，认为自己的看法不对，党的主张正确，就表示改变观点，并在同胡适等人一起开会时，宣传了党的主张，从而争取了一部分人对党的同情。

1923年，大钊同志在《时》一文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能从昨日来到今日，不能再由今日返于昨日。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的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说得多么好啊！“只能前进”，这既是对革命者的号召，也是他生活的准则。一切旧的思想影响，革命征途中的羁绊，都没有阻挡住大钊同志前进的道路。他在党成立后，继续前进，顽强战斗，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这种精神，是永垂史册的。

向李大钊同志学习，永远革命，永远前进，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我们革命后代的历史任务！

（原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试论李大钊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

李世平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的李大钊同志，为革命慷慨就义已经有五十二年了，他从理论工作到实践斗争，从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到共产主义战士，始终十余载，勋业不朽，遗文犹存，至今深受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追念和敬仰。大钊同志的著作已编入《李大钊选集》的共 133 篇，其他同志搜集的目录已达三百余篇。鲁迅写《〈守常全集〉题记》评论大钊同志丰富的遗著说：“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解放以来，不少同志研究大钊同志的论著，基本上都采纳鲁迅的评论精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先烈的光辉榜样，发扬革命传统，加深对五四思想史的了解，成绩是可观的。

但是，在中国人民经历了同“四人帮”惊心动魄的搏斗以后，当我们趁“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和《李大钊选集》重新印刷发行的机会，重新学习“先驱者的遗产”，不能不觉得，过去的研究忽视了李大钊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这个方面的论述。有的研究还似乎把他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混淆起来，一概当作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的残留。这就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了。

一、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

无产阶级民主的概念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既对立又有联系，从后者到前者，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共产党宣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这是说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发得更明确：无产阶级专政，“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同时“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在这里，无产阶级民主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彻底否定。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没有任何可以混淆的地方。

《共产党宣言》还提到，“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包括例如同德国革命的资产阶级“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无产阶级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另一层意义。从民主革命的任务看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可以说无产阶级民主继承或夺过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旗帜，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但是从民主派革命中两个阶级各自的作用和革命的最终目标上看，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又有根本的区别。所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为彻底完成革命，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奋斗。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批原来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范畴的革命民主派先后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他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根据中国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的认识，是努力参加民主革命的无产阶级民主派，是为实现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而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同志是较早完

成这样的转变的。

资产阶级民主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建立代议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马克思和列宁都多次指出，那是少数人的民主、富人的民主，是对多数人的专政，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压迫人民，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实质。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在中国五四时期，它的革命作用仍然存在，只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已经充分暴露，它的政治理想已经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先进人物探求新的出路和继续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新文化中我们看到，大钊同志首先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局限性，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因素。

大钊同志在辛亥革命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里，便对人民多年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感到幻灭。他发现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和对广大人民的专政这样的事实，“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①，“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他明显地向往着多数人的民主却暂不知道出路何在。随后，当陈独秀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介绍典型的代议制的法兰西民主的时候，大钊同志却对代议制发生怀疑：“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然即假定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③相信可以找到比代议制更为民主，使大多数人享受民主权利的国家制度。这时，他在民主思想上的量的变化

① 《李大钊选集》第8页。

② 同上，第1页。

③ 同上，第50页。

是很明显的。不久以后，果然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找到了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制。他欢呼：“俄则由极端之专制主义，依猛烈之革命，一跃而为社会民主矣”^①。高兴地看见资产阶级民主制那一套完全被无产阶级民主制所代替：“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②这可以标志大钊同志的民主思想已经发生质变，即明确赞成无产阶级民主。他在欢呼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胜利时，也并列地欢呼民主主义的胜利，并随即补充说明：“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③界线分明，毫不含混。此后，大钊同志继续使用的民主主义及相关的词汇，在实质上，都应被理解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继续。他开始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而奋斗，在1922年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的主张^④，同时也探索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民主远景。

大钊同志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和《平民主义》两篇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平民政治、平民主义，都是通译为民主的 Democracy 的别译。）他认为无产阶级民主的目的，“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当然，“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7页。

② 同上，第114—115页。

③ 同上，第135页。

④ 同上，第401页。

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但当“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時候，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工人政治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泯灭，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民主的探索虽然比较粗略，但大钊同志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应该逐渐由对人身的统治过渡为对事物的管理，把这看做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本内容，显然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二、人民群众和圣哲英雄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基础则主要是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关于“天赋人权”之类的学说。这类学说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血统等级制度等方面，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但是，抽象的人权学说掩盖了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划分为阶级的事实真象，在根本上抹杀了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往往把创造历史的功绩归结为“杰出人物”、天意或上帝。法国伏尔泰就认为，人们需要上帝，即使没有上帝，也会制造一个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不只是少数剥削阶级民主的理论根据之一。

大钊同志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根据，是他在1920年明白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他说：“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①。值得注意的是还在1916年，他已经使用另外的语汇表述

^① 《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了类似的思想：“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①“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②前后对比，可以说，大钊同志在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具有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这应该是他能够较早地突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局限性，较早地具有无产阶级民主思想因素的哲学上的原因。

大钊同志《民彝与政治》这篇重要文章，是为反对当时袁世凯进行尊孔复古、称帝复辟的活动而写。当时思想界出现迷信孔丘等“往圣先哲”、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的“新英雄主义”、“超人哲学”，以及吹捧专制独夫为“神武”人物种种逆流。大钊同志因此提出，要根除专制政治，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不但要打倒袁世凯，还要从思想上彻底破除对“神武”人物包括“往圣先贤”和当今“英雄”的迷信崇拜。因为，“残民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大钊同志的认识不同于当时“打倒孔家店”运动中某些形式主义的片面观点。他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孔丘和其他圣哲英雄，而是历史主义地具体分析他们的不同作用，把他们放在“当然之位置”。他认为孔丘是“一代哲人”，而不是“万世师表”；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嘉言懿行”可以“示人以创造之力”，而“不在其法制典章示人以守成之规”。这样，就有力地揭露了袁世凯利用祭天祀孔的宗教仪式，鼓吹先哲微言大义的神圣条文，“以图压服人心，钳制人口”，实现恢复君主专制的阴谋，解脱了人们对圣哲的迷信枷锁。大钊同志承认英雄，但不承认英雄是“神人”、超人或天才的迷信观点。他指出：“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轶类者，非由

① 《李大钊选集》第46页。

② 同上，第50页。

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英雄只能产生于人民群众之中，并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则是“奸雄”、“大盗”。于是，大钊同志相当精辟地论证了民主与专制的重要分界线，在群众与英雄的不同关系上：“彼其众庶，立于水平线以上，以驱策英雄俾为民用可也，降于水平线以下，以待英雄之提撕，听英雄之指挥不可也。”

大钊同志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十分敬重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但同样没有把他们奉为神人。他赞扬“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①。把革命领袖比作良朋、忠仆和战士，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无产阶级的民主精神。

上面大钊同志说的“众庶”，虽然缺乏明确的阶级内容，不完全等于现在的“人民”的概念，但也不同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大钊同志早就看到中国农民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是人民力量的重要表现：“一部廿四史中，斩木揭竿，狐鸣篝火，孳然起于草泽之间者，不绝于书。……固皆民彝见制，迫不得伸，乃于偶变逆激之道以求其达之征也。”^②而“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③。这基本上是说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中国，这是很可贵的认识，是大钊同志突破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五四运动以后，大钊同志初步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由于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而更臻完备，明确了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体。他在1924年就指出“在国民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1页。

② 同上，第45—46页。

③ 同上，第46页。

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①。这是当时最接近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提法。又指出：“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份。”^②他很早就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认为“只要知识阶级加入了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③，“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④。以后大钊同志研究北方各省的红枪会组织，对农民运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总之，他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所达到的正确认识，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作出的贡献，也是他的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真理和民主

大钊同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是不断寻求真理的一生。他主张：“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毋宁信真理。”坚信真理，而不轻信一般公认的权威；并提出思想上言论上的民主自由，是认识真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说：“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自信，是要求个人对自己思想言论活动采取民主的态度，即实事求是，不自欺，不盲从，不计毁誉。“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但能据乎事实，便于真理为邻。社会或誉或毁，都不应影响个人思想言论的民主。因为“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以言违时之弊犹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00 页。

② 同上，第 525 页。

③ 同上，第 149—150 页。

④ 同上，第 308 页。

小，以言惑世之弊乃无穷焉”。所以，“自信”是个人探求真理必须具备的主观条件上的民主。

大钊同志说的“自由之言论”，是指社会性的思想言论的民主，是探求真理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上的民主，是更为重要的条件。因为，仅仅“以一人之智察，而欲洞明一切应有尽有之实体，曷乎其难”，必须“令各人竭其所知”，才能经过广泛的社会实践去认识和检验真理。当然也可能因此而“见仁见智，又人人殊”。会不会因此“一乱而不可复理”，“而真理之为物愈以淹没而不彰乎”？这往往就是专制主义者压制思想言论民主自由的借口。大钊同志反对压制思想言论，坚持民主自由。他认为思想言论和行为是不同的。思想就是思想，“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进行压制的行为之所以危险在于既扼杀真理，又保护谬论。思想言论的民主自由，就是让群众性的社会实践去鉴别谁是真理或谁是邪说的客观必要条件。例如，曾被孟轲诬为主张无父无君即禽兽之说的杨朱墨翟，经两千多年社会实践的检验，“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因此，大钊同志深信：“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所以无害，贵在“真实”；但能出于真实，纵或误信邪说，“都比那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还好得多”；可见“使人愚暗”，可免“教人虚伪”，然后可以有利于真理的寻求^①。

大钊同志宁信真理，不轻信权威，主张思想言论的自由，在他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有充分的体现。他不屈于当时反动派咒骂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过激主义”的思想政治压力，毅然充当中国第一个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在陈独秀和胡适都“要防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时，他公开宣

^① 《李大钊选集》第86—89页，第216—217页。

称：“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①但在他的较早著作中又说马克思的学说“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应加救正的地方”，应该怎样理解呢？当然可用他自己的声明来解释：“因为作者的知能浅陋，有误解马氏学说的地方”^②。不过更应该从李大钊同志的根本态度上去理解，看作是他宁信真理而不轻信权威，坚持无产阶级的思想言论上的民主自由的言行一致的表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真诚拥护。反之，满口拥护，其实盲从，未必是真正拥护马克思。李大钊同志是在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德奥匈诸国革命继起等社会实践检验了马克思的学说，证明它“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一开始，他就反对教条主义的空谈，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否则，“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③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他当时感到实践检验尚欠充足之处提出疑问，把马克思学说怎样运用于“解释一切历史”，是否“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④，看作是应该由中国革命的实践来继续检验的问题，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真正爱护，是创造性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这种正确的态度使他比较早就能指出：“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产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⑤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者在中国不是立刻进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首先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31 页。

② 同上，第 174 页。

③ 同上，第 230 页。

④ 同上，第 195 页。

⑤ 同上，第 230 页。

进行打倒官僚强盗的民主革命。这是当时非常深刻的认识，决非迷信权威、照搬条文能够达到的，这是创造性的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学说以外，还有大量其他学说和思想在中国广泛流行。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驳斥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张目、压迫和愚弄人民的各种反动思潮，同时也采纳倾向进步和有利民主的各种学说思想。在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在他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他使用一些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习见的论点和词汇，来阐发革命理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一类的阐发和解释本身是否精当，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但是这样的作法，原则上是否容许呢？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不是靠闭门造车。它不但总结了阶级斗争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活的经验，而且象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①不能想象，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类优秀成果的工作早已截止，或者以后的人类除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再无优秀成果可言，或者从事继承的工作并非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的权利。这些想法当然不能成立。如有任何一点能够成立，都肯定会削弱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应该肯定，大钊同志的上述作法不但在原则上是容许的，并且是完全必要的。这是不断探求真理的无产阶级民主精神，是有利于创造性地学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他使用“互助”的词汇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前景，便是一个例证。“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是“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②谁都可以理解，这里说的是用当时流行的思想和词汇

① 《列宁选集》集二卷，第441—442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225页。

来说明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社会生活中的同志式的相互关系，“互助”，有助于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何害之有？

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时热烈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呼声，至今似乎余韵未已；重读革命先驱者的遗文，仍不乏启人深思之处。过去的史学研究工作对大钊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民主思想方面重视不足，是与整个理论工作中忽视无产阶级民主的研究一致的。而理论工作上的忽视，又是实际生活中对无产阶级民主重视不足的直接反映。粉碎“四人帮”以来，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已大有生机。我们应该进一步效法大钊同志“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除陈旧学说之囿圉”的革命精神，多研究那些过去受到忽视，实则有益的问题。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收入本书时作了个别删节。）

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兼驳“四人帮”对李大钊的诬陷

谭双泉

“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五四时期第一次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公开激烈的战斗。斗争完全表明，革命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是一名英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陈毅同志曾以“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的诗句来颂扬李大钊，实际上反映了党和人民对他最公正的评价。

可是“四人帮”为了要把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竟然污蔑这次“问题与主义”论战是所谓“资产阶级内部的争论”，他当时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论文，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来欢迎十月革命的”；甚至影射攻击李大钊批判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潮的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等等。这一派别有用心胡言乱语，怎能掩盖得住历史昭昭、真理煌煌的客观存在呢！

“问题与主义”论战，实际上是分三个阶段进行的：第一段是胡适发表《不朽——我的宗教》（1918年冬）、《实验主义》（1919年春）和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5月）的战斗；第二段是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919年7月）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的战斗；第三段是胡适的

《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和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12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1月)的战斗。这次论战延续一年多的时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

—

在中国,李大钊所以成为第一个反对实用主义思潮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绝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以前,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中国启蒙思想的影响极大,几乎成了先进思想界的主流。当时,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也曾信仰过进化论。例如,他曾认为过去世界的历史,

“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①

但是,李大钊又不同于一般激进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还具有某些特点:(一)他对于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已觉察到弊病:“余诚不知以心灵理性超绝万类自夸之人类,视禽兽之互相吞噬者,相去何几耶?”并由于这个学说“本身之不完”,“野心家乃取以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②。可见他对于此说仍有保留。(二)如果说一般激进民主主义者,只是以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作为奋斗的指针,但却傲视一切,看不起劳动群众;而李大钊有所不同,他不仅毫无利己主义,始终坚持为民族的进步和解放而斗争,并深刻地同情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群众的力量。他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

① 《李大钊选集》第71—72页。

② 同上,第84—85页。

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①对于当时袁世凯“屈从”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愤慨地指出：“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于未死以前。”^②只要敢于战斗，“日本虽横，对此战血余腥之大陆，终恐其食之不下咽也。”^③因而在举国一片哀愤声中，他充满了胜利斗争的信心。（三）着眼于现实的革命活动。面对辛亥革命失败、袁世凯篡权复辟的黑暗岁月，曾经参加革命和追寻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些人动摇变节，投机钻营；一些人消极颓废，乃至出家、自尽；一些人出国留学，谋求个人出路；一些人虽坚持下来，却在徬徨苦闷；所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即取消了现实的革命活动。李大钊振臂高呼：

“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我们不能回顾“过去”，不能企望“将来”，也不能优游“现在”，而需“宜善用‘今’”。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我们必须根除“厌‘今’”这个“人类的通性”，勇敢投入现实的革命斗争，“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④（四）在思想方法上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在《青春》、

《今》、《新的、旧的》等著名文章中，李大钊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是异常明显的。例如他认为“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是宇宙变化的普遍规律。他号召青年“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创造一个“青春中华。”^⑤由于李大钊的思想上具有以上一些特点，所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他就能够更加迅速地

① 《李大钊选集》第30页。

② 同上，第27页。

③ 同上，第24页。

④ 同上，第93、95、96页。

⑤ 同上，第67、72页。

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条件，就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的炮声给当时正在摸索着前进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论文的发表，正是代表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也是他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从今天看来，尽管这些文章还有未必精当之处，然而，他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欢迎十月革命的，并且做了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最初尝试。

李大钊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同当时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认为十月革命只是“公理”的胜利，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不同，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十月革命“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①“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②因此，这种革命完全“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它和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相比，“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国革命“根于国家主义”，而俄国革命“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③。从此，人类历史进入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个“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主要是由于“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Marx）为宗主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1页。

② 同上，第115页。

③ 同上，第102页。

④ 同上，第117页。

因而这种革命的功业乃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①。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不仅最早地联系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正确观点。

首先，在革命的对象、任务问题上。十月革命以前，李大钊也和一般民主主义者一样，只意识到中国长期贫困、落后、停滞的罪恶根源在于“君主专制”，而对站在“君主专制”后面的那个敌人——帝国主义，则是认识不清的。例如，他曾以为一些“官僚政治”的国家，如日本就是向外国侵略的。而一些“民主政治”的国家，如美国就不会侵略。因而在他斥责日本的“极东门罗主义”的同时，却又赞扬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都想利用战争来夺取世界霸权，他们打仗的目的都是“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结果取得胜利的，“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②，是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警告那高兴得发狂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指出：“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③特别是在“五四”风暴到来的前后，李大钊不断指出，日本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绝“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今日中国的政治现象，但见有几个政客，抱着强盗的大腿转来转去”^④，“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并且提出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3页。

② 同上，第110、109页。

③ 同上，第113页。

④ 同上，第123、127页。

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①应该说，在此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述问题，这种对帝国主义本质和规律的揭示，促进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深入发展。

其次，在革命的动力问题上，李大钊由同情人民已发展到依靠人民的明确观点。他从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引起的世界革命的风暴中，清楚地看到了工农群众是决定历史命运的力量；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在这股革命潮流面前，就“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凜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②。工农群众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革命威力？这不仅因为他们多数，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李大钊所写的唐山煤矿工人生活的短文，实际上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帝国主义者、资本家、封建包工的三层压迫，工人“尚不如骡马”^③。他谈到农民的生活时，认定“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那些脏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他还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严重意义，指出：“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农民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对于劳动妇女解放的问题，坚持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认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就是“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⑤。他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不仅“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而且“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女人对于男子要求解放”，“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12、214 页。

② 同上，第 117 页。

③ 同上，第 154 页。

④ 同上，第 147、146 页。

⑤ 同上，第 145 页。

解放的运动”^①。

在劳动群众的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怎么办？李大钊认为，“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目的是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②，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学理，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如果“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③。

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其前途将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李大钊认为，十九世纪法国式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新纪元”，“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这种“俄罗斯式的革命”洪流，将要席卷全球。“Bolshevism 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却“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④。只有通过这种革命，才能把“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⑤。他热烈欢呼中国已经受到这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潮流的激荡，他认为十月革命是在这人类长眠的黑夜中升起了一颗闪闪的明星，中国人民必须乘着这一线光明去打碎那旧世界的锁链，为创造人类新生活而斗争。这铿锵的语言，对五四运动不能不起到了号角的作用。当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更明确地指出：“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⑥这就把由五四开始的中国革命，看成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作为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也就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国际主义者了。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30 页。

② 同上，第 146 页。

③ 同上，第 233—134 页。

④ 同上，第 117、118 页。

⑤ 同上，第 121 页。

⑥ 同上，第 255 页。

可见，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李大钊所写的主要论文，不仅最早地宣传了马列主义，而且已着手进行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工作。当时虽然对中国革命的某些基本问题，如社会性质、革命步骤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认识，但是对于革命的另一一些基本问题，如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前途问题，却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虽然还没有（这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但却孕育着这条总路线的一些基本观点的幼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必然得到不断的完善）；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但却基本上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而且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阵营中的杰出代表，反映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他是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战旗，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指导潮流前进的一名伟大旗手。这样，也就引起了一切马克思主义敌人首先是实用主义者的非难和挑衅，便不足为奇了。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来是由几部分知识分子参加，主张科学、民主和文学改革的文化统一战线的运动。十月革命以后，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开始传播时，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就有了本质不同的因素。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逐渐感到不安，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还没有带上广泛的群众性，因此他们暂时还未公开站到敌人方面去，然而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如果说，在提倡“文学改良”时，胡适还只是间接地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那末，当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时，他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不朽——我的宗教》，随即又刊布《实验主义》，公开

揭起了实用主义的破旗，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这样，就揭开了“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序幕。

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胡适把个人叫做“小我”，把全人类社会称为“大我”。社会这个“大我”是由无数个人这个“小我”活动的连续和堆积所造成，即个人造成历史、造成社会。“大我”不死、不朽，“小我”有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言行，都一一留在那个“大我”之中，随着“大我”一同“永远不朽”。胡适说，这种“社会的不朽”观念，便是“我的宗教的教旨”，也就“是我的宗教”^①。

在这里，胡适把他的社会学观点同宗教迷信联系起来，向信仰主义乞灵，不是偶然的。因为实用主义是和信仰主义分不开的。它既然否认客观真理，坚持主观真理；又认为这种主观真理，根源于自己的信仰，所以必然走上信仰主义。詹姆士就说过：“如果神学观念于具体的生活能有价值，它在实用主义上就是真的，就真到这个限度。”^②胡适把“社会不朽”论推向神学，还因为当时是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人们对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宗教和神权宗教的信仰，产生了动摇，而信仰的传统又象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他想趁着这个有利的时机来推行一种新式宗教、新的迷信，也就更容易俘虏人。

但是，他的“社会不朽”论的主要矛头，又是对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于是，他就把自己的神学理论涂上一层“科学”的油采，用神学冒充科学来进攻马克思主义。他不仅宣称“社会不朽”论是达尔文科学进化论的产物，而且公然在《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把李大钊早期进化论的思想引来为自己辩护，表面上看去，似乎是对李大钊的尊重，实际上则是用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李大钊。

^①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载《胡适文存》卷四。

^② 詹姆士：《实用主义》中译本，商务版第80页。

这样，李大钊就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如前所述，作为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对于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就已感到怀疑；而当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便对这种理论作了大胆否定。他说，“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这完全是出于剥削阶级的需要，是帝国主义“扩张领土”的需要，是一些民族“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的需要，人类社会“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此，大家才晓得这个学说是“大错的”^①。这就从原则上指出了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的错误，也就把胡适的“社会不朽”论的“科学”外衣脱了下来。

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不朽”论同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尖锐对立的。

首先，这种理论完全抹煞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规律，极端夸大偶然性的作用。胡适认为社会单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古往今来的无数个人的交互影响，造出了历史，这种社会历史的基础是个人，从根本上否认了社会的基础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李大钊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的政治、法制、伦理、哲学等等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动引起基础构造的变动。所以说它是“最高动因”，因为“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

^① 《李大钊选集》第120页。

主义社会又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胡适的“社会不朽”论，妄图用极端夸大个人的偶然行为的作用，来取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这种客观必然的规律，是极荒谬的。李大钊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社会“最高动因”的“这个生产力，非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那社会组织是万万不能打破”，这“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①

同时，“社会不朽”论又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社会改良。既然胡适认为全人类社会只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无数个个人组织起来的，这些个人不论是地主或农民，资本家或工人，帝国主义者或殖民地人民，统治者或被统治者，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一概都叫“小我”，都是组成社会这个“大我”的个人，因而阶级也就在这抽象的个人中消解了。特别是在《实验主义》一文中，他更直截了当地说，“古代的社会阶级很严，有劳心的劳力的，治人的和被治的，……这许多区别，在现在的民主社会里都不能成立”。阶级不能成立，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在他看来，组成社会这个“大我”的各个“小我”的一切言行，不论大小好坏，一一都留在那个“大我”之中一同“永远不朽”。不仅“那英雄伟人可以不朽”，而且那挑水、煮饭、浴堂擦背、掏粪倒马桶的，也“都永远不朽。”^②这就用不着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暴力革命求得“根本解决”。相反地，现在的个人，因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必须对过去的社会负责，又对未来的社会负责，只能做一点一滴的改良。尤其是在《实验主义》一文中，他更明显提出：“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但是这一点一滴一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5—186页。

② 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适文存》卷四。

分一毫全靠着你和我和他的努力贡献”。胡适的“社会不朽”论也就是他的社会改良论的理论基础。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什么叫阶级？他说：“一个社会团体，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按：指剩余劳动）”，就形成了阶级。从马克思看来，在原始社会崩溃以后，人类社会“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社会，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这种阶级的对立，必然发展到流血革命，以“争政治上的权力”^①，直至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象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才“洗出一个新纪元来”^②。只有到了这时，对抗性的“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这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规律，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活在阶级社会中被胡适叫做“小我”的任何一个个人，不管意识到了没有，喜欢不喜欢这点，“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的命运”^③。

可见五四前夜，胡适所写的《不朽——我的宗教》等论文，是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他的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点，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否认真理客观内容的相对主义在社会伦理思想上的反映，是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是地地道道的新式宗教迷信。它同旧式宗教迷信没有本质区别。虽然他在文章中反复宣称，反对“灵魂不灭”，反对上帝存在的观念等等。然而当他讲到“小我”虽死，但他的言行不论大小好坏都一一留在那个“大我”之中“永远不朽”的时候，不正是在偷偷地散布一种变相的“灵魂不灭”的观念吗？当他讲到“因果报应”的时候，又不正是在偷偷地制造一个变相的上帝吗？何况，一切封建社会的旧式宗教里的神灵和上帝，无非都是按照当时统治者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8—189页。

② 同上，第119页。

③ 同上，第188—189页。

的意志和面貌塑造出来的，都是一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不朽”。所以胡适的“社会不朽”论，尽管穿上了科学进化论的衣裳，仍然不能掩盖他的宗教迷信的神学本质。恩格斯早已说过：

“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这是十足的幼稚之见。”^①胡适也企图用这种罪恶的作法，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手段，只能是徒劳的。事实表明，只要拿起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武器，就能所向披靡，击破任何形式的封建的宗教迷信观念，拨开层层迷雾，战胜一切蒙昧主义。在这第一阶段上，李大钊对胡适派实用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的斗争，在当时知识界不能不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解放作用。

三

五四爱国政治运动象火山一样地爆发了。特别是从六三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以一支独立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反映这种社会势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以不可挡之势呼啸着而来。这时，胡适也就公开揭橥自己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如果说，他从前主要地是以封建宗教迷信的制造者、用神学冒充科学作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手段；那么到现在，他就再也顾不上披任何形式的伪装，主要地是想借助于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以遏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立即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就围绕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全面地展开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2页。

首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可不可在中国传播？胡适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一方面象泼妇骂街，嗷嗷狂吠：什么高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所以谈主义的人那么多，都是“由于一个懒字”；甚至造谣诬蔑，把社会主义比作“公妻主义”；等等。李大钊满怀无产阶级义愤，予以义正词严的斥责，指出：胡适这唾沫横飞的咒骂，无非是“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克的潮流”，但“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不仅要谈，而且要用它“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不管谁随意“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所谓“公妻主义”之类的胡言乱语，只要看看最近“本报（指《每周评论》——引者）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就“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另一方面，胡适又象巫师念咒，悲天悯人，时而利用一些无耻政客对社会主义的假冒牌号以施展恫吓，胡说“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这不是“主义”的“大危险”？时而又借助封建军阀对“过激主义”的野蛮摧残来进行威胁，说内务部“下令严防”它，曹锟、卢永祥“出示查禁”它，所以要劝诫人们“少谈”些主义。对于这套罕见的精神讹诈术，李大钊驳斥道：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我们不能因有安福派和其他假冒牌号的社会主义，就停止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这正象“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至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是任何暴力机关所无法阻挡的。李大钊认为，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识别“天经地义”和“异端邪说”的正确途径。谁要“强行禁止，就犯了泯没真实的罪恶。”何况进步思想的传播，不但禁止不了，而且“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这种禁止，只表明“我们政府的愚暗无知和恐怖的心理”。他指出：“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

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①这不仅有力的鞭撻了当时法西斯式的封建恐怖统治所推行的文化专制政策和愚民政策，而且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

其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能不能在中国生长？胡适挖空心思，使尽手段，除了在政治上实行软硬兼施，更主要地是想从理论上“证明”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在中国生长。胡适从实用主义否认真理的客观内容的相对主义出发，不仅把真理的普遍性歪曲为抽象的真理，说什么“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而且又把真理的具体性和真理的普遍性绝对对立，使“问题”与“主义”完全分离。他一会儿借口真理的具体性来否认真理的普遍性，叫喊“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只因传播的人“图简便”，便把它“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一会儿又借口真理的普遍性来否认真理的具体性，胡诌谈某某主义，只要看一、二本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所以只有“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他这样任意地割裂和肢解“问题”与“主义”的内在联系，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目的是想证明，这个“外来进口的‘主义’，”对中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列宁说过：“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②实用主义者的胡适，原来也就是这样一个唯我论者。李大钊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给予了系统有力的批判。他指出，“主义”是从具体中得来的，但具有普遍的绝对的性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最先进的工人运动的经验和过去人类知识一切优秀成果的总结，它反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16—218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 139 页。

映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是具体与一般、相对与绝对统一的客观真理，我们必须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他说：“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先生（指胡适——引者）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是否有生长科学社会主义即所谓“过激主义”的土壤呢？要知道“过激主义种子，实在是因为社会上不满意的事太多，才生产的。既有这个种子，那社会上的一切不平、不安稳、不公道的事体，就是他的肥料。既加了肥料，又要他不生长，那可有点办不到。”事实上，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中的顽固党都怕过激主义，但是都在那里培植过激主义。”^①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也是适用于中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在这里，李大钊固然还没有明确认识到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但已从原则上指出，社会主义是能够救中国的，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最后，要不要坚持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这是斗争的核心问题。既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种子可能在中国大地上生长，但怎样坚持用这个思想学说来指导中国的改造呢？是搞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还是搞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的焦点。胡适认为：“主义的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

^① 《李大钊选集》第151页。

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方法了。”这就恰好说明，胡适一类如此起劲地反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因为极端害怕中国人民有了这个思想武器，中国问题就可以得到“根本解决”了。他甚至心急如焚、惊惶万状地哀叹着，若是中国真的走上了这条“根本解决”的道路，这就是他的实用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改良的死刑的宣告！”^①的确，李大钊所要坚持的就正是这样一条为胡适所惶恐不安的“根本解决”的路线。李大钊指出，什么叫“根本解决”？“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因此“经济的构造”是“基础”，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是跟着“经济的构造”的变动而变动。当然，这个变动不是自发地到来，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如果“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了不注意”，那经济的革命，将“永远不能实现”。所以说，“根本解决”，就意味着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这种“根本解决”是解决一切具体问题的前提条件，有了这个前提，“才有把一个一个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李大钊从俄国十月革命正面的经验和第二国际执行机会主义路线反面的教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指出，“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另一方面他又认定，那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党，曾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而不敢于积极地准备条件，以武装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②这不仅有力地击中了胡适派改良主义的要

① 均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卷二。

② 均见《李大钊选集》第228—234页。

害，而且又极大地加强了当时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

四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逐渐形成广泛的历史潮流。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基本上还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范畴；五四以后，已不局限于上述的口号，而把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提到重要的地位。这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流传，喷沫鸣溅，并开始了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趋势，日益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这样，胡适就更加气急败坏，眼看既不能用神学冒充科学的手段，也不能借助封建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手段，来推行实用主义，防遏马克思主义；反而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上新的特点，甚至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于是他就在1919年12月《新青年》7卷1号上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妄图在中国建立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篡改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并在同期《新青年》上连载了杜威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讲演稿，相互配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新的进攻。接着，李大钊也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文，给予了有力的批判，斗争开始了第三阶段。

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胡适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什么是“评判的态度”？他说：“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这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是他的“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他引用法西斯思想家的先驱尼采的话来为自己作注解，是很自然的。尼采的思想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所形成的。他对自由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极端不满，认为

这一切在帝国主义时期已不能成为镇压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抵御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有力工具，而必须提出更加露骨和更加反动的适应帝国主义统治需要的社会政治观点和道德观点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发出了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狂吼。胡适运用这个原则作为对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态度，其用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这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根本观点出发，胡适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反动口号。他一方面强调，要“在研究问题上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这当然不是说，用马克思的学理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不能引起人注意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而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只有实用主义。因为实用主义不给什么特别的主张，如共产主义，只给一个“哲学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实用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①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用评判的态度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胡适埋怨当时一些复古派、国粹党反对新文化运动“而不能言其所以然”，就“是这样糊涂懵懂”，所以必须“整理国故”^②。换句话说，他要在中国建立帝国主义文化思想和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反动同盟，以便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杜威也在竭力攻击所谓“极端的唯物派”、“根本解决派”的同时，使劲地推销“新旧文化汇合”、“中西道德结合”等谬论，鼓励反动统治者要注意利用“东方的社会以家庭做中心”^③的封建家族制度，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基础。二人一唱一和，丑态可掬。李大钊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中国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卷二。

② 以上均见：《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

③ 杜威：《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新青年》第7卷第2号。

的社会性质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同他们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

李大钊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学说，指出：“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中国现代思想的变动必须由经济上作出解释。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构造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组织”。农民既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也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拿去交换。“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只有到了近代，由于“扩张市场”和“搜求原料”的需要，“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沈静的大门”。他们不仅在中国推销商品，而且开辟通商口岸，控制关税铁路等等大权。“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这种自然的“农业经济组织”受到了破坏，而另一种“新经济组织”即“近代工业”不能不缓慢地发展起来。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的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加以“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这就在中国产生了一个反对专制和迷信，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以后，逐渐地带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也是历史的必然。从一方面看，由于“现代的经济组织”的发展，工业劳动阶级的成长、壮大，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另一方面，又由于“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的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因此，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发展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是十分自然的。“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

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这是胡适一连串的恶言恶语所诽谤不了的。

在中国是否有可能出现建立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样的历史大倒退？李大钊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首先，对于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中国人民已尝够了苦头，早就给予极端的仇视和排斥。至于杜威所看准了的封建的家族制度，固然是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然而，这种封建的家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即个体的农业经济组织已经受到破坏，所以“他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而建立在这个制度上面的一切孔门伦理、纲常、名教、道德、礼义等等的封建文化思想，也必然发生动摇，跟着崩颓粉碎。要知道，以孔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由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封建的农业经济有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不能适应现代的经济基础了。那怕还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即使天天去巡礼祭孔，传播“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因此，要在中国建立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来取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传播，是办不到的。因为这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势力的变动所决定，是胡适、杜威一类所无法阻挡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①。这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胡适破坏新文化运动的反动纲领，而且对于中国半殖民地半

^① 以上均见《李大钊选集》第295—302页。

封建社会的形成，作了某些精辟的分析，不少珍贵的思想，从而也就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乃至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纵观上述，李大钊同胡适派进行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实际上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潮的第一个公开激烈的战斗。就论战涉及的全部内容来看，如列宁所说，“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种制度‘不完善’的人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①这样两种学说的斗争，贯串着论战的整个过程。它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大搏斗。

胡适派实用主义者，从“唯我论”出发，或者以神学冒充科学，制造新的蒙昧主义；或者企图借助封建法西斯的恐怖统治，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最后提出了破坏新文化运动的行动纲领。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输入实用主义，防遏马克思主义。在这样阴险狡猾的论敌面前，李大钊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不是被动地到处迎战，作枝节问题的争论，而是抓住一些基本问题，初步地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上，给予摧毁性的抨击。这不仅命中了敌人的要害，而且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加强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李大钊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斗争的艺术和经验，代表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斗争智慧和力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

量。

诚然，在从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的思想也还是比较庞杂的，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残渣，也有空想社会主义的遗留，甚至还有某些错误倾向，例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认为唯物史观尚有“流弊”、“偏蔽”，“可以拿团体行动、法律、财产法三个连续的法则，补充阶级竞争的法则”等等。然而，这一切，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不足为奇的，乃至是不可避免的。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通过资产阶级折光镜的歪曲，而且是同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国的先进分子是在这种极端复杂的思潮中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革命的政治任务已相当成熟，根本不容许当时的先进分子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去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从十月革命到五四的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仅仅以几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长达一百多年的历程。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落后，更增加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困难条件。列宁曾经说过：“在大工业发展程度最高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和它的思想家领会马克思主义最容易，最迅速，最完整，最牢实。落后的或发展速度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一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几方面”^①。因此，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出现李大钊这样的人物，使人感到惊奇的，绝不是他在理论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而是他那种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英勇战斗和献身的精神！

经过“问题与主义”论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粉碎了胡适和杜威的反动文化同盟的进攻，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改良主义的思想界限，从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

^① 《列宁全集》第16卷，第347页。

促进了一些急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建党的思想准备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李大钊亲手播下的马克思主义的种子，已在中国大地开遍了壮丽的鲜花。尽管“四人帮”是怎样承袭着实用主义者的衣钵，或者故技重演，或者花样翻新，对马克思主义极尽了蹂躏和践踏的能事，给革命先驱者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污泥，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有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越来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照耀着我们新的长征道路上的灯塔。当我们缅怀先驱者在一片荒凉无际的草原上披荆斩棘，献出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最初开辟道路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多么不可遏抑。让我们更高的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努力奋斗！

（原载《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李大钊的史学思想

叶桂生

李大钊（1889—1927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青年时代，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①，进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受过“新学”的熏陶。其后又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本科，学习法律和经济。在那里，他接触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也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16年回国后，李大钊先后担任《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以及《晨钟报》等进步刊物的编辑或主任编辑。1918年1月，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1年辞去），有机会接触大量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和一些马列主义原著，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写作。1920年7月，他被聘为北大的教授，在史学、经济、法律等系任教，直至1925年8月。此时，在一般进步学生的眼里，李大钊已是很受尊敬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了^②。

在历史学方面，李大钊的著述也不少。他是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史学大家”^③之一。他最早在我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出了全部历史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作”、“重作”的主张；他作过研究西方历史学发展史的尝试，编有《史学

① 李大钊：《狱中自述》

②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③ 杨鸿烈：《史地新论·自序》，《晨报社丛书》第20种，1924年印。

思想史》讲义^①。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李大钊著《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概论。李大钊的史学著述主要集中在1919年至1925年。那几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正是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时代。这一转变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反映，就是“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②。李大钊就是亲自倡导历史学革命的先驱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在今天，正确地阐述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以及他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应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

唯物史观是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我们考察李大钊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必须注意到他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的巨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诞生于欧洲，半个世纪后，即本世纪初，才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在最早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涉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著名论点。例如1906年，《民报》第2号登有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除简略地介绍马克

① 李大钊在1920年曾开过《史学思想史》的课，笔者见到该课的讲义（抄件），包括有“史观”、“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韦柯及其历史思想”等部分，除“史观”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已收入《李大钊选集》外，其它尚未经整理出版。对该讲义的研究，当留待以后来作。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658页。

思、恩格斯的生平外，还着重译述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几段文字。“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译成：“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1908年《天义报》第16—19期合刊号上，译载有《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编者在按语中特别指明：“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但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将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是李大钊。

1919年5月，李大钊担任《新青年》的责任编辑，适值马克思诞辰101周年。他对这位世界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深怀敬意，组织了一期“马克思研究”专号，载入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发表自己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同时，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晨报》副刊也创辟“马克思研究”专栏，除登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外，还译载马克思原著《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李大钊在政治上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后，在理论上全面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作了概括的介绍和评述。这里，我们仅联系他的其它论文，就其历史观加以分析。

河上肇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扼要地指出：“观察社会的变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適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件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①。在李大钊的笔下，唯物史观的这一特征得到更明确、更详尽和更深刻的阐述。他根据河上肇的译语，抄录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段论述，言简意赅地写道：“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

^① 《新青年》，1919年5月，第6卷第5号。

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①他博览群籍，学贯中西，从世界历史学发展的角度总结了历史观的演变，正确地指出，在马克思以前，各种流派的史学家考察社会变革的原因，总归于“历史精神”或“宗教的”、“政治的”缘故。“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②，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归根到底，“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支配的。什么是“物”的势力？用李大钊当时的提法，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

李大钊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归纳为唯物史观的两个要点，那就是：第一，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这是“基础构造”。一切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宗教的、哲学的，简言之，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表面构造”，或喻之为建筑中的上层。“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③。这里，他讲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无作用呢？他在另一处写道：“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④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积极的能动作用，它要为基础服务，有时会影响、破坏，但不能根本地扭转经济基础变革的方向；上层建筑能动作用的大小程度，最终还是受社会生产力状况的制约。

① 《李大钊选集》179页。

② 同上，第337页。

③ 同上，第186页。

④ 同上，第193页。

第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称“社会组织”）二者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它、妨碍它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新的、更先进的生产关系，当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机体中成熟之前，是决不可能发生的，“恰如孵卵的情形一样，人为的助长，打破卵壳的行动，是万万无效的，是万万不可能的。”^①

其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并非马克思的创见。1852年，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特别说明了他在阶级斗争学说上的新贡献，亦即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一般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点^②。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阶级斗争说也并不陌生。尤其是“民国”以后，随着西方各种杂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夸谈“阶级争斗”更成了舆论界的时髦。应该强调指出的是，李大钊一旦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和以往曾影响过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划清界限；在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时，较为准确地体现了马克思所申述的基本观点。他极其严格地首先把阶级视为经济的范畴，指出马克思讲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他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6页。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32—333页。

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①同时，他又把阶级看作历史范畴，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他按照人类社会的发展，分析了阶级、阶级斗争产生和消亡的历史进程，精辟地指出：“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终始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阶级的社会只占了短暂的一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李大钊认为，与其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不如说是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他还明确地宣布：“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③，“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④。资产阶级出于一己之私利，为了维护其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总是把阶级对立说成合理的、永久的；而无产阶级代表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认识并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他们敢于公开宣布，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使阶级归于消灭，社会走向大同。李大钊的历史观不是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的，其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是一个鲜明的标志。

列宁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旧的历史理论两个缺点时指出：“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⑤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说明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7页。

② 同上，第189页。

③ 同上，第382页。

④ 同上，第224页。

⑤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李大钊的历史观中占了最突出的部分。在当时的文化界，这些也是熠熠闪光的思想。

李大钊指出，唯物史观确认“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它“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力所造”^①。这“人”就是指作为物质资料生产者的普通劳动民众。民众用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他们是高尚的、神圣的。“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②。无产阶级的史学就是要引导人民，使大家懂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③。他告诫人们，“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④。他号召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要树立起依靠自己解放自己的坚强信念，奋起作不懈的斗争。“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⑤李大钊热情地欢呼：“民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⑥

无庸讳言，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是逐步提高和成熟的。在最初的一些文章里，免不了夹带着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论点或提法。这一点可以从李大钊同志初期理论活动的历史条件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5、339页。

②③ 李大钊，《孔道西的历史观》1923年12月，见《守常文集》上海北新书局1949年新1版，第75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30页。

⑤ 同上，第226页。

⑥ 同上，第332页。

得到合理的解释。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扩大了在华的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面粉业，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壮大。这就为在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感召下，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时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科学技术落后，不少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普遍存在着封建性的剥削；工人运动刚刚兴起，尚处在自发的阶段；尤其是广大的农村，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经济结构仍居统治地位；加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封建性的军阀统治，以及国际上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涌入，又都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带来了不利和障碍。李大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正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的，他的文章中的欠缺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在今天看来，这仍是瑕不掩瑜，无损于他整个思想体系的光辉。

唯物史观的传播，给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民主思潮注入了新鲜血液。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个传播也更加促使思想界的阶级分化，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斗争中继续前进，直至组织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同志后来在回忆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道：“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指1918年），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①“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指1920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②。这年年底，他在

^① 斯诺：《西行漫记》，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6至11页。

给当时在法国的蔡和森同志一封回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①。

唯物史观的传播对于历史学的发展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中，简明地叙述了“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原理”，即历史唯物主义，接着指出：“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②李大钊也敏锐地洞察这一点。他把唯物史观的发现比作是“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这种“运动”类似于生物学上达尔文学说的作用。它将以往历史学、历史哲学家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③。“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④

我们知道，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文化思想界经历了“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的反复斗争，历史学界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战场。那时，一批资产阶级思想家用以批判和冲击旧的封建主义史学的思想武器，就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庸俗进化论，或称社会达尔文主义。它认为，宇宙间“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⑤，“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宇宙之内日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⑥。这种进

① 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3集。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③ 《李大钊选集》第177—178页。

④ 同上，第294页。

⑤ 严复译，《天演论》（上），“导言一，察变”，1898年。

⑥ 同上书，“导言二，广义”1898年。

化论观点的宣传极大地影响到历史学的变革。过去，先进的思想家为了宣传改良主张，曾对宣扬怀古、循环史观的封建史学进行过抨击，但由于不掌握新的思想武器，他们与旧史学的斗争终究跳不出封建主义的今古文经学论争的圈子。现在，用进化论的思想武装起来，使之有可能突破封建儒学经典的藩篱，在中国创立资产阶级的新史学体系。此外，西方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的传人，也为新的史学研究工作提供了门径。1902年，梁启超用“新民”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了《新史学》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史界革命”主张。他激烈地批判封建史学，斥之有“四蔽”、“二病”，倡言：“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①。再过两年，即1904年，另一著名资产阶级学者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问世。这部未完成的中国通史可以被看作是对梁氏“史界革命”的一次实践。作者运用上述进化论的学说，把中国历史放在从上古、中古到近古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强调古今事变的因果联系，其编纂体例又注重揭示社会的进化规律。象这样一本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新颖的历史书，当时是颇受读者欢迎的。这表明，进化论思想在中国史学发展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至于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陆续增加了对世界史，尤其是法、英、日、俄、印度、菲律宾等国历史的译著和研究，开阔了史学领域，也是运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所带来的成果。

然而，庸俗进化论毕竟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它用生物学的术语解释人类社会的现象，从而引申出一套“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结论，直接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政策辩护。作为一种历史观，庸俗进化论是反科学和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说得好：

“生物学的一般概念，如果被搬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就变成空

^①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四册第3、5、10页。

话。”^① 要分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物竞天择”说显然无能为力。它既不能找到促使社会不断发展的真正原因，也发现不了活动在历史舞台上的主体。中国资产阶级使庸俗进化论服务于要求变法、自强的主张，反映了它政治上的软弱和理论上的贫乏。随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文化思想上结成反动同盟。和这样强大的敌人较量，资产阶级免不了败下阵来。五四前夕，康、梁、严、夏等人，还有一批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甚至包括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志士章太炎等，都被卷进了反动的复古逆流。事实宣告了资产阶级“新学”或“西学”的破产，也宣告了庸俗进化论的破产。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索，终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介绍，在当时“实在是陈腐极了”^②的史学界，是开辟新径的创举。其后，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阻力，但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成了进步学者的神圣职责。据统计，从1920年至1930年的十年间，公开出版的马、恩、列、斯译著达八十多种，其中如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瞿秋白译《列宁主义概论》（1925年）、柯柏年译《哥达纲领批判》（1925年）、《国家与革命》（1927年）、李一氓译《哲学之贫困》（1929年）、陈启修译《资本论》第一卷（1930年）、吴黎平译《反杜林论》（1930年）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这十年中，出版翻译外国学者研究唯物史观的专著也近十种，如李达译荷兰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吴念慈译俄国普列汉诺夫的《史的一元论》（1929年）、郑里镇译日本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1930年）等。至于发表探讨唯物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7页。

② 朱希祖：《新史学》序，1921年，商务印书馆印行，第4页。

史观和社会发展史的论文，数量更多。对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和宣传，为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那场社会性质、社会史大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方面，李大钊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1933年，鲁迅为行将出版的《守常全集》作序指出，大钊同志的遗文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①。我们以为，用鲁迅的话来评价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上的贡献，是很恰当的。

二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位革命领袖，他的主要精力当然不可能放在历史学的研究上。但是，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去分析中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所作出的成绩，却是同时期的学者、专家们无可比拟的。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正确地阐述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历史地考察和批判封建主义的孔学与孔孟之道，说明无产阶级新道德一定要取代旧道德的必然性，写下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著名论文。他十分重视对农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其经济状况以及思想意识、农民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都作了精湛的论述。1925年底发表在《政治生活》上的《土地与农民》是我国最早的一篇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农民的历史和现状的重要论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②他在北大教学的讲义《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又是自

① 《守常文集》，北新书局，1949年新一版第2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535页。

觉地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所作的初步的探讨。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文化、学术界，显示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力量，使人耳目一新。尤其应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那几年，李大钊对于历史学理论更作了可贵的探索。

1928年，何炳松在《通史新义》自序中说：“吾国近年来史学界颇受欧化潮流之激荡，……其对于西洋史学原理之接受，正与一般政治家、经济学家、新文学家同，一时顿呈饥不择食、活剥生吞之现象”^①，这大体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史学界的状况。当时，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续传播；另一方面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出于阶级的偏见，也慑于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恫吓，表现了对唯物史观本能的抵制。他们“厌故喜新”，抱着极大的兴趣热烈地向西方寻求所谓“新”的理论。于是，什么杜威的实用主义、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鲁滨孙的多元史观、塞利格曼的经济史观等等，统统被介绍进来，当作宝贝。这些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流行的反动学说，形式上各成一家，但无不极端敌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宣扬历史唯心主义。它们的输入，使史学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中国史学究竟能不能最终摆脱封建主义经学的羁绊，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研究历史究竟用什么观点作指导？“一时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有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之概”^②，李大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探索历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的。

1920年后，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女子高师、师大、朝阳、中国等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唯物史观研究”，陆续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桑西门的历史观》、《孔道西的历史观》、《时》、《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与哲

①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1页。

② 何炳松：《通史新义》自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11页。

学》、《演化与进步》等重要的论文和演说，直至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基本上汇集了这些论文的观点。在这些论著里，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锐利武器，对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一切旧史学、史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就历史学中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创造性的见解。特别意义深远的是，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全部历史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改作”、“重作”的主张。

“什么是历史”？或者说“什么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开宗明义地这样提出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只要一提起历史，便自然罗列出二十四史、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之类，似乎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传入后，“史料即史学”又逐渐为一些人接受，怀疑这种说法的似乎也不多。尤其是那位自诩有“历史癖”的胡适，继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又打出“整理国故”的旗号。在他的鼓吹下，研究历史就等于“埋在南窗下读死书”，去钻故纸堆。总之，在以往的旧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只是一堆僵死的、毫无生气的本本上的记录。

李大钊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历史作了崭新的解释。他说，象史记、通鉴一类的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它们不是真正的历史，而仅是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历史所应重视和利用的史料。“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们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①。“历史学即以此活历史为所研究之对象者也”^②。这种活的历史，内容极其广泛，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页。

② 李大钊：《清代通史序》，1923年12月。

包括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整个社会的变革”，既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道德的、学术的、宗教的等等。这样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①。

对于历史的绝然不同解释，反映了两种历史观的尖锐对立。当时，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那种“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观，“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他希望一切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共同担当起“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②的重任。他自己的那几篇讨论时间辩证法的文章，就是针对章行严、梁启超等人的循环、复古谬论而作的。章“一面说，从前衣服既由宽大而趋于瘦小，今则复由瘦小而返于宽大，以证史相的反复循环；一面又说唐碑不如魏碑，魏碑不如汉碑，以证人文的愈趋愈下”^③。梁启超早年也抨击过孟轲的“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可是，如今他却“以移时抛故”，大大地倒退了。1923年，他在一次学术讲演中，对原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作了“修补”和“修正”。他自认，“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世界只怕也是如此”^④。整篇演说和文章，“行间字里，几全为悲观的论调所掩蔽”^⑤。他甚至还发出这样今不如昔的哀叹：“依我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⑥。照章、梁这班“论坛权威”看来，历史不是向前发展，而是一天一天地退化；在经过“一治一乱”的无数次循环之后，人类似乎要回到穴居的时代去。李大钊严肃地批评了这种“崇古卑今”的循环倒退论。他指出，“时间”是有进无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291页。

③⑤ 同上，第488、489页。

④⑥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第14册第5页。

退、一往不返的，“今日之日不可延留，昨日之日不能呼返”^①，即使有时从现象上看，在发展的途中出现了反复、循环；然而这循环亦是顺进的，不是倒退的，是螺旋式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时间”如此，人类的历史也自然是这样，“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②。过去，封建史家常常言必称三代，宣扬一套世愈古治愈盛的道理；现今的“怀古派”也往往发伤时之慨叹，动思古之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着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其实，他们所梦寐向往的只不过是些草昧未开、洪荒未拓的景象。我们“新历史家首要当打破此种谬误的观念，而于现在于将来努力去创造黄金时代”^③。李大钊还告诫人们，社会向前发展，如果谁有一瞬的徘徊、半点的踌躇，作旁观、回顾，那么，就会被遗弃在后面，当了时代的落伍者。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实践正好为李大钊的结论作了注脚。

当然，如果仅仅指出历史是活的、进步的，还不够。问题在于，这活的历史或“人类社会的变革”是不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可寻？这是能否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权威专家都是不可知论者，唯有李大钊站在捍卫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作了十分肯定的回答。

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同自然界一样，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是客观存在。“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现他，确定他了”^④。过去，人们对于历史的“解喻”受到条件的限制，无法认识这种客观的规律。历史上活动的本体是人，人又是有思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6页。

② 同上，第433页。

③ 李大钊：《史学与哲学》，1923年4月17日，天津《新民意报》副刊“星火”。

④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6页。

想、意识和感情的，因此，往往就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社会的变迁、沿革，完全是由于人的思想动机所支配。只有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这样子遂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地位”^①。在这样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李大钊进而提出，全部中国历史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南，“改作”、“重作”。这就是实行无产阶级的历史学革命的主张。

提出历史要“改作”，是不是因为旧的历史书“缺乏充分的材料”，或现时代的历史学家具备了什么“特殊的天才”呢？否。李大钊认为，历史观是研究和编著史学的理论基础。“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和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②。举例来说，对于火的发现和农业、农具的发明，旧的史书视为燧人氏、神农氏等半神的圣人之功德，现在看来，“实为人类生活一点一点的进步的结果”；前人为孔子立传，总是说他出生时有若何奇异祥瑞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吹得天花乱坠。“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正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③。这样看来，研究历史，“推翻古人的前案，并不算什么事”^④，“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⑤。

李大钊为了论证“改作”历史的必要性，在论著中多处反复强调了理论观点对于史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意义，正确地阐述了史观和史料的辩证统一关系。下面这段切中时弊的论述，笔者以为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5页。

② 同上，第6页。

③ 同上，第7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483页。

⑤ 同上，第290页。

在今天仍不无教育意义。他说：“史学家应否有一个一定的历史观，言人人殊。或谓史家宜虚怀若谷，以冷空的智慧，观察史实；不宜预存一先入为主的历史观。此言殊未尽然，史实纷纭，浩如烟海，倘治史实者不有一个合理的历史观供其依据，那真是一部十七史，将从何处说起？必且治丝益棼，茫无头绪。而况历史观的构成，半由于学问知识的陶养，半由于其人的环境与气质的趋倾，无论何人，总于不知不觉之中，有他的历史观在那里存在。夫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①

“改作”历史就是要求研究者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对于个别的、特殊的史实进行考察，加以确定、整理和记述，而且进一步探索事实的“理法”，即规律；不仅注重单个史实的特殊“理法”，而且还要进一步去研究许多事实之间的联系，求得它们的普遍形式、性质和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概括就是历史学理论。李大钊指出：“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究。”^②

我们强调历史学理论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对于具体史实的搜集、考证和整理，相反，史学家应以搜集、考证史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工夫。“个个事实的考证，实为一般理论的研究必要的材料。必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法的发见，始能比较明确”^③。就当时史学界的状况而论，具体史实的搜求、考证虽有显著的成绩，但总的说来，仍是很不理想的。李大钊特别要求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要亲手做史实的调查、搜集、考证和确定工作，自辟蹊径，不应依赖他人。李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42页。

②③ 同上，第17页。

李大钊所反对的，是那种摒弃理论研究，“只为以欲明此特殊事例的本身为目的的考证，并非以此为究明一般性质理法的手段之考证。”^①这种“考证”专家实际上是划地为牢，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拒于科学之外。在科学发达、人们的历史知识进步的今天，这种“考证”工作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新史学”，恰恰相反，他们的史学尚处在“幼稚的时期”。

当时的学术界，也有些人十分看重历史研究法的探讨，甚至把有关研究法的论断也当作历史学理论。李大钊对于这二者作了严格的区分。历史学理论是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一般性质、形式、规律的学问；历史研究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和规律的方法，它包括了要交待历史学的材料都是些什么？怎样去搜集、编制、整理？又怎样从材料和事实中去考察一般的规律？历史研究法还可以包括一种历史编纂法，即说明怎样依学术的方法去编著史书，怎样绘制图表等。总之，“历史研究法是教人应依如何的次第方法去作史学研究的阶梯学问，是史学的辅助。历史理论则非别的学问的辅助与预备，实为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要部分”^②。李大钊针对学术界普遍轻视历史学理论研究，以及这门学问近乎空白的状况，在《史学要论》一书中，单辟章节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体系、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极其广泛的，那么，历史学理论的体系也应该是庞大的。它至少可以包括六个方面，即“人类经历论”、“民族经历论”、“国民经历论”、“社团经历论”、“氏族经历论”和“个人经历论”。他对这六大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都作了大体的规定，并且指出，在研究的次序上，应以“个人经历论”为出发点、着手点，“人类经历论”到最后成立。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4页。

② 同上，第32页。

社会科学中，与历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大致也有六类，其中，李大钊着重分析了文学、哲学、社会学，尤其是哲学。他说，中国自古以来，文史不分，然二者毕竟不是一门学问。编写历史需要借助文学家的笔墨，以使叙述的史实绘影绘声，增加史书的感染力。但是，这种描述应有所限度，不能损害历史本身的科学性。“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①。历史学和社会学都以社会为对象，前者目的在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后者乃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换言之，“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②。至于历史学与哲学尤其密切。一个人历史观的形式，固然和他处的环境、时势有关，而过去或当代的哲学思想，直接间接地给以陶冶和感化，亦是个很大的因素。所以，“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③。反过来，哲学对于人生界、自然界、宇宙一切现象的综合考察，又以特殊的科学，如历史学的研究为基础。特殊科学在研究中得到的一般规律的见解，常含有哲学的思想；其具体观察问题和思考的方法，也能供哲学研究作参考。特别是对于某一国家、某一时代、某个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历史的探讨，即哲学史的研究，又直接是属于历史学的一个门类，历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法完全适用于哲学史的研究。李大钊关于历史学理论体系和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历史学的科学性。它使人扩大了眼界，增强了实现历史学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应强调指出的是，李大钊坚决主张进步的史学工作者，应走出学院，使历史学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手中求解放的斗争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41页。

② 同上，第52页。

③ 同上，第43页。

武器。关于史学研究对于人生态度的影响，亦即教育人民的作用，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基本任务的阐发，是李大钊的无产阶级史学革命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归纳起来，那就是：第一，历史学要给人民一种科学的态度，使大家树立起脚踏实地的人生观。“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①。它应教育人们，凡事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第二，历史学应给人们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②第三，历史学要使人民觉悟到自身力量的伟大，引出“舜人亦人，感奋兴起的情绪”。旧的历史学宣扬历史是神造的、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在这种史书里，帝王公侯被说成受神的保护，人民大众对自身遭逢的悲惨境遇，不但不能反抗，甚至不敢怨恨，只得服服贴贴地任人宰割；无论他们受的痛苦残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和“我生不辰”的悲吟。无产阶级的新史学则不然，它把什么“赫赫”“皇矣”的天神、“天亶”、“天纵”的圣哲统统推倒，“导引我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③当人们谈论起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为国家、民族而舍身效命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这些英豪并非与常人有所殊异之处，只不过他们感觉到社会的需要敏锐些，要为社会服务的情绪热烈些，从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53页。

② 同上，第55页。

③ 同上，第56页。

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①。李大钊说，他自己就是本着“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的宗旨，来写《史学要论》这本书，为战斗的历史学作宣传的。

李大钊对上述诸问题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改作”历史的主张，廓清了笼罩史学界的迷雾，为无产阶级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指明了方向。1927年4月28日，在蒋介石、张作霖的谋害下，李大钊壮烈地牺牲了，年仅39岁。当初，他在北京女子高师讲授“社会运动史”时，曾“惋惜地对同学们说：‘现在还没有人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编出一部中国历史来。现在历史教材不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本书’”^②。反动派夺走了他的生命，使他未能亲自实践“改作”历史的主张。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虽然如此，李大钊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在史学上的贡献，还是决定了在中国史学史上，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反动派宣布他为“阴谋分子”并处以绞刑，还查抄和公布他的“罪证”（即革命文献）而消声匿迹。我们可以看到，在李大钊身后，一些探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专著还在引述着他的观点^③。更有人明白地指出：“李守常到底是新一世纪底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底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示出优越性来”。李大钊在“理论研究上开初组织了历史学系统”，“他这种立于理论研究底意味上的这种精神底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是值得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56页。

② 李星华：《青年的良师—回忆父亲李大钊在女子高师教学二三事》，《文汇报》1979年5月14日。

③ 参见卢绍履：《史学概要》，1930年商务印书馆发行；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1940年中华书局发行。

我们注意。最后提及史学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更是一个革命家底信号，只有阶级觉悟了的人才能接受的”^①。

李大钊同志遇害距今已有五十二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里，祖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大钊为之奠基和热切期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无产阶级在向历史科学更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途中，还应不时温习先驱者留下的宝贵遗产，从中汲取力量，以坚定自己的方向。为此，我们应当进一步开展对于李大钊史学思想及其对历史学贡献的研究。

（原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① 刘静白：《何炳松历史学批判·绪论》，1933年，上海辛垦书店，第16至17页。应该说明一点，我们所引述的这段评价李大钊史学思想及其贡献的文字，大体上是不错的。它出自三十年代人之口，在史学史的研究中，有一定参考价值。

李大钊与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

上海师大图书馆学系

上海师大图书馆

1979年5月4日，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日。五四运动不仅划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而且揭开了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崭新篇章。李大钊同志既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作为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后来人，为缅怀先辈，继往开来，特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述李大钊同志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所建树的丰功伟绩。

利用图书馆阵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李大钊同志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的卓越代表。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期间（1918年至1923年），正是五四运动酝酿、爆发和向深广发展的时期。为了启发群众觉醒并培养革命骨干，李大钊同志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图书馆的首要任务。

据《北京大学日刊》报道：1918年至1921年间，北京大学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

图书部订购的国内外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和《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The Communist》等十多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有40种以上，例如：《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上为西文版；《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以上为日文版。还特别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经验的阅览室^①。这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前提。

李大钊同志除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外，经常把一些进步学生吸引到图书馆内，向他们推荐马克思主义书籍。讨论问题时，他随时把馆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拿给学生看，进行讲解和辅导。当时少数指导思想不纯、学风不正的人，读了片断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拿来装璜门面，卖弄渊博。李大钊同志为了阐发革命真理并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的基本思想简明扼要地编译出来，便于大家完整地、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不致断章取义及受骗上当。

由于李大钊同志的言传身教，1919年，经济系学生李泽彰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其后，一些进步学生搜集了若干马克思主义书籍，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共产主义的音译）。现在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还保存着一些盖有“亢慕义斋”的图章的书籍。1920年3月由北京大学学生组成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李大钊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政治硕果。该会附设的图书室。到1922年，收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已有60多种（其中三分之二是英文版，三分之一是中文版），马、恩的主要代表作大体都有。1921年5月，在上海出现了无产阶级图书馆的又一雏形——“通讯图书馆”。它以搜集进步书籍为己任，

^① 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26日，3月19日、22日，12月11日。

《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总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辅导材料，以及《新青年》、《向导》、《政治周报》、《中国青年》等革命期刊，均在收藏推广之列。它和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基本相似，足见榜样力量之无穷和政治影响之深广。

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办公室，是当时的革命活动中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同志经常在那里探讨社会主义和研究重大问题。《每周评论》编辑部亦多次在那里商讨国内外大事。“六三”以后，各地的代表汇集在那里交流五四运动的情况。校内外进步青年特意来访的更是络绎不绝。李大钊同志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为讨论问题和日常交谈的重要内容。《新潮》月刊的主任编辑由于常去那里，思想面貌发生明显的变化，从向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而主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朝鲜、日本的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曾专程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其家里拜会李大钊同志，得到很大教益。事后他们常对人说：“千里问道，此行不虚。”^①

由于李大钊同志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阵地，利用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但对五四运动起了启示作用和推动作用，而且培育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邓中夏便是突出的代表。该同志原先崇拜戊戌变法中英勇献身的谭嗣同，把谭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自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反革命的暴力，逐步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

北京大学图书馆既是李大钊同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又是他改造主观世界的熔炉。李大钊同志早年读过“四书”、“五经”，应过科举，以后又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直至十月革命前还是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18年2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

^① 参见《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编，1951年北京宣文书店印行。

主任后，除去经济系上课和处理馆务外，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刊，在世界观上产生新的飞跃，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过程。他的大量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章（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都是在他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部主任时撰写和发表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宣传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图书馆事业坚持什么方向的重要问题。李大钊同志为我国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指明了政治方向。

既反对封建的藏书楼，又反对超阶级、超政治的图书馆学观点

图书馆是通过自己拥有的书籍、期刊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的文化机构。一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符合这种阶级利益的办馆方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部主任期间，将图书馆作为研究、传播马列主义并向中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的阵地。这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名目繁多的藏书楼，它将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结晶——书籍，藏之高楼深阁，定下了无数清规戒律，专供统治阶级鉴赏，对人民大众搞蒙昧主义。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的著名演说辞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要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代图书馆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应“是研究室。管理员不能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挥很大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①

^① 《平民教育》1919年第7号。

这些话明确表明了李大钊同志的办馆方针。

从一个“守书人”到为教育、为科研服务的“先行官”，不只是形式的不同，而是有本质的区别。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①

社会的图书馆，即公共图书馆，李大钊同志认为：要使它成为向中国人民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的工具，应该面向劳工。他强调指出：“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休息时间的阅览。”^②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里，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与“苦闷、干燥、污秽、迟滞、不方便、不经济、不卫生、没有趣味”的生活相对照的新生活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求“多办市立图书馆，通俗的尤其要紧”。他主张“图书馆宜一律公开不收费”^③。李大钊同志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时，也不忘对苏联基层的公共图书馆的考察和调查。如列宁格勒一个海员俱乐部的图书馆拥有多少藏书，拥有多少外文书，管理员能否操外语，都一一录以备考，进行记载，作为衡量苏联劳动群众受教育水平的标志，作为判别苏维埃政权下的图书馆为劳工服务的标志。

1920年4月附设在北京大学的通讯图书馆的《募捐启事》，具体贯彻了李大钊同志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办馆方针。它开宗明义地宣布：“我们必须使人人均有读书之机会，领受一点新知识、新学说”。“但是在今日私产制度之社会中，能够长期研究学问的人，都是少数的资本阶级。”“我们最崇敬的工人（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饥则耕而食，寒则织而衣，劳则筑而居，人类之

① 《平民教育》1919年第7号。

② 《劳动教育问题》，见1919年2月14、15日《晨报》。

③ 《新生活》第5期，1919年9月21日。

能够生存，皆藉赖他们之力。乃因没有智识的缘故，致为他人所鄙视，且所应得之幸福，均为强有力者所夺去。我们若要援助他们，最好是增加他们的智识，使他们能自己觉悟。”^①

对于学校图书馆，李大钊同志觉得它是有别于社会图书馆的，“它和教授法有密切的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换句话说，它受学校教育方针和方法所制约。因之，学校图书馆的办馆方针，侧重是为教育和科研服务。

李大钊同志认真探讨和研究了图书馆和教育的辩证关系，指出：“想教育发展……非依赖图书馆不可”；而学校图书馆所“含有教育的性质”发挥得好，又能大大促进教育的发展。他说：“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在除了“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还由教师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为学生自学的材料”^②。这样做，既可使学生加深和扩大课堂知识，又能培养其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

李大钊同志在反对把图书馆办成封建藏书楼的同时，十分警惕那种超阶级、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思想侵蚀。1920年夏，在北京高等师范第一次举办的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上，清华学校图书馆馆长戴志骞向各省学校图书馆馆员们宣传说：作为一个图书馆馆员的基本前提就是“不可投入政治或党派范围”。李大钊同志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和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也应邀参加了这个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他除陈述自己的观点，宣传自己的主张外，抵制了戴的那套超阶级、超政治的货色。李大钊同志说，他希望通过这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使进步的图书能得到广泛的流通，以教育中国青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六年具体实践，为无产阶级创办自己的图书馆提供了有益的经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13日。

② 以上引文均见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验。延安时代的公共图书馆，蒋管区的地下通讯图书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图书馆，继承并贯彻了李大钊同志提出的办馆方针。

积极依靠群众，尽量方便读者

贯彻群众路线是搞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同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北京大学教授刘复深情地赞叹说：“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自从做了图书馆主任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很诚恳、很刻苦的想法改良；而且曾经开过几次会议，请校内诸位注意收藏事业的教员，帮同他设法改良。”^①刘复自己就发表了长达五千余言的《对于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他指出：“无论那一种书，必须经过具有那一种专门学识的人审查了才买来，才适合于实用，才不至于不经济。”^②在图书的收藏编目上，刘复提了一系列建设性意见，并介绍了大英博物馆组织藏书的先进办法，还设计了两种图书标签的格式。顾颉刚教授深感中文书籍旧分类的不便，建议重新编目，并设想了拆散丛书、编辑《学派书目》和再编《分类书目》等三项步骤^③。吴康不赞成顾颉刚的办法，提了几条商榷意见^④。该校学生李良骥则对筹办北京大学图书馆起草了一份详细的计划书^⑤。真是主任倡导，师生献策，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共同为办好北京大学图书馆而努力。

李大钊同志建议组织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委员会，既是咨询机构，又是决策机构，从图书馆的重大问题（如《图书部试行条

①②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28日。

③ 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5日。

④ 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6日。

⑤ 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8月12日。

例》和各研究所、阅览室书籍均归图书部登录编目等)到一般业务(如纸片目录类应编总号等)都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向校长报告后即向全校师生公布^①,以取得群众的监督和支持。

遇到困难,李大钊同志总是同群众商量。如阅览室缺《奋斗》第3期,各处补配不到,就在校刊上登一则征刊启事,希望读者捐助。又如为帮助比利时鲁蕃大学解决缺乏汉文书籍的问题,靠馆内抽取无法满足,便发动广大读者帮忙筹集^②。

李大钊同志除坚持民主办馆外,十分关心读者的需要,正确地满足读者对于图书的要求,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在借书方法上,他反对“文库式”,主张“开架式”。指出:“旧图书馆采用文库式,取书的手续非常麻烦。阅书的人不能亲自拿来,只能在目录里查出书名填在单子上叫管理员拿来;若是拿的不合用,又要按以前手续去换。”徒劳往返,浪费时间。他认为欧美各国的“开架式”好处较多,不但“节省无谓的手续和虚费的时间,并且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其“弊处”是失书较多^③。事实上任何办法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只要利多于弊就可以采取。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搞过一段“开架式”试验,他认为这是“图书馆的新趋势”。六十年后的今天再来探讨这一问题,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李大钊同志认为:要方便读者,图书的分类与目录组织亦需作相应的改变。他说:“从前的目录是字典式的,就是以书名的A、B、C、D排列。这种目录很适于文库式,因为可以使管理人员便利,但是开架式目录宜于分类,就是以书籍的性质去分别。因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若是用字典

① 详见《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8日、22日。

③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式，那就不太方便了。”^①为此，组织力量仿照《杜威分类法》将馆藏西文图书加以改编，做了一套卡片目录放在第四阅览室内供读者参阅，并在校刊上登出布告：“望同校诸君，检查之际，遇有不合，随时指告，必当力求改善。”^②实践结果证明，颇受读者的欢迎。

开放时间也从方便读者出发。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暑假期间下午闭馆，做内部工作。李大钊同志考虑到教师备课和学生预习等的需要，离开学还有十几天就贴出布告，向读者宣布：“近日暑气渐退，本校为便利阅者起见，自8月23日起除上午7时至10时开馆外，下午2时至5时一并开馆。”^③方便读者，还是方便自己，这不仅是个工作态度问题，而且是个办馆路钱问题。在处理方便读者和加强管理这对矛盾时，方便读者是目的，加强管理是手段。李大钊同志倡导的一切为便利读者的服务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和发扬。

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 对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

李大钊同志对于人类的新旧两种思潮，对于图书馆藏书所反映的各种学说和主义，他都能够辩证地进行考察，妥善地加以处理。他曾经说：“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该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④他又说：“这二种思潮，一面要有

①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2月24日。

③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2日。

④ 《李大钊选集》第155页。

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① 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李大钊同志一面把北大图书馆当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对各类图书兼收并蓄，广泛收藏。除发挥原来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北京大学图书部前身）所藏几万册图书（主要是线装古籍）的作用外，又补充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和具有现实社会政治意义的图书。据统计，在他任图书部主任期间，汉文书籍扩大到二十余万册，西文书二万册，日文书千余册，还把他在日本留学时带来的《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的经济论丛》、《早稻田讲演集》和明治大正5年9月出版的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多种书籍全部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图书尽量加以补缺，如在1920年3月22日北京大学第十次总务会议上，李大钊同志提议补刻《刘申叔先生遗著》四种^②。除上述而外，对于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予以收藏。李大钊同志收藏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为的是通过假、恶、丑显示真、善、美。通过比较，读者自己会增强对真理“自信独守的坚操”。轻视反面教材的作用，就不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针对当时有些人把马列主义视为异端邪说，妄图加以禁止，李大钊同志指出：“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假使一种学说确与情理相合，我们硬要禁止他，不许公然传布，那是绝对无效”。他认为：“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③ 他还深刻指出：“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即高悬理想与俯就社会之言论，亦当兼容互需而不可有所偏废”^④。以先秦的诸子为例：“杨朱为我之说，墨翟兼爱

① 《李大钊选集》第155页。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7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217页。

④ 同上，第88页。

之旨，固二子所信为真理者也，而孟轲之徒，则距之辟之，不遗余力，以无父无君罪之为禽兽。然自今日观之，其说于中国周秦时代哲学上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已为中外学者所公认矣。”^①李大钊同志认为，即使是异端邪说，也应该让“人人都能认识他是异端邪说”，这样“大家自然不去信他，不至受他的害”。“若是把他隐蔽起来，很有容易被人误信的危险。”^②李大钊同志这种“兼容互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是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文化专制主义的犀利武器。

也正是李大钊同志善于从问题相互关联的各个方面去认识，努力从对立中把握统一，因此对于东西方文化，他主张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他决不因反对胡适“媚美崇美”就盲目排外。在1920年5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登了一则《图书馆通告》，内容为：“纽约近宁图书公司代表密秘勒器俄君持来教科书籍多种，于19日下午及20日，在本校图书馆第5阅览室内陈列，以供众览。”这是李大钊同志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形象说明。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除介绍欧美的“开架式”、《杜威分类法》和图书馆员的训练等外，还赞扬过美国大学图书馆在学校教学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在美国，“助教不必上堂授课，只在图书馆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这种制度有两层利益，一层可以清除师生间的隔阂，一层可以鼓励研究的兴趣。”^③批判地吸收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能够推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李大钊同志主张对各类图书“兼容互需”，主张对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很长时间里受到非议。一些李大钊的研究者将这些观点看作是他非马克思主义残余的表现，认为这是盲目推崇美国文化。特别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这作为“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佐

① 《李大钊选集》第88页。

② 同上，第217页。

③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证。在这里有必要分清是非，拨乱反正。

革命导师列宁就十分重视对于白匪军书籍的利用。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后，列宁同志曾两次指令收集所有的白匪军报纸，要求“把收集到的报纸交给国家图书馆”^①。此外在1921年6月16日美国大学图书馆要求交换图书的来信上批示：“同意交换图书”^②。不但如此，还数次提出必须“按照瑞士和美国的制度来改组整个图书馆事业”。他甚至提出：谁不“在俄国施行瑞士——美国体系”（指图书馆体系），必“将受到严厉的革命惩罚”^③。

读读列宁的这些指示，我们就可以明白李大钊同志的观点同列宁的意见是何等一致！能说这些意见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残余吗？！恰恰相反，这些观点证明了李大钊同志是掌握了马列主义思想武器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既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性，又注意到图书馆的批判继承性。

重视图书馆的技术问题，提倡 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

列宁夫人恩·克鲁普斯卡娅强调指出：“书籍的完整，藏书充分利用，对读者要求的满足，以及图书馆的政治面目，都取决于图书馆的技术问题。”^④图书馆的技术问题体现在业务工作的各个环节之中，李大钊同志不但亲自过问，而且一抓到底。

为了使内部工作职责分明，有章可循，在李大钊同志主持下，制定了《图书部试行条例》（共13条），规定全馆“暂设登录、

① 《给M·H·波克罗夫斯基的便函》，1920年1月15日。

② 《列宁论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列宁论图书馆》编译小组编，第95页。

③ 《给教育人民委员会部彼得堡图书馆处的电报》，同上，第37—38页。

④ 见《列宁论图书馆》第130页。

购书、编目、典书四课”(相当于现在的组或科)。每课均有具体的职责范围,如登录课有“新书之登录公布”等6项;购书课有本校图书报章杂志之购买”等5项;编目课有“书籍、小册子、杂志及图表目录之编纂”等3项;典书课有“参考材料之指导及介绍”等8项。该条例第11条还指出:“本部各项办事细则,另章规定之。”

李大钊同志十分注意读者工作,对学术价值较高的图书(如陈衡哲教授指定的研究中欧交通史的十种图书),陈列在阅览室内供广大师生参考,其中有本《大秦景教流行碑》,还是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外单位借来的^①。有时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介绍单位或个人赠送书籍目录加以宣传推广。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藏书作用并使大家都有浏览的机会,规定“凡非有复本之书籍概不出借,一律陈列在阅览室内。”

为检查和总结某一时期为读者服务的情况,发现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李大钊同志特别重视读者阅读情况的统计。在1920年1月2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就刊登了图书馆的三则消息:一是图书馆第一阅览室中文杂志阅览月报;二是图书馆每月杂志借出统计表;三是图书馆第三杂志阅览室10月份统计表。分阅者(或借者,包括校内机关、校外机关、教员、职员和各系学生)、阅览(或借出)杂志册数(包括中文、西文、日文)以及人数三栏。在4月份的杂志借出月报和杂志阅览月报中,又增一日平均、月总计、月比较(增、减)等项。通过统计,一方面可以看出图书馆为读者服务的程度;另一方面便于掌握各类杂志的流通情况;还能够了解各种类型读者的阅读倾向和阅读特点。将其公诸于众,能起促进读者进一步利用图书馆的作用。

为加速图书流通,方便多数读者,李大钊同志以图书部主任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0月21、11月12日。

或典书课的名义经常出布告催还图书，并把久借不还者的姓名在校刊上公布出来，发动群众检查督促^①。

为核对馆藏，纠正差错，并保证教学和科研需要，在催还图书的同时，李大钊同志规定：每到春假，“例行清理”图书，要求读者将所借图书全部归还，有时因改编目录、换贴标签或经过搬迁，亦要“彻底清查整理一下”，“乘此机会造出一份确实的统计表”^②，供改进工作参考。

加强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是提高图书馆技术问题的关键。李大钊同志除在实际工作中发动馆员互相探讨和实行传、帮、带外，热忱希望北京高等师范“添设图书馆专科简易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知识”。他把图书馆工作者获得业务知识训练看作“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到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③。为此，他除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兼讲图书馆学课外，还在1921年12月1日的北京《晨报》上发表名曰《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的文章，详细介绍了美国图书馆学校从1878年到1895年的发展情况和课堂设置，还列举了夏季学校见习班，图书馆讲演会、谈话会及师范学校内的训练等方法，说明搞业务训练与不搞业务训练大不一样。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今天，要把图书馆办成为教育和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切实发挥尖兵作用和参谋作用，加强图书管理人员的业务训练便显得更加重要了。

总而言之，李大钊同志从指导思想、办馆方针、办馆路钱、藏书建设、业务技术等方面，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我们图书馆界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主要应该学习李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坚持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方向，继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1月17日、3月25日。

② 同上，1920年3月27日、5月29日。

③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辞》。

承传统，努力创新，立足现实，放眼未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为实现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服务。

（原载《图书馆通讯》1979年第2期）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

——李大钊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戴鹿鸣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早期的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最早从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沉寂黑暗的旧中国，第一个向中国人民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培育了一代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崭新的道路。李大钊同志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他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和奠基人，他的光辉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早期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由胜利走到破产并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在这期间，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深刻而急剧的变化。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发动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向统治和禁锢中国人民二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为中国革命从失败和徬徨无路中走向新的轨道作了最初的启蒙工作和思

想上的准备。

李大钊积极地参加了这场影响深远的反封建斗争，并且以他特有的鲜明性、坚定性和深刻性，表现了他早期的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和品格，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具有广泛影响的主将之一。

要求民主和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形式上建立了号称“中华民国”的共和国，但实际上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袁世凯在窃取了政权之后，就逐步撕去了他“拥护共和”的伪装，向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攻，最后终于把“民国”仅有的一点形式也完全抛弃，公开恢复帝制，把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所追求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轰毁了。这个沉重的打击深刻地教育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因此，他们首先冲破了专制复古思潮的牢笼，大声疾呼地要求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就是一个要求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英勇战士。

李大钊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关心着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他决心研究政治，于1907年考入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勤奋地学习欧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近代的自然科学等。“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思想亦日益腾高。”^①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他对革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但是，辛亥革命以后的现实却使他大失所望。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很快就看出了袁世凯军阀统治的专制实质，“民国”只是徒具形式的“假共和”，人民并没有获得当家作主的权

^① 见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

利。他在191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①又说：“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这是对袁世凯专制统治最早的也是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公开化之后，李大钊更是奋力奔走呼号，联络同志，共谋反抗。李大钊于1913年冬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6年春，他为联系反袁事，曾离日本回上海活动。不久，他又回日本担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编辑《民彝》杂志，从事反对帝制复辟的宣传活动。他在《民彝》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长篇政治论文《民彝与政治》，充分地表达了他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礼赞和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鞭笞。他所谓的“民彝”，就是人民的心理，人民的意志。他认为政治的好坏，就在于为政者能否适应和发扬人民的自由意志。他说：“兹世文明先进之国，莫不争求适宜之政治，以信其民彝，彰其民彝”。当代能够表达这种人民意志的政治，就是“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③；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他认为封建专制统治压抑了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创造才能，是使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原因。他说：“昔称天府，今见陆沉。呜呼！是果孰之咎欤？余思之，且重思之，则君主专政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④因此，要使古老垂危的中国回春再造，获得新生，就必须根绝专制制度于中国。他以极大的义愤，强烈地表示了和专制制度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他说：“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3页、第1页。

③ 同上，第41页。

④ 同上，第56页。

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①

当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反对下倒毙之后，李大钊对于人民力量的这个胜利，感到十分鼓舞，并寄以莫大的期望。认为“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②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到北京先后参加了《晨钟报》和《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宪法公言》、《太平洋》等杂志上撰稿，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宪法与思想自由》等重要文章，继续鼓吹民主政治，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对专制压迫，反对思想统治，反对孔孟之道。他热情地号召和鼓舞青年：“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奋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③。

但是，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局的发展是使李大钊失望的，不但没有什么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出现，而且是南北大小军阀更加激烈的争夺，随后又演出了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的丑剧，而段祺瑞则以讨平复辟，“再造共和”之名重新夺取了北京政府的控制权。段祺瑞继承了袁世凯的衣钵，继续实行军阀专政和武力统一的反动政策。李大钊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袁氏既死，政局宜稍有光明之象也。顾乃反是，新旧之争哄不绝、党派之轧轹未已，接触愈多，排挤益烈，长此以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反动之后，益以反动，潜滋酝酿，终成不可收拾之局，而非吾国今日之能堪。”^④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出路在那里呢？李大钊提出了要创造

① 《李大钊选集》第56页。

② 同上，第62页。

③ 同上，第58页。

④ 《调和之法则》，《言治季刊》第3期，1918年7月1日（此文写于1917年春，曾寄登在日本出版的《神州学丛》，但遭日本政府禁止，未发刊）。

一种新的“中心势力”的主张和设想。他说：“国家必有其中心势力，而后能收统一之效，促进化之机”^①。他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原来活动在我国政治舞台上的三种势力，都已不能成为国家的中心势力。第一种是掌握着军政权力的军阀势力，由于他们总是利用其所据有的权力为所欲为，背离了人民的意愿，所以“终难免于败亡”，在袁世凯死后，已“呈崩离之象”；第二种是以进步党（后演变为研究系）为代表的温和派；第三种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激进派。这两派都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跃过一个时期，但都已日渐消沉。一则是因为其中的分子，大半为“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恒不惜以国家殉其私欲与野心”；他们这种行为逐渐暴露于社会之后，“遂来国民之厌弃”；再则他们既是“专门政治的营业者，故其所为，毫不与国民之生活有何等关系，因而无国民之后援”。因此，这三种势力“皆不能为国家之中心势力，以支撑此风雨飘摇之国家，……以致政象日涣，人心日离，……斯诚政治上绝大危机也。”所以，他主张我们应当“顺世界文明之潮流，别造一种中心势力以代之。此之势力，必以中级社会为中枢，而拥有国民之势力，其运命乃能永久。”他号召说：“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驱逐此政治的营业者于政局之外，由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自进而造成新中心势力，以为国本之所托，泯棼抢攘之政治，庶或有澄清统秩之一日乎。”^②

这个方案就是要以资产阶级为基础，又团结和依靠国民作后援，排斥军阀和投机政客，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力量，以建立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李大钊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而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方案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性质，但它却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

①② 《中心势力创造论》，《甲寅》日刊1917年4月23日。

主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要求寻找新的出路的反映。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中国三种政治力量的分析，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北洋军阀和研究系不用说，即以被称为激进派的国民党人，他也是失望的。如他于1917年在一封信中所说：“大抵今日之民党已失其正系，不偏于溺，则流于暴，求能平心静气，刚毅不挠，依据法律以与强暴之势力为恒久之抵抗者，盖不闻焉。”^①事实正是这样，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虽然坚持了革命的立场，但不发动群众，主要是采取单纯的军事冒险和军事投机活动，因而也脱离了群众，削弱了在群众中的影响。二是强调要“拥有国民之势力”，要国民自己觉醒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虽然这里所说的“国民”，仍主要是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但是认识到这一点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两年以后，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除三害》的社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可以说仍是这个方案的继续和延伸。陈所说的除三害，就是指军阀、官僚、政客。陈所说的：“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②，也就是李大钊所要创造的中心势力。

但是，这时无论是李大钊还是陈独秀，都是把建立真正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却决定了它无力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正因为这样，他们当时都提不出如何实现这个方案的办法。李大钊曾经赞同对立的两方面势力互相调和，规劝他所说的温和派和激进派都自己“反省悔悟”，共谋出路；他曾经大力倡导发展国民教育，培植民力，养宿民德，他说：“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

① 《给李革痴的信》，转引自文操：《大钊同志五四以前革命活动的片断》，见《文汇报》1957年4月29日。

② 陈独秀：《除三害》，《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

民力”，“民力既厚，权自归焉”^①；他还特别寄希望于青年的自觉，号召青年奋发图强，再造中华。在国内外反动派的统治下，这些办法显然都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李大钊仍然坚信民主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潮流，是必然要胜利的。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曾经给了他很大的鼓舞，连续著文表示欢呼，并强调它对中国民主政治前途的影响。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府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制之不可复兴。……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②表示了他对于民主制度必胜的信念。

要求思想解放，主张科学真理，反对思想统治，反对偶像崇拜，是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主要内容，也是李大钊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世界文明的进步，民主和科学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两者是密切联系的。没有民主，科学难以进步；没有科学的进步，民主也没有保障。反观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专制和愚昧，也是两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封建专制制度（包括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造成了我国的愚昧和落后，而愚昧落后、迷信盲从又维护和巩固了封建专制。李大钊在分析我国封建制度长期统治的原因时，曾经深刻地指出：我国自秦朝建立封建专制制度以后，“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源，斲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也。学以造乡愿，政以宿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且不堪也。”^③

① 《论民权之旁落》，《言治》月刊第3期，1913年6月1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82页。

③ 同上，第44页。

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统治思想——孔孟之道的最大危害，就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挫伤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使人人匍匐拜倒于往圣前贤的纲常名教之前，丧失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我的权威，而变成封建统治者驯服的奴隶。因此，要建立和巩固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使人民从孔孟之道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保证人民的思想自由，个性解放，人格独立。李大钊为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在袁世凯推行帝制运动的时候，曾经出现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袁死后，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已堕落为保皇党徒的康有为，又公开要求“以孔教为大教，编入宪法”。另外又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李大钊坚决反对这些谬论，他写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吾国自秦以降，其为吾人自由之敌者，惟皇帝与圣人而已”，“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①，皇帝与宪法不相容，孔子与宪法也同样不能相容。他说：“宪法者，为国民之自由而设，非为皇帝圣人之权威而设也；为生人之幸福而设，非为偶像之位置而设也。”（同上，以下未注者同）如果将孔教列入宪法，实际上就等于取消了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等自由，“其祸视以皇帝之权威，侵害吾人身体为尤烈”，因为其为害不仅及于个人和一时，“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流毒所届，将普遍于社会，流传于百世”。李大钊还进而指出：尊孔复古是为复活专制作舆论准备。因为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将此护符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此乡愿政治之见端也。”^②

① 《宪法与思想自由》，见《宪法公言》第7册，1916年12月。

② 《李大钊选集》第77页。

要彻底“打倒孔家店”，清除孔孟之道的流毒，还必须反对偶像崇拜，迷信盲从，宣传科学真理。李大钊指出：孔子本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但是由于其学说“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也。……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在这里，李大钊还进一步对孔子作了历史主义的分析。他指出：孔子在其所生存的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因而也有其历史的价值。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他们统治的利益，利用孔子的学说并加以塑造，而将其偶像化，以作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则是另一个问题。对于这种神化了的孔子的偶像，必须推倒，为此“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①

以上李大钊对孔子的分析，不仅表现了他反对偶像崇拜的极大勇气和坚定态度，而且表现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孔子作了历史的分析，把历史上的孔子和后来被神化、偶像化的孔子加以区别。这就在批判孔孟之道的同时，又给孔子以恰当的评价，避免了在前期新文化运动中普遍存在的对孔子、对中国文化否定一切的错误偏向。同时李大钊的分析把专制君主和孔孟之徒密切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大盗和乡愿之间狼狈为奸的关系，这就把反封建的思想斗争和反对军阀专政、帝制复辟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对于推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向现实的反军阀的政治斗争发展，也是有作用的。因为早期的《新青年》曾经声明：“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

① 《李大钊选集》第80页。

② 陈独秀，《通讯》，《青年》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李大钊在批判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时，还进一步指出，必须打倒一切偶像崇拜，树立真理的权威。他说：“偶像云者，即先入为主之偏见妄想也。”它和科学真理是不能并立的。故“欲得真理之奥，必先破坏此……偶像”。他特别指出：“吾国历史传袭最久，举国昏昏皆为崇拜偶像之人。”^①因此，宣传科学真理，打破各种偶像和迷信，是十分重要的。他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②他强烈地喊出了“真理之权威”的呼声，号召人们宁崇拜真理，崇拜科学，而不应崇拜孔子，崇拜偶像。他说：“余信宇宙有唯一无二之真理”^③。又说：“吾人生于今日之知识世界，唯一自然之真理外，举不足劳吾人之信念，故吾人之伦理观，即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也。”他还认为：真理是宇宙客观存在的自然法则的正确反映，它是从客观宇宙来的，“断非神秘主宰之赐与物，亦非古昔圣哲之遗留品也。”^④

这时李大钊当然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来对真理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但他的朴素的唯物论观点是很清楚的。根据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应当从客观实际出发去寻求真理，强调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求其真实之境”，“一时幻妄之象，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他把追求真理看成是“人生最高之理想”^⑤。他特别强调要有敢于坚持真理和为真理而牺牲的勇气，不因社会的非议而背弃真理。他说：“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则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

① 《培根之偶像说》，《晨钟报》，1916年8月31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75页。

③ 同上，第86页。

④ 同上，第79页。

⑤ 同上，第87页。

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与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① 这是何等光明磊落威武不屈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社会里又是何等的可贵！而李大钊一生的实践正表现了这种高贵的品质。

早期的李大钊不仅是一个反对专制和迷信的英勇战士，也是一个反帝爱国的英勇战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李大钊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一个突出的方面。

从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以武力打开中国的门户以后，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都向中国涌来，向这个长期停滞和落后的老大帝国开刀，把中国变成了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和奴役下的半殖民地，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和反封建的斗争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成为每一个中国的先进分子最迫切的要求。

李大钊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民族危机达于极点的时候。他时时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命运。正象他在《狱中自述》所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再兴民族之事业。”1912年他还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时，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出版的《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狂热鼓吹瓜分中国之说。李大钊见此，极为愤慨，“怵于亡国之痛”，与同学共同将之翻译出版，“并附驳议”，“以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知耻知惧，竞奋图存。”^② 该书出版后，“风靡一世，远及外国”。1913年9月，李大钊游于昌黎碣石山，适见日军打死中国铁路路警五人的暴行，他极为悲愤地在其游记中写道：“是自昌黎遂为国耻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国健儿，

① 《李大钊选集》第86—87页。

②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官治》月刊第1期，1913年4月1日。

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不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①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时，看到日人展出的掠自中国的甲午战争中的“战利品”，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出”，“不胜国家兴亡之慨”。其忧国之深，悲时之切，随处可见。

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欧战爆发的时机和袁世凯亟欲恢复帝制的心理，向袁提出了《二十一条》，以作为支持袁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全国震动，同声反对。留日学生总会举行集会，推举李大钊执笔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随后李大钊又编印《国耻纪念录》，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这些文章和材料，详细地介绍了中日交涉的经过、条约和内容及其严重危害。他指出：“此次日本索要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复兴之生机，毁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②他号召全国人民“勿灰心，勿短气”，卧薪尝胆，奋发图强，以必死的决心，与顽寇斗争到底。他说：“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③表现了破釜沉舟，血战到底的决心与气概。

当时，由于国内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加以外祸日亟，民族危亡，因而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消极悲观思想，少数人并愤而自杀。陈独秀于1914年冬在《甲寅杂志》上所发表的《自觉心与爱国心》一文，也流露了这种情绪，并愤激地说：对于一个腐败的残民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爱之也何居”，“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也。”^④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李大钊读后，深为不安，于是写了《厌世心与自觉

① 《游碣石山杂记》，《言治》月刊第6期，1913年11月1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16页。

③ 同上，第27页。

④ 陈独秀：《自觉心与爱国心》，《甲寅杂志》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

心》一文，强调要自觉奋发，改造国家，树立积极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说：“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自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他强调地说：“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①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积极创造的爱国精神呀！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是非常重要的，却又是非常难得的。文章对于少数人的那种自杀行为，指出它虽有其社会的客观原因，但也是不足取的。他认为一个人即使出于爱国之心而愤不欲生的时候，“亦当忍死须臾，以待横刀跃马，效命疆场，则男儿之死，为不虚死。”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革命乐观主义的人生观。

虽然李大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和当时所有的先进分子一样，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仍没有深刻的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建立明确的反帝思想。因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进知识分子同专制、迷信等进行战斗的主要思想武器是进化论而不是阶级论，即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等等观念。他们也无法把被看成是民主政治典范的欧美列强同其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本质统一起来理解。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抛弃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想。和当时流行的说法一样，李大钊也曾经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公理与强权之争，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公理、正义等口号，也曾寄以很大的希望，誉之为“平和之曙光”，等等。但即使这样，李大钊仍开始对曾经风行一时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结论提出了质疑，指出了它的四大缺点，并揭露它“授近世侵略

^① 《李大钊选集》第29页。

家以口实”，和“助长战争之恶影响”^①，从而也对“社会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同时，李大钊对于英美帝国主义虽认识不足，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却有很清醒的认识。当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欧战爆发之后，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的欺骗口号，妄图在共同对抗欧美的幌子下，独霸亚洲。此说刚一出笼，李大钊立即敏锐地指出：它是“假大亚细亚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②。这就戳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骗局。

早期李大钊的急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于人民群众的态度。他关心劳动人民的疾苦，他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李大钊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冀东的农村。他自幼就失去了父母（父亲在他出生前已病逝），也没有兄弟姐妹，依靠一个垂老的祖父抚养成人。当时正是清末民初的动乱时代，朝政腐败，外敌入侵，民生痛苦，民变蜂起。震动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就发生在他十一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家乡就是义和团很活跃的地区。家庭生活的不幸和国家民族的灾难，给李大钊的思想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他生活在劳动人民之中，他了解他们的疾苦，同情他们的苦难，他同群众心连心。在他的文章里面，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在1913年所写的《大哀篇》一文，在标题下就注明“哀吾民之所失也”，可以说它既是一篇申讨军阀专政的檄文，也是一篇为民请命的控诉书。他痛斥军阀政客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们徒知争权夺利，搜刮民脂民膏，丝毫不以民生为念，“敲吾骨吸吾髓耳”。他描述人民的苦难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莛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

① 《李大钊选集》第83、84页。

② 《大亚细亚主义》，《甲寅》日刊1917年4月18日。

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①这是一副多么悲惨的中国人民生活的画卷啊！1917年，他在编辑《甲寅》日刊时又写了《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文章说：“北京之生活，以人力车夫为最可怜。终日穹手足之力，以供社会之牺牲，始赢得数十枚之铜元，一家老弱之生命尽在是也。”他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社会原因是：“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尤胜转死于沟洫。京中人力车夫之所由日多者，乃概为救死问题。”他提出，在目前尚不能根本改变此种状况的时候，希望政府督促车主为人力车夫改善一些劳动条件，如备置手套、雨衣雨帽等，使“奔走劳瘁之车夫，稍受涓埃之保护，或足以聊慰其不平之情乎。”^②这篇不长的短文，不仅提出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而且表明了李大钊是如何地关心着国计民生的大事，对劳动人民寄予了多么深挚的感情！

李大钊不仅关心群众，而且相信群众，寄希望于群众。他在1916年所写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一方面是论证了实行民主反对专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阐明了人民群众的作用，以及群众和英雄的关系。他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力量是不能违抗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意向和要求，就是时代的趋向和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谁要是阻挡这种历史潮流，就要被潮流所压倒。他说：“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人民的意志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心理自然之势，终求其达。其为势力，不以常达必以偶达，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顺达必以逆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假若群众的要求得不到正常的表达，“民彝见制，迫不得伸”，那么：“蚩蚩者氓，挺而走险，何所不可。”^③表现了同情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

① 《李大钊选集》第3页。

② 《可怜之人力车夫》，《甲寅》日刊，1917年2月10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45、46页。

他还极力反对贬低群众的作用，宣扬崇拜英雄，把个人神化、偶像化的旧传统、旧心理。他认为英雄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人民群众的力量而造成的，“乃以代表众意之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无英雄势力焉。”这就是说：是群众创造英雄，时势创造英雄，而不是相反。他还指出崇拜英雄的必然结果是：一方面使广大群众“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少数奸雄乘机愚弄群众，凌驾于群众头上，形成个人独裁。他说：“惟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他号召人民群众要破除这种迷信，解放思想，自觉地充当起国家的主人，“圣贤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①李大钊这种对英雄和群众的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当时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李大钊却把群众奉为历史的主人，并以此作为他反对专制，要求民主的斗争武器，这在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中间，也是不多见的。

正是基于对群众力量的信任，因此他在观察国家前途的时候，总是考虑到群众的作用。他把脱离群众看成是当时国内各政党的根本弱点，而拥有国民的后援，则是他所要创造的“中心势力”的根本要求。又因为他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对民主主义必然胜利的前途，总是充满了信心，认为这个代表人民要求的时代潮流是不能倒转的。

当然，在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对于人民群众也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如说群众愚昧无知，因循守旧，自私懒惰，迷信盲从等。但是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传统看法和偏见；另一方面也应承认群众确实存在着落后的一面。李大钊在这个问题上超越于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充分地看到了群众的积极方面，从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

^① 见《李大钊选集》第48—50页。

在他们身上，而指出群众的消极方面，目的也在于唤起群众的自觉醒悟，不可苛责于前人。

总起来说，早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激情的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和现实政治的变动，他积极地投入了反帝反封建和反对迷信盲从的斗争，他相信群众，积极进取，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坚信着革命的未来。虽然从根本上说，他仍然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可是他的思想境界，却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他的同辈，包括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最大影响的陈独秀，他是我国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成为我国最早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位思想家，就不是偶然的了。

从急进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开始了从急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从1918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

这个转变是从正确认识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始的。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开创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敲响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灭亡的丧钟，在世界历史上开始了真正由被剥削的多数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它具有极其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就成为区分各种政治派别的重要标志，成为考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试金石。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充满恐惧和仇恨自不用说，小资产阶级也不能正确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在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流派，有的人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也由于反对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而堕落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正因为这样，李大钊对于十月革命的歌颂，就成为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在十月革命的初期，中国人民要了解十月革命的真相和伟大意义是十分困难的。当时，只能从外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和通讯社的经过歪曲的和零星的报道，来了解十月革命的情况。中国的舆论界和思想界，除了孙中山及其影响下的《民国日报》，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曾经对十月革命表示祝贺和同情之外，一般都是抱着怀疑以至反对的态度，包括陈独秀在内，都是如此。所以李大钊对于十月革命的正确认识，也是经过一段迟疑、仔细地观察和研究之后方才达到的。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曾引起他极大的重视，立即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和歌颂，并由此进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的政变，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和平运动的情况。他认为这个运动终将促进这次大战的结束，并指出俄国二月革命的成功，亦“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结果”^①。但当俄国革命从二月革命发展到十月革命，即从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却在好几个月里看不见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映。到1918年3、4月间，他开始向朋友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但是他公开宣传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是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

这篇文章有三点重要的内容：（一）初步指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俄罗斯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之革命之采色者也。”（二）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

^①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和平运动》，《甲寅》日刊，1917年5月5日。

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血潮之中”，故“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三）批判了对十月革命的悲观态度，相信十月革命的胜利前途。他说“新文明之创造”，“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这是人类进化的普遍法则。所以，“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化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① 这篇文章尽管还有些不确当的地方，但是它充分地表示了对十月革命的肯定和同情，看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和胜利前途。这是中国人民正确认识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在十月革命的初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处在国内外敌人夹攻中的困难形势下，李大钊发出这样的呼声，就不仅需要非凡的勇气，而且需要有卓越的见地和非凡的判断力。这种勇气和判断力从何而来呢？就来自他有了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以这篇文章，是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开始，也是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是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1918年11月，李大钊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1919年1月，又发表了《新纪元》一文。这些文章进一步以更大的热情，更明确的语言阐发了上述的观点，对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有更深入的理解，并强调指出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特点，指出德、奥、匈等国的革命，都是一个世界群众运动的历史潮流。这个潮流将冲破历史上一切腐朽的反动的东西而获得最后的胜利。他满怀信心地欢呼：“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因此，他希望中国人民也沿着

① 以上引文均见《李大钊选集》第101、102、104页。

② 同上，第117页。

十月革命的道路，“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①。给中国革命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以上诸文，从各个方面基本上正确地阐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在此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宣传，就逐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李大钊是这个宣传的肇基者和开路人。

对于十月革命的观察和研究，引起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于是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之中。1919年5月，他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他以比较系统的方式公开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这篇文章首先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说：“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②他还指出，在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只有马克思才以科学的论证，阐明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③。这里不仅说明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也指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而马克思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文章接着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

① 《李大钊选集》第124页。

② 同上，第173—174页。

③ 同上，第176页。

是与其特有的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用以论证和阐明了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预言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资本主义制度而起，最后又“根据这个预言，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他强调指出：“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

文章又分别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和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社会的上层建筑是随着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生产关系又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动的。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所以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也不断发展。因此社会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②。文章又指出：在土地公有制破坏之后，社会的经济关系“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他们的阶级利益是“立于不相容的地位”，所以“阶级竞争是他们不能避免的命运”^③。但是这种阶级斗争最后也将随阶级的消灭而告终。文章也介绍了资产阶级学者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种种“批评”，虽然由于李大钊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还不高，还不能给以有力的驳斥，并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认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有“夸张”、“偏蔽”和自相矛盾之处，需要加以“救正”。但他的这些缺点，随着后来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提高都已得到改正。并且他在介绍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和所谓“批评”时，着重强调了马克思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有“莫大的功绩”^④。是站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77 页。

② 同上，第 186 页。

③ 同上，第 188 页。

④ 同上，第 191、195 页。

立场，而不是以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介绍的。

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资本家掠夺劳工生产的方式”，是马克思“全部经济学说的根本观念”。文章还介绍了资本集中的学说。最后文章指出：“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无产阶级愈增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所以，“竞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①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这时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和比较全面的了解，已经涉猎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文章中的观点也基本上是正确的，虽然还有些不确切的地方，还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划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界限等等，但是考虑到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极端贫乏，马克思恩格斯的最重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直到1920年4月才有一个全译本出版，李大钊虽然可以从日文或英文译本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但也不得不从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介绍中来了解马克思主义等情况，因此，要一下子就摆脱资产阶级偏见的影响是不可能的。相反的是，他能从当时十分混杂的困难条件下，很快就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并确定了自己正确的方向，恰正是难能可贵的。他这篇文章的全文，是以维护和崇信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介绍的，他是把自己的同情和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寄托在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上。因此这篇文章表明，从基本方面来说，这时李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① 《李大钊选集》第210—211页。

由于这篇文章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全面、系统和基本上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因此它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它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书籍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为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材料。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是在李大钊的教育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是李大钊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

继《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李大钊还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以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一系列文章，继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等课程，利用学校讲坛宣传社会主义。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推动下，《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国民》等当时有很大影响的报刊，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8月，李大钊又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帮助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了我国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当资产阶级右翼的胡适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时候，李大钊又立即驳斥了胡适的谬论。

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割裂问题与主义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打着要研究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的幌子，反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贩卖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①。其目的是要阻止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反对用马克思主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义来指导中国革命。李大钊敏锐地看出胡适的险恶用心，立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锋相对地进行了驳斥。他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①

李大钊在文章中还公开地声称：“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杀他们的一切”^②。针对社会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咒骂，文章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鸚鵡、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③在这里，李大钊一方面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一方面对反动派公然表示了蔑视的态度，这是一种多么襟怀坦白和大无畏的态度啊！充分地表现了他的伟大革命精神。他的文章给了资产阶级右翼的进攻以有力的反击，捍卫和促进了当时正在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这个运动，使中国人民从思想到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李大钊是这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8页。

② 同上，第231、232页。

③ 同上，第233页。

个运动的伟大先驱和旗手，他的功绩是永世不可磨灭的。

李大钊是为了寻找中国的出路而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他从来不是把理论当成清谈的资料，而是作为斗争的武器，行动的指南。言行一致，理论和实际结合，是他一贯的特点。早期的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李大钊是这样，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就更是这样。实际上，当他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就立即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写了很多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特别是写了很多短小精悍、战斗性很强的“随感录”。这些文章，表明了李大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在不断丰富和提高，也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前他的结论，仍然是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老路，现在的结论则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可以看到他的思想的这个重要发展，以及它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第一，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

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但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却长期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提不出明确的反帝纲领。这一方面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先进分子本身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思想培养出来的，并且是以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其理想，因此他们不可能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库中找到可以反对帝国主义的武器。只有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提供这样的武器，即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外矛盾，以及资本——帝国主义的发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命运，作了科学的论证，把它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所以，中国人民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和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一致的。另一方面，也

正是由于他们彻底断绝了对于帝国主义的一切幻想，然后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李大钊就十分认真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和平运动和各国工人阶级要和平、要面包的斗争。指出：“凡持社会主义者，莫不反对战争”，因为战争将使资本家获得暴利，“长其横暴”，而驱使劳动人民“以生命血肉为牺牲”。他预言俄、德等国人民的“面包革命”，“或即为此次大战之收场”^①。其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德、奥各国的革命相继爆发，果然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随之结束。这一切给了他以极大的鼓舞。他从中不仅看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也开始看到了帝国主义政策的阶级实质。因此，他在欢呼十月革命的同时，就揭破了帝国主义所制造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种谎言。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指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之发展”，是资本家的政府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所引起的，而不是什么“公理”和“强权”之争。并指出：这次战争的结束，也不是英法美等协约国的胜利，而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紧接着，他又在1919年初著文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指出它“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他并提出：“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③。同时他还把“殖民地对于本国（按指帝国主义宗主国——引者注）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

①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和平运动》，《甲寅》日刊，1917年4月24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③ 同上，第119、121页。

解放”^①，看成是现代世界的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言论，表明了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于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有了新的认识，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要求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新觉醒，给处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它是促进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思想的准备。

但是，在五四以前达到象李大钊这种认识的先进知识分子还是极少数。就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仍然对帝国主义抱着很大的幻想，还需要帝国主义再一次从反面来教育他们。不久，在英美法日意五大帝国主义强国操纵下的巴黎和会，果然充当了中国人民最好的反面教员。和会不仅完全拒绝了代表提出的废除二十一条、归还青岛和山东的胶济路沿线德国的特权、关税自主等各项正义要求，反而把理应交还中国的原被德国夺取的青岛和山东的一切权利让给了日本。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人们被这种极大的耻辱震怒了，惊醒了，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破灭了。于是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影响深远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李大钊又写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进一步给运动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文章愤怒地指出：什么“人道”、“平和”这些好听的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②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有什么觉悟呢？他指出：“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因此，“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

① 《李大钊选集》第130页。

② 同上，第212页。

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①于是，他响亮地喊出了：“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②这个口号喊出了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反映了中华民族最迫切的要求。这里所谓“改造强盗世界”，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所谓“民族自决”，就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二者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也不能分的。但是在中国人民没有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前，却从来没有提出反帝的任务。虽然也看到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的严重，但只认为这是自己国内政治太腐败、国家太弱所引起的，只要实行维新的“自强”或者革命的“自强”，帝国主义就不会来侵略我们了。这样就放过了中国革命的一个主要敌人，而使革命归于失败。因此，明确提出反帝的思想，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所取得的第一个最大的收获。正是在这种坚决的反帝思想指导之下，才使五四运动具有为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使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五四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李大钊的反帝思想也有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他一方面指出必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因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③；另一方面又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排外主义”或“锁国主义”，对于“欧美的人民”，我们并不排斥，“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对于一切愿意以平等的态度相处，“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的兄弟。”^④他主张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应该联合起来，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214页。

^{③④} 同上，第282页。

共同斗争，要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形成一个世界联合的解放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这种“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如果把它仅仅看成是一个“爱国运动，尚非恰当”^①。他还强调地指出：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号召弱小民族的人民要敢于和它斗争。他说：

“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高，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权威，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斗，信他必可摧拉。”^②以上这些观点，都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它不仅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而且教育和鼓励被压迫人民要联合起来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这些重要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对于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是关于反封建斗争和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问题。

反封建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另一个基本任务，但是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这个斗争主要是要求民主、自由、科学等等，还局限于思想文化的领域。当李大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中国革命的时候，他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要对中国社会实行根本改造。

李大钊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指出：中国长期落后的农业经济，和建立在它上面的封建家族制度，“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上作他的表面构造。”^③建立在这种经济构造之上的孔孟的伦理道德，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与治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55 页。

② 同上，第 261 页。

③ 同上，第 296 页。

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①，以巩固君权、父权（亦即族权）和夫权的无上权威。孔子学说所以能够支配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就是因为这个封建经济没有改变。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农业经济遭受破坏，近代的工商业兴起，于是孔子的学说已不能适应中国的现代生活，于是发生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个时候，李大钊对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他深刻地指出：“一部中国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到了现在，那些皇帝与圣人的灵魂，捣复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这些跋扈的武人，无聊的政客，那一个不是大盗与乡愿的化身呢？”^②又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③他在分析各种社会问题时，也都归结为社会制度问题。在谈到妇女解放问题时，他说：“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是“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④在谈到废娼问题时，又说：“根本解决的办法，还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⑤

1919年8月，李大钊在驳斥胡适一点一滴改良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时候，就把这个根本改造问题更加明确更加突出地提出

① 《李大钊选集》第297页。

② 同上，第128页。

③ 同上，第167页。

④ 同上，第145页。

⑤ 同上，第170页。

来了。他指出：在一个已经腐朽的“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①同时他又指出，要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开展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经济制度的变革也不会自行到来。所以根本改造的方针，就是一个革命的方针。

在这个革命的问题上，当李大钊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也赞成革命，但却更愿意进化和改良，主张协力与调和。他曾说：“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现代之社会，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户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②但是这时，他却强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必要。他认识到：在存在着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必然趋势。而且“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竞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并说：“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③从进化论转变为阶级论，从主张阶级调和转变为主张阶级斗争，这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一个根本变化，是他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标志。正是在他的倡导和影响下，社会改造的声浪响彻全国，成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讨论得最普遍最热烈的一个问题，它唤起了广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3页。

② 《青年与老人》，《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223页。

大的人们都注意社会的改造问题，它引导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

究竟把中国改造成为什么样子呢？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呢？李大钊曾经提出他改造中国的理想。他说：“我所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他所说的物质的改造，“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他所说的精神的改造，“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他还说明了这两种改造的关系，“这个精神的改造，实在是要与物质的改造一致进行，而在物质的改造开始的时候，更是要紧。”因为如果不把旧思想改造，它在新社会里还会为害，使新的社会组织“保持不住”。但是另一方面，物质的改造更重要，“因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①

这个理想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是在开始还没有用这种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稍后在他回答“中国今日是否能实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他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认为在今日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且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②这就是说，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5、336页。

② 同上，第357页。

事实上，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社会主义已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共同趋向的理想。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暴露了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也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前景；另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不断破产，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以及人们对于帝国主义认识的提高，因此，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就由失望以至绝望了，转而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用李大钊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可以用之“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①所以，人们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当成了他们的理想。当时关于社会改造问题的讨论，都不同程度地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在一个名叫《工读》的杂志上这样写道：“现在的社会是坏极了，不图改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他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族国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②可以代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的共同看法。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方向，中国人民趋向的理想，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后，对中国革命所引起的一个根本变化，其意义是极其巨大和深远的。

但是，在当时的思想界，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非常混乱和模糊不清的概念。当中国长期被禁锢的思想闸门被打开之后，各种社会思潮都一涌而入，纷至沓来，五光十色，无所不包。单以社会主义而言，就包括了很多流派，既有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又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0页。

^② 《工读的究竟目的安在》，《工读》第5期，1920年2月。转引自《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第139页。

有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实即社会改良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但是在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很少的时候，还很难分清各派社会主义的真伪。特别是带有很大欺骗性的无政府主义，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曾经有很大的影响，初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人曾经受到它的影响。李大钊也是这样，他这个时期的一些文章里就或多或少的反映了这种影响，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的影响。他所提出的精神改造的方案里，把互助、博爱列为它的主要内容而被放在不恰当的地位，就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虽然如此，但李大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这是因为：第一，如前所述，他坚持了阶级斗争的原理和革命的立场。第二，他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除前已提到要由“纯生产者组织政府”以外，他在稍后所写的《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统治。”只有等到私有制完全废除，“失了复活的可能”，和阶级消灭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才会“渐就消泯”^①。这样，就同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因为空想社会主义是离开阶级斗争幻想社会主义的实现，无政府主义则反对一切国家政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正象列宁指出的那样：“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李大钊就正是这样。第三，李大钊强调人道主义和互助、博爱等，

① 《李大钊选集》第397—398页。

② 《列宁选集》1972年版，第三卷第199页。

其着眼点是在于救治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道德人心的堕落。他一直很重视这一点，他自己就是以他的“道德文章”获得了社会对他的崇敬。同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不讲道德修养，而是相反，要以更高的标准，发扬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这是实现共产主义重要的思想条件，也是体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重要标志。李大钊所期望的，正是这样的理想社会。所以，也不能把提倡人道主义、互助、博爱等等，同马克思主义完全对立起来，应该看到它是马克思主义者改造社会的一个方面。李大钊的缺点，只是在当时把精神改造摆在了不适当的地位。

第四，是关于人民群众即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

当李大钊还只是急进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对人民群众表现了极大的同情和信任。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更加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并明确地提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和知识分子应当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

这时，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批判了唯心史观把历史看成只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少数英雄的业绩。他指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创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与我们，将来的历史亦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①。这就是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应该作历史的主人。他认为：“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基础。”^②真正的力量是在人民群众方面。他说：

“到底谁是‘有实力’者呢？是那些有钱的人么？若是工人不甘作他的奴隶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是那些带兵的人么？若是兵士不愿听他的指挥了，他那‘实力’又在那里？”^③他引用清朝统治

① 《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② 同上，第330页。

③ 同上，第248页。

的被推翻和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的相继失败，来说明民众势力的伟大^①。他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贵族绅士们把工农群众说成是低级劳动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痛斥道：“我请问低级高级从那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作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②

李大钊认为：群众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奋斗，自己解放自己。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们‘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③。他又说：“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④当1920年8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利用全国人民反对段祺瑞政府的情绪，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时候，李大钊就积极主张利用此政局的变化，去争取人民的权利。他说：我们应该“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不拘一定形式，不待政府召集”，“随时随处自由集合国民大会”^⑤，提出民众最迫切的要求，督促政府去办。

但是，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民才能得到自由和解放。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充分阐明了这个思想。李大钊十分赞赏这篇文章，他也写了一篇名叫《大联合》的短文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

① 参见《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

② 《李大钊选集》第305页。

③ 同上，第226页。

④ 同上，第330页。

⑤ 同上，第331页。

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①

为了把群众组织起来，就必须进行大量的艰苦的启蒙教育工作。因此，李大钊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宣传启蒙作用。他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组织群众。早在五四前他刚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就强调地指出：“要想把现代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认清这个道理。”^②他号召有志气有觉悟的青年，应该立志到最落后、最黑暗、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去奋斗，对社会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他特别号召青年离开都市的生活，“到农村里去”。他说：“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又说：“我们中国是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③这里就把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清楚地提出来了。因此他号召知识青年回到农村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④

李大钊怀着同样强烈的阶级感情，注视着城市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五四之前，他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诉说了工人“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却过着“不如骡马的生活”^⑤，唤

① 《李大钊选集》第286页。

② 同上，第146页。

③ 同上，第146—147页。

④ 同上，第149页。

⑤ 同上，第154页。

起人们对工人问题的重视。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出了《劳动纪念号》，并写了《五一杂感》的短文，介绍了“五一”节的来历，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注意这纪念日”。这是我国第一次对这个无产阶级共同节日的纪念。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到1920年的“五一”节，全国就有许多城市举行了集会、讲演和游行。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有工人学生五百多人参加的纪念会。同时，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斗争历史，号召中国工人阶级觉醒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并且寄希望于中国先进的知识界：把“三五文人”的“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真正的“劳工阶级的运动”和“街市上的群众运动”^①。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1919年3月，北京大学就成立了由邓中夏等发起和主持的“平民教育演讲团”，开始向市民进行宣传活动。五四以后又扩大这种活动到附近的工厂农村。1920年9月，在李大钊领导下，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更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创办通俗刊物《劳动音》，成立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五一”节时，长辛店工人一千余人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举行了纪念大会和示威游行。会后即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实际上就是工会。随着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1921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提出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去的号召，一方面固然是着眼于教育和组织群众，一方面也提出了知识分子要在群众中改造自己的要求。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要和农民一起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指出：“须知‘劳工神圣’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324页。

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①他又说：“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②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忠于群众，作群众运动的宣传者、组织者，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意义所在。所以，他所提出的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的号召，包括了两方面的重要思想：一方面是要“唤起民众”，把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工农群众组织起来；一方面知识分子必须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既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也是知识分子本身革命化的需要。正象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中国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分，“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③这是一个被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正是李大钊最早地提出了也亲身实践了这个光辉的思想。

由于李大钊正确地提出了上述重要思想，就给中国革命找到了依靠的力量，并找到了如何组织这个力量的途径。这就给中国革命的胜利指引了正确的道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革命数十年，其基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没有唤起民众，所以多次被军阀所玩弄而遭到惨痛的失败。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进行了勇猛的战斗，对提高群众的觉悟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当时运动的倡导者片面夸大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广大群众没有联系，因而使自己陷于孤悬无力的地位。五四爱国运动虽然具有广大的群众性，但基本上是出于革命的义愤而自发奋起，又主要限于学生群众（后期才有工人阶级参加），因而也不能持久。但是，当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7页。

② 同上，第3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3页。

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组织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以后，实行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首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在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发动农村的大革命，推动北伐战争，中国革命的面目从此就焕然一新。同时，大批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在这个群众革命斗争的洪流里，锻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以上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歌颂，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对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仅表明他在十月革命后，如何迅速地由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成了我国早期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特别是这个时候，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所得出的新结论，回答了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指引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航道，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铺下了最初的基石，开创了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其意义是极其深远和伟大的。

李大钊不仅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且为这个理想的实现而英勇奋斗。他这时已是国内享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学者和教授，但他却尽其可能的参加了各种实际革命活动，后来并完全脱离学校工作，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他那无私无畏，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感人至深的。他曾经说过：人民的民主自由，民族的独立解放，都只能靠斗争得来，只有具备牺牲奋斗的精神，不惜“断头流血以从之”，才能获得自由与解放。“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①他号召革命者：“爱人道，便该为人道牺牲。爱真理，便该为真理牺牲。爱自由，便该为自由牺牲。爱共和，便该为共和牺牲。”^②他强调说：“平凡的

① 《争自由宣言》，《东方杂志》第16卷第17号，1920年8月25日。

②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新生活》第8期，1919年10月10日。

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①李大钊这些铮铮有声的语言，正是一个革命者的生死观的高度概括，也是他自己行动的座右铭，和他光辉一生的生动写照。从他慷慨悲壮地反对《二十一条》，到他积极奔走反对袁世凯称帝；从他在反动军阀三令五申地禁止“过激主义”的情况下，公开向社会表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大胆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到他在北洋军阀统治中心的北京，长期坚持领导北方党的斗争，直至最后在敌人的绞刑架下，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这一幕又一幕，无不闪耀着他“生命的音响和光华”。正是“‘青春’之气，万古常青”^②。

总之，李大钊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深刻而丰富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他的伟大而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他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所建立的伟大功绩，将永垂不朽！

（原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① 《李大钊选集》第247页。

② 吴玉章为《李大钊选集》的题词。

解放思想的先驱 坚持真理的典范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朱乔森

1979年10月29日，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获得解放，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他以“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在长夜难明的黑暗中勇敢地探求真理，在狂风巨浪中不屈不挠地战斗前进，在豺狼当道的旧社会无畏地撒播革命火种，在“荆天棘地”中奋不顾身地开辟路径，直至“贡其精忠碧血”，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深深地铭记在我们心里；他的革命思想和战斗事迹，是我国人民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李大钊同志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以及陈毅、林伯渠、张太雷、邓中夏、赵世炎、陈乔年、范鸿劫、何孟雄、高君宇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经受过他的熏陶和影响。这本来是历史的事实，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看作是推行现代迷信的重要障碍。他们竭尽诬蔑诽谤之能事，迫不及待地要打倒早已为革命壮烈牺牲的李大钊同志，以便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打倒一大批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登上最高权力的宝座，实现其“改朝换代”的迷梦。

迷信从来是真理的对立物。正因为这样，真正的革命家，总是要具备一种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敢于让思想冲破牢笼，坚决地打碎阻碍人们觉醒和进步的精神枷锁，反对一切迷信和偏见，让科学的新思想得到传播。在旧中国即将发生激烈变革的关键时刻，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李大钊同志正是这样做的。他明确宣告：“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①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了“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②，他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终于从历次革命失败的惨痛经验教训中，从对各种学说、主义的反复比较和深入思考中，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一旦找到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后，他就毫不犹豫地为之而奋斗，而献身。真正做到了“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殚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③！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追求真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永远前进的一生，也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遗余力地传播真理，捍卫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的一生。

李大钊同志为真理而战斗的伟大一生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呢？

反对一切迷信

在李大钊同志看来，要“达于真理”，首先就必须反对一切迷信。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58 页。

③ 同上，第 64 页。

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是随着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创办而开始的。这个彻底反封建主义的启蒙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革命大旗，向着封建的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使许多人开始从旧礼教、旧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就为中国先进分子迅速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创造了思想上的条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李大钊同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并代表着这个运动最彻底的方向。他看到，我国人民要求得革命的真理，要救国，首先就必须打破封建思想的重重束缚，扫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愚昧；而由于“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①，打破对于孔子和孔教的封建迷信，就成为当时思想革命的首要任务。

早在1916年春，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在《民彝与政治》这篇重要的反封建主义的文章中，李大钊同志就集中地论述了反对两千多年来人们对于孔子的迷信的必要性。他精辟地指出：许多人把我国历代的典章制度、德礼政刑，特别是孔子所创制的一套纲常伦理吹嘘得天花乱坠，“繁缛彪炳，美矣备矣”。“群之人视彼性圣之嘉言懿行，正若天经地义，莫或敢违”，而不知“其崇奉之专，即其庸愚之渐；美备之胜，即其偏蔽之由”。正是由于这种反科学的、反进步的封建迷信的毒害，许多人形成了一种十分固执的思想：“以沿承因袭，踏故习常，不识不知，安之若命。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义必取于诗、礼、春秋”^②。这种封建的精神枷锁如果不打破，我们民族的“思辨知能”，将萎靡不振，再没有“活泼之机、崭新之象”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88页。

② 以上均见《李大钊选集》第43—44页。

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总结了人类几千年历史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从而指出：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昌明的古邦，正因为迷信圣哲，他们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腐败，终于酿成了亡国的惨祸。也正因为这样，“孔子生而吾华衰”，“吾华之有孔子，吾华之幸，亦吾华之不幸也”。由于迷信“往哲前贤”，其民“秉彝之明，悉慑伏于圣智之下”，“而黯然无复生气”。除了“鞠躬尽礼、局促趋承”于“残骸枯骨之前”，除了膜拜圣哲、“风经诂典”^①而外，不再知道有新的历史使命和新的理想。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实，多么发人深省的教训啊！

李大钊同志还指出：正是这种封建性的迷信，给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可乘之机，累代的大盗乡愿，如袁世凯者流，正是“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名”^②，“绳之以往圣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③，来铜蔽人们的聪明，天阏人们的思想，消沉人们的志气，桎梏人们的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再“取之以盗术，胁之以淫威”，于是“乘时崛起”，达到了篡权窃国的目的。

李大钊同志告诉人们，应当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基本道理：即便是“旷世殊俗”的伟人所讲的、所写的东西，也不一定适于今天。他说：“理之创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④，“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嘉言懿行，传流虽久，施之今世，决非所通。”^⑤因此，要有发展的观点，要看时间、地点、条件；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往圣前贤”的经训格言出发，这也就是李大钊同志后来所写

① 以上均见《李大钊选集》第42页。

② 同上，第45页。

③ 同上，第44页。

④ 同上，第43页。

⑤ 同上，第46页。

的：“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①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的“青春中华”的理想，决不是“死板的模型”，而只能是生动活泼的创造；也决不是“铸定的偶像”，而只能是永远前进的生活。所以，“孔子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

李大钊同志大声疾呼：现在，国人还在迷信孔子的束缚下，“举相讳忌噤口而无敢昌说”，如此下去，则民之既无，国于何有？找不到确实能挽救国家危局的真理，“若吾华者，亦终底于亡耳。”因此，他热烈呼吁中国人民，“冲其网罗而卓自树立，破其勒辱而突自解放，举一切迷蔽民彝之死灰陈腐，摧陷而澄清之”^②，大胆地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只有这样，再造神州的大业，才有成功的希望。

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颇有一些人在猛烈批判封建的旧文化旧道德的同时，又陷入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迷信。李大钊同志却不是这样。早在1916年，在著名的《青春》一文中，他就认为，必须既“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又摒绝现代资本主义“黄金与权势”的支配，才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③。

正因为他彻底反对一切迷信，既不迷信于孔子和封建的文化道德，也不迷恋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黄金与权势”，他才能彻底地反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他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活动，对依附于军阀的所谓“缓进派”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我国最先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从而在

① 《李大钊集选》第272页。

② 同上，第44页。

③ 同上，第71、75页。

我国唱出了十月革命的赞歌，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吹响了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战斗的号角，喊出了五四运动的最强音。

科学的态度

李大钊同志所主张的反对一切迷信，并不是怀疑一切，也不是盲目蛮干，而是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具备这种科学的态度，才可能达于真理。这种科学的态度，在李大钊同志看来，也就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的态度，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一种“求真的态度”。他一贯地提倡工作、学习都要有一种“求真的态度”，“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①。

对于什么是真理的标准？李大钊同志当时虽然还不可能加以阐明，但他明确指出：“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论事析理，“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那些责以“毁圣非法”的辱骂，不准“离经叛道”的说教，尽可以不去理它！他的这个主张是始终一贯的，后来论及研究历史，他还反复强调，我们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②

为什么必须脚踏实地、考查事实、从实际出发呢？李大钊同志说：要“知道世界给与吾人以机会的俄顷，必有些限制潜伏于此机会之下以与之俱。这些限制，吾人必须了喻，有时且必须屈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4页。

^② 同上，第484页。

服。”^①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客观世界在给我们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的同时，必然又有客观规律在制约着我们。对这些规律，我们必须明了，必须遵循，按客观规律办事。因此，李大钊同志强调：必须“获得一种哲学的明慧，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促进人们合理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以科学的态度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李大钊同志特别提出要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他认为“我们的将来”，要“我们凭借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②。只有对过去认识得越清，才能对未来的道路认识得越清。历史好象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脚踏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应有的科学态度。“这种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③

李大钊同志还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他认为：探求真理决不是某一两个人的事，因此，要认识真理，就必须相信民众，和民众打成一气，尊重民众的创造精神；而政治的好坏，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要看它的制度风习，是不是对民众在教育引导的同时，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判断事理的是非得失，去权衡审谛哪些学说、主张、意见、办法是合乎真理的东西，去从事新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只有这样，才能把现代国家治理好，否则，“论治之言虽庞”，“去治日遥”。也正因为这样，对思想，对“研究一种学说”、“信仰一种学说”，不能用禁止和专政的办法。那种“无知的排斥、自欺的顺从”，倒是应当予以批判的。

对于这种科学的态度，李大钊同志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05 页。

② 同上，第 506 页。

③ 同上，第 505—506 页。

的。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例如对于中国工人阶级所受的压迫剥削和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就不仅作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而且亲身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实践，从而作出了“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①的正确论断。在农民土地问题上，他也花费过巨大的精力。从历史上的周、秦至清，一直到当时农商部的大量统计材料；从广东的农民运动，一直到鲁、豫、陕等省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绿枪会等，他都作了精辟的考查和研究，由此进行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对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他也是作出了贡献的。

坚持真理的勇气

李大钊同志认为，要“达于真理”，就必须有坚持真理，为真理而战斗的勇气。如同他在《狱中自述》中对自己一生所做的概括那样：“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早在1917年，当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当他宣传“吾人今日与其信孔子……毋宁信真理”，因而被“哗然群誓，誉为大逆”后，就庄严宣告：“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②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热爱真理，愿为真理而献身

^① 《李大钊选集》第499—500页。

^② 同上，第86—87页。

的坚定态度。

他认为，一个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因为，“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①。假如我们果然发现了真理，那么，就“不必计及社会之于吾言，或遵为天经地义，抑斥为邪说淫辞”。要知道，“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②。他热情赞扬了李贽等由于批判儒宗，虽被“尽情谤讟，几不侔于人类之伦，卒至囚其人，火其书”，而仍然“自榜其书曰‘焚书’，将其所信，表而出之”^③的坚持真理的高尚气节。

李大钊同志还列举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的事例说明：从来新文明的诞生，新思想的流行，总有一些人“犯当世之不韪”，“奋其颖新之笔，掎击时政，攻排旧制，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④，扬布国家再造之声，然后，“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才得以“震耀世界”。因此他主张：“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之口头，无‘碍障’之语”，应当在真理的道路上，“惟知跃进，惟知雄飞！”^⑤

为了探求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李大钊同志提出，必须反对一种封建的“应考的遗传性”。所谓“应考的遗传性”，就是单凭迎合长官的意旨来说话办事的一种顽习、恶习。他说：中国有些人“有一种遗传性，就是应考的遗传性。什么运动，什么文学，什么制度，什么事业，都带着些应考的性质，就是迎合当时主考的意旨，说些不是发自本心的话。……所说的话、作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7 页。

②③ 同上，第 88 页。

④ 同上，第 61 页。

⑤ 同上，第 60 页。

文，都是揣摩主考的一种墨卷，与他的实生活都不生关系。”这种“应考的遗传性”，把我们“弄成这样的不自然”^①，实在是真理之敌，大家要认识它的危害性。

正因为李大钊同志具有这种为真理而献身的勇气和决心，他一旦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当共产主义还在我国报章上被当作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的时候，他就公开宣告了帝国主义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而且在这一光辉旗帜指引下，向着整个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强盗世界”，展开了坚强不屈的斗争，“没有一瞬徘徊”，“没有半点踌躇”；“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进”^②；虽至断头流血，“卒无变志灰心”。他终于用大气磅礴的从容就义，实践了自己的一贯主张；直到在敌人的绞刑台上，还庄严宣告：“绞死了我，绞不死伟大的共产主义！”真正做到了为真理舍生忘死，奋不顾身！

日新月异，与时俱进

李大钊同志认为，要达于真理，就不能停留在已有的认识上，还必须不断研究新情况，积极取得新认识，从而做到：“日新月异，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李大钊同志这个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之上的。他曾多次反复指出：历史是有进无退的，历史是一往无前的，即便有时出现了仿佛是倒退的现象，也“只是螺旋的进步，不是反复的停滞”^③。“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

① 《李大钊选集》第246页。

② 同上，第487页。

③ 同上，第489页。

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①。那种死抱着过去不放，主张而今而后只许照搬过去的东西的思想，只不过是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②的表现。这种历史观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向的，是面向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是违反历史的本相的。坚持这种面向过去的态度和历史观，就只会被“遗在后面作了时代的落伍者”^③。

李大钊同志说：“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④，只应该郑重的欢天喜地的去创造未来。根据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他鲜明地提出：我们一定要“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却要“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⑤；“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⑥也就是说，要不断抛弃旧的、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过时了的认识，取得新的、符合于当前情况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伴随着真理的发展而发展，紧跟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

李大钊同志还认为，追求真理也好，进行革命也好，最重要的，就是把握住今天，把握住现在。从他投身革命不久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许多篇文章中，他反复地讲这个问题。他写道：

“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⑦“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⑧因此，“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73 页。

② 同上，第 488 页

③ 同上，第 487 页

④ 同上，第 506 页

⑤⑥ 同上，第 75 页。

⑦ 同上，第 94 页。

⑧ 同上，第 486 页。

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①”他指出，“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意，因起一种回到‘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②或者也是对于“现在”的一切都不满足，但他们不想“过去”，只盼“将来”，盼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还有一种人觉得“现在”所处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图进取，再为创造。这两种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③那么，怎样才是正确的态度呢？只有紧紧抓住“现在”，“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起点”，认真总结过去，努力研究现状，放手创造将来。

李大钊同志所处的时代，是我国人民苦难极其深重的时代，也是我国人民产生了新的觉醒，起来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的时代，是我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开始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变化是极其剧烈的。正由于李大钊同志具有上述“与时俱进”的精神，才一贯地反映了广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要求，发扬了时代的革命精神，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从一个少年爱国者成长为一个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又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曾经受过较深的旧民主主义影响的人来说，这是很难得的。他在认识上的不足，不断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了改正；一切旧的思想影响，都没能阻挡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始终斗志昂扬地高歌猛进！

（原载《红旗》1979年第11期，收入本书作了个别删节）

① 《李大钊选集》第93页。

②③ 同上，第94页。

五四前后李大钊同志对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

袁 谦 吴家林

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六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同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赤旗”，第一个系统地、比较准确地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怀着“再造中国”的崇高理想，为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一

大钊同志生长在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亲眼看到帝国主义的野蛮掠夺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因此少年时代的大钊同志，就怀着忧国忧民、挽救民族于危亡的爱国志向。他曾经非常崇敬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明末的爱国志士朱舜水和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及至中学毕业后，他抱着“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①的崇高理想，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而后又东渡日本，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本期间，大钊同志更多地接触

^① 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

到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并且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日本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日本社会党人幸德秋水的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揭开了世界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俄国广大工农群众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关心国事、密切注视世界潮流的大钊同志，早在1918年7月，就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指出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他指出：“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大钊同志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一片污蔑、叫骂声中，毅然指出：“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①

同年11月，在北京群众欢庆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大钊同志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接着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如果说1916年9月发表的《青春》一文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最充分的表述，那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这三篇著作，特别是后两篇著作的发表，则是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主要标志。大钊同志在这两篇著作中，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1、104页。

的胜利及其伟大意义，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为中国革命指出了新的斗争方向。

首先，大钊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原因，揭示了帝国主义战争是强盗争夺的战争。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而俄德的无产阶级看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的野心，不惜在大战期间，发动了社会革命，来制止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①。在这里，大钊同志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本质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榨、剥削，指引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中国人民获得这种认识，首先是从大钊同志开始的。

其次，大钊同志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发展的趋势，指出一切反动腐朽势力必然要灭亡，布尔什维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他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看作“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②。继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欧洲许多国家“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0页。

② 同上，第113页。

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山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①

第三，为了迎接世界的新潮流，大钊同志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说，新纪元的创造是很艰难的，但是这种艰难是社会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对此我们不要恐怕，不要逃避。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这正如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同时告诫人们，对于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能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大钊同志大声疾呼地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强盗世界，创建一个“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②的新世界。

《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这两篇著作的发表，说明大钊同志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展有一个质的飞跃，即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从此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一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力军，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新的觉醒。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17 页。

② 同上，第 110、111 页。

当时的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是全国革命青年向往之所，因而大钊同志在这里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最近李维汉同志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谈到当时的湖南青年在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没有或很少接触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不象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那样。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救国之道如何？真理在何处？我们仍在蒙昧之中。”^①由此可见，大钊同志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二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五四前后，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骤然增多起来。广大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争先恐后、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研究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其中的一派，此外还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无抵抗主义、新村主义等等，也鱼目混珠地传了进来，使人们难以辨别真伪。

为了消除“误解”，分清真假，使马克思主义这个“为世界改造的原动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②，1919年9月大钊同志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①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第10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173页。

在这篇著作中，大钊同志指出：“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他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别为三部：历史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大钊同志认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离开了他的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因为他根据他的史观，确定社会组织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变化而来的；然后根据这个确定的原理，以观察现在的经济状态，就把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预言现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不久必移入社会主义的组织，是必然的命运；然后更根据这个预见，断定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所以“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

关于唯物史观，大钊同志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的主要部分，同时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理解。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另一个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社会组织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它束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在这里，大钊同志向读者详细地介绍了马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6—177页。

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同时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于社会学上的进步，究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他能造出一种有一定排列的组织，能把那从前各自发展不相为谋的三个学科，就是经济、法律、历史，联为一体，使他现在真值得起那社会学的名称。因为他发现那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因为他指出那从前全被误解或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的现象中是顶重要的；因为他把于决定法律现象有力的部分归于经济现象，因而知道用法律现象去决定经济现象是逆势的行为；因为他借助于这些根本的原则，努力以图说明过去现在全体社会学上的现象。就是这个，已足以认他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占优尚的位置，于学术界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①

关于经济理论，大钊同志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指出：马克思的“经济论”有两个要点：一是“余工余值说”，二是“资本集中说”。他说：马克思的“余工余值说”根源于他的“劳工价值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一件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件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资本主义的秘密就在于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价值。他说：工人的劳动力为资本家用工资所购买后，即与工人本人断绝关系；资本家用工资形式买回劳动力后，取得自由地处置这种物品（劳动力）的权利。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永远不能与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相等。换句话说，也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永远大于它的价值，那多余部分的价值叫做剩余价值，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大钊同志指出：揭破这个秘密，是马克思学说的特色之一。关于马克思的“资本集中说”，大钊同志说：随着近代科学的勃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5—186、190—191页。

兴，许多重要机械的发明，社会生产力的逐渐增加，社会组织的改变，新的交通手段的增添，新的市场的开辟，更促进了产业的发展。“从前的些小工业都渐渐的被大产业压倒，也就渐渐的被大产业吸收了。”而且现在的事实证明，托拉斯、卡特尔这些组织，

“不止吸收小独立产主，并且把中级产主都吸收来，把资本都集中于一处，聚集在少数人的手中。于是产业界的权威，遂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因受这种新经济势力的压迫，不能不和他们从前的财产断绝关系，不能不出卖他自己的劳力，不能不敲资本家的大门卖他自己的人身。”“少数资本家的工厂，就是多数无产阶级的大营。”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无产阶级愈增愈多，资本愈集中，资本家的人数愈少。从前资本家夺取小手工小产业的生产工具，现在工人要夺取资本家的生产工具了。从前的资本家收用手工和小产业的生产工具，是以少数吸收多数压倒多数，现在工人收用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是以多数驱逐少数，比从前更容易了。”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结果，“把这集中的资本收归公有，又是很简单的事情。”“凡物发达之极，他的发展的境界，就是他的灭亡的途径。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资本主义的破坏，就是私有财产制的破坏。无产阶级从资本家手中夺回生产资料，交给工人集体所有，每个劳动者都将得到同他劳动相等的一份报酬，“到了那时，余工余值都随着资本主义自然消灭了。”^①

关于阶级斗争学说，大钊同志说：“历史的唯物论者，既把种种社会现象不同的原因总约为经济的原因，更依社会学上竞争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6、195、196、197、198、209—211页。

法则，认许多组成历史明显的社会事实，只是那直接，间接，或多，或少，各殊异阶级间团体竞争所表现的结果。他们所以牵入这竞争中的缘故，全由于他们自己特殊经济上的动机。”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斗争，“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都是为了“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政治变动“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因此“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从来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进行的。大钊同志还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本家的，这些生产方法出现的次第，可作经济组织进化的阶段，而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至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全是因为资本家阶级“依生产手段的独占，掠夺他人的余工余值……的原故。”阶级的存在是客观的，阶级斗争是不能避免的。“直至那建在阶级对立上的经济的构造自己进化，发生了一种新变化为止。”^①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很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②中国人民掌握了这个理论，才能够从传统的唯心史观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在改造社会的斗争中，明确阶级阵线，分清敌我，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有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7—189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7页。

成效地进行革命斗争，使中国革命出现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此外，大钊同志还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党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明确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但是并不是“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不去争取，而是要“拿这社会主义有必然性的说，坚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他必然发生”。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布‘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①

大钊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介绍和宣传，由于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刚刚传入中国，许多重要的著作尚未翻译出版，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又乘虚而入，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地研究和鉴别，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个别观点的认识，尚有误解和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及其革命思想的了解，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重要著作，比较系统地、完整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这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篇著作的发表，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

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引起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极度恐慌和仇视。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也开始分裂。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胡适，公开地跳出来向马克思主义挑战。1919年7月，他利用陈独秀被捕和大钊同志被迫离京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1页。

的机会，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胡适恶毒地污蔑“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极力反对“外来进口的‘主义’”，叫嚷高谈主义不但“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胡适不赞成别人宣传主义，可是他的那篇文章通篇贯穿着他老师杜威那里贩来的实用主义。他把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割裂成许多零星的孤立的具体问题，反对在系统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对社会问题采取根本解决，并指责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故意把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宣传主义对立起来。胡适的真实用意就是拿“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①为幌子，兜售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8月17日，大钊同志从昌黎五峰山寄给胡适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批驳了胡的谬论。大钊同志在这封信中，针对胡适的论点，讲了以下四个问题：

首先，大钊同志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明确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分离，一针见血地揭破了胡适以“多研究些问题”为借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虚伪性。他说：“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

^①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文存》（二）第147、150—151页。

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不和社会上多数人发生关系，那末你那个社会问题是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的。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大钊同志明确指出：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必须宣传，同时也要研究实际问题，根据“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的不同，把理想运用到实际中去。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至于胡适所说的所谓空谈主义的危险，“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其次，大钊同志指出：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些招牌的性质，这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比如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词很在社会上流行，于是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但是决不能因为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就停止我们正义的宣传。这正如新开荒的时候，难免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但是开荒的人决不能因此就把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正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所以“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鸚鵡、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第三，大钊同志针对国内外反动派的恶毒攻击和造谣诬蔑，明确指出：“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

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大钊同志坚定地指出：“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至于那些猫、狗、鸚鵡、留声机之类，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什么过激主义、洪水猛兽、邪说异端，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哪有闲工夫去理他！

第四，大钊同志指出：就我们这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没有推翻旧的反动统治、取得国家政权的国家来说，“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以俄国为例，沙皇政府没有被推翻、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的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而经济构造是它们的基础，只要经济组织一变动，它们都跟着变动。所以“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为了取得根本解决的条件，必须用主义去教育、组织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决不能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对我们应该是，“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①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这场斗争的发生，说明中国革命运动的深入，阶级阵线的分化；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33—234 页。

深入人心，它已经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在这场论战中，大钊同志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犀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无可辩驳的论据，批判了胡适派的进攻和阶级敌人的诬蔑，壮大了革命声威，振奋了群众的斗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开拓了阵地。同时，对于如何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如何开展中国的革命运动，也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此后，大钊同志在同梁启超、张东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在同混入工人运动内部和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继续作了大量的艰巨的工作。

四

五四前后，大钊同志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观察中国问题，指导革命运动，从而促进了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同时，在他的直接参加和指导、影响下，创办了许多报刊，组织了许多社团，一批进步青年集结在他的周围，努力地学习新思想，研究新问题。这不仅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而且为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伟大的中国革命运动造就了一批骨干。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必然促进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从1920年5月开始，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陆续成立，大钊同志是北京小组的负责人。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他努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派人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展开活动，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出版工人小报，成立工人俱乐部，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工人群众，为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大钊同志学识渊博，敦厚朴实，诚恳待人，善于团结群众，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具有很高的威信。许多进步青年都把他当

作导师和革命的引路人。听他的教诲，请他帮助、指导，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大钊同志走过的道路代表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寻求解放的道路。他的一生，正如他在《狱中自述》中所说的：“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大钊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身体力行，言行一致，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决不象有些人那样，为了赶时髦，在书斋里清谈马克思主义；也不象后来的王明一伙那样，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不看实际情况地到处乱套；而是努力结合具体情况，把马列主义当作革命的指南，把它应用于中国的环境。大钊同志还在学生时期，他就怀着“再造中国”的崇高理想而刻苦地学习，积极地、艰苦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奔走呼号。他当时的著作和实践活动，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不屈不挠的爱国者，是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他怀有一颗解决中国问题的赤城之心，他深研学理，密切注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所以他能够在十月革命之后首先看到了这个革命的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接受和宣传马列主义，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是五四运动的卓越的领导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他在短短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六十年，大钊同志牺牲也已经过去了五十二年。我们回顾我国的优秀人物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挽救祖国于危亡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回顾大钊同志的革命实践活动，学习大钊同志的著作，他那锐敏的目光，深邃的思想，慈祥的容姿，谦和的态度，诚恳朴实的作风，为了人

民的利益而坚贞不屈、英勇献身的的光辉形象，时时萦回于我们的脑海，时时在激励着我们，教导着我们，鼓舞着我们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断前进。今天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为人民而追求真理，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早日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继承革命先烈们的遗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原载《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五四时期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李大钊同志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林家有

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反帝运动，又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它的最大功绩是在中国形成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①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经过严酷斗争的。当时，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传播马列主义作了巨大的努力，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陈独秀、李大钊就勇敢地反对封建主义。他们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倡新文化运动，宣传科学与民主，努力解除封建专制主义和迷信蒙昧思想对人们的禁锢。此后，《新青年》便逐步成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李大钊等人，通过自己的思想舆论阵地，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斗争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使中国人民觉醒。“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以自觉的革命行动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

阶级的觉醒是有力量的表现，然而，阶级力量要得到充分发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9—660页。

挥又必须由政党来组织领导。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工人阶级新觉醒的结果。因此，对于李大钊同志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必须充分估计。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李大钊同志只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民主主义者。他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孜孜不倦地追求救国真理和探索解放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光明的未来。

从青少年时期起，李大钊同志就是一个爱学习、爱国家、要革命的人。1905年，他考入河北省永平府中学，1907年进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读书。这是他一生学习求知的重要时期，也是他爱国思想的发端和发展时期。1905年，孙中山领导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并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派，围绕着要不要用武装斗争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重大问题，与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全面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宣传，一方面大大激发了李大钊同志的爱国激情，另一方面使他较为广泛地接触到当时的所谓“新学”。那时的“新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①随着“新学”在中国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

传播，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对李大钊同志有很大的影响，使他十分同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时也向往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所以，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悲愤交集，结交名流志士，发奋自雄，决心向外国学习，寻求新的救国真理。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些放眼世界的开明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从总结落后挨打的经验教训出发，主张向外国学习，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中国不但没有得救，而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先进人物，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曾掀起和领导过革命，向侵略者和封建政权进行斗争，结果象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样规模的革命运动都遭到失败，无法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操纵政权，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横冲直撞，中华民族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在五四运动以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无数爱国者，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过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甚至肝脑涂地，然而都失败了。这是为什么？这引起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如李大钊同志等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对封建主义开展猛烈的攻击，摸索新的救国真理，酝酿着新的革命。

李大钊同志说：原望中国“有彼岸之可达”，现在由于袁世凯“窃权”，一切都成了泡影，全国又“固犹在惶恐滩中”^①。袁世凯之流高唱什么“共和”、“民权”、“幸福”的高调，实则是，“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今之自命为吾民谋福利护权威者”，“乃坐视困苦飘零而不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载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李

^① 李大钊：《隐忧篇》，《言治》杂志1913年第1期。

李大钊同志愤慨指出：“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①在这里，他深刻揭露袁世凯“窃权”把人民推入苦海，造成“风云变色，五彩旗翻”^②的现实，反映了他有从新干起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

要讨袁，要救国。但是感情上的憎恶和仇恨，毕竟不能从根本上挽救祖国的危亡。于是在友人的资助下，李大钊同志于1913年夏到了日本，希望向学习西方取得成效的日本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正值袁世凯窃国和军阀混战，“南天动乱”。所以，他虽东渡日本，而对祖国仍然无限怀念，对祖国前途无比忧虑。这种心情，可从他当时写给朋友的一首诗中看出来。诗云：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③

正因为如此，他到了日本便积极组织“神州学会”，秘密进行反袁斗争。与此同时，他学习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还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由于爱国激情的驱使，他无心在日本继续呆下去，便立下“把国耻洗光”的雄心壮志，于1915年冬毅然返国讨袁。在回国途中，他写了一首讨伐袁世凯的诗。“黯黯五彩旗，自兹少颜色。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男儿当雄飞，机失不可得。”^④这首诗不仅表露了李大钊同志对袁世凯“逆贼”糟蹋祖国的义愤，而且强烈地反映了他

① 《李大钊选集》第3页。

② 同上，第6页。

③ 李大钊：《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同军中》，《言治》1913年第6期。

④ 李大钊：《太平洋舟中咏感》，《言治》季刊1917年第一册。

对仇视爱国人民之举的深切痛恨。然而，单纯扼腕或者埋头不问，只是消极行为。所以他毫不含糊地号召人们，抓紧时机，齐力合作，打倒袁世凯的卖国统治，再造“青春中华”。可见，李大钊同志从青年起就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二十世纪初，国家到了生死存亡之秋。要救国，必须向外国学习。学什么？首先是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但历史已证明，仅仅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而不改变当时的政治制度，则不可能达到富强的目的。所以，随着“新学”的传播，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也引起广泛探讨。既然辛亥革命未能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先进的中国人必须继续寻找救国的科学真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探讨的范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

二十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已经显露。认真学习西方的先进中国人已经看到西方“文明的善果”，同时也看到“文明的恶果”。李大钊同志那时诚然不可能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和“国情”，但他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争夺其他弱小国家的情况中，认识到学习外国必须根据本国“国情”，一面要学习外国一切好的东西，为我所用，为国家所想；一面又要坚持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要“求国情于外人”。1914年，他作《国情》一文，就指出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制度，经历了长期的斗争，“民亦将进索取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指资产阶级代议制），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他最后说：“欧美人之言，岂尽可恃哉！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这不仅是对袁世凯恢复帝制阴谋的反击，而且是对反动封建统治者不惜卖国求荣，拜倒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脚下的深刻揭露。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贼

袁世凯“欣然承诺”，公开卖国。李大钊同志在日本闻讯后，心悲痛，恨切齿，立刻召集留日同学总会同人开会，呼吁救国，并亲自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在这篇痛快淋漓、感情奔放的反侵略反投降宣言书中，李大钊同志痛数了祖国被侵略的历史，揭露了“二十一条”的侵略本质，喊出了中国人民久抑心胸的呼声：挽救民族危亡，要依靠人民的觉醒和斗争。号召人民，“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率我四万万忠义勇健之同胞，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①

上述表明，李大钊同志学习外国是有鲜明政治原则的。他对于外国的科学和民主政治制度敢于“拿过来”，但“拿过来”不是投降帝国主义，而是为了国家富强，增强国家力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祖国独立和光荣历史。

1916年春，李大钊同志再去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编辑该会出版的《民彝》杂志。在5月15日出版的创刊号上，李大钊同志发表著名论文《民彝与政治》，阐明其早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思想。他说：“君主与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君主专制”是社会黑暗、国家贫弱的祸根。“民主制度”则是当今社会的潮流，顺之者存，逆之者灭。因此，他大声疾呼“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②。他大胆抨击了那些拥护袁世凯的“毁新复古”之徒，号召人们对宣传“君主专制”、复辟帝制的人，一律当作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对那些拥袁“丑类”，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无所姑息，不稍优容”，只有这样，“再造神州”，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命”，始有“成功之望”^③。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页。

②③ 同上，第56页。

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他一个爱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色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气概。

1916年夏，李大钊同志回国，到上海参加反袁运动。不久，袁贼败亡，李大钊同志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后改为《晨报》)，任总编辑。由于李大钊同志持论严正，为研究系分子不满，因而排挤他。他愤而辞去总编辑，并写了一篇《别泪》，刊于9月5日报端，以示决绝。不久，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加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当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以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立场，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民主即是推翻独裁专制，实现人民民主；科学即是反对封建迷信，实现科学文明。这正是当时中国广大人民的愿望，因此，它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深刻影响。这时，李大钊同志还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向陈旧的封建君主制度和纲常礼教开战。1917年1月起，他陆续发表了《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章，指出：孔子者，孔子之徒的“圣人”也。这个所谓“圣人”，实则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完全违背了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所以，李大钊同志认为，为了“新生活”、“新道德”的确立，对于陈腐的、僵死的道德，必须加以“人为之力”，促其迅速崩溃，“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①。1916年，他还在《新青年》第2卷第1期以《青春》为题发表论文，要求青年把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当作历史的界限，从此再造“青春中国”，表明他对中国革命有从头干起的决心。他说：中国要写出“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而这些光辉历史的写成，是要依靠“青年之自觉”，要求青年要勇敢地站在民主与自由的最前

^① 《李大钊选集》第80页。

列，“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①，发奋图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人类造幸福”^②。这种对于新的光明的未来的赞美，表明李大钊同志对国家、民族充满希望和信心。李大钊同志置身于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历史”的进步革命潮流，并决心努力去探索实现“青春之国家”、“青春之历史”的真理，不仅是这位爱国者值得人们敬佩的地方，也为他后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打下思想基础。

毛泽东同志指出：近代那些想救中国的人，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③辛亥革命后，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同志千辛万苦地向外国学习，积极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与自由，破除封建主义的束缚，掀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热潮。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李大钊同志仍然寻找不到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他的理想和愿望也未能实现。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唤醒了中国新的革命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④这个变化的最初表现，是一部分首倡新文化运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等同志，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五四运动的左翼。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75—76页。

③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是在无产阶级的新时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伟大人物,这不是由于他有什么“灵感”,也不能看作是一种超越时代和阶级之外的偶然现象。而李大钊同志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也难免受到他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带来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问题是他怎样对待这些旧思想。李大钊同志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战斗中,用实际行动表明,他毫无保留地抛弃旧思想。因此,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史观,对李大钊同志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不仅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求,也是无产阶级的战斗任务。

我认为,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李大钊同志以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他的历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思想上,他热情宣传十月革命道路,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为中国人民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很大作用;在行动上,他勇敢地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站在群众运动前头带领人民前进,给中国人民以巨大鼓舞。这一切,都是应当铭记的。

首先,从李大钊同志的思想谈起:

(一)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工农群众自己的国家。俄国工人阶级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宣布,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在这无产阶级革命和胜利的新潮流中,李大钊同志跟当时一般民主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勇敢地进行适应世界潮流的转变,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批驳王明等人自吹在他们之前中国没

有马克思主义时曾说过：事实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这个论断，正确地反映了李大钊同志十月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真实情况。1918年下半年后，李大钊同志写文章，办刊物，积极宣传十月革命道路，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有巨大影响的事。《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中放出的马克思主义异彩，就是李大钊同志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很好证明。在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

1. 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意义，指出这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①俄国工农阶级第一次夺取了国家政权，李大钊同志高兴万分地指出：“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这次革命必将在全世界发生巨大影响。

2. 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李大钊同志看到“新时代的曙光”，预示着中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未来。指出：俄国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②，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③。

3. 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④。我们中国人应该趁十月革命“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⑤，为实现“赤旗的世界”、红色中国而奋斗。

以上这些，都是对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颂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2页。

② 同上，第118页。

③ 同上，第111页。

④ 同上，第118页。

⑤ 同上，第121页。

诗，表现了李大钊同志开始“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并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工农苏维埃政权流露出的羡慕和向往，说明他对人类的未来充满胜利的信心。

列宁指出：“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当然，李大钊同志在刚开始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时所写的那些文章，现在读起来“未必精当”。在当时，他也还没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从他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赞扬，则说明他开始抛弃曾为之奋斗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这就说明，李大钊同志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这一根本转变表明，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开始造就了新的一代。这是中国划时代的事件。李大钊同志找到真正救国救民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为中国无产阶级作出了贡献。所以，他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在“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在广大进步青年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

（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明确指出民众“是永久的胜利者”。

十月革命前，在中国，没有谁能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虽然在革命时跟民众也有过某种结合，但他们没有也无法意识到民众是历史的主体。李大钊同志也不例外，从根本上说还是持唯心史观。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接受马列主义，从俄国十月革命中体察到工农民众力量的伟大，所以在他早期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中就充满唯物史观。但是，比较系统地阐述这一观点还是在1919年5月1日开始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李大钊同志指出，

^①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9页。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改造世界的革命学说；对它作介绍，使人们对它有正确的承认与理解，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接着他就马克思主义几个重要问题加以介绍，用两部分篇幅着重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即上引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指出：“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它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李大钊同志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在阐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关系后，李大钊同志又论证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的关系，说明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矛盾和斗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就给中国历史学开了新生面。1920年8月，李大钊同志在《晨报》上发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和12月在《新青年》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指出：唯心史观“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不能正确地阐明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李大钊同志还强调了群众自觉斗争的重要性。他说：群众通过自觉斗争，必然“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他通过阐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明确指出：民众“是永久的胜利者”，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表明李大钊同志认识到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而且驳斥了唯心史观对人民群众的歪曲和诬蔑，为中国马列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

李大钊同志说：“民众势力”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历史上的旧势力，如宗教、皇统、军阀、政阀等，“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

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础**”。只有民众“是永久的胜利者”^①。历史是靠人民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②。

人民群众怎样创造历史呢？李大钊同志指出，人民群众通过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创造历史。他首先阐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指出“劳动为一切物质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劳动的结果”，因此应当“尊重劳动”^③。“一切知识的发现，技术的发明”，是“人人劳作的结果”^④。又说：阶级斗争是社会私有制的产物，是“必不能避免的”，“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⑤。他从十月革命所引起世界性的群众运动中认识到，人民是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力量，“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在这种力量面前，“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阀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⑥鉴于这种认识，李大钊同志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⑦。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0—332页。

② 同上，第340页。

③ 同上，第160页。

④ 李大钊：《史学要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5月版，存北京图书馆。

⑤ 《李大钊选集》第191页。

⑥ 同上，第124页。

⑦ 同上，第146页。

认识民众，是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服务。所以，李大钊同志指出：当时“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①。“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②。因此，李大钊同志号召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忠于民众”，要“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苦痛的原因”。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同志对于“青春中华”还不知是什么样子，创造“青春历史”还不知道靠谁去实现；那么，五四运动后，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已经认识到，中国要彻底解放，实现人民的时代，人民的国家，只有人民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自觉的斗争才能实现。这标志着李大钊同志思想的极大飞跃——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形成。这是根本性的思想革命。

人们的思想变化跟当时历史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条件是有密切关系的。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跟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是相适应的。他的转变，既是当时工人阶级的要求，也是工人阶级自觉性的反映。此外，李大钊同志正视现实，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他通过权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由胜利到破产的过程，很快意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便毅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举起马列主义旗帜，进行适应历史潮流的思想革命，并义无反顾地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正是李大钊同志的伟大之处。

再看李大钊同志的行动。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确的言论和行动同样重要，但往

① 《李大钊选集》第147页。

② 同上，第154页

往行动更足以说明人们的思想。所以，革命导师列宁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①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一面通过宣传马列主义，鼓舞革命者，狠狠打击敌人；一面在敌人的“武打”、“文攻”面前顽强战斗，大义凛然，光明磊落，用实际行动证明对马列主义的无比忠诚。

（一）李大钊同志勇敢地同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在斗争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创造离不开“理想的主义！”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1918年12月，李大钊同志和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刊物，标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文化运动已开始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引起阶级敌人的仇视，1919年7月，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文章，开始公开仇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捍卫马列主义真理，李大钊同志同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大论战。他针对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严正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不要，因为它是解决问题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不懂得“主义”就不懂得事物的规律，结果“问题”也无从谈起，无从解决。要解决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然而，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进行阶级斗争。如果“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21页。

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①。所以，社会的根本创造离不开阶级斗争和马列主义。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②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③。通过这场“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不仅揭露了阶级敌人仇视马列主义的狰狞面目，而且也表明李大钊同志同反马克思主义阶级敌人的不可调和。

1920年底，李大钊同志又和其他人一起，打退研究系政客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贩卖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学说——基尔特社会主义抵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进攻。李大钊同志针对他们要在中国开办资本主义“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的谬论，痛加驳斥：中国虽然不如欧、美、日本等国那样发展资本主义实业，但中国一般平民接受资本主义经济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因而想在中国举办资本主义实业，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决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④。

1921年1月，李大钊同志还领导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内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要求个人绝对自由的谬论，在《少年中国》发表《自由与秩序》一文批驳道：“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原是不可分的东西”，社会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如果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环境，追求个人绝对自由，“这种的个人，还有什么个人的意义！”

李大钊同志在这期间，同种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228、233—2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第567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56—357页。

揭开了关于在中国要不要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争的序幕，影响是深远的。

(二) 李大钊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前面，带领人民向旧世界开战，宁死不屈。

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人民群众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推动历史发展的革命活动，是生产力要求打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与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旧势力以及代表旧势力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所不同的，是他不惧怕群众的革命运动。他支持和拥护工农的革命斗争，组织和领导学生、知识分子的爱国运动，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向旧世界开战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实践家。

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同志正在北京大学任职。运动开展后，他一面大声疾呼，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一面积极参加运动的领导。当学生们殴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后，有的学生被捕。他毅然挺身而出，四方呼号，成立教职员联合会，被选为教职员代表，与学生联合会一起，营救被捕学生。他还动员“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同志到上海等地宣传、发动“六三”工人罢工运动，声援学生们的爱国行动^①。同时，他还发表了大量战斗檄文，传播马列主义，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和封建统治者的卖国行为，号召人们打消“恩赐”观念，用自己的力量去“抗拒冲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坚决斗争。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控了帝国主义侵略，认为

^① 《五四运动前前后后》，见《光辉的五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版，第190页。

“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号召人们打倒“强盗世界”，改造“强盗世界”，实行“民族自决”^①。在7月13日发表的《真正的解放》一文中，他明确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②此外，李大钊同志还在《国民》杂志等刊物，发表许多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社会，指出人民斗争方向和革命前途的文章。特别是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许多短小锋利的《随感录》，揭露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歌颂新事物，宣扬新思想，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1919年这个充满革命风暴的年头，李大钊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站在革命群众运动前头指导运动，在北京、长沙、天津、武汉等地领导了伟大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他的文章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所发表的文章相配合，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等等，影响了当时整个思想界。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之一，就是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掀起一个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热潮，为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革命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以群众的智慧、创造、勇敢和力量来鼓舞自己，丰富自己，

① 《李大钊选集》第212—214页。

② 同上，第226页。

使自己得到根本改造。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只有跟工农相结合，才能改造自己，同时也改造社会。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和恽代英等同志在各地领导人民斗争，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他们深入工农群众，把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做了许多工作，这就为建党准备了条件。1920年9月，李大钊同志发起和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深入工厂，调查工人状况，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群众的斗争。1921年1月，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又指派邓中夏等在长辛店为工人创办劳动补习学校，提高工人思想觉悟，锻炼和培养工人的组织能力。同年5月1日，长辛店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并以“工人俱乐部”的名称，组织工人自己的工会。可见，李大钊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党成立后，李大钊同志是北方党的重要领导人。他忠于党、忠于马列主义、忠于人民，英勇无畏，兢兢业业地工作，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重大革命原则问题上，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和党制定的正确方针，同党内外一切阶级敌人，进行顽强战斗。为此，他为反动派所不容，被奉系军阀逮捕。1927年4月28日，为了党的伟大事业，李大钊同志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他与人民永别了，但正如吴玉章同志在《李大钊选集》题词中所说：李大钊同志的“‘青春’之气，万古常青”。

由上述可见，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李大钊同志的思想改造是紧密相联的。他献身于马列主义事业的过程也是他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

三

李大钊同志的一生，是不断追求真理，不断进步，坚持革命的一生。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追随时代潮流，从一个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民主革命者，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为党的事业贡献了生命，实在可歌可颂。他为国家、民族呕心沥血，为人民和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我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深切怀念。陈毅同志在《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诗中所说：李大钊同志是“革命思想早，行动守纪律，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①今天，李大钊同志人虽死，但他的遗文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②。我们要继承这一光辉遗产。当然，李大钊同志也不是超越时代的“完人”。他的思想也不能不反映新旧时代交替时的复杂因素。不过，本文总结李大钊同志追求真理的复杂过程，是为了说明他追随时代潮流不断进步的崇高精神，是为了还原李大钊同志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并不是考察他的思想全过程。所以，无需去分析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还遗留的一些民主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同志要救国，从日本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方案，并热切地为民主与自由大声呼唤过，但西方资产阶级的这一套，却终不能使中国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为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近八十年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因为中国资产

① 陈毅：《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见《陈毅诗词选集》。

②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四卷。

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们的失败是必然的。”^①李大钊同志从外国学来的那些新学和西学，都不能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也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见，资产阶级宇宙观不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去战斗，当然理想总不能实现。

十月革命后，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来中国，情况就两样，中国从生活到思想都开始出现了崭新的时期。这就说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救国的唯一真理。李大钊同志等一批先进的中国人首先向西方寻找到这个救国真理，并最早开始在中国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伟大历史的开端创造了前提条件，作出了重大贡献，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李大钊同志的革命道路，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相信真理、坚持真理的道路，是实事求是的道路。革命知识分子遵循这条道路前进，就能在党的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马列主义真理之光象探照灯照耀中国革命前程，神州处处气象新。当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豪情满怀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胜利前进时，我们怎能不以无比敬仰的心情，去追思在黑暗中国摸索救国真理、高举马列主义火炬、为革命抛头洒血的李大钊同志和无数革命先烈呢！我们应该遵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57页。

李大钊同志的遗愿，“继续牺牲者愿做而未成的事业”^①，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① 《李大钊选集》第382页。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历史地位

肖超然 沙健孙 梁 柱

1979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同志的九十诞辰。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空前觉醒、斗争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期，李大钊同志站在历史的前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李大钊同志和北京大学的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从1918年1月进入北大，直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才被迫离开，前后将近九年。在这期间，他所进行的广泛的革命活动，是以北京大学为基地的。今天，我们隆重纪念李大钊同志九十诞辰，感到分外亲切，无尚光荣。

—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马克

思主义从产生到传入中国，其间经过了整整七十年。中国人民和它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曾进行过长期的探索和艰苦的斗争，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才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从这时起，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而李大钊同志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时传入中国，李大钊同志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呢？这决不是偶然的。第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有了一个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壮大了的进步阵营。站在这个阵营最前头的工人阶级正在日趋觉醒，它迫切要求新的理论武装，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第二，从思想发展的历史行程来说，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仅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思想已被证明是毫无出路了，中国人民已下决心要坚决摒弃之，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证实了这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由于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夺国柄，上演帝制丑剧，共和倾覆，南北对立，它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特别是先进分子的心目中，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动摇以至破产了。这就是说，不论是中国固有的古老文明，或是从西方输入的资本主义文明，都不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唯一有可能为中国人民指明前途的就只有社会主义思想了。第三，也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其中也包括中国。这真是一种少见的历史巧合，难得的历史机运，正当中国人民摒弃旧的思想武装，迫切需要新的先进的思想武装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胜利的十月光辉，照亮了中国的沉沉大地，无怪乎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即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从欧美转向了俄国，从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在这个大转向中，李大钊同志是一位最杰出的代表。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的封建文化思想是深恶痛绝的。十月革命前，他在我国新文化运动勃起的前几年中，就曾发表一系列极富战斗性的文章，抨击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①；号召青年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②，表现了很强的彻底决裂的精神。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他曾哀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③并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与保留。他并认为，如果代议政治要废除，“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较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④。可见他是考虑过要用一种新制度来代替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正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基础，加以他于1913年至1916年在日本学习期间，早就接触过社会主义思潮，喜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所以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一旦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为历史发展所证实，他就毫不踌躇，猛着先鞭，捷足高登，无条件地转向十月革命，成为我国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同志代表我国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他到北大后不久，于1918年先后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三篇著名论文。这三篇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集中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其时代精神，批驳了认为第一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指出第一次大战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这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回答了当时由于爆发十月革命和德奥联盟被战败这两件世界性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第1页。

④ 同上，第50页。

大事，人们普遍存在的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如何看待第一次大战的胜利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十月革命介绍的。因此，如何对待十月革命，就成为检验是否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李大钊同志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时，正是全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对十月革命大肆攻击、污蔑，进行舆论围剿的时候。十月革命的真相，其时并不为国人所了解。只要翻一翻当时国内的报章，就可以看到诸如“过激派阴谋”、“布尔扎维克之阴谋”、“过激派侵入之危险”等类标题报道，充斥版面。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被视为异端、“新毒”，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被看做洪水猛兽。思想舆论界毒雾迷漫。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李大钊同志冲破桎梏，异军突起，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对于十月革命的拥护。他正确地地区分了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二十世纪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性质，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①他把十月革命比喻为“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鹑声”，认为正是这个革命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对于这“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唯有翘首以迎”^②。他预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③。对十月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论述得是何等透彻，何等深刻呀！四个月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们普遍迷惑于英美等协约国战胜了德奥联盟的现象，大肆庆祝胜利，宣传什么这是“公理战胜强权”，是“正义”、“平等”、“互助”的胜利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11月15、16两日召开的天安门讲演大会上，又作了题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2页。

② 同上，第104页。

③ 同上，第101页。

为《庶民的胜利》的不同凡响的演说。他扫除思想迷雾，尖锐地指出：“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①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这就从经济的和阶级的根源上揭示了第一次大战中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矛盾，表明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已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同志曾说过，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实质达到理性的认识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③。毫无疑问，李大钊同志就是最早具有这种认识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正是他这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前提。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Bolshevism 的胜利》的著名论文。这篇文章是他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明白的、公开的宣言。比较上述两篇文章，他的思想认识是更前进更明确了。他公开提出和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即列宁主义，把第一次大战后人民的广泛觉醒和俄国十月革命突破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而取得胜利的事实，明确归结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是他批判帝国主义制度、赞助十月革命的思想认识合乎逻辑的表现。他把当时资产阶级捧为领袖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在一旁，却突出赞扬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和列宁，声称：“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9页。

② 同上，第110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6页。

业，毋宁说是列宁……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①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和列宁一边。他进一步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李大钊同志的这三篇文章，虽然还有一些唯心的表述，但基本倾向是唯物的，马克思主义的。其笔锋之犀利，文字之流畅，气势之磅礴，思想之敏锐、深刻，在当时国内都是仅见的。它代表了当时国内思想认识的最高水平。

1919年5月，李大钊同志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③。这表明他已有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两个月后，在从五峰山发出的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李大钊同志对胡适妄图阻止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动行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邪说，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和批判，这表明他已不仅在理论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行动上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作战了。从这以后，李大钊同志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展开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第一，发起成立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其中最著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前者于1920年3月，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由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朱务善、李骏、李梅羹、罗章龙、杨人杞、刘仁静等十九人发起秘密成立，后者由李大钊同志和费觉天、郭梦良、鄢祥祺、何恩枢等八名北大学生于同年12月公开成立。这两个研究会，特别是前者，在搜集整理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3页。

② 同上，第117页。

③ 同上，第177页。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方面，进行过大量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李大钊同志多次在这两个研究会上宣传马克思主义，象收入《李大钊选集》中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文，就是他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此外，李大钊同志还和当时积极活动于北大的进步政治学术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团体有很大一部分成员是北大的学生（新潮社的成员几乎全是北大学生），而李大钊同志是北大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以后，兼任经济、政治、史学等系教授并任北大评议会评议员^①，他的革命思想、渊博学识和高尚情操，足为青年一代的楷模。因此，这些团体都奉他为导师，请他在政治上和学术上进行指导。李大钊同志也常在这些团体内讲演、座谈。同时，他在《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国民杂志》、《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阐明历史发展规律和剖析社会重大事件的文章，极大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二，正式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从1920年起，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律系先后开设《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或讲座。当时的《北大日刊》上还登载着这样的“布告”、“启事”：

注册部布告：李大钊先生刻已来校，所授唯物史观，本星期起照常授课^②

① 1920年7月8日北大评议会召开特别会，通过决议：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从此，李大钊同志即以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史学等系教授。同年10月16日，评议会选举，李大钊同志当选为评议员。见《北大评议会议事录》第二册，北大档案室藏。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5月10日。

政治学系教授会启事：本星期四之现代政治，仍由李守常先生继续讲演“工人的国际运动”^①

这是在我国大学里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课程，对学生讲授，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载，李大钊同志在北大文科各系以及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开设的理论课程共有十门之多，计有“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女权运动史”、“社会学”、“图书馆学”等。学生学了后要进行考核。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1923年北大政治系一位姓贺的学生的“唯物史观”试卷。这份试卷的封面印有“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套红大字，在考试科目栏下印有“唯物史观”四大墨字。试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的全部答题用毛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晰，论述正确，不仅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还对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重大意义。试卷写道：“自马克思唯物史观出世后，这些唯心解释的企图都一一失败了，不得不进取于唯物的解释，史学的价值才日日提高，日日昌明。”“自有马氏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意即把历史学变成了科学——引者）。此等功绩，实为历史界开一新纪元，也是影响于史学上最大之点”^②。这份难得的考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大钊同志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生动效果。

李大钊同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对五四时期的北大以至全国一代青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在的北大图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2月22日。

② 这份试卷现收藏在北京市档案室。

书馆主任办公室和在城内的住宅，常常是北大进步学生和革命青年集会和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一代革命青年在他的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成长起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都受过他的影响。从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整整有半年时间，毛泽东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他管理的报刊阅览室和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同在红楼一层，相距很近，因此能有机会朝夕相处，经常过从。后来毛泽东同志曾回忆说，他就是1918年下半年，于北大图书馆工作学习期间，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的^①。周恩来同志在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后不久，也就和李大钊同志有过直接的接触。1919年9月21日，即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觉悟社就曾请李大钊同志去天津给他们作学术讲演。在这次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会见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过去后一年，1920年8月，周恩来同志又率领觉悟社到北京，和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一起在陶然亭开茶话会，相互学习，交流经验，共同探讨改造旧中国的道路。会上，李大钊同志向觉悟社和其他几个团体建议，有必要“标明主义”。“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想，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②。这里所谓标明主义，就是要标明社会主义，标明马克思主义。随后，这几个团体又在北大的通信图书馆开会，共同商定了“改造联合”的方案，拟定了宣言和约章。也就在这一年的夏秋之间，李大钊同志又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③。

五四前后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过李大钊同志革

① 斯诺：《西行漫记》。

② 《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15日。

③ 参看《李大钊传》第92页、第108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载《关谦呈文》。

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的青年还可以举出许多。象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范鸿劼、何孟雄、杨景山、赵世炎、缪伯英、张太雷、郭隆真等，就是一部分代表。另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同志、邓颖超同志也都得到过李大钊同志的帮助。陈毅同志曾回忆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是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中受过不少教益^①。完全可以这样说，李大钊同志是五四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代革命青年的指路人。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日益结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逐渐成熟。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华，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况，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他以记者的身份来到北京，经北京大学一位俄籍教员的介绍首先访问了李大钊同志。接着在北京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开了几次座谈会。后经李大钊同志介绍，维氏又去上海访问了陈独秀，并同上海的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举行了座谈。经过多次讨论，交换意见，大家达到了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成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于是陈独秀就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而李大钊同志就成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

1920年9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大正式成立。参加者除李大钊同志是教授外，全是北大学生。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小组发展到十儿人。同时，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大成立，第一批团员四十多人，其中不少是北大学生。李大钊同志也参加了青年团，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出版委员^②。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北方党组织的最早基础。党成立后，它发展为党的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1924年以后，又进一步发展

^① 陈毅：《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② 参看《李大钊传》第92页、第108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载《关谦呈文》。

为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李大钊同志一直是北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面在北大教课，一面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北大也一直设有党的机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和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的发行通信处都设在北大第一院。在红楼，还设有北方区委秘密接头的地方。在北大三院，北方区委还秘密办过党校训练班，训练党团干部。从1918年到1926年，北大始终是李大钊同志生活、战斗的重要阵地，这确是北大历史上的光荣。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只需死记硬背和机械复述的教条。它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在不同的国家中，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下，是各不相同的。必须从本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这个理论，才能使这个理论发挥出伟大的威力来。

李大钊同志不仅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第一个指明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作为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还在中国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第一个指明了应当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在欧洲。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运用这个理论，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社会条件下来运用这个在欧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论；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众是农民，首先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是一个困难而又特殊的任务。这个任务的解决方法，是无论在哪一部现成的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

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敌人几乎

从来就众口一词地宣称：这个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早在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就曾经作过这种鼓吹。由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1919年7月，他抛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公开发难，向马克思主义进攻。胡适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因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由此出发，他攻击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只起了“鹦鹉和留声机”的作用。

面对资产阶级的猖狂挑战，李大钊同志旗帜鲜明地率先投入了战斗。1919年8月，他发出了致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给予了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以及时的、有力的回击。

一方面，李大钊同志明确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他引证日本《日日新闻》的评论，指出胡适等人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①。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已经陈旧了；而“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②，是不可抗御的。他强调说，这个布尔扎维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不仅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正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它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③。在这里，他坚定不移地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1页。

② 同上，第232页。

③ 同上，第230页。

另一方面，李大钊同志又明确地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和“研究实际的问题”，这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不应当截然地把它们分割开来。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和各国的实际结合在一起。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①在他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革命科学，而不是凝固的、僵死的、万古不变的宗教教条。他认为，“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②的。他并且告诫人们，不要“偏于纸上空谈”，而应“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在这里，他初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光辉的思想。

李大钊同志所提倡的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中是有反映的。比如，研究会曾以“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为题，在北大举行辩论会。参加辩论会的有北京各大学各专门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而李大钊同志则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专家”被邀请为辩论会的评判员。辩论会经过几天的热烈争辩，最后由李大钊同志作结论。他的结论“引起了大多数听众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增加的会员达数十人之多”^③。研究会还进行过诸如“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掠夺之实况——特别注意于中国”这种联系实际的专题研究^④。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230页

③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④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北大日刊》1922年2月2日。

当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正确地、有成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极其宏伟、艰巨的工程，它不仅有待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而且需要有一个在实践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过程。但是，李大钊同志遵循着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正确的方向，在这方面也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勇敢的探索，并因而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重要建树。比如，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他就提出过许多卓越的见解：

（一）指明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

中国人民看出帝国主义自身的矛盾及其联合中国封建买办阶级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个情况首先在李大钊同志的著述中得到了证明。

早在1919年1月1日，李大钊同志就写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它是与民族自决主义直接对立的。“据现在所能看到的当时文章，这是我国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①。同时，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外国驻华使馆集中的地区“东交民巷里有我们的太上政府”^②，从而揭露了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靠山，是中国内政的操纵者。

在应该怎样对待帝国主义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同志总结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在《再论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两个互相关联的重要的战略思想。即：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的凶恶的本质，对它不应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我们应该信赖民族自决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9页，并参看《李大钊传》第59页。

② 同上，第215页。

力量，去解决一切纠纷，不可再蹈从前‘以夷制夷’的复辙”；另一方面，要认清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敢于同它进行斗争。他说：“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阔，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我们应该在那威势煊赫的中间，看出真理的威权，因而发生一种勇气与确信，敢与他搏战，信他必可摧拉。”^①由于帝国主义惯于用自己的强大来吓唬人们，用各种甜言蜜语来欺骗人们，因此，李大钊同志所揭示的这两个思想，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境况下的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武装，是一个十分巨大的鼓舞力量。

（二）指明了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先锋。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是由无产阶级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在建党初期，李大钊同志就批驳了“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的错误论调，指出无产阶级身受的压迫是极为深重的。他们既受本国资本家又受外国资本家的压榨，“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②，因而有着坚强的革命性。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同世界各国无产者联合，在本国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23年京汉路罢工失败后，党内有的人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示了悲观，对于工人运动采取了消极的态度^③。与此相反，李大钊同志却从二七罢工斗争中，进一步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他特地写了《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热情地讴歌“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坚定地宣告：“现在中国是

① 《李大钊选集》第281页。

② 同上，第377页。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24—125页。

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正是工人阶级的这种革命精神在“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①；在这里，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现得何等鲜明！

（三）指明了农民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同志首先着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但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也开始着手研究农民问题。他在1925年至1926年所写的《土地与农民》等文章，就农民运动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意见，是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李大钊同志极为重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与那种所谓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的错误估计相反，他认定农民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他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②

为了把广大农民广泛深入地发动起来，李大钊同志认为，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因为只有农民自己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因此这是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其次，要注意武装农民。因为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军阀土匪扰乱范围的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③。这种武装农民自卫

① 《李大钊选集》第499—500页。

② 同上，第525—535页。

③ 同上，第534页。

的组织应该是“属于乡村大多数群众而从事于守望相助的”，必须严格防止军阀、土豪、土匪加以利用；最后，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为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革命当局应该“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①。他并且号召革命者应当结合起来，到乡村中去进行工作，以便引导在水深火热的沟壑中倒卧着的广大农民“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②。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农民问题上，李大钊同志的主张是和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正确方向相一致的。

（四）指明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4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③。而李大钊同志早在这以前就已经对这个思想作过初步的表述了。比如，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以其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使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作为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中国人民，也“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④。在大革命时期，他更不止一次地论述了“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这个正确的思想。

正是从“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这个命题出发，李大钊同志一方面指明了“把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起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条件；另一方面又指明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2—534页。

② 同上，第5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9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401页。

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①，从而充分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李大钊同志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且从现时的认识水平来看，他的某些论述，也难免有其不精当之处，或者虽属正确仍然缺少发挥；但是仅从上面所举的事例，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于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事业，对于提高党在理论上的成熟程度，确实作出过极其宝贵的贡献。鲁迅曾说：他的遗文“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②。这是完全正确的。

认识的来源是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最早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必须使自己和中国的工农群众结合起来。作为一代青年的导师，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李大钊同志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说过，“光明缉熙之运，唯待吾民之意志造之，唯赖吾民之实力辟之”^③，对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是有所期待的。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借助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更建立了“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④的坚定的信念。因此，早在五四的前夕，他就发出了“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革命召唤。他教导革命青年要与劳动者同呼吸，共命运，谆谆告诫他们必须在群众之中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⑤。他要求青年深入到群众中去，以便了解“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561页。

②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

③ 《李大钊选集》第18页。

④ 同上，第330页。

⑤ 同上，第150页。

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痛苦，应该用什么方法？”并进而“把他们提醒，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①。他认为，知识分子固然是“民众的先驱”，但仅仅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必须把“三五文人的运动”变为“劳工阶级的运动”，把“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街市上的群众运动”^②，才有意义。

李大钊同志的这种思想，对当时的革命青年是有影响的。这个情况我们从北大学生的活动可以看得很清楚。比如1920年5月1日，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同志组织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及“北大工读互助团”在北京城内第一次发起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他们除在城区举行小型示威外，并以《劳动纪念日与中国劳动界》等为题在街头进行讲演。北大校役夜班同日在北大第二院大讲堂举行大会，有工友、学生五百余人参加。会上有人提出，要把工人阶级“当作一盏指路明灯”，表示“我们要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更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工作。向工人群众作马克思主义通俗宣传的《劳动音》周刊出版了，它的创刊号就强调了社会主义运动不仅要作学理的宣传，而且必须“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④。为了这个目的，1920年冬天，李大钊同志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这个学校是与长辛店工人商议后，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义，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团捐款开办的。一九二一年元旦，学校正式开学了。有将近二十个工人来上学。到四五月间，又进一步发展到四十来个人。几名北

① 《李大钊选集》第161页。

② 同上，第324页。

③ 《北京之劳动纪念》，《时事新报》1920年5月4日。

④ 《劳动运动的新生命》，《劳动音》创刊号1920年11月7日。

大学生被派作学校的常驻教员。邓中夏同志每周来讲课两次。北京小组成员何孟雄、朱务善等轮流来上过课。李大钊同志本人也来学校视察过。年轻的教员们抛开大学的学业，来挤着住在狭窄的房间里，“一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饭，还省下几块钱来买茶叶糖果，好招待工人来学校里座谈。他们这份精神真把工人的心打动了，谁也不再把教员当成一般穿长褂儿的先生看待”；“先生也不再讲客气，不再分彼此”^①。这年的五一节，长辛店工人上千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北大也有多人前来参加。会场上“一时叫号声唱歌声杂出，几乎把火车汽笛的声音都压住了”^②。就是在这个中国工人自己召开的第一次庆祝五一的大会上，我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的长辛店工会宣告成立。这年秋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补习学校的几位先进工人都入了党，成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很明显，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工作，既帮助革命知识分子学习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斗争经验，推动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又帮助工人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武装，提高了自己的阶级觉悟。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生动范例。

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和优秀理论家的李大钊同志，他是为挽救中国危亡而宣传和研究革命真理并为之奋斗的，因而他不仅是一位渊博的学者，而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战士。在他身上体现了学者和战士这样两种品质的和谐的统一。他无私无畏，勇于实践，认定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

① 《北方的红星》，见《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93页。

② 《晨报》报道，转引自《北方的红星》。

动”^①。他曾用诗一般的语言，抒发自己的战斗激情：“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②

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是一个革命基础极为深厚的国家。我们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实际的革命斗争，肩负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从这时起，李大钊同志除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传播以外，开始更多地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积极参与和领导广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党在成立后的两年间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党最早注意并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中，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书记，全力领导了北方的工人运动。他首先以“正太路工业研究会”的名义，在石家庄建立工会组织。后来，他又利用当时控制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和交通系的矛盾，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六位共产党员，以铁路“密查员”的身分，到京奉、津浦、京汉、京绥、正太、陇海等六条铁路线工作。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在各路工人中扎下根基，帮助工人建立夜校和工会组织。仅京汉路沿线在1922年就建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在这次罢工高潮中，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领导的以铁路工人为中心的北方罢工运动，轰轰烈烈，威震全国。李大钊同志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罢工的前几天，他就亲临汉口。这时，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由郑州迁到汉口江岸办公，正是斗争最紧张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参与了指导。罢工爆发后，他“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③。李大钊同志对阶级兄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1页。

② 同上，第498页。

③ 同上，第499页。

弟的牺牲无限悲愤。有同志回忆，他当时“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苍白”^①，但他对工人事业的胜利有坚定的信心。“二七”罢工失败后，他又立即投入了救济被害烈士家属和失业工人的工作。

这时，革命的进程已经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它已成为发展革命运动、促进中国革命高潮迅速到来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于是，李大钊同志也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并为建立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党的二大前后，李大钊同志就为贯彻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受党的委托，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联系。他们曾多次就振兴国民党和振兴中国的问题，“畅谈不倦，几乎忘食”^②。李大钊同志坚定的革命精神、深刻的分析能力和诚挚的态度，给中山先生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孙中山认为李大钊“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是他“特别钦佩和尊敬”的人。李大钊同志也常到孙中山家里去作客，就革命工作交换意见^③。在这期间，李大钊同志还先后设法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政府特使越飞会见了孙中山。他们向孙中山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验，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援助中国革命的热忱。在我们党召开三大、正式确定了统一战线的方针以后，李大钊同志不辞辛苦，为促成国共合作多次奔走于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之间，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1924年1月5日和2月19日的《北大日刊》曾分别刊登了李大钊同志因事请假离京和他回京到校上课的布告。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正是在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负责领导参加大会的全体共产党员，并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的成员，参与大会的领导工作。在会上，国民党右派分子提议在党章中规定“本党党员不

①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人民日报》1957年4月29日。

② 李大钊：《狱中自述》，见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展件。

③ 参看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得加入他党”；对此，李大钊同志发表了严正的声明。他指出：“我们认为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强调“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必须“明揭而扫除之”^①，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正如何香凝先生后来所回忆的：“那时候，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极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②

统一战线建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革命的实际运动已经把农民问题提到了最迫切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我们党内，李大钊同志是较早地注意到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的一个人。他不仅提出过解决农民问题的许多正确主张，而且他还亲自训练农运干部，为当时秘密设在北大三院的北方区委党校训练班讲授农民课程，并派出许多同志担任农民运动特派员，参加领导各地的农民斗争。在这同时，李大钊同志还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早在1923年，他就经常和赵世炎、邓中夏等同志到北京蒙藏学校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并培养了乌兰夫、奎璧、吉雅泰等第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1925年10月，李大钊同志亲自到张家口，主持内蒙古地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并被选为大同盟的书记。会后，李大钊同志积极领导了内蒙古人民特别是农民的革命斗争，在许多地区建立了农民协会、牧民协会。工农兵大同盟还出版了《内蒙古农民报》作为自己的机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见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展件。

② 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转引自《李大钊传》。

关报。随着北方各省农民运动的兴起，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是更加深入发展了。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还积极进行了军事活动。他曾亲自给冯玉祥做工作，在冯部国民军中发展党的组织。他还派出许多同志到广州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些同志学习结业回来，其中不少人在国民军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成为我们党后来在西北军中的一部分基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西北军内日益发展了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活动，广大官兵日益倾向革命，这是和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对冯玉祥所部进行的工作分不开的。

这时，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南方革命力量正在加紧对北伐战争的准备，而李大钊同志则一直战斗在北洋军阀直接控制的心脏地区。由于他的正确领导，日益发展的北方革命运动，实际上成了配合即将开始的革命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24年以后，李大钊同志除了领导我们党的北方区委工作外，还担负了领导整个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重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持团结左派、打击右派的正确方针，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的同时，坚持我党独立自主地领导工农群众的斗争，从而促进了北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1925年，他领导了支持孙中山北上、召集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制造的“善后会议”的斗争。这一年的11月，他和北方区委根据群众日益革命化、北京段祺瑞军阀政权摇摇欲坠的新形势，又毅然决定了发动以推翻段祺瑞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11月28日这一天，北京许多街道的屋顶上竖起了迎风招展的红旗，几十万份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传单到处飞舞，全城呈现了一片革命的气氛。在李大钊同志亲自率领下，几万群众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前面由北大学生军为骨干的学生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等为前导，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群众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赶跑了警察总监，一度占领了警察总署和邮电

局，一些学生还占领了“国会”。他们还准备将段祺瑞提交民众公审，驱逐这个卖国贼下台。这次斗争由于国民党右派的挑拨和告密活动，破坏了原定国民军配合行动的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并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段的国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李大钊同志是一位大无畏的革命战士，旧世界的不妥协的敌人。在艰苦的斗争中，他始终英勇顽强，不屈不挠。他曾用下面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身的高尚情操：“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①。还在五四运动时，他就曾冒着被逮捕的危险，亲自到城南游艺园等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号召群众对于违背人民意愿的政府，“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他曾多次作为北大教职工的代表去北京政府国务院请愿，积极营救被捕学生。据一位当时运动的参加者回忆：“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枪。守常愤怒非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②。在著名的“三·一八”运动中，北京十多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英勇斗争。李大钊同志亲临现场指挥，亲自举着大旗率领群众队伍前往执政府请愿。当群众遭到反动军警预先布置的野蛮屠杀时，他不顾自己头部和双手受伤流血，从容不迫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他自己曾一度被捕，经他机智地脱险后，仍继续留在现场，坚持和最后一批群众一起离开，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心中唯有群众的崇高革命精神。

① 《李大钊选集》第247页。

②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341页。

李大钊同志的革命活动，使反动军阀极端恐惧，也招致了他们的刻骨仇恨。早在1923年2月，直系军阀头子曹锟就从保定密电北京巡阅使王怀庆，声称：“北大管理图书员李大钊在该校设有秘密机关，传布过激谬说”，“应密飭干探切实侦查，如有前项不法行为，望即密达政府依法惩办，以遏乱源”^①。1924年5月，由于张国焘的出卖，反动政府对李大钊同志明令通缉^②，6月又下了海捕文书，飭令各省“严速查拿，务缉归案”^③。1925年3月，军阀政府教育部又训令北京各校，对“北京大学首倡共产党”的李大钊，要“严行防范”^④。对于这一切疯狂的迫害，李大钊同志都等闲视之，仍然战斗不息。由于他在广大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中受到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因此人民都站在他一边，反对反动派对他的迫害。北大评议会曾专门通过决议质问教育部，并要求取消对李大钊的通缉令。在1924年8月7日致教育部的公函中，北大反驳了反动当局以“提倡共产主义”作为通缉李大钊的罪名，指出：“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科学问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以维学术。”并且提出：“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⑤“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反动政府再次下令通缉李大钊同志，北方党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李大钊同志将个人安危置于度外，谢绝了同志们要他暂时离京的劝告，继续留下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在隐蔽期间，他还通过在漫云女校工作的郭隆真同志，和北大进步力量保持联系，继续关怀和指导北大的爱国民主斗争。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被捕

① 《曹锟挂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5期。

② 《晨报》，1924年6月28日。

③ 转引《李大钊传》第161页。

④ 《教育杂志》第17卷第5号。

⑤ 《北大致教育部函》北大档案室藏。

后，受到了敌人的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气节凛然。在敌人法庭上，他侃侃而谈，宣传革命真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贞和革命英雄气概。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其他主要负责同志被捕后严守党的机密，使北方区委所属七个省的党组织没有遭到一点破坏。4月28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我们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时年仅39岁。和李大钊同志同时牺牲的，还有北大的范鸿劫、杨景山、李昆、张挹兰等烈士。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李大钊同志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彪炳日月，辉煌千古。它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人民革命史上的灿烂篇章，也是北大历史上的灿烂篇章。

李大钊同志诞生后的九十年，是中国历史发生掀天揭地变化的九十年。先烈期望的“青春之中华”，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烈士鲜血浇灌的红花，已经开遍祖国大地。李大钊同志生活、战斗过八年的北京大学，也已经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今天我们纪念李大钊同志，就一定要学习他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寻求真理、热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精神；学习他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理论和实际密切联系起来新的革命学风；学习他为了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忘我斗争、英勇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这些光荣传统，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更加努力地奋斗。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离于众庶，则无英雄”

——李大钊同志是怎样看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

朱维真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也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大钊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正确看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始终尊重人民，忠于人民，为人民说话办事，相信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大钊同志的革命思想和实践中一个始终一贯的特点。

拥护人民民主 反对封建专制

早在1913年，大钊同志刚刚投入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生活不久，就认为民主共和应当是给人民带来幸福，而不应当只是把皇帝换成大小的专制军阀。那时，他就对人民的苦难作了深刻的描绘，对人民的命运表现了衷心的关切，并愤怒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①

1914年到1916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中，大钊同志痛斥了那种诬蔑中

^① 《李大钊选集》第1页。

国人民“无参政之能力”，“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因而需要恢复帝制的谬论。他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的自主能力和革命精神，指出：“纵悬厉禁以网之，民亦将进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此实逆乎国情之论也。”^①特别难得的是，大钊同志没有停留在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这一点上。1916年，在《民彝与政治》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反对迷信个人的英雄史观，反对一切封建专制主义，要求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这个在当时十分卓越的见解。

在这篇文章中，大钊同志总结了袁世凯篡权复辟在思想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分析了几千年封建专制所造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危害：总是把希望寄托于出现一个圣明的统治者来替大家造福；这种思想，只能麻痹民众的意志，使得民众不能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文章指出：辛亥革命以来，人们感于任务的艰巨，遭遇的困苦，于是，一些急于求成的人就大惊小怪地奔走呼号，“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从而歌哭之，崇拜之”。他们就这样看上了袁世凯，把袁世凯吹捧成为“吾国之拿破仑”，“吾国之华盛顿”，“尧、舜、汤、武之再世”，“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而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也就借此“蒙马虎皮”，欺骗民众，并通过手下的顽儒利禄之徒，大造舆论，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打扮成“‘神武’之人”，“以迎秽纳垢，府聚群恶”，作威作福。结果，“‘神武’之势成，而生民之祸烈矣”！文章说：这固然是遇到了坏人，造成了如此的祸端，但也是“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有以成之”啊；“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②

大钊同志认为，要彻底打倒当时还在作垂死挣扎的袁世凯，

^① 《李大钊选集》，第5页。

^② 同上，第46、47页。

并防止这类野心家篡权窃国的事件重演，就必须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迷信英雄的心理，使广大人民敢于起来争取民主，实行民主。因此，他着重指明：“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他尖锐地批判了那种“英雄者，人神也”的谬论。认为这种谬论，只能使人民“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①。

大钊同志说，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一则置重众庶，一则侧重一人”。他郑重宣告：“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望也”^②！

大钊同志这些论述，我们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对于我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于我们分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仍然是很有帮助的。

正因为大钊同志在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确立了“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正确见解，较好地解决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才能毫不犹豫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欢欣鼓舞地迎接人民革命“新纪元的曙光”。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许多人都在讴歌协约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时候，他却挺身而出，在我国唱出了第一曲十月革命的赞歌，热情颂扬了“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他这时已进一步把民主与社会主义正确地联系起来，指出：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49页。

② 同上，第49、56页。

民主应是“一步一步地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我们不应满足于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改变人类整个旧的社会制度，“直到世界大同，才算贯彻了民主的真义。”^①

宣传唯物史观 批判英雄史观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大钊同志更把尊重人民，相信人民，反对迷信个人，迷信英雄，提到唯物史观的高度来认识；并把传播唯物史观，批判英雄史观，作为革命宣传的一项突出内容，贯彻始终。

这一时期，他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所开设的十多门课程中，就有六、七门课讲到这方面的内容；他在这时所写的大量文章，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所发表的演说，以及和同志们的谈话中，也着重讲了这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当时，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民众。首先是到工人中去，启发工人的觉悟，搞工人运动。这样，才促进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成立后，进一步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农、学生运动，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大钊同志不仅参加了而且领导了这些工作和斗争。他之所以特别重视宣传唯物史观，批判英雄史观，也正是自觉地为革命需要服务，为发动民众的工作进行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大钊同志用很大力量反复宣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他指出，根据这个原理，必然得出社会历史是从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的结论，必然得出“‘劳

^① 《跋〈国体与青年〉》。

工神圣’的新伦理”。因此，“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亶’‘天纵’的圣哲”。一切历史，“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而是由人民群众“共同造出来的”。由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发现，历史观才进于“科学之列”，“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①。

大钊同志指出，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伟人、圣人创造的，从这里必然走向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历史唯心论。

“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②，都是反科学的，反进步的。

大钊同志看到了封建思想在我国影响很深，仍然是人民群众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要思想障碍。因此，他继续揭露了英雄史观对我国人民的毒害，指出正是这种几千年来统治着社会的思想，“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是暴虐，是篡窃，是焚杀，是淫掠，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巨罪当诛，天王明圣’，无论其所受的痛苦，惨酷到如何地步，亦只能感恩，只能颂德，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这种历史观把千百万人民的革命性、创造性全都“消泯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只有老老实实的听人宰割”^③。

大钊同志强调，“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他深信，当人们看到历史的进步，就是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民所创造的，就必须“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他就能自觉认识“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④。因此，他认为，在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07、340、288 页。

② 同上，第 288 页。

③ 同上，第 506、507 页。

④ 同上，第 330、338 页。

群众中普及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当时大批投入群众运动的知识分子，大钊同志谆谆告诫他们：少数先进个人或领袖人物，必须注意正确解决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①从这种认识出发，大钊同志早在1919年初，就对革命知识分子提出了“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口号。他号召知识阶级到最苦痛、最悲惨的劳动人民中去，尤其要到农民中去。他说，中国是一个农国，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

在当时那样复杂而又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大钊同志所以能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且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正确地解决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言行一致 身体力行

大钊同志是言行一致的模范。因为他严格按照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个人和群众的关系，所以在行动上也就一贯地尊重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与群众在斗争中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他在北京大学工作的时候，热爱青年，热爱学生，是出了名的。他常常穿一件洗褪了色的布袍子，天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他每月120元的工资，用了一多半帮助贫寒的青年学生，后来又用三分之二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校长蔡元培见他完全不顾自己，只好特地关照会计，发薪时先把他家庭必要的生活费扣下来，以免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在担任党的北方区委领导职务后，他更经常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了解情况，生活上完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8页。

全和他们打成一片。1925年冬，他赴张家口领导内蒙古工农兵大同盟的成立，冯玉祥当时曾派人去找他，发现他在工人宿舍里，和许多工人一同睡在只铺了一层干草的地上。“三·一八”惨案那一天，他不仅亲自率领群众游行队伍，走在最前面，而且在自己头部和双手都负伤后，仍然坚定地指挥和掩护群众退却，直到枪声响过半小时后，才随着最后一批群众撤出广场。他经常教导同志们不要脱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而他自己，正是处处这样实践的。

大钊同志一贯地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他谦逊朴实，作风民主，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对各种不同经历、不同年龄、不同性格和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他都一样地热情爱护，诚恳相待；对他们的缺点错误，都一样地积极帮助，耐心教育。对于他这种善于团结广大同志一道工作的高尚风格，当年在大钊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陈毅同志曾有过中肯的评价：“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①大钊同志还处处以一个普通战士的身份出现，从不因为自己的地位和声望而认特殊，盛气凌人。他的同志和战友莫不称道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鲁迅说他“诚实、谦和”，这决不仅是外表，正是他思想意识上深刻修养的体现。

在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是既有宝贵深刻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的。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正确措施，曾经使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迅速地革命化。建国以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我们党反对了那种“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夸大个人作用的骄傲情绪。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开始不谨慎了。我们某些时期的错误，曾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特别是“四人帮”一伙大搞个人迷信，把领袖神

^① 《陈毅诗词选集》第195页。

化，党的民主集中制被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被破坏，造成了严重后果。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封建主义的历史很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加上我们过去对民主的正确宣传和正确实行不够，制度上也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家长作风以及无政府主义很容易滋长。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国家才被林彪、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一类阴谋家钻了空子。”因此，继续深入地宣传唯物史观，反对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清除其对于部、群众的毒害，仍然十分必要。大钊同志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1月6日）

李大钊同志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

郭 烙

李大钊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起者之一。六十多年前，大钊同志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吸取了从“新纪元”中带来的“曙光的一线”，把它交给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微言如闪首传真”（林伯渠赞诗），在黑暗沉沉的中国，是他首先起来欢呼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他首先系统地介绍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他首先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他短暂的一生中，除了担任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担负着组织并指导革命的群众社团活动、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国共两党的北方区工作等十分繁重的任务。另外，他还不断地呕心沥血、挥笔疾书，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在这些精神遗产中，关于史学方面的著作占颇大的篇幅。大钊同志是中国历史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大钊同志的著作中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有：《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19年）、《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史学思想史》（1920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年）、《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年）、《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1920年）、《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史学要论》（1924年）等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试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方法来解释历史的。当时大钊同志正处于由一个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之中，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上、提法上，还存在某些不足或不确切之处，是不应苛求的。我们必须看到，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史学观点和十九世纪末各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思潮笼罩下，大钊同志能够首先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来重新解释阐明人类历史的进程和中国历史的变动，这种首创精神，这种慧眼与勇气，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永远学习的。

本文试对李大钊同志在传播唯物史观方面的贡献，从以下几方面作些探讨。

一 社会历史发展变动的原因应从 社会内部去寻求

当时中国流行的是唯心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变动的原因是神定的“天命”，或皇帝个人的主观意志，或英雄人物的魄力。大钊同志对这些谬论给予有力的批判，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意识或精神决定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指出，“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旧的历史方法，即历史唯心主义“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①旧社会存在以外的什么“神的”或“精神的”力量推动历史前进，“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新的历史方法，既历史唯物主义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②，他认为必须由社会存在本身寻求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因，也就是“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③，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339页。

③ 同上，第237页。

“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①。他说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于是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唯心主义，遂为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战胜。他进一步指出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历史观，“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为所造”，二者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完全相反：历史唯心主义“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实，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②。“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③；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告诉人们：社会进步的原因“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④。“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⑤，这种史观是革命阶级进取的史观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使人们“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⑥。

恩格斯说：“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⑦又说：“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⑧大钊同志早在六十年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介绍到中国来了，并用它作为检阅我国长期的历史“再造青春之中国”的思想武器。这是大钊同志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也是革命阶级政治要求的反映。

① 《李大钊选集》第267—268页。

② 同上第337页。

③④⑤⑥ 同上，第33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3页。

⑧ 同上，第四卷第506页。

二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大钊同志阐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另一原理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①“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②大钊同志并不否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说：“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③。

当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满怀激情地向封建主义的思想、伦理、道德观念等展开猛烈批判冲击的时候，大钊同志却能首先理智地、冷静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从经济上寻找封建主义的根源及根本解决的途径。他说：“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④。他说帝王思想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工业发达了，帝王思想、宗教迷信思想必然被民主、科学思想所取代。他认为中国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是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理直气壮地回答当时反动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说：“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5—186页。

② 同上，第260—261页。

③ 同上，第193页。

④ 同上，第297页。

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会发生。……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①他指出要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经济问题的解决，才是根本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②。他进一步提出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方案。当一些知识分子只着眼于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时，大钊同志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了“根本解决”的途径，这就引导五四运动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三 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 变革、社会革命的发生是不依 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大钊同志节译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的有关部分，阐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又一要点是：“人类随着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③他解释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手臼产出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汽制粉机产出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④“马克思则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由家庭经济变为资本家的经济，由小产业制变为工场组织制，就是由生产力的变动而决定的。”^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不

① 《李大钊选集》第297、302页

② 同上，第233页。

③ 同上，第182页。

④⑤ 同上，第186、179页。

能适应生产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①。大钊同志从这一原理出发，进而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而获得胜利的道理。他说：“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②这正反映了大钊同志根据唯物史观深远地观察了历史发展“莫或可逃，莫或能抗”，“有进无退，不可淹留”的规律，他坚信“世界革命的新纪元象烈日一般”融化旧势力的“春冰”，反动统治者终要象“经了秋风一样的枯叶飞落在地”。他一生“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正是以他唯物的发展的历史观作为思想基础。

四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大钊同志早在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潮并存的情况下，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介绍到“满目蹉然”的中国，给渴求真理的人以方向。

关于阶级的产生，他说在原始社会，并没有阶级，人类社会曾经有一个原始共产主义阶段。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创造剩余产品，才产生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6页。

^② 同上，第465页。

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①

大钊同志多次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说：“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这两种阶级，在种种时代，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②，于是形成阶级斗争。“当初只是经济的竞争，争经济上的利益，后来更进而为政治的竞争，争政治上的权力”^③。

他探索了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说：“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④他又说：“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⑤如果只相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而忽视组织工人阶级开展阶级斗争，“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⑥。他不仅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而且看到了劳动人民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他称赞说：“‘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3页。

②③ 同上，第188、189页。

④ 同上，第223页。

⑤ 同上，第190页。

⑥ 同上，第233—234页。

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①

大钊同志认为阶级斗争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所以他的唯物史观说：‘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②

大钊同志还认为阶级斗争只是手段，其目的是消灭阶级，实现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他说：“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阶级竞争也将与这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同时告终。”^③大钊同志把阶级社会的历史称作人类历史的“前史”，他说马克思“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④。大钊同志认为在人类的“真历史”中（即无阶级的社会）“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⑤。

正因为大钊同志认识到阶级斗争是消灭阶级实现美好理想的手段，所以他非常重视发动劳动群众，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人中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五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是英雄伟人，还是人民群众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区别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试金石。历史唯心主义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强调英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1页。

② 同上，第177页。

③ 同上，第188页。

④⑤ 同上，第224、225页。

雄伟人的“天才”、“智慧”、“意志”等等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面对人民群众，却视若草芥，看作可以听任英雄伟人随意摆布驱使的“群氓”。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决定社会的面貌和历史发展的方向。

当李大钊同志还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早在1915年，他就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①1916年5月，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更进一步发挥这一思想。他说：“是则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②他认为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人民的意愿，“终求其达。其为势也，不以常达必以偶达，不以正达必以变达，不以顺达必以逆达，不以和达必以激达”^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象秦始皇那样强暴的统治，人民都能揭竿而起，把他推翻。人民觉悟了，其力量是无敌的，“残民之贼，锄而去之，易如反掌”^④。他最担心的是人民受欺骗，产生崇拜迷信、依赖英雄人物的心理，而忘却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他说：“独此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长此不改，恐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⑤，一个‘神武’人物下去，其余的‘神武’人物又陆续产生，“而‘神武’之势成，而生民之祸烈矣”^⑥。“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⑦。“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⑧。他

① 《李大钊选集》第27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45页。

④⑤⑥ 同上，第47页。

⑦ 同上，第49页。

⑧ 同上，第56页。

把对英雄人物、“神武”人物的崇拜与专制制度联系起来看，认为对个人的崇拜必然导致专制主义。而专制主义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概念是对立的。可见他是坚决反对英雄史观，而承认人民群众是真正的历史的主人。

十月革命后，他开始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有了新的认识，从劳动人民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的高度，从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阐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18年，他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①。1920年他又说：“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②其后，他进一步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说：“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璽’‘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都是象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③“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④。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② 同上，第330页。

③ 《史学要论》第87—88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定英雄伟人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大钊同志没有陷入机械唯物论的泥坑，这从他赞扬中外历史上领导起义的英雄，歌颂马克思和列宁的“功业”中可以看得到。

另外，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明确指出三点：

(1) 英雄伟人无论如何伟大，都应当把他看作“人”，而不应神化。早在1916年，他就反对加莱罗、耶马逊等把英雄神化的说法。他说：“英雄之势力，初无是物。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①他在这里简要地阐明了英雄只是代表群众的意志，英雄离开了群众则一事无成，离开了群众的意志，即没有任何力量。英雄的活动必然受着群众的制约。他又说。“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彼其超群轶类者，非由时会之因缘，即在众庶之信仰。秉彝之本，无甚悬殊也。”^②“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要求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③英雄并非天生，而是在群众的信赖中成长和存在。他反对神化英雄伟人而迷信之崇拜之。他说：“伟人崇拜，英雄崇拜，国君崇拜，都现出优劣不平等的关系……而欲依此以实现平等的理想，恐怕很难了。”^④

(2) 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离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应当考察当时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那个时代的作用。他说马克思主义“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页。

② 同上，第48页。

③ 《史学要论》第88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94页。

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①这儿他指的是不应生搬硬套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②在大钊同志的著作中，对孔子的评论颇多，他一方面认为“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③；另一方面，他认为“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④。对现代社会来说，孔子只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只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大钊同志这种态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3) 任何“先哲”、“先贤”或伟大人物的思想言论都不是适用于千秋万代的“金科玉律”或“永恒真理”。大钊同志说：“理之创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⑤。

“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⑥他指出把古人的言论当作永世不变的经典强迫人民信奉的坏处是：“其崇奉之专，即其庸愚之渐”^⑦，使人民除了“风经诂典”而外，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于是人民群众活泼的生机，创造的精神都将被扼杀。久而久之，人民便“失却独立自主之人格，堕于奴隶服从之地位。若而民族，若而国家，即无外侵亦将自腐，奚能与世争存！”^⑧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195页。

③ 同上，第79页。

④ 同上，第302页。

⑤ 同上，第43页。

⑥ 同上，第272页。

⑦ 同上，第43页。

⑧ 同上，第49页。

总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有关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当时，大钊同志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四时期，大钊同志首先高举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的大旗，向当时盘据在中国史坛上的历史唯心主义猛烈进攻，否定历史是神的安排，否定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宰，揭示历史是按照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向前发展的，阐明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人。在黑暗沉沉的中国，大钊同志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传播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理，对我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继承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坚决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历史唯心主义。

（原载《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五四前后李大钊哲学思想探讨

武 仁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我国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而其中有一些先进分子，完成了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李大钊同志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殉难于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在人生的征途上，只赢得了三十九个春秋，而从1905年进入永平中学，开始其自主生活算起，只不过生活了二十二个年头。可是就在这短暂的岁月中，他却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无产阶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李大钊同志的理论和实践闪耀着民族和阶级解放的光芒。历史事实表明，李大钊同志不愧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奠基人，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时代的开拓者。

本文拟对李大钊同志在五四前后（指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作一初步的探讨。

从李大钊同志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看来，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了。

第一，李大钊同志把世界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世界，而精神世界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他反复地论述了这一问题。

早在1917年，李大钊同志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曾指出：“历稽中国、印度，乃至欧洲之自古传来之种种教宗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极，曰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指此大主宰而言也。”李大钊同志对这个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进行了科学的批判，指出它是“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的”^①，并且指出，产生这些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是在于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不能作出解释的缘故，由于对“自然界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说明，结局仍是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②在李大钊同志看来，宇宙绝非什么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东西，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大实在”。他说：“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③在1918年发表的《今》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论证了宇宙乃是“大实在”^④。在1919年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这篇重要著作中，他通过对道德的分析，对于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指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现象是物

① 《李大钊选集》第79页。

② 同上，第262页。

③ 同上，第79页。

④ 同上，第95页。

质的反映”^①。李大钊同志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意识是存在的反映的观点，唯物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同一切唯心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第二，李大钊同志认为宇宙不是一成不变的、凝固的，而是不断运动不断迁移的；这种运动不是倒退的，而是前进的，上升的。

早在1916年发表的《新生命诞育之努力》一文中，他就曾指出：“夫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吾人日循此轮回生死、成毁、衰亡、诞孕之中，即日尝辛苦，日需努力。”^②很明显这个轮回是迭次更新的意思，是在事物不断发展变化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同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说：“二十年以前，洋海始通，西学输入，缙绅先生尚持天动地静之说，而以为奇技淫巧焉。今地球环绕太阳之理，声光化电之学，虽在童蒙，亦粗知其义矣。盖所谓真理者，亦有从世运而变迁者乎。”这都清楚地说明李大钊同志已经认识到客观事物是“时时流转，时时变易”^③的，正如他所肯定的那样：“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④1917年，李大钊同志在其名著《青春》一文中，更进一步深刻地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这就是说，宇宙是无限的物质的永恒存在，空间与时间这个运动着的物质所固有的存在形式，是无限无极的，这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在此前提之下，李大钊同志进而指出：“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

① 《李大钊选集》第267—268页。

② 同上，第64页。

③ 同上，第96页。

④ 同上，第95页。

象万殊生焉。”^①这就是说，在无限无极的物质存在中，万事万物都在运动着、转化着，就各个具体事物本身来说，虽然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但作为总和来说，则是无限无极的。这充分说明李大钊同志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而同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

第三，李大钊同志不仅论证了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着的物质世界，同时阐明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原因，并指出事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运动。

李大钊同志认为，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着的双方既相互矛盾、相互斗争，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伸），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在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②生与死，盛与衰，阴与阳，吉与凶，福与祸等等是彼此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的联系和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原因。他说：“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③。这是说，运动是矛盾的对立双方失掉应有的平衡而引起的。在1918年发表的《新的！旧的！》一文中，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指出，“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新与旧“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与进化有益。”^④这里，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了事物的矛盾斗争和统一推动着事物的运动，新陈代谢是事物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

李大钊同志认为，事物的矛盾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他在1916年发表的《青春》一文中说道：“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李大钊同志这里所讲的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66页。

^③ 同上，第68页。

^④ 同上，第97页。

“道”，是规律的意思。他认为宇宙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轮回反复，连续流转”的进程。事物总是按照其自身的固有规律而运动，“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①，“若决江河，奔流莫遏”。在这里，李大钊同志不仅论证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是有规律的运动，同时也指明了事物的运动是螺旋式的上升的发展过程。“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②宇宙运动的总的发展趋向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不是简单的循环和重复。

第四，李大钊同志认为宇宙间各种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各自孤立的。他在《今》这篇文章中，通过对过去、将来和现今的关系的论述，对事物的互相联系作了十分精辟的说明。他说：

“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一般，已成‘过去’了”，“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他进一步指出：“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从而他号召人们脚踏实地“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③恩格斯曾把辩证法视为“联系的科学”，列宁更是一再强调要认识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就必须弄清他们之间的联系。李大钊同志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

① 《李大钊选集》第67、68页。

② 同上，第273页。

③ 同上，第93、94、96页。

把握了“联系”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

只有对客观世界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谈得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只有认识了客观规律，才能利用这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指导主观的行动，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目的。李大钊同志对客观世界的唯物的论断，对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的论断和把握，对中国革命事业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二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现象，指导革命斗争，解决社会问题上，也就是在于他对中国哲学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时代的开拓上。

强烈的民族意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愤世疾俗、憎恶吃人的旧礼教和同情劳动人民的民主精神，是李大钊同志的哲学思想的发轫点。正是这一点促使李大钊同志百折不挠地去寻找正确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李大钊同志远在1913—1916年在日本求学时，便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五四前后，他已经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中国社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第一，李大钊同志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封建意识形态，揭露了封建专制政权的反动实质，指明了中国革命的任务。

李大钊同志认为，“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变化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

造。”^①在李大钊同志看来，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恰恰相反，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是上层建筑（用李大钊同志的话说是表层构造）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哲学等等上层建筑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变动的”^②。因此，李大钊同志强调指出：“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因为历史上物质的要件中，变化发达最甚的，算是经济现象。”^③“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构造，全社会的表面构造，都依着他迁移变化。”^④他在《经济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著作中，也反复论述了这一问题。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李大钊同志在许多文章中论述了上层建筑作用于或服务于经济基础的问题，比如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通过对孔子伦理观的批判作过深刻的论断。他说：“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以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⑤这就是说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的孔家学说，从来是为维护封建制度及其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其他一些著作如《孔子与宪法》等中也一再作了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不仅看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看到了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巩固其经济基础服务的。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同志对封建道德伦理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科学的批判。李大钊同志认为，封建道德伦理观既然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是它的护身符，那末，要推翻整个封建制度，摧毁封建经济基础，就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61、260 页。

② 同上，第 265 页。

③ 同上，第 178 页。

④ 同上，第 179 页。

⑤ 同上，第 80 页。

必须对封建道德伦理观进行彻底的批判。作为哲学家的李大钊同志，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的批判始终富有现实的战斗性，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因此他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

李大钊同志对封建道德伦理观的批判，主要针对着“洪宪登极”、张勋复辟、孔教会粉墨登场、祭孔读经喧嚣不已这种现实的社会大倒退现象进行的。

早在1916年发表的《民彝与政治》一文中，李大钊同志就曾指出：“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孔子生而吾华衰”。又说：“膜拜释、耶、孔子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使命也；风经古典而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①象这样把旧道德与新理想，把圣人与民众相对提出，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抨击那些时刻准备卷土重来，复辟帝制的封建势力是“欲以历史之陈死人，制服社会之活心理”，从而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说：“过去之历史，既为乡愿大盗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典谟训诰为护符，尽倾其秽恶之心血，以污其幅帙矣。今后之历史，尽有无限光华洁白之空页，全俟吾民本其清新纯醇之资能，以晶映其异彩。”^②反动倒退势力再要污染历史的日子已经过去，新历史应由人民来创造。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李大钊同志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本质以及其根源的揭露和批判，是十分深刻的。远在1920年，李大钊同志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而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无一不是这个大家族制度的“表层构造”^③。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个

① 《李大钊选集》第42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206页。

“构造”的实质，指出：“两千年来支配中国精神的孔门伦理”，不论是纲常、名教、道德、礼义，样样都是“损卑下以奉尊长”，“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而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一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修身的最高境界就是“孝”、“忠”、“顺”、“贞”。臣对君“忠”，是子对父“孝”的放大；妇对夫“顺”、“贞”，母对子“从”，也是父权的引申。由此，李大钊得出结论说：“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①。这种道德之所以能支配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完全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两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②诚然，在中国哲学史上，曾经有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对孔门学说提出过那样那样的指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批判，从王充的《问孔》、《刺孟》到李贽的《题孔子象》、从太平天国对封建政权、族权、夫权的批判到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却都没有象李大钊同志这样揭露出孔家学说的实质及其根源。李大钊同志不把他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批判局限于其本身，而是要发掘其本质和根源，是有其深刻的哲学意义的。李大钊同志在1917年发表的《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就说过：“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③批判死人为的是匡救“时弊”，批判封建的旧道德，为的是杜绝倒退的道路。有的同志把上面李大钊同志这段话，说成是他批孔不彻底的表现；恰恰相反，我们却觉得这正是李大钊同志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批判旧的上层建筑的最

① 《李大钊选集》第296、297页。

② 同上，第297页。

③ 同上，第80页。

好说明。

李大钊同志以其深刻的观察，论断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灭亡，随着经济基础的垮台，其上层建筑也将或先或后倒塌。他一再欢呼：“时代变了！”“孔门理论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①“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②“中国的经济变动了”，“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命运，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③，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④

李大钊同志上面的论断不只是观察中国社会的结果，同时也是研究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历史的结果，是他从对马列主义的钻研中逐步明确起来的。他在发表于1919年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名著中，就曾利用西方先进国家的思想史资料，论证了物质变动会改变社会伦理道德这一原理。他说：“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⑤这一道理是怎样揭示出来的呢？他指出：“由挟着暴力的生产过程而生的社会问题，更促人竭力研究人类社会的实质。以是原因，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见了光明。”^⑥

有的同志说：“大钊同志关于道德问题的分析，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的开始”。我们觉得这个评价是十分正确的。的确，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的分析，是当时中国哲学界

① 《李大钊选集》第297页。

② 同上，第80页。

③ 同上，第299、300页。

④ 同上，第302页。

⑤ 同上，第265页。

⑥ 同上，第264—265页。

解释社会道德问题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第二，李大钊同志还比较系统地介绍和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斗争等基本原理。

李大钊同志指出：“表层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虽在那束缚他、妨碍他的社会组织中，仍是向前发展不已。发展的力量愈大，与那不能适应他的社会组织间的冲突愈迫，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①从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正确地阐明了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生产力是活跃的、革命的，但生产关系却起着加速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需要时，它有助于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则起着阻碍和束缚的作用；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就会到来。

李大钊同志认为，中国的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都是为封建经济基础、封建专制制度服务的。要解救中国，要使中国社会得到改造，不仅需要同封建文化思想作斗争，要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孔家的学说，同时必须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随着经济问题的解决，工人解放、妇女解放……等等问题才能得以完全的解决。然而，要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不进行阶级斗争，“经济的革命，恐怕是永远不能实现”的。所以李大钊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6页。

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强调指出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阐明了阶级与阶级斗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比如，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说：“在马克思所谓阶级竞争之所由起，全因为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①。“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竞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在《阶级竞争与互相》一文中，又说：“Marx 明明的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取敌对形态者的最后’，又说：‘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可见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②李大钊同志也基本上阐明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在1919年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说：“物质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勤工主义的精神，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在游惰本位、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把那劳工的生活，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人人都须作工，作工的人都能吃饭。”这里包含着通过阶级斗争改造社会的思想。李大钊同志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产生与消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的论述，对于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诚然，李大钊同志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在许多地方还说得不清楚，不够准确，不够完善。甚至有时也还难免混和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杂质，更应指出的是，他在这个时期的文章中，还很少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1922年以后，李大钊同志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平民政治与工人政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8页。

② 同上，第224、236页。

治》、《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巴黎“康妙恩”[The Commune of Paris]即巴黎公社——笔者)等文章中,对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论述就清楚多了,也准确多了,并且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他强调了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了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时期。”^①并指出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代替资产阶级专政。他说,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 Volga(伏尔加——笔者)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②

第三,李大钊同志科学地批判了帝王圣贤的偶像崇拜,充分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远在1915年李大钊同志在《甲寅》杂志发表的题为《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讨论时,就曾指出:“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③。此后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又说:“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贤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这“经纬万端”的国事应该由谁来治理呢?人民!他说:“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④尸是主的意思,就是说国家的事情应该由人民自己来治理,来主持。

然而在谁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主宰这个问题上,从来不只是一个现实政治斗争问题,而且也是哲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⑤,李大钊同志为了把这个问题分辨清楚,沥心沥血,写下了许多精到、深刻的文章。要把专制思想

① 《李大钊选集》第397—398页。

② 同上,第456页。

③ 同上,第29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李大钊选集》扉页。

和对帝王、圣哲、英雄的偶像崇拜批倒，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思想树立起来，不仅要有生花的妙笔，在当时军阀统治的具体条件下，尤其要有敢担道义的铁肩。李大钊同志发下誓言：“为了谋新生活之便利，新道德之进展”，“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矣。”^①在当时孔教要定为国教，孔学要纳入宪法的时代，“毁圣非法”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写道：“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孔子者，国民中一部分所谓孔子之徒者之圣人也”，“孔子之道者，含混无界之辞也。”^②李大钊同志对孔子这一圣智的偶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李大钊同志继续批判道：“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③李大钊同志是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提出问题的，既然孔子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而成了一具历史僵尸，一个帝王专制的护符，一尊专供社会上层祭祀的偶像，哪里还有实际的价值呢？为了把躲在护符后面的封建专制打倒，有什么理由不把护符撕碎呢？李大钊同志的批判是极有说服力的。

要把这种“专制积习”和偶像崇拜批倒，就要挖出它的根子。除上文已多次提到的它的经济基础外，李大钊同志还着力分析了它的社会根源。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说：“盖夫一国专制之积习，沦浹既深，民间持论之态，每易昧于商权之旨，好为抹杀之辞。未尽询谋之诚，遽下象定之语，此其流弊，以视偶语之禁，腹诽之罚，尚为可怖。”^④这是说这种“专制积习”和偶像崇拜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0 页。

② 同上，第 77、78 页。

③ 同上，第 80 页。

④ 同上，第 50—51 页。

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与钳制舆论分不开的。那些为统治阶级豢养的文人，那些圣人的徒众，只知维护专制和偶像崇拜，遇有不同意见，不加商榷，就轻下断语、乱兴挞伐，比偶语、腹谤之狱还凶。接着，他揭露了孔子弟子子舆（即曾参）“谓‘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谬论，尖锐地批判道：“吁！此其言之背于逻辑，何其甚也”！他还揭示了李贽由于批判了孔家学说而身陷囹圄，书成灰烬的惨状，于是叹道：“其群之对于言论之虐，其视专制之一人为何如也。”^①专制和偶像崇拜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李大钊同志这些分析是一针见血的，十分深刻的。

人民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打碎封建专政和偶像崇拜的枷锁，自己创造历史。李大钊同志对此一直是满怀信心的。

李大钊同志在《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说：“国家兴亡，民族消长，历史所告，沧桑陵谷，迁流罔极，代兴代亡者，矍然其非一姓氏一种族也。”就是说，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封建专制，偶像崇拜是不能永存的。他说：“秦皇、元代之雄图，波斯、罗马之霸业，当其盛时，丰功伟烈，固莫不震撼于当世。曾几何时，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英雄世主的陈迹，也早就“杳如烟雾”，无从寻觅了^②。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③因此，“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④要认识到其真正的解放，“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⑤李大钊同志满怀信心地欢呼道：“民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1 页。

② 同上，第 29—30 页。

③ 同上，第 48 页。

④ 同上，第 330 页。

⑤ 同上，第 226 页。

众啊！只有你们是永久的胜利者！”^①

李大钊同志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②，并认为要使群众觉悟起来，就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同志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不遗余力的，对于宣传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满腔热忱的。他还号召一切真正的革命知识分子不要空谈，走出书斋，到工农中去，把马克思主义灌输给工农群众。

李大钊同志在许多文章中，特别是《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中，热烈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积极地向中国人民说明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意义，号召中国人民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③他告诉人们：“俄国革命的血”“洗出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④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⑤他要人们“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⑥并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⑦

李大钊同志积极地投身于发动群众的革命实践之中，亲自组织领导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一方面采取种种办法，如举办讲座、创办报刊、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向群众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方面组织各

① 《李大钊选集》第 332 页。

② 同上，第 191 页。

③ 同上，第 113 页。

④ 同上，第 122 页。

⑤ 同上，第 111 页。

⑥ 同上，第 104 页。

⑦ 同上，第 117 页。

种群众团体，如学社、学会、研究会、学生会、工会，发起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组织各阶层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发动和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并且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亲自散发传单，亲身同敌人搏斗。正是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对推动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李大钊同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以唯物主义的战斗姿态，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1919年反击胡适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哲学的挑衅，就是许多次斗争中的一次。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了题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企图以所谓“多研究些问题”为障眼法，达到其所谓“少谈些主义”即取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李大钊同志立即于8月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的谬论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明确指出：要想解决问题，就得“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不懂得主义，就谈不到解决问题。李大钊同志毫不含糊地说：“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①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右派最早进行的一次论战，也是关系重大的一次论战。通过这次论战，狠狠打击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和实用主义哲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随后，李大钊同志对于那些抵制马克思主义传播，硬要把中国社会拉向后退的反动思潮，不断进行了批判，而每一次斗争，都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向前推进一步。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也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本文还不是全面地探讨李大钊同志的哲学思想，但仅就上面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2页。

所谈到的,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哲学史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来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第一个哲学家。他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社会,认识社会,揭露社会发展规律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作为革命实践的指南。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的努力,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党的纲领、战略和政策的制订,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原载《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

李大钊与吉野作造

吕万和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日本也有一个“大正德谟克拉西”^①运动。它的理论指导者，就是日本著名民本主义者吉野作造。

吉野作造是李大钊老师的老师。他是日本一位民主人士，曾编纂《明治文化全集》二十四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他的《民主主义论集》共八卷。在五四运动时期，他支持我国的五四运动，而李大钊同志也支持吉野作造领导的“大正德谟克拉西”运动。

吉野作造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1906年至1909年，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教书。李大钊同志当时在该校上学，听过吉野的课。其后，李大钊同志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吉野在东京帝国大学当教授。吉野与中国留学生交往甚密。据日本人士回忆，李大钊同志回国后，对这位老师很怀念，“每遇日本人来华，都要问吉野先生好。”

吉野作造于1916年发表长篇论著：《论宪政之本义兼论达成其最终完善之途径》，由此坚持宣传“民本主义”（他特意把“德谟克拉西”译为“民本主义”而不译为“民主主义”）。1918年11月，他不畏强暴，在两千多名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支持下，与右翼军国

^① “大正”是日本大正天皇的年号（1912—1916年）。“德谟克拉西”在英语中意为民主。

主义团体“浪人会”公开进行辩论，影响很大。这次辩论之后，在日本相继出现了黎明会、新人会等进步团体，形成了“大正德谟克拉西”的一个高潮。

与吉野上述活动约略同时，李大钊同志于1916年从日本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他先编《晨钟报》(后改名《晨报》)，继又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编辑部，主办《每周评论》，以炽热的文字，指导并组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

《每周评论》一创刊就寄赠吉野作造。该刊第5期上登载了吉野的来函，感谢赠刊，并希望彼此“遥为声援”。《每周评论》毫不迟疑地声援了吉野作造的进步活动。第7、9两期连续报道了吉野作造领导成立黎明会的详细情况，说“黎明会”这三个字在日本政治思想史上真成了一个绝大的纪念。李大钊同志并写了《祝黎明会》(署名明明)、《黎明日本之曙光》(署名：TC生)两篇文章，热情地说：“黎明的曙光现了，东亚的晨钟响了”。希望两国人民握起手来，使“中国的黎明”和“日本的黎明”相互辉映，造成“东方黎明”。1919年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期又刊登了李大钊同志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署名：守常)，肯定“黎明会”是“与顽迷思想宣战”的新思潮代表。5月15日，“黎明会”的刊物《解放》创刊，十一天之后，《每周评论》就全文转载了该刊创刊号宣言。反映如此之快，报道如此之多，说明两者关系之密切，也说明李大钊同志对吉野作造所领导的民本主义运动之关切。

吉野作造也真挚地支持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当时日本官方和资产阶级报刊对五四运动一片诬蔑，吉野先生却挺身而出，在《中央公论》、《东方时论》、《解放》、《新人》等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同情五四运动，驳斥各种诬蔑，号召两国人民相互支持。

日本统治者诬蔑五四运动是受“某国煽动”。吉野则指出：这次运动“纯然为自发的”，“发自一种确信精神，并为达到此确信

之目的而正确选定了关键性事件”，所谓“煽动”云云，“纯属无稽之谈”。日本统治者攻击五四运动是“传统的排日”，吉野指出：五四运动的目标，首先是“排除国内之祸根”。至于所谓“排日”，吉野说：有“侵略的日本”，有“和平的日本”。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侵略的日本”而非“和平的日本”。吉野还说：“多年以来，吾人为此而致力于从官僚军阀手中解放我所爱之日本，北京学生团之运动于此岂非与吾等同其志向目标乎？愿我等速使这一解放运动成功，并真切祈愿邻邦民众之同一运动也有所成功。从官僚手中解放，始可建筑两国间牢固之国民亲善，而以往之所谓亲善，其实乃妨碍真正亲善之大障碍。”

吉野作造的这种见解是卓越的，可贵的。中国人民高度评价吉野的进步立场。上海《中华新报》和《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全文译载吉野所写的《北京大学骚扰事件》一文，并摘登了他的《致北京某君书》。这个“某君”，很可能就是李大钊同志。吉野在这封信里写道：“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平和的、平民主义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我侪所反对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平和人道的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

“五四运动”与“大正德谟克拉西”性质不尽相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的思想也有差异。以对“五四运动”的评价而言，吉野作造同情这个运动，但并未能摆脱资产阶级对群众运动的偏见。在对华政策上，他抛弃了早年的某些错误论点，但并未能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尽管有这些局限性，却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进步立场作出积极的、肯定的评价。

民主与反民主、对华友好与对华侵略，这是日本近代史上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长期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吉野作造是属于进步势力一边的。他欢迎中国进步，主张中日友好，希望日本

民主。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能够和民主主义者吉野作造相互支持的基础。今天，中日友好已成为时代的潮流。李大钊烈士和吉野先生如果有知，亦当引以为慰吧！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

试论李大钊同志人生观最显著的特点

陈 勇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为新中国而奋斗的沸腾的政治生活和卓绝的斗争生涯中，李大钊同志追求真理，身体力行，写下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吊民伐罪，泣血陈词，表达忧愤，抒发抱负，鼓舞民心，唤人觉醒，成为万千革命志士献身革命的动力之一，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而李大钊同志在人生观问题上的深刻论述，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马克思说过：“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

今天，我们捧读李大钊同志关于人生观的大量论述，领悟其中的真谛，回顾李大钊同志的战斗历程，无不肃然起敬。经过六十多年峥嵘岁月的严峻考验，李大钊同志的言论和实践所显示出的光芒愈发耀眼了，感人的力量超过了六十多年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李大钊同志人生观的特点作一初步论述，对于我们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效法先烈的高风亮节，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

积极进取，富于战斗性，是李大钊同志人生观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鸦片战争失败后，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戊戌变法运动，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前夜，在这八十来年间，中国人民即为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复兴而不屈不挠地战斗着。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摸索奋斗，颠扑踣蹶，多少希望，化为虚妄；多少幻想，尽成泡影；多少斗争，收效甚微。强敌深入，国土日蹙，利权丧失，民不聊生，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一幅残败凋零，黑暗阴森的图景。历史的和现实的亡国惨痛，不能不使富于政治敏感的知识分子震动忧虑。这批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曾经满腔热情地参加过辛亥革命，但是却对革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以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结果，中国必然面目一新，从前在书本上了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图画，立刻就会变成现实。这种虚妄的希望，在革命失败以后，立刻就变成了失望。他们感到自己的空虚和无力挽回既成的局势，但是，又不肯去依靠人民群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很快冷却，再也看不见革命的前途，再也鼓不起斗争的勇气了。在悲观绝望之中，他们有的消极退缩，有的颓废堕落，也有的去当和尚甚至干脆自杀了。这种悲观厌世的情绪，象阴影一样笼罩着不少的知识分子。随之而产生的不思进取的思想除了在政治上强烈地表现出来外，在人生观上也暴露无遗。而鲁迅所说的那些“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①的话语，既是这些知识分子精神空虚，人生观消沉的真实写照，又是五

^①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四前夕不少知识分子思想的现实状况。十月革命的惊雷隐隐约约地传到中国，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广大知识分子痛定思痛，跃跃欲试，准备开展新的战斗了。但是，不去掉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消沉的人生观而代之以革命的人生观，使广大知识分子解脱精神负担，在思想上确立起斗争的观念，这场战斗是很难坚持下去的。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又怎样去树立，就成了急迫的问题和任务摆在知识分子面前，需要回答，需要解决。而李大钊同志则历史地担负起了这个重担，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正确地解决了这个任务。使自己的人生理论高屋建瓴，深邃不俗，较之一般的人生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之处。

首先，李大钊同志从“青春”的宇宙观，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高度而不是从个人修养出发，比较完整而正确地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观，即“青春”的积极进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人生观。李大钊同志深刻地指出：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生活。他主张“很热心的去研究过去”^①，是为的“去照彻人生经过的道路”^②。至于“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③李大钊同志认为青年应以栽培、灌溉、促进并同享宇宙之青春为自己一生的目的，在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奋其回春再

①②③ 《李大钊选集》第 505—506 页。

造之努力”^①，使衰老者复为青春，青春者终不衰老，从而“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②。李大钊同志还指出：“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作事，则功业可就”^③。充分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埋头苦干，不务虚名，不尚空谈的求实的人生观。

其次，李大钊同志一反当时流行着的人生理论中存在着的对新事物恐惧，对旧事物留恋的观点，热情歌颂新生力量必定战胜腐朽力量。他指出：“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所成，健壮之前有衰颓，老大之后有青春，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④。他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永无止境地运动着、发展着；事物都处在矛盾对立的变化过程中，新的和旧的矛盾是“事物进化的机轴”，“旧的毁灭”和“新的再兴”就是宇宙变化的规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大凡一新生命之诞孕，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⑤他大声疾呼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⑥。要“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⑦，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为索我理想之中华而斗争。

第三，李大钊同志批判了两种不知爱“今”的人生观。他清楚地指出：青春是无尽的，“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⑧。“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⑨他认为，青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72、65页。

③ 同上，第504页。

④ 同上，第58页。

⑤ 同上，第64页。

⑥⑦ 同上，第75、76页。

⑧⑨ 同上，第66、67页。

年人不应当把人生局限在个人利益的圈子内，“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①；而应当“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②，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果青年人不能把自己的青春与“宇宙之青春”相结合，那就会觉得“浮生若梦”^③，犹如“电波石火，不可淹留”^④，因而“咨嗟太息”^⑤，走上可悲的道路。李大钊同志在《今》这篇文章里特别着重的指示人们要注意“今”即“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因为“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同志具体地分析和批判了两种不知爱“今”的人生观：其中第一种不知爱“今”的人可名厌“今”派。厌“今”的人又分两类，一类是“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这是代表封建势力的顽固守旧派的人生观。另一类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这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革命派的人生观。李大钊同志指出那些家境优裕，懒散无志的人属于第二种不知爱“今”的人，则是乐“今”派；“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他说：“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表面上虽与厌“今”派不同，但“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⑥在这里，李大钊同志基本上已知用马克思的矛盾观、发展观来歌颂中国的新生，分析和批判那些不正确的人生观，并以马克思的矛盾观、发展观为指导，来建立自己正确的人生观。这种积极进取，富于战斗性的革命人生观，显示着从自由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光芒，大大鼓舞

①③④⑤⑥ 《李大钊选集》第93、94页。

② 同上，第66、67页。

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前进。

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同志关于人生观的论述是多么的正确，是多么的如实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成熟，是多么的有针对性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呵！而重要的是，他已具有了辩证法思想，并把这个思想作为自己建立人生观的基础，这就比一般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从而走到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前列，这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不及的。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表现在人生观上的消极、保守、落后，最主要之处就在于他们看不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看不出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规律性，看不出“今”（即现在）的努力同“未来”的有机的联系。而在这三个方面，李大钊同志都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鲜明的回答。李大钊同志能在那种情况下提出如此正确的人生观理论，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系列论述，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鼓舞，冷静的思考，认真的判断。该怎样生活？该怎样战斗？该有怎样的理想？最后终于摈弃了悲观情绪和消极思想，以对未来的信心、希望和乐观主义精神，投入了五四运动及其以后的革命运动，并成了这些运动中的骨干。

二

自觉地运用知识为斗争服务，不倦地追求真理，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结合，这是李大钊同志人生观又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李大钊同志一生好学不倦，孜孜以求，这既是他所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需要所致，也是他正确的人生观的直接反映。他最鄙视那种泛泛空论，不老老实实学习，不认真地解决具体问题的人；他同样最厌恶那种闭门造车，不同现实相联系，不把知识服务于人类的人。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同志写下了这样精辟而有力的文字：“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

与真实，只要得了光明与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那么，光明与真实怎样而得呢？他接着写道：“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发展的障碍。”很显然，李大钊同志是把知识作为人们走向光明与真实的引路的灯烛，有了它，加之能够正确运用，人们可以探索真理，追求光明；而没有它，人们就不可能获得真理，走向光明。在这里，李大钊同志表现了一种为斗争而学习知识，用知识来推动斗争的现实的知識观，而不是象某些人那样，要么把知识作为步入官场的阶梯，要么把知识作为超脱红尘的逸品，充分显示了人所共仰的高尚情操。李大钊同志愤怒地控诉了当时的反动政权不准人们学习新知识，接触新思潮的罪行。他直言不讳地抨击道：“禁止人研究一种学说的，犯了使人愚暗的罪恶。禁止人信仰一种学说的，犯了教人虚伪的罪恶”^①。

是的，“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②。“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③。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话语说得多好啊！既然把人生最高的理想归结于追求真理，那么，就必须确立起对于理想的实现所必有政治远见和坚定信念；既然把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归结于送旧迎新，把人类最高的欲求归结于创造新生活，那么，就必须汇身于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去，打碎旧世界，开辟新天地。这样，就把反帝反封建的理论同救国救民、同群众一道开展斗争的实践不可分地结合起来了，从而使他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而与李大钊同志同时代的陈独秀，理想脱离群众，不能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立场上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最后必然走上了与人民群众相背离的道路。这样，李大钊同志克服了过去许多知识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17 页。

② 同上，第 87 页。

③ 同上，第 119 页。

分子在宣传政治思想和人生理论时，常将救国救民的宏图大略同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脱离开来，将先进分子和先进思想的指导同人民群众的力量脱离开来，将理论同实践脱离开来的共同弱点，而赋予人生观以全新的意义。但又怎样去救国救民呢？这个问题在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是没有很好地解决的。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不仅在政治领域内是不彻底的，特别是在思想领域内更不彻底。由于缺乏这种彻底的思想革命，所以封建主义依然在人们生活中植根很深，成为政治上反动派的有力助手，这种情况是和当时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相适应的。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微弱，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地位的软弱，使他们在思想上也缺乏独立的体系，和封建主义不能割断联系，因此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反封建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表明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新的物质条件的发展，要求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于是要求树立起独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的建设，宣传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作为新文化运动主要参战者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又不能不受这个运动的影响，在人生观上反映出个人主义的倾向。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脱离社会政治现实，不愿去做艰苦的工作，坐而论道；二是看不起人民群众，单纯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幸福，孤芳自赏。这两种倾向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反映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政治上的动摇性和软弱性，人生观上的保守性和狭隘性，并且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烙印。

对于第一种倾向，李大钊同志进行了及时的批评。他指出：“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①要知识分子不要脱离现实，眼睛里要有社会黑暗和人民贫弱的现象；要做中

^① 《李大钊选集》第55页。

华大地的主人，挑起操主九州沉浮的重担。针对当时有些知识分子由怕苦转变为“忍苦”的畏难情绪，李大钊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忍苦的人生观，是勉强的人生观，虚伪的人生观。那求乐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真实的人生观。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立在真实上，求得人生的光明，不可陷入勉强、虚伪的境界，把真正人生都归幻灭。”^①李大钊同志还深刻地指出：“固然在黑暗的里面，潜藏着许多恶魔毒菌，但是防疫的医生，虽有被传染的危险，也是不能不在恶疫中奋斗。”^②并进而指出：“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③李大钊同志这深入浅出的分析，哲理般的话语，给广大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启迪，使他们大多数人认识到只有置身于现实斗争之中，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中国社会改造才有希望。

对于第二种倾向，李大钊同志同样进行了及时的批评，并从与工农相结合的高度出发，教育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推进革命的发展。他指出：知识分子“临开始活动以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④在这里，李大钊同志提出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活动的方向问题。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认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决不能一味追求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不能专为寻欢作乐，去到那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去活动，不应该去投入上层社会，因为那里虽然“尘嚣嘈杂”，耀人眼目，实际上那里并无真理，并无光明。有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159、162页。

③ 同上，第247页。

④ 同上，第158页。

意志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该采取“尊劳主义”，到最受压迫，最痛苦的劳动群众中去，那里最黑暗、悲惨、寂寞，但“黑暗寂寞中所含的，都是发生，都是创造，都是光明。”^①所以李大钊同志教导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说：“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②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呵！”^③李大钊同志特别语重心长地向那些热衷于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发问道：“旧时代的青年讲修养的，犹且有‘先忧后乐’的话，新时代的青年，单单做到‘独善其身’、‘洁身自好’的地步，能算尽了责任的人么？”^④他号召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劳动中去，同劳动群众相结合，得出了“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⑤这样的正确观念。从而初步地表述了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共同斗争的思想。反映在人生观上，这一点，正是他高于其他人的基本标志，也是他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的生动体现。

三

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同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战斗风格结合起来，并把它们彻底地贯彻到人生观中去，这是李大钊同志人生观再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在从事他们所为之献身的事业的时候，总是要在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选择和决定自己的信仰。而人们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条件下，建立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58 页。

②③④ 同上，第 161 页。

⑤ 同上，第 146 页。

起对某种主义的信仰是容易的，难的是一辈子坚信一种信仰而不动摇。当然，我们所说的信仰绝不是那些荒诞不稽的信仰，而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能够建立起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可贵的。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后而能够坚定不移地为其付诸实践而奋斗终生是不容易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发人深思的论述。他说：“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①毛主席的话是多么的耐人寻味。其实，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这里只不过是较典型的几例而已。

对于一个人由革命走向反动，由进步蜕变为堕落，人们习惯于从政治思想、世界观上去分析，去找原因。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且是最主要的方面。但我们不应仅限于此。除了主要在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等方面去找原因外，在人生观上我们也是不难找到原因的。以陈独秀为例，他由一个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最终发展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治思想上对于中国革命的错误认识，“二次革命论”，放弃革命领导权，等等，固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他过分夸大个人作用，鄙视群众，消极动摇，缺乏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表明他在人生观上没有解决对革命的理想和前途的认识，我们难道不也可以说是他走上右倾机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原因吗？政治思想和信仰决定人生观，人生观又反作用于政治思想和信仰，它们之间是不能脱节的。在这个方面，李大钊同志高出于陈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6页。

秀，从而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同陈独秀截然相反的道路。

李大钊同志是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认识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旧社会的冲杀中形成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是一两个斗争回合所能解决的。这其中包含了李大钊同志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和多少次反复的思考与判断呵！因此，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李大钊同志的思想上扎根很深。李大钊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发表的《真理之权威》一文中指出：“故真理者，人生之究竟，而自信者，又人生达于真理之途径也”。“吾人论事析理，亦但求其真实之境而已，一时幻妄之像，虚伪之用，举不足移易吾人真理之主张也。”在这里，李大钊同志把“自信”说成是人生达到真理的途径，指出一旦确立了真理的主张，就绝不被“幻妄之像”和“虚伪之用”所迷惑、吓倒，因而动摇，这表明他已初步探索到了坚定信仰同求得真理的关系。在《青春》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同志用“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这样战斗性很强的话语鼓动青年斗争，说明他没有把革命的信念滞留在头脑里，而是运用其支配行动，已经能较正确地把革命信仰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李大钊同志在《黄庞流血记序》中，歌颂革命，歌颂斗争，要人们“勇敢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表明他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①，用斗争的态度，“科学的态度，造成我们脚踏实地的人生观”^②，这金石之言，则最终表明李大钊同志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贯穿到人生观中去了，这使得他在斗争中不退伍，不落荒，不颓唐，永远进击，始终保持战斗的精神。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18页。

六十多年前，在那群魔乱舞，长夜难明的黑暗年月里，李大钊同志对革命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仰。而当他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就对共产主义不曾有过半点动摇。他冲杀在斗争第一线，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以后的革命运动，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和反动文人的谩骂，不屑一顾。即使被捕后，他也“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以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彪炳日月。应当指出，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以及诞生后的日子里，李大钊同志对革命能坚贞不二，忠诚一心，这是同他有着坚定而正确的人生观不可分的。这同当时与革命分道扬镳，走上资产阶级道路的许多人相比，恰成鲜明的对照。李大钊同志正是以对革命胜利的无限憧憬，豪情满腔地面向苍宇，呼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响亮之声。今天，世界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情况也同六十多年前李大钊同志所处的那种情况根本不同了。如果说，六十多年前，李大钊同志在那样黑暗的社会和恶劣的环境中都能坚持对革命的信心，无畏地战斗，那末，今天，在这样光明的社会和幸福的环境里，我们更应该坚定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勇猛地战斗。我们没有理由自暴自弃，更没有理由动摇自己的信念。我们要解放思想，轻装上阵，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一定会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

鲁迅先生说过：“个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但一代的真理更可宝贵，生命牺牲了而真理昭然于天下，这死是值得的。”^①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二年多了，他在六十多年前关于人生观问题的大量论述，几十年来，启发和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和青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附记》

年学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即使我们今天读来也深受教育，倍感振奋，十分亲切。历史证明，这样的理论是永远有生命力的。

当然，在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中，亿万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最动人最壮丽的青春之歌，已经把六十多年前李大钊同志所阐发的人生理论向前大大发展了，而我们今天所应当建立的人生观也比六十多年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要建立的人生观内容更丰富了。但基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仍然要象革命先驱者那样，以天下为己任，把科学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和爱国精神继续保持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四化的战斗中发扬光大。我们应当铭记李大钊同志及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谆谆教诲和无限希望，建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发出自己全部的光和热。在中国革命雄飞跃进的火红年代里，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李大钊同志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①。

（原载《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①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

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自传

黄 真 姚维斗

李大钊同志 1913 年冬东渡日本留学，1914 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 年春，为参加讨袁运动，在毕业前辍学回国。在日本留学的两年多期间，大钊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为反对袁世凯同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他代表留日学生总会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号召国民奋起救国；不久他组织了秘密的革命组织“神州学会”，积极进行反袁世凯活动。大钊同志在校学习非常刻苦，除了掌握老师所授课程外，还广泛地阅读英、日文本的社会主义书籍，并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大钊同志这一时期的活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我们介绍一份这一时期他在英语班上写的作文——《我的自传》。

这份《我的自传》，是由教他英语课的老师 A·U 鲁宾孙 (Robinson) 抄存下来的；经过六十多年，现在又从美国传到中国。这是现存的大钊同志最早的一份自传，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

A·U·鲁宾孙抄写的这份《我的自传》，是由他的儿子保存下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藏有它的复制件。这份抄存的《我的自传》，左上角注有：“A·U·鲁宾孙（我的父亲）1915 年录于东京。他曾经是李大钊的英语老师。”右上角还注有：“李大钊 1927 年被杀害。”这两个注都是鲁宾孙的儿子写的。现将《我的自传》全文试译如下：

我的自传

1890年，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

第二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儿我度过两载光阴。然后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

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恰好在这时，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现在我们正愉快地生活在这里。从这个时候起，我要靠书本和墨水台来充实我全部生活中的流年岁月。

大钊同志在《我的自传》中，记述了自己从出生到去日本留学的简单经历。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可以知道大钊同志在北洋法政学校学习阶段，曾深入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毕业后，又在北京和同学一起办过几个月的报纸；就在这时，他有过短时期的出世思想。所有这些情况，在我们过去的研究工作中都是缺少了解或知之不多的。我们可以将这些线索与其它有关史料互相核对，再访问还健在的老人，在考证史实上下功夫，进一步研究大钊同志的思想发展过程，更好地弄清他早期思想和活动的基本情况。

据考订，《我的自传》在大钊同志出生年份上是有误差的，准

确的年份应为 1889 年。在大钊父母的卒年问题上,《我的自传》与目前国内流行的说法也不一致,同大钊同志是遗腹子的传统说法是矛盾的。这些问题,都需继续考核。

《我的自传》既然是大钊同志学生时代的一篇英语作文,那么有没有可能不是完全按照本人的真实经历写的呢?这一点,研究李大钊生平的同志一定会注意到的。尽管如此,《我的自传》的史料价值,仍然值得引起重视。

(原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

关于李大钊的生年问题

黄 真 姚维斗 朱乔森

李大钊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英语班上写过一篇题为《我的自传》的作文^①。这是现存的李大钊的最早一份自传，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但是，由此也引出了几个小问题，有些问题且已在报刊上有所反映。对此，我们发表一些粗浅的看法，供讨论。

（一）李大钊同志究竟出生于1889年，还是1890年？

李大钊同志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即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日，这在我国史学界经过多年的研究考订，特别是根据李大钊同志墓碑的记载，已是无疑的了。但是《我的自传》所述出生年月为1890年。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我的自传》是不确切的。据我们分析，发生差错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在年龄问题上，多年来习惯于用阴历，在纪年上辛亥革命前用皇帝的年号，辛亥革命后一般用“民国”纪年，“五四”以后，用公历纪年才逐渐多了起来。李大钊同志写这份《我的自传》时，未必用很大力气对有关纪年细加核对，这是我们后辈人为研究重要人物生平时才这样做的。所以《我的自传》出现这样的差误并不足为怪。

（二）李大钊同志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还是遗腹子？

李大钊同志在《我的自传》中说：“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

^① 详见《革命文物》1980年第8期。

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这个问题已引起争论。李大钊同志是遗腹子，这本来已为大家所承认，但《我的自传》中“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一说出来后，有些同志否定了前一说法。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彭明同志《评价历史人物的几点意见》一文，以李大钊同志的研究为例，谈了不少好的意见。但他把李大钊同志是遗腹子的问题，作为“缺乏最基本的史实考订”的例子，是值得商榷的。彭明说：

“长期以来曾流行着李大钊系‘遗腹子’的说法，根据最近看到的李大钊1914年用英文写的自传（按：据我们所见影印件，为1915年——笔者），他是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证以李大钊《狱中自述》所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看来‘遗腹子’的说法是不足信了。”

是“不足信了”吗？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据我们了解，“遗腹子”一说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

第一，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同志故居纪念馆存李家祭祀牌位，证实李大钊是遗腹子，其父亲李任荣逝于1889年3月，而李大钊出生于同年10月。这个牌位，应当是可靠的（牌位记“光绪十五年三月”，缺日，以公元核对，为1889年3—4月，暂按3月——笔者）。

第二，据研究工作者的记载。贾芝同志（按：贾芝同志是李大钊同志的女婿，研究李大钊同志多年，其中许多原始材料出于李大钊同志长女李星华同志的回忆）在《李大钊同志战斗的一生》中记有“在他（指李大钊）降生以前，他的父亲李任荣在一次大地震之后不幸病故了。”据我们了解，唐山这次“大地震”发生于1888年6月23日，震级7.5级，震中在渤海湾里，距乐亭县城仅三百多里。据查，李任荣是在地震九个月后逝世的。

第三，据李大钊同志家乡亲友、邻里的回忆。解放以后，去李大钊同志家乡调查的同志，找过与李大钊同志同年代的老人多

人回忆，都说李大钊同志是遗腹子。李大钊同志出生在 1889 年，距现在才九十年，而解放初期，他的同龄人才六十多岁，他们讲的关于李大钊同志及其父母的事情，并不是什么古老的传说，应当承认他们的回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四，据当年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同志共事，来往密切的梁漱溟先生最近回忆：

“1921 年冬月，我走访守常于其家，告诉他我即将结婚。他笑着说，这在他已经是过去二十年前的事了。因而自述在父死之后，而母亲又在生他之后不久亦死去。所以没有见到父母的面，主要靠祖父母抚养长大。……说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全不对。另见人民出版社的《李大钊传》一书，说他尚未生而父死去，他生后十六个月母亦故去，与我所闻于守常自述者尚差不远。”

由以上情况可知，李大钊同志是遗腹子的说法是建立在一定的史实考订基础上的，是有比较充分的根据的。“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一说，仅据李大钊早年的《我的自传》。以我们对李大钊出生时间问题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我的自传》关于年岁的记载并不都是十分确切的。至于《狱中自述》所说，“在襁褓之中，即失怙恃”，这是一种概括的叙述，对两种说法都可以解释，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遗腹子”之说或作为“两岁丧父，三岁丧母”说的旁证。

我们认为，根据现有史料，仍可以作出李大钊同志是遗腹子的判断，但“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一说，亦可作为进一步研究时的一种说法。

尽管《我的自传》存在着这样一些具体问题，其史料价值仍是很高的，对我们研究李大钊同志早年的活动和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15 期）

李大钊同志被捕和就义纪实

李 义 彬

1980年4月28日，是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五十三周年。

大钊同志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道德、学问和文章为举世敬仰，影响和哺育了五四时期我国的一代先进青年。他的名字永远彪炳于中国革命史册，铭刻在中国人民心里。

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在敌人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坚守战斗岗位；他身陷囹圄，仍关心着党的事业和同志们的安全，把个人的生命和家庭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在敌人的监狱里、法庭上和绞刑架下，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最后从容就义，为党献身。他那崇高的共产主义品质是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光辉典范。

—

李大钊同志长期战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北京。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北方群众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力地配合了“五卅”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直接威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因此，敌人一直把李大钊同志视为“心腹大患”，多次下令通缉他。1926

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段祺瑞反动政府即下达紧急令，再次通缉大钊同志。

为了保存革命实力，1926年3月底大钊同志带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斗争。

从大钊同志迁入东交民巷到被捕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为了破坏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和逮捕大钊同志，绞尽脑汁，展开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一、派遣特务监视行动。大钊同志住进苏联大使馆旁旧俄兵营不久，敌人的特务就伪装成人力车夫，天天在兵营门口窥视。凡是从兵营出来的人，他们就跟踪盯梢，直至拷问逮捕。在大钊同志那里负责交通工作的阎振山同志和到市内买菜的工友张全印同志，都是这样被捕的。

二、派暗探打入内部。尽管敌人监视、逮捕，但他们对兵营内部的详情还未弄清，于是他们就利用兵营内招用工友之机，派遣四名暗探化装打入内部。据当时北京《晨报》报道，这几名暗探在旧俄兵营中“经过三月，所有党中一举一动，俱已调查明晰，并经绘图报告。”^①

三、收买叛徒。北洋反动政府的“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沈维翰，经过所谓的“多方劝导”，使曾在大钊同志身边工作的李渤海（因散发传单被捕）叛变投敌。李渤海出卖了李大钊同志和其他革命同志，他“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之情报及其他共党分子名单供出”，后来“并引导警察厅人员携带消防队设法将李等捕获。”^②

1927年春，国内的革命形势继续高涨。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

① 北京《晨报》1927年5月1日。

② 《访问搜查俄使馆法官沈维翰先生》，载《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

势进抵长江流域，吴佩孚、孙传芳均遭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已摇摇欲坠。可是，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正磨刀霍霍，准备向工农开刀；奉系和直系军阀，除拼命抵抗北伐军外，在他们盘踞的北方则加紧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搜捕革命者，疯狂进行迫害。在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先是杀害了《京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编林白水，接着就把屠刀指向了李大钊同志。

根据帝国主义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入内。于是“安国军”（此时奉军称安国军——作者）总部派人先找荷兰公使欧登科（当时任公使团团团长），接着又与英、法等国公使交涉，最后经签订《辛丑条约》的八国公使会议讨论，默许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搜捕李大钊同志等人。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的三百多名军队、警察、宪兵、侦探，全副武装，身佩红线为记，于1927年4月6日上午11时半进入东交民巷，其头子在荷兰使馆内坐镇指挥。他们首先把住各个路口，随后就进入苏联大使馆及旧俄兵营内进行搜捕^①。

4月6日正是清明节，天气非常温和，大钊夫人领小女儿炎华去兵营那边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大钊同志在里间屋里伏案写字。突然外边响起了尖厉的枪声，星华有些惊慌，大钊同志镇定自若，安慰女儿道：“没有什么，不要怕。”他领着星华来到院里，进入一间僻静的小屋。不久，一群如狼似虎的宪兵、侦探和警察蜂拥入内，并带来了几天前被捕的阎振山同志。一个侦探指着大钊同志问阎振山：“你认识他不？”这位经过党培养教育的老工人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那个反动派的爪牙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呢！”于是，大钊同志以及他的夫人、

^① 关于奉系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搜捕李大钊的情况，请见《国闻周报》4卷15期《俄使馆党案始末》。又见《东方杂志》24卷12号《时事日志》。

两个女儿落入了反动派的魔爪。同时被捕的共有六十余人。其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其他的人。

此前，1926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进关入京以后，北方的局势日趋恶化，白色恐怖愈来愈严重。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国民党领袖贪生怕死，纷纷弃职南下。我党为了保存干部，也将部分同志调离北京。李大钊同志象一棵挺拔的苍松，在凛冽的风雪中傲立着。他毫不恐慌畏惧，坚守战斗岗位，继续领导着北方的革命斗争。许多朋友劝他离开北京，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说：“要离开北京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他的夫人为他担心，多次劝他暂避一下。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嘛！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在大钊同志被捕前夕，杨度（曾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第一名，后来思想转变，同情革命，更后还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在北洋政府中任职）无意中从北洋政府总长汪大燮口中得知敌人的阴谋，急忙“回到家中时，满屋子都是客人，有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在内”。杨度留下了胡鄂公，待客人走光后，把这一惊人消息告诉了胡。“他们赶忙把这消息通知俄营中党人”^①。形势尽管如此险恶，李大钊同志仍然坚守在战斗的岗位上。

二

大钊同志铮铮铁骨，一片丹心，在狱中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的革命气节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① 陶菊隐：《北京党狱》，载《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年2月初版，第370—371页。

敌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大钊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大钊同志坚贞不屈，没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没说一句有损于革命的话。他在狱中写的《自述》，反映了他的坚定的革命原则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字里行间洋溢着 he 献身于革命，谋求民族解放的志向。通篇《自述》是以国民党人的身份写的，根本没有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他在《自述》中还巧妙地、不失原则地回答了敌人提出的关于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国民党北方执行部等有关问题。为了保护同时被捕的青年，以保存革命力量，大钊同志在《自述》中还表示自己“负其全责”，要敌人“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舍己救人，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高贵品质。

大钊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北方的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是在他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他被捕后，北方铁路工人曾组织了劫狱队，计划劫狱营救大钊同志。这个计划通过党组织传到狱中后，大钊同志感谢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看出当时完全没有实现这个计划的可能，他不愿工人同志做无益的牺牲，使革命力量再遭受损失，因此不同意这个行动。党组织接受了大钊同志的意见，取消了劫狱的计划^①。

在教育界，广大学生、教师和学者也纷纷起来营救大钊同志。4月9日，北京九个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10日，推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校长为代表走访张学良，由张的秘书代见。两位校长提出五点意见，其中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②4月12日，北京二十五个大学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篇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移

① 《李大钊同志革命史略》，载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28日。

② 北京《晨报》1927年4月11日第六版。

交法庭办法。”^①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统治阶级对迫害李大钊同志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北洋政府曾派梁士诒、杨度、罗文干等三人面见张作霖，主张将东交民巷事件中所逮捕的人“移交法庭”处理。奉系军阀内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有的认为“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则依照军法处分，自属适当”；有的则认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虽密谋赤化，虽属颠覆国体行为，唯文人与军人究不能相提并论，……不可高压而迫其走险。”^②

面对这种形势，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同志也曾一度动摇迟疑。可是，南北的新旧军阀及其帮凶们勾结在一起，竭力谋害李大钊同志。参与这一阴谋活动的，有竭力反苏反共、充当封建军阀鹰犬的中国青年党。“民国十六年夏李大钊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以后，北平各报纸都以特字号登载李大钊乃是学者，大学教授，政治犯，不可伤害。而青年党这时，陈启天率领党徒多人捣毁北平晨报馆，曾琦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惟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同时青年党又假借北平民众团体名义，张贴标语，什么‘杀一李大钊抵杀千万个共产党’，什么‘杀以止杀’”^③。奉系军阀的一个重要头目张宗昌由山东前线拍来一电，“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④。隐藏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蒋介石，这时已公开叛变革命，在南方疯狂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人。反动势力的怂恿，特别是蒋介石的公开叛变，促使张作霖下决心杀害李大钊同志。

① 1927年4月13日北京《晨报》第六版。

② 1927年4月14日北京《晨报》第三版。

③ 陈永年：《青年党外传》，载《文萃》第45期，1946年8月29日第18页。

④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宜文书店1951年8月初版，第74页。

张作霖害怕大钊同志在群众中的威望，害怕人民的力量，不敢举行公开审判，而偷偷摸摸地导演了一出“军法会审”的凶残丑剧。“会审”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4月28日上午11时，在警察厅南院大客厅正式开庭，整个“会审”没超过七十分钟，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紧接着，就极端秘密地将李大钊同志等用六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当日看守所马路断绝交通，警戒极严”，道路“两旁均有宪兵警戒”^①。敌人用极其野蛮的绞刑杀害了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革命者。首登绞刑架者，为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神色不变，从容就义^②。

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李大钊同志英勇战斗一生，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大钊同志逝世三十周年的时候，陈毅同志曾赋诗纪念：“就义从容甚，大节凛不辱”，“先驱好肝胆，松柏耐岁寒”^③。这是对大钊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①② 北京《晨报》1927年4月29日。

③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

韩凌轩

几年来，在对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的评价问题上，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李大钊同志极尽诬蔑、诋毁之能事。近几年来，似乎又出现一种脱离历史事实来评价李大钊的倾向。我们认为，在对革命先烈李大钊同志的研究上，同样应该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本文拟就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问题谈几点看法，就正于同志们。

一、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但不是主要发起人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由于辛亥革命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和黑暗的军阀统治的刺激，在广大进步的知识青年中激荡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纷纷起来组织学会，学习和探索新思想、新学说，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其中人数较多、分布最广、历时最久、影响也较大的一个进步社团。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党的早期活动家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等同志，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有的并担任过学会的领导工作。其中的李大钊同志曾经参加学会的筹备和发起工作，并亲自担任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主任，从事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

宣传，在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初期占有重要地位。但有的同志却说李大钊同志是学会的主要发起人^①。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李大钊同志确曾参与学会的发起工作，但不是最初的和主要的发起人。

首先，我们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少年中国学会是在1918年6月30日开始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的。在学会筹备期间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学会筹备情形的宝贵资料。其中王光祈在学会成立前夕回忆学会发起情形时说：“岳云别墅者，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到会者为：陈君清、张君尚龄、周君无、曾君琦、雷君宝菁、王君光祈六人。会议结果，公推王光祈为起草员。遂由王君光祈草拟规约数十条，复在岳云别墅会议修改数次，并邀同会员李大钊商榷一切。当时列名发起者，则为陈涪、张尚龄、曾琦、李大钊、周无、雷宝菁、王光祈七人也。”^②这说明，李大钊同志并未参加开始筹备学会的岳云别墅会议。学会规约的最初草拟均出自王光祈之手。规约草成后才邀请李大钊同志参与商榷筹备学会诸事。周太玄（即周无）是最初参与发起学会的人之一，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他在回忆中证明：发起学会的最初动议者是王光祈和周太玄，后来利用同学、同乡之谊联络了曾琦、陈涪、雷宝菁等人。再后来，由于陈涪的介绍和新闻界的联系，才联络上李大钊同志^③。曾经担任过少年中国学会临时执行部主任、后来成为国家主义派骨干分子的陈启天，在他近年来写的《寄园回忆录》一书中谈到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时也说：“少中的宣言、宗旨、信条以及规章都是由王光祈创意起草，而初期的会务与会友的接洽（民国七年六月至九年四月）也是由光祈总其成。所以光祈成为少中的第一个中心人物。”^④“创意”者，首创其意也。他的回忆和王光祈、周太玄的回忆

① 《浩气长存》第7页。

② 《少年中国学会会务报告》第3期。

③④ 见《五四时期的社团》第538、541、133页。

不谋而合，自非偶然。这反映了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王光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发起人。当王光祈等利用同学、同乡之谊提出建立少年中国学会的时候，李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已很有研究”^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人物而在文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所以，王光祈等邀请李大钊同志共同作为学会的发起人，利用他的声望作为联络和扩大会友的旗帜，也是合乎情理的。而李大钊同志为了团结广大进步青年，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自然乐于做学会的发起人。1918年6月30日，在学会筹备会上，王光祈以发起学会的首倡之功，被推为筹备处主任，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时，又被推为执行部主任，而李大钊同志被推为编辑部主任。这都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其次，我们从学会的宗旨来看。1918年6月30日的筹备会上确定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同时还规定了“奋斗、实践、坚忍、俭朴”^②八个字的信条。这个宗旨和信条明显地反映了以王光祈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李大钊同志的思想主张大相径庭。王光祈在《少年中国的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一文中说：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各有各的主义，而且是各人对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彻底。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预备功夫。第一阶段的路走完了——即指各种主义共同必须的预备功夫——再商量走第二阶段的路程。”^③这种两阶段论的乌托邦式的理想，自然是不能实现的。当然，这种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却起了进步作用。但是，这种改良主义的、兼容并包的指导思想，是和李大钊同志的

①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1012、1013页。

③ 《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思想没有共同之处的。当时的李大钊同志已经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初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把二十世纪的俄国十月革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加以比较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①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文。1919年5月，李大钊同志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又鲜明地表明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基本上正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原理，指出“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避免之数了。”^②深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并决心终身为之奋斗的李大钊同志，自然不会提出上述那种富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的学会宗旨来。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李大钊同志虽然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工作，但并不是主要的发起人。

二、李大钊同志曾经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领导人之一，但不是自始至终的领导人

在李大钊同志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关系上，还有一种说法，即认为李大钊同志是少年中国学会的“自始至终的领导者”^③。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李大钊同志的确曾经是少年中国学会前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说是“自始至终的领导者”，则与事实不符。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之后，由于李大钊同志的参与发起和领导，由于文化界其他著名领袖陈独秀、蔡元培的支持，同时由于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2页。

② 同上，第211页。

③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1014页。

学会所持的兼容并包的方针得到了各阶层知识分子的欢迎，使它在前期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它的会员迅速增加；分会组织遍布国内十多个省市；并在巴黎、纽约和德国、南洋等地也建分会，所以它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同志希望通过它来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并把他们引向革命的道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李大钊同志正在北京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没有参加大会^①。由此可见，这时李大钊同志对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视程度。大致说来，这时大至学会的大政方针的讨论，小至欢迎新会员入会、欢送会员出国留学，讨论对某会员的处分等，他都亲自参加，认真处理。

这时期李大钊同志对学会的领导，基本分为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两个方面。在组织领导方面，在1923年7月以前，李大钊同志历任临时编辑部主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评议部（学会决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员，是学会行政会务方面的领导人之一。但始终没有担任过评议部主任、执行部主任等最高领导职务。所以，李大钊同志对学会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的领导。在学会筹备期间，他对筹备会提出的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学会宗旨很不满意。在他的建议下，成立后的学会宗旨修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②这个宗旨虽然也还比较笼统，但要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奋斗这样一个目标却明确地提出来了。这样，就使学会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使学会的活动与改造中国的政治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李大钊同志又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会的指导思想问题，希望把学会变为宣传马克

^① 胡华、肖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② 《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

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8月16日和19日，在少年中国学会等五团体的茶话会上和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的茶会上，大钊同志先后两次提出标明学会主义的问题。他说：“本会同入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①。根据李大钊同志当时的思想信仰，他所要求标明的主义自然是社会主义。李大钊等同志虽然多次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学会指导思想的问题，都因为学会内部思想庞杂，没有获得一致意见，但在李大钊同志的宣传和影响下，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黄日葵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活动家。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以后，“很快就出现分裂现象。基本上形成三派：一派倾向共产主义，有守常先生领导；另一小撮是国家主义，有曾琦、李璜等人；还有一些人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后来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和国家主义派针锋相对，互相斗争，最后分裂。”^②名为三派，实为两派，即共产主义派和国家主义派。从1921年7月在南京举行的年会开始，两派就以是否规定主义和进行政治活动进行公开斗争。后来，在1923年10月于苏州举行的年会上，国家主义派更借马克思主义者从事实际革命运动无暇顾及会务的机会，一度夺取了学会的领导权。1925年在南京举行最后一次年会之后，学会终因内部思想不能求得统一而宣告解体。从少年中国学会发展和分化的这个简单轮廓中我们可以看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展和中國革命运动的发展，正好走着相反的方向。随着内部分化的日益加剧，它已经不能完成团结广大革命青年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任务了。这是李大钊同志后来不再重视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原因。1921年7月中国共产

① 《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

②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1013页。

党成立以后，李大钊同志虽然又继续担任了两年的评议员职务，但除了1922年杭州大会时，他和在京的几位会员一起向大会提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①之外，并没有参加多少实际的活动。实际上，这时他已经以主要精力代表党中央领导北方革命运动，和少年中国学会没有多少关系了。而少年中国学会这个组织却一直到了1925年才告解体。所以，说李大钊同志是少年中国学会自始至终的领导者，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三、李大钊同志在少年中国学会时期的思想发展

李大钊同志虽然不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也不是主要的、自始至终的领导者，但是，少年中国学会时期尤其是其前期，无疑是他思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他不但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经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光辉战斗历程。因而，这个时期在他的整个思想发展史上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如前所述，1918年底、1919年初，以《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发表为标志，大钊同志初步完成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以后，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实际问题方面又有了新的飞跃。这时，少年中国学会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少年中国？用什么方法去创造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各派会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同的。以曾琦、李璜为首的国家主义派主张效法意大利，

^① 《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

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以王光祈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虽然希望将来的中国能够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弊病，但他们实际上也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则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社会主义在当时只是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朝着这个方向一步步的向前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前应该做些什么，在大部分共产主义者中间还是不十分清楚的。只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少数先进者，披荆斩棘，开辟着中国革命的航线。他在1918年至1921年初写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跋〈国体与青年〉》、《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文章，都是他为中国革命航线铺下的浮标。同时，也标志着他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不久，又踏上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征程。

（原载《北方论丛》1980年第5期）

李大钊与鲁迅

运之江棣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李大钊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伟大战士鲁迅生活在同一时代，早在五四时期他们就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李大钊把鲁迅看成是“在文化革命的战阵中”的“一面大旗”，是自己的亲密战友；鲁迅则把李大钊当成“革命的先驱者”，他“愿意遵奉”命令的“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的激战中，《新青年》是一个重要阵地。1918年间，《新青年》编辑部改组，李大钊和鲁迅参加了编辑方针的讨论。鲁迅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①这以后，他们的交往很多。李大钊是《新青年》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而鲁迅与《新青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们翻阅五四时期的《鲁迅日记》，随处可以看到关于《新青年》的记载，在他的通信中，更常常谈到《新青年》的工作。其中鲁迅在1919年以后两年的日记中，直接记有

^① 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与李大钊的书信来往就有八次之多。

值得提一下的是青年毛泽东曾去鲁迅家中拜访过一次，也是李大钊帮助联系的。北京大学的红楼落成后，担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天天在这里办公。鲁迅和《新青年》的同人们也把这里看成联络点，常来这里与李大钊交谈。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领导湖南的“驱张”运动第二次来到北京，工作很紧张，但还是希望去鲁迅家中拜访这位仰慕已久的新文化运动的斗士，并请李大钊转达了这个意思。1920年4月，毛泽东去鲁迅八道湾新买下的住宅访问。不巧的是，这天鲁迅因公外出，毛泽东只见到了周作人，未能与鲁迅见面。这成为他们的终生憾事。

五四时期鲁迅和李大钊在向封建势力的进攻中，互相的配合是很紧密的。

1918年5月，《新青年》刊登了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同时刊登了李大钊的重要论文《新的！旧的！》。《狂人日记》是我国新文学的开篇之作，是对封建主义战斗的宣言书，它控诉了“吃人”的封建制度，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李大钊的论文则尖锐地揭露了“新”与“旧”的矛盾，要求新青年开辟“新径路”、创造“新生活”，“进！进！进！新青年！”

1919年第5号《新青年》，由李大钊负责编辑。他把这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他精心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在我国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李大钊为办好这期杂志所组约的优秀文章中，就有鲁迅的著名小说《药》和战斗性很强的《来了》、《现在的屠杀者》、《人心很古》、《圣武》等四篇重要杂文。

鲁迅说：“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①“既然是

^① 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4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①。鲁迅的这些说明，确切地反映了他和李大钊紧密配合的战斗情景。

李大钊、鲁迅等在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恐慌。在1919年2月，守旧文人林纾发表了反动文言小说《荆生》，诬蔑新文化运动，并企图借军阀的武力镇压新思潮。3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转载了这篇小说，并加按语进行批判，同时又转载了他发表在《晨报》上的批判文章《新旧思潮之激战》，怒斥勾结封建军阀的文人，举出俄国沙皇的可耻下场来警告中国的反动派。鲁迅与李大钊取同一步调，在多篇《随感录》中，指出林纾一伙是“现在的屠杀者”，驳斥林纾等人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维护旧制度、反对一切改革和进步的谬论。

在《新青年》反封建统一战线营垒内部，李大钊等代表运动的左翼，胡适等人代表运动的右翼，斗争也是非常尖锐的。在这场斗争中，鲁迅也是始终站在李大钊一边的。鲁迅把二者相对照，尖锐指出：胡适是“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而李大钊“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②

胡适对于《新青年》轮流编辑的办法不满，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取消这个办法。大家问他：“不轮流编又怎么办？”胡适竟毫不客气地说：“这个杂志归我一个人负责编辑。”鲁迅当时冷冷地对胡适说：“这个杂志既然归你一手包办，那就不用到我们操心了，我们宣布退出。”^③这样一来，胡适只得知难而退。后来，李大钊在《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又引起胡适的恐慌。他认为

① 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见沈雁冰《鲁迅与〈新青年〉同人关系探索之五》，《文汇报》1962年9月25日。

《新青年》几乎成了《苏俄》杂志的汉译本了，便向同人提出停刊或声明不谈政治的办法。鲁迅复信胡适，表示应同反动政府抗争到底，“不愿示人以弱”，“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①。

五四时期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场斗争。李大钊针对胡适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出所谓的“这‘过激主义’也就不用谈了”的反动观点，严正指出：“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札维主义的”。当时，鲁迅虽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真心拥护十月革命。他坚决站在李大钊一边，为革命先驱者“喊几声助助威”。他针对反动派发出的“过激主义来了”的叫嚣，指出其目的是对抗革命潮流的冲击，保障他们兽欲的满足。他热情歌颂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是“新世纪的曙光”。

二

五四时期以后，李大钊忙于创建中国共产党和担任党在北方地区的领导工作，鲁迅在文艺战线上坚持反帝、反封建军阀的不妥协斗争，他们的联系虽然不多，但却是互相“默契”的。诚如李大钊说的：“我们见面虽不多，但他和我却很能‘默契’。他善于‘忘我’，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真是不可多得的好战友。”^②

1923年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出版后，李大钊非常高兴。他当即购了一册送给孩子们，与他们谈论这本书的价值。他特别赞扬《阿Q正传》，要孩子们认真阅读。1925年春天，鲁迅的小说《长明灯》发表后，李大钊读了很高兴。他说：“我看这是他要

^① 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② 见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灭神灯’，‘要放火’的表示，这是他在《狂人日记》中喊了‘救救孩子’之后紧接上去的战斗号角。”李大钊还派人去看望鲁迅，并请他“把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直接领导起来干！”鲁迅听后，表示对李大钊致亲切的问候^①。

鲁迅也很关心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他在杂文《忽然想到(八)》中，记有北洋军阀一次“国务会议”要查办李大钊的丑剧：“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钊?!’于是乎办定了。”简单的记述，尖锐地讽刺了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反映了鲁迅对李大钊安全的关怀。

鲁迅的工作很忙，但他一直关注着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的斗争。中共北方区委在李大钊指导下所办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在1924年夏创刊后，成为鲁迅必读的刊物。至今我们在鲁迅珍藏的书刊中，还可以找到《政治生活》第62期、78期和79期。在这几期刊物中，载有李大钊的著名论文《土地与农民》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等重要论文^②。

当时李大钊除负责中共的领导工作外，还兼任国民党北方的负责工作。国民党左派的机关报《国民新报》于1925年12月创刊后，鲁迅是该报副刊的主编之一，并在该报发表过十多篇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和译作。李大钊也常给该报写文章。1926年3月，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国民新报》出版了“纪念特刊”。李大钊的《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鲁迅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两篇论文，同时在该刊登载。他们高度评价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

在这以后不到一个星期，北京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一

① 见刘弄潮：《李大钊和鲁迅的战斗友谊》，《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② 鲁迅保存的这三期《政治生活》，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八”惨案。北京各界人民在李大钊亲自领导下，举行了抗议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的卖国行为的请愿斗争，遭到反动的段祺瑞政府的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示威群众死伤达二百多人，李大钊头部和双手负伤。反动当局反诬这一爆行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闯袭国务院”。鲁迅对此怒不可遏，几天之内，“气得饭也不吃，话也不说”。他写文章控诉敌人的罪恶，认为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指出敌人“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①。

这时，反动文人陈源之流为虎作伥，发表《闲话》，竟指责革命群众“受人利用”，还胡说什么“民众领袖”（指李大钊等人——笔者）“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应负“道义上的责任”。鲁迅愤怒地反驳说：“这些东西（指陈源之流——笔者）仿佛就承认了对徒手群众应该开枪，执政府前面原是‘死地’”，而“群众领袖……怎么能够料到这阴险的辣手”^②。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段祺瑞反动政府，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五人。同时，反动当局因为害怕鲁迅等对他们的揭露和斗争，还准备通缉鲁迅等五十人。

这时，李大钊被迫迁往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旧兵营，转入地下斗争。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将许多同志调离北京，他自己却始终坚守在岗位上，担负着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鲁迅先是避居在西城锦什坊的莽原社里，后移往旧刑部街山本医院和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法国医院，五月间才返回寓所。在白色恐怖下的紧张战斗生活中，李大钊和鲁迅仍互相关怀着。

5月25日黎明，李大钊要一位同志撤退去兰州工作，离京

① 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前，李大钊又批准他去看望鲁迅，并代表李大钊问候鲁迅，两人还具体商定了与鲁迅谈话的内容。当天早上，这位同志来到鲁迅家中，介绍“三·一八”事件后李大钊领导同志们工作的情况。鲁迅马上关切地问：“守常住在哪里？”当他知道李大钊住在俄国大使馆内，仍在指挥大家战斗的情况，和李大钊由于过分劳累，身体瘦弱时，鲁迅面部出现了不大放心的表情。鲁迅要他转达对李大钊安全的担心，深情地说：“俄国大使馆并不安全啊！要他注意！”谈话中，鲁迅还指出，“三·一八”烈士“是为爱国牺牲，千千万万人永远纪念在心里，千千万万人的崇敬就是万古不磨的‘无字碑’！”^①

鲁迅在亲友们一再敦促下，直到8月才被迫离开北京，前往南方投入新的斗争。

三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悍然逮捕了李大钊等同志，4月28日反动派用极野蛮的手段绞死了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同志。李大钊在狱中和刑场上保持了坚贞的革命气节。与此同时，鲁迅在广州也经历了错综杂复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严重斗争，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鲁迅离开北京后，一直惦念着战友李大钊的安全。近年发现的鲁迅在1927年写的论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面对北伐战争中沪宁克复的大好形势，他敏锐地觉察到隐伏在革命阵线内的危机的严重存在。他运用列宁的观点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要求革命者高度警惕阶级敌人和投机分子破坏革命。这时，他特别想到的是自己的战友李大钊在北京的被捕。他说：“忽而又

^① 见李世军：《回忆“三·一八”惨案后与鲁迅先生的告别谈话》。

想到香港《循环日报》上所载李守常在北京被捕的消息，他的圆圆的脸和中国式的下垂的黑胡子便浮在眼前，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当然，鲁迅是知道反动军阀是怎样狠毒的。因此，他为李大钊的危险而担忧，他预见到凶多吉少，愤怒指出，对敌人必须以牙还牙，“永远进击”！

事实上，李大钊被捕后，他的儿子李葆华正是在李大钊和鲁迅一起办《新青年》的挚友们的掩护下，才幸免于难的。李葆华藏匿的地方，正是鲁迅原来在八道湾购买的那所房子的东屋。这里的三间小屋，曾多次掩护过革命者。

鲁迅在广州惊悉李大钊遇难的恶耗时，心中感到剧烈的痛楚。他后来回忆说：这时，李大钊“椭圆形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

但是，“革命先驱者的血”没有使鲁迅消沉和退却。他面对北洋军阀的凶残行为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军阀“四·一五”大屠杀的罪行，更加勇猛地向敌人进击。他继承了李大钊的遗志，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了党领导的文化战线的斗争，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3年4月23日，在党的领导下北京群众为李大钊举行了隆重葬礼。远在上海正遭白色恐怖压迫的鲁迅，为安葬李大钊的遗体，毅然捐款五十元，表达了他的心意。对这次出殡，鲁迅表示这也是了却他的一点心愿。他还在文章中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出殡群众的残酷镇压。

李大钊的遗文经过一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整理，辗转送到上海。鲁迅非常关心李大钊文稿的出版，为此花费了许多心血。他于1933年5月29日为该书写了《〈守常全集〉题记》。文章对李大钊光辉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和李大钊的革命友谊，作了具体生动的追忆。鲁迅并指出，李大钊虽然牺牲了，“他

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鲁迅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要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出版李大钊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几次商量这件事，他特别指出：“《李集》我以为不如不审定，也许连出版所也不如胡诌一个，卖一通就算。”^①他打算用这种办法避开敌人的“中央检查员”。正不出鲁迅之所料，敌人的文化特务无孔不入，终于由于敌人的破坏而使《守常全集》未能出版，这使鲁迅感到极大的愤慨。鲁迅逝世后，《守常全集》于1939年印出来了，但立即被反动当局禁止，已印成的书全部被没收。由此可见敌人对李大钊的害怕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但是，鲁迅写的《〈守常全集〉题记》还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发表了。这也是经过鲁迅精心安排，才躲过敌人的检查，在鲁迅称之为“文简而旨隐”、“侦探们亦不甚解”的刊物《涛声》上发表的。后来，鲁迅在编《南腔北调集》时，又把这篇文章选入，并特别加了个“附记”。“附记”中说：他因为对李大钊“谊不容辞”而写了这篇题记。李大钊的文集虽然被禁了，“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短短几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李大钊的同志之爱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之恨！

写于1980年

^① 见《鲁迅书信集》（上卷），第3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周子信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六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工人运动在国内的蓬勃兴起，使建党具备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促使两个方面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

回顾从五四运动到党的创立期间的历史，人们不能不想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他的崇高思想和杰出活动，同我们党史中最初的篇章是不可分割的。李大钊同志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处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迎着席卷神州的风暴，高屋建瓴，所向披靡，一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一面发动工人运动，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奔走呼号，为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历史滥施刀斧，对李大钊同志也妄加非议。他们千方百计把李大钊同志打成“资产阶级民主派”，完全抹煞大钊同志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我党的功绩，竟将他的名字从党史中一笔勾销。然而，金子总是闪光的，李大钊同志的光辉业绩是不可磨灭的。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2页。

今天，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大钊同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伟大生平，赞颂他创立中国共产党的不朽功绩，将更加激发我们的革命精神，鼓舞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新的长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李大钊同志走在我国觉醒最早的知识分子的前列，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当他一旦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便忠诚地信仰它，积极地宣传它，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李大钊同志的著述宏富，内容广泛。“计公挥笔阵，前后十三年”。从1913年起至1926年止，他先后在《言治月刊》、《甲寅杂志》、《晨钟报》、《新青年》、《每周评论》、《政治生活》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约在三百五十篇以上，仅收入《李大钊选集》的就有一百三十多篇，四十万字。其中写于十月革命前的有十五篇，绝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写的，以论述马列主义为最多。

李大钊同志早在青年时代，便胸怀大志，追求真理，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他刚刚阅历世事，开始政治生涯的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发生的岁月。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清朝皇帝，却没有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大钊同志感于国势的危迫，对国家怀着“隐忧”，为人民倾诉“大哀”。他满腔热血，忧国忧民。

1913年冬，李大钊同志怀着强烈的爱国感情，东渡日本，寻找救国的良方。当时，日本已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工人运动日渐高涨，马克思主义正在传播。这种客观环境，为李大钊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探索救国之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日本，李大钊同志用熟练掌握的日、英两国文字读了不少书，接触到欧洲社会

主义思潮，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十分喜爱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例如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幸德秋水、河上肇的著作，都曾经给他较大的影响。这个期间的学习，使他初步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群众的观点，同时，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产生了怀疑。这就为他后来拥护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作了初步的准备。

李大钊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不是死守书斋、教条式的学习，而是拿起理论的武器，投入现实的斗争。当日寇出兵山东、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时，大钊同志愤然成立爱国组织，撰写战斗檄文，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勾当，开展爱国反帝的斗争。

1916年4月，李大钊同志为了参加反袁斗争，毅然中途辍学回国。回到国内，李大钊同志先后担任《晨钟报》、《新青年》、《甲寅》等报刊的编辑。在蓬蓬勃勃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挥起如椽巨笔，写了大量富于感召力的文章。其中，脍炙人口的《青春》，代表了他在那一期间思想的高度。这是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同志以鲜明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他对宇宙、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看法。他以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精神，提出了“青春之中国”的美好理想，论证了“青春之中国”的必胜原因，指出了创造“青春之中国”是革命人民的历史重任。

正当李大钊同志为“青春之中国”探索途径、绘制宏图之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出现了。毛泽东同志论述这个革命对于中国的影响时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

是结论。”^① 大钊同志站在先进分子的前列，迎着十月革命的曙光，深感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是救国的良方。最先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这个历史的结论。这时，也正是在这时，他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前后，李大钊同志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新纪元》等著名的论文，坚决地拥护十月革命，积极地宣传十月革命。《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是中国人民赞扬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它阐明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论证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新纪元》一文谈到了十月革命给予中国的影响，文章写道：“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他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② 大钊同志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

1918年1月，李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图书馆大量增购中外图书，特别是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的“红楼”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红色园地。同时，大钊同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更系统的学习和更深入的探讨。1918年冬，他在北大组织“马尔格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邀请了几位教授参加。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展活动，就受到反动政府的阻挠，以“防止过激主义传播”为由查禁了。1920年7月，大钊同志在北大担任教授（仍兼图书馆主任），他把学校的讲坛作为宣传的阵地，先后在北大、女高师、朝阳大学讲授过“唯物史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0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121页。

③ 同上，第117页。

观”、“马克思的历史”、“马克思的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学”等课程，广泛地传播马克思主义。

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北京以至全国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为了推动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李大钊同志努力创办报刊，多写文章。1918年12月，他和陈独秀一起创办《每周评论》，配合《新青年》向群众展开宣传教育工作。接着，他又指导全国学生救国会和北大学生办了《国民》杂志和《新潮》月刊，担任这些刊物的导师和顾问。他还帮助《晨报》第七版（副刊）实行改革，并在这个副刊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曾陆续刊载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以及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译文。这些报刊的创办和改革，尤其是大钊同志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大钊同志的宣传、组织和领导下，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浪潮风起云涌，终于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大钊同志的同辈人回忆起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推崇他是“催生五四运动的人物”。

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六三工人大罢工以后，李大钊同志配合革命的进展，着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实践具有这样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对五四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钊同志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条件，随着马克思主义水平的不断提高，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发展。1919年秋冬，大钊同志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续发表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分别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可见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登高一呼群山应，微言如闪首传真。李大钊同志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以及他坚持不懈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在青年时代，都曾得到大钊同志的启示和指点。毛泽东同志回忆当年大钊同志对他的影响时谈到：“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① 鲁迅先生也赞誉李大钊是“革命的先驱者”，而把自己当作“听将令”的“小兵”^②。假马克思主义者王明自吹自擂，胡说在他们之前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同志批驳王明的狂言时指出，事实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那时候李大钊同志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有书为证^③。在李大钊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蔡和森等一代新人在迅速成长，为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李大钊同志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写了非常多的文章，单说从五四运动到党的成立那一段时间，他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据目前所知，就在一百三十篇以上，平均每六天就发表一篇。同时还在各学校授课，讲授的课程，也达十门以上。这是多么辛勤的劳动！多么巨大的贡献！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④ 随着革命形势的到来，李大钊同志不但开展广泛的理论宣传，而且进行艰巨的组织工作。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他已经把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提到革命活动的日程上来了。李大钊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建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① 《西行漫记》第123页。

②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48页。

③ 毛泽东同志1942年11月在延安的一次讲话。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49页。

二

李大钊同志十分注重建立革命组织，重视组织的作用，发挥组织的力量。为联络和组织进步青年，1918年6月，大钊同志参与发起建立“少年中国学会”，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主任。该会会员遍布全国，先后入会的达一百三十余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以及知名作家田汉、朱自清等人，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为了团结青年，培养干部，有计划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在大钊同志的指导下，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不久，瞿秋白也参加进来。在大钊同志帮助下，大家艰难地搜集了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又筹集一些资金，购置了有关图书，为研究会设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巧妙地取名“亢慕义斋”（英文 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大钊同志曾经提出，希望这个研究会能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①。李大钊同志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就在与进步青年的密切联系中，开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

李大钊同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进步团体的活动，如果说初期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那么，后来由于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则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有一个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说过：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

^① 《李大钊选集》第371页。

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①当年，李大钊同志密切联系群众，注重社会调查，关心工农劳动者的疾苦，以鲜明的立场证实了自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写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为终日劳动在“地狱”一般的炭坑、处境“不如骡马”的煤矿工人，倾诉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他揭露农村的黑暗，从“中国是一个农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刻指出农民“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痛苦，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痛苦”^②，说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大钊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看待妇女问题，指出：“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才能争得妇女的解放^③。他还教导青年，看清世界的潮流，明确努力的方向，“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并提出“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④。为此，他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⑤。大钊同志还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参加爱国的群众运动，针对北洋政府出卖山东的事件，他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⑥，号召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斗争。

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工人运动的日益高涨，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也为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李大钊同志经过一系列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适时地积极地投入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活动。据现今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31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146—147页。

③ 同上，第145页。

④ 同上，第160—161页。

⑤ 同上，第146页。

⑥ 同上，第214页。

所知，大钊同志为建党所做的工作，有如下史实：

第一件事，1920年初，李大钊同志与邓中夏同志酝酿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第二件，陈独秀被捕出狱后，1920年1月，李大钊同志不避艰险，护送他离开北京。在去天津的路上，大钊同志与陈独秀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

第三件，1920年1月，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取道天津转往上海。陈独秀走后，大钊同志在天津设法与列宁领导下的苏俄取得联系，借《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等，找到原旧俄租界，会见了苏俄某友人，相互交谈了对革命的见解。由于被敌特发觉，张扬出去，大钊同志速即告知与会人员注意防备，自己返回北京。

第四件，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远东局局长维金斯基和马马耶夫、库兹涅佐娃、萨赫雅诺娃带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等来中国。先到北京，通过北大的俄籍教授鲍立维（柏烈维）和伊万诺夫（伊文）找到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热情接待，邀集进步人士和他们多次座谈，并举行欢迎会、演讲会。大钊同志和魏金斯基深入交谈，了解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及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最后，请魏金斯基在北大红楼图书馆里再次会谈了建党的问题。魏金斯基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和他来到中国的见闻，认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并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大钊同志完全赞同魏金斯基的意见。四月，大钊同志介绍魏金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雅诺娃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而把马马耶夫留在北京帮助从事建党的准备工作。

第五件，1920年5月（一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党的组织。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拿不定主意时写信向大钊同志

征求意见，大钊同志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明确答复就叫共产党。

第六件，1920年8月，由周恩来同志发起组织的觉悟社同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人道社和曙光社等五个革命团体在北京陶然亭聚会，大钊同志到会指导。他说：各团体要有一个正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对内不足以团结一致，今后各团体要进一步加强联系。

第七件，1920年10月，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李大钊同志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缪伯英、罗章龙、范鸿劫、李俊、张国焘、刘仁静等。这些人，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早已团结在大钊同志的周围，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方面，有了迅速的进展。表现在，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从事工人运动的实际活动；活动的内容，由过去进行一般民主主义的宣传，提高到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宣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首先是于1920年11月7日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者》周刊。1921年7月，又创办《工人周刊》，销行北方各地，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办得很有精神。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工作，是在长辛店举办工人补习学校，于1921年元旦开学。学校除了学文化课、常识课，还直接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工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还讲工人阶级的政党和工会。这个学校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为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的斗争打下了基础。接着，于1921年5月1日，在庆祝劳动节的欢呼声中，长辛店工会——工人俱乐部宣告成立。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它不断总结经验，办得很有条理，成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

明星”。1921年11月，大钊同志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入团，直接领导它的活动。大钊同志还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纯洁和巩固了组织，提高了小组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使它更接近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队的要求。

第八件，从1921年初开始，李大钊同志除曾亲自去郑州指导该地区的工人运动外，并先后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指导工人运动和帮助建立革命组织。天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唐山的工会组织，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津浦机车厂的工人俱乐部、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共产主义小组，都是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派人帮助建立的。

第九件，1921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动身来华，6月初到达上海，旋即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同志，商谈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并研究了中国同志与苏俄驻北京代表建立联系的事宜。大钊同志欣然赞同共产国际的意见，然后委派邓中夏同志陪同马林去上海，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李达等商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建党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好了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条件成熟了。1921年6月，党的上海发起组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大”从7月23日开幕，于7月31日闭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李大钊同志由于工作繁忙，加之名声很大，行动不便，他未能去上海亲自出席党的“一大”。但是，如前所述，大钊同志在中国最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他不仅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者和

领导者，而且对建立党的全国性组织、加强党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做了许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总之，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卓越的创始人之一。

三

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传播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创立的。李大钊同志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了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同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介绍马克思主义书刊骤然增加，谈论社会主义成为一时的风尚。但是，随着舆论的闸门一开，未免旁流杂出，泥沙俱下。与科学社会主义传播的同时，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托尔斯泰的勿抵抗主义……，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乘机涌入。许多问题众说纷纭，真伪难辨，给一些进步青年造成思想的混乱。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曾以相当的篇幅批判了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思潮，阐明了共产党人对它的态度。这说明，对各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不加抵抗，任其泛滥，对发展工人运动和创立党的组织，都将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大钊同志一面积极写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消除“误解”，澄清是非；一面坚持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斗争。从五四运动以后到建党前夕，大钊同志及其战友们旗帜鲜明地进行过几次大的论战。

第一次，同胡适进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形势，引起国内外反动派以及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的仇视和恐惧。混在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的胡适，公开跳出来挑战

了。他气急败坏地叫嚷：“我看不过去，忍不住”，“发愤要谈政治”^①。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反对“根本解决”，诬蔑宣传“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做的，极力反对“外来进口主义”，胡说高谈“主义”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胡适不准别人宣传“主义”，可是在他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贯穿了从杜威那里贩卖来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而反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事后，胡适直言不讳地谈道：当时“承‘五四’‘六三’之后，国内正倾向于谈主义，我预料到这种趋势的危险，故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大钊同志立即发表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大钊同志揭穿胡适把“主义”与“问题”割裂开来的阴谋，指出具体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大钊同志明快地写道：“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其实质是中国走殖民地道路还是走革命道路的问题，是中国革命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论战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一段落。在这场论战中，大钊同志以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犀利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打退了胡适派的进攻，批判了实用主义的谬论，壮大了革命的声威，振奋了群众的斗志，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第二次，同梁启超、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论战”。挑起这场论战的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

① 转引自《胡适反动思想批判》第39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231、232页。

人。他们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反对社会主义，说什么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先来发展资本主义，叫嚷中国不需要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也不应当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大钊同志和陈独秀以及李达同志等奋起反击，坚决驳斥梁启超、张东荪的谬论。大钊同志还指出，在当今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但“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①。这次论战的中心，实质上是中国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大问题。这场论战持续一年之久。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这场论战中不但批判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反动谬论，而且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建党的工作。

第三次，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从1920年起，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便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场斗争也反映到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来，这突出地表现在讨论党的纲领问题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不久，拟定了一个临时纲领，其中写有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文。讨论这个纲领时，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极力反对。大钊同志领导组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原则，和他们展开激烈的争论。结果，无政府主义者陆续退出小组，他们与共产主义者终于分道扬镳了。正在这些论战的高潮中，1920年8月16日，在有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参加的各社团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李大钊同志讲道，各团体要有个明确的主义，主义不明，就不能团结一致。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开展的几次论战，其基本的意义，正在于保证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明确的主义，即战斗的马克思主义。

诚然，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大钊同志在从民主主义

^① 《李大钊选集》第356页。

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思想还比较庞杂，认识还有些模糊，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毋容讳言，还有不够精当的地方。然而，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也难免，我们不可按照今天的水平，对前人求全责备。正好比白玉上或有几点疵瑕，仍然不失玉石珍贵。鲁迅先生说得好：“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①

（原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

^①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

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韩一德 杨树升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①这种结合是在中国历史上形成的，经历了自己“独特的道路”，并且“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②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根据当时中国社会提供的条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成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这个伟大事业中，李大钊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他最早在中国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和推动了一批革命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奠定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条件。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李大钊作为组织者和领导者，曾经对这次运动发生了重大影响。

在建党过程中，他接受共产国际的帮助，配合陈独秀在上海的活动，积极促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同陈独秀一起被誉为“南陈北李、两大星辰”。

李大钊的建党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

①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9页。

结合的方向，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又是领导革命斗争的杰出组织者和实践家，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都为建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我党早期的杰出领袖。虽然他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成立后也没有象陈独秀那样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建党历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他对建党的伟大贡献，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

本文试就李大钊在建党过程中的活动、贡献及其特点，作一概略论述。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建党的思想基础

虽然马克思的名字早在1902年就已出现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后来民主派的著名理论家朱执信又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有了较多的介绍，但这些被片断介绍的所谓新思想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因而也没有在群众中产生什么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①。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历史前提，是在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才具备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中国的民族工业曾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受到开办近代企业的冲击，大批纺织、面粉、制盐、开矿等手工作坊，代之以机器生产转化为近代工厂，从而使中国的产业工人队伍由大战前夕的六十多万，急增到二百万左右。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3页。

人的罢工斗争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

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矛盾激烈尖锐化的情况下，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受到俄国和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他们的文化程度虽然落后……然而街谈巷议……是听着的”，他们“被这个潮流惊醒了”，唤起了“工人之国”在中国早日实现的希望，这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开始它的黎明期了”^①。然而要从这种黎明期的“自觉性的萌芽状态”^②。前进到阶级的自觉，在中国革命的转变中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担负起领导者的责任来，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这种发展，就给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体系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阶级基础。

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斗争中，1915年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掀起了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虽然仍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但它是近代中国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启发了人们民主主义的觉醒，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准备了思想前提。

李大钊曾经作为陈独秀的战友，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的行列，但他在这个运动中急速地突破了民主主义的眼界，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揭开了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从此开创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开辟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并逐步与中国人民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18年7月，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3期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开篇之作。这篇文章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

①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3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46页。

区别，说明世界历史潮流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时期。同年12月，他又在中央公园北京大学组织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讲演会上，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演说，不久又撰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在这两篇著作中，李大钊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明确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是列宁(Lenin)的功业；……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他热情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和“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而布尔什维主义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为一切皇帝、贵族、军阀、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将被这无法防遏的涛涛滚滚的潮流所摧毁，“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不久，他又在《每周评论》第3期社论栏里发表重要论文《新纪元》。文中宣称：现在的时代，“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欢呼中国人民已经看到了这个新纪元的曙光，“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号召中国人民乘着这线光明去打碎黑暗的、死寂的牢笼，为创造新的生活而奋斗。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俄国革命的爆发，使在寻找革命真理过程中屡遭失败的先进分子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07—1408页。

生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他们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了对它的追求和研究。李大钊这个时期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这种新觉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的这一历史特点。

《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的发表，表明李大钊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世界和国家命运的工具，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只要看一看新文化运动当时的主要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李大钊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观点，他就能够从本质上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得出关于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新结论，从而在思想上明显地超出他的同时代人，站到更高的水平线上^①。

李大钊在参加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表现出思想上的某些特点，他具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他相信中国人民具有“良智良能”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在革命的奋斗中乐观、进取，不断地批判现实，追求真理。还在1913年至1916年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受到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

① 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的陈独秀的文章《克林德碑》，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庆祝中，北京人拆毁克林德碑发出的感慨。

文中指出，何以有此碑的设立，是“因为义和团无放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进而指出，拆除克林德碑不值得欢喜，因为中国既还存在道教、佛教、孔教、儒释道教合一的中国戏和妄自尊大的守旧党这些原因，将来义和团的事必将还要发生。

蔡元培的文章《劳工神圣》指出，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蔡公在此所指的劳工，是为从事正当职业，非贪官污吏、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或投机商人的工农商学各界。

陶孟和的文章《欧战以后的政治》，指出欧战政治上的教训有（一）秘密外交；（二）背弃法律；（三）军人干政；（四）独裁政治。上文都没有触及这次大战的实质问题。

水和河上肇的著作的影响，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①。同时，他又投身在反袁反帝的斗争中，寻求着救国救民，“创造青春中华”的出路。因此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就有可能比较快地接受其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思想上到行动上迅速跨进新的领域，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优秀代表。而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则是在1920年5月左右，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推动。所以，众所公认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起到了“首传真”的启蒙作用，成为这个运动的旗手和主将。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全新的质量，在思想上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围，具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政治上唤起了人民政治斗争的重新活跃。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创办的《每周评论》的出版，便是这一新形势下的产物。该刊抛弃了《新青年》创刊时宣称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的信条，无情抨击反动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广泛报导世界革命的动态，直接号召和推动人民起来进行爱国政治斗争。这个刊物虽然直接编辑者的政治倾向很不一致，但他们一度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方向上采取了共同步骤，因而对五四运动的酝酿和发动起了重要作用。李大钊则把它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的许多重要文章都是在该刊上发表的。1919年5月，当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之际，李大钊在该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信誓。这对五四运动坚持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方向有深刻影响。

五四运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合，为

① 于树德：《我所知道的李大钊同志》，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

② 《新青年》一卷一号，记者《答王庸工书》。

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五四以后，人民的思想空前活跃，以社会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在短期内达到二百余种，一个空前广泛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已经形成，而李大钊一直站在这个运动的前列。

1919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的，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六个月，曾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等文章。李大钊还把由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集中了大量介绍“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的文字，其中还刊有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译文，文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而从本期首载的，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则是我国第一篇完整地、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章冠之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题目，在当时极其醒目，充分表现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革命胆识。文中指出，“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他申明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说明了这三个部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阶级斗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最后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功绩在于告诫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现绝离不开人民本身的斗争，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这篇文章中尽管还有个别不准确或者错误之处，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及其革命意义的了解无疑是正确的。这个时期，他还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多篇论文，又在北大、女高师等校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

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等课程。李大钊的论文和演讲对普及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这一时期，受到五四运动的推动和李大钊的影响，一批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营垒。

马克思主义运动如滚滚江河奔腾向前。如果说反动军阀政府对曾经声称“不议时政”^①的新文化运动尚能容许，而对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为直接目标的共产主义运动则表现了极大的仇视和恐慌。军阀政府的内务部发公文、张告示，查禁“过激主义”，捉拿“过激派”；《每周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被查封；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83种进步读物被列为禁书。在革命阵营内部，新文化运动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开始分裂。那些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在中国社会大转变的舞台上表演一番之后，也逐渐暴露了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这表明，一场马克思主义与各色各样社会思潮的论战已经不可避免。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②，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首先公开站出来挑起了这场论战。胡适在他的文章中诬蔑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阿猫阿狗”、“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他极力反对所谓“外来进口的主义”，声称宣传主义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很危险的”，他主张去研究一个一个具体问题进行点滴改良，其实质就是借口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反对进行社会革命。

①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5卷1号。

② 时值陈独秀被捕入狱，李大钊被迫流亡，由胡适担任编辑。

李大钊是在临去五峰山避难之时看到胡适的文章，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锐敏当即洞察到胡适这篇文章的实质和这场论争的严重意义，毅然挺身而出，在五峰山的孤灯石室中写就了给胡适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5期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首先肯定了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他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强调要改造中国“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反动阶级的国家政权，而用主义去教育和组织群众，正是为这种根本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针对敌人的攻击，李大钊公开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表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和对敌人的蔑视。

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又着重指出，我们宣传主义，最终是要“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并“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他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也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手段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不仅从根本上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也给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继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李大钊又在随后发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及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中，写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之实业》、《民主与秩序》等文，与陈独秀、李达等更多的同志一起继续开展对各种反动社会思潮的批判。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战有如大浪淘沙，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不可避免的百说杂陈的局

面得到清理，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正确解释，它的革命真谛日益为中国人民接受，逐步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

到1921年3月，李大钊已经对建党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并公开号召为迅速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而斗争。他在《曙光》杂志2卷2号上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①一文中指出，中国“彻底大改革”的事业，“要靠民众的势力去完成”，而民众要靠团体去组织训练。“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这个政党是由“C派朋友”组成的“强固精密”的团体，在国际上它以“第三国际为之中枢”与“各国的‘C派朋友’相呼应”。在这里，李大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以中国的彻底大改革为其奋斗目标的，有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政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之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建党思想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进一步武装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二、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为建党作了组织准备

重视革命的实际运动，是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一个显著特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他更加注意用革命的组织手段来推进和巩固运动的发展，在斗争中培养大批干部并以他们为桥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17年底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北大这块新文化阵地上，以他激进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对公众事业

^① 参阅王世儒，《介绍李大钊五四时期的两篇文章》，《革命文物》1980年第4期。

的热心，很快与周围群众发生了密切联系。这个时期，他参加了所有主要社团的创建，通过社团的活动，影响和推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社团的出现，是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从思想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产物，每个社团根据自己的宗旨出版刊物并实行团体的结合以实践其宗旨。在这里云集了许多先进分子，使它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社团在组织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它的进一步发展又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1918年6月30日，李大钊参加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有较大影响的社团之一。在成立会上，经他提议将学会宗旨定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在这里，他把“创造少年中国”作为一个理想提出来，曾产生很大积极影响。学会成立后，李大钊被推举为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他积极参加学会活动，一直担任评议员、编辑等领导职务，学会的不少会议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召开的。李大钊曾经希望这个学会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为此尽了很大努力^①。但由于它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在谋求共同的主义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最后终于走向分裂而于1925年停止了活动。学会历时七年，会员有一百二十多人，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尚德、黄日葵、刘天章、田汉等^②。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爱国激进青年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成立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杂志，李大钊应邀担任该社的导师，对该社的成立和刊物的出版给予了热心的帮助和指导。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上）第86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一册，第240—241页。

李大钊的重要论文《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就发表在1919年元旦出版的《国民》第1卷第2号上。这篇文章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在我国这是第一次以马列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概念^①。李大钊又在该社的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演说^②。国民杂志社的会员曾发展到一百八十余人，该社由于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影响，政治倾向很激进，“公开谈论政治，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③，在“民国八年发起五四运动并为这个运动的中坚。五四运动之后，这一群的倾向越发分明了，他们显然是社会主义——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仰慕者了。”^④

1918年12月，北大的又一著名社团新潮社在《北大日刊》发表成立启事，李大钊也是这个社团的顾问之一，曾在红楼拨了一间房子供该社使用并积极支持《新潮》月刊的出版。新潮社初期在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受到胡适的影响，它的主要成员在五四以后走上了所谓“国故整理”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

当时在国民杂志社和新潮社之间，由于思想倾向不同经常发生对立，李大钊则多方调解促进，使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共同点上联合起来，组织在北大学生会周围，从而加强了五四运动中进步青年的团结。

1919年2、3月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中指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这对社团的发展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在这两篇文章中提出，改造中国社会，“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号召青年在新世纪曙

①③ 许德珩：《纪念伟大的先驱李大钊同志》，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

② 《李大钊选集》第255页。

④ 黄日葵：《在中国近代史演进中的北大》，《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第35页。

光的照耀下，到劳动人民中间去，“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然后“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①。这里虽然不同程度的保留了俄国粹派的影响，但在当时却推动了知识分子迈出与工农群众结合的步伐，因而有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产生。

1919年3月，邓中夏等在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发起宣言中声明，该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以露天讲演为方法。”^②他们决心“打破从来的少数有知识的人保守他那个阶级的制度”，“现在我们要改革社会，自然要从灌输人民知识上入手。”但“中国劳动阶级的人，识字不多，所以第一步的方法就在于讲演了。”^③该团有团员六七十人（一说有一百五十余人），从成立到1925年，坚持宣传活动六年之久。他们讲演的内容从介绍一般科学常识到宣传反帝反封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讲演的对象从市民扩展到工农群众；讲演的方法从街头演说到举行民意测验，进行社会调查，组织工人团体。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代表了五四时期社团发展的正确方向，北大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参加了该团的活动，他们在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上，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取得了显著成绩。

社团的建立和活动，在李大钊周围聚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他们面对民族危机的日益紧迫和军阀政府腐败无能的黑暗现实，逐步认识到只靠宣传教育、出版等活动已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越来越热烈地讨论着“直接行动”的问题。所谓“直接行动”，这是李大钊在介绍国际工人运动经验时多次提到的，即不经当局批准，直接采取“正规范围”以外的行动达到革命的目的。五四运动就是爱国青年走上直接行动的斗

① 《李大钊选集》第161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第134页。

③ 同上，第155页。

争。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参加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向人民提出了直接行动的斗争目标，它要求保持国家主权完整、废除与日本订立的密约；取消步军统领和警备司令两机关、保安队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权等，声明政府若不“听从市民之希望”，人民“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①。陈独秀在散发《宣言》时被捕，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陈独秀出狱后，他又亲自护送陈独秀取道天津前往上海，“南陈北李，微服出京”。经过这次考验，陈独秀的思想更加激进，不久便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的发展，社团遍于全国。1919年9月，觉悟社在天津成立。李大钊曾应邀赴津与觉悟社的社员见面，他给予了这个思想先进、组织严密、男女平等的“天津小明星”^②以热情的赞扬。1920年8月，觉悟社提出团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倡议，全体社员到北京请李大钊指导和帮助。李大钊热烈支持团体联合的主张，8月16日在陶然亭举行商讨联合的茶话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团派了代表出席。会上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在讲话中，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他说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心志，对外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③。这次会议产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两个文件。在马克思主义目标下的团体联合，是五四以后社团发展方向的一个尝试，但由于在谋求主义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实际上这种联合没有实现。

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早期共产主义者已经不满足于—

① 转引自《伟大的开端》，第141页。

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第299页。

③ 张中府：《忆守常》，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

般的结合，觉悟到有成立严密的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①。因而李大钊于1920年8月组织了秘密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的最初会员有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黄日葵、朱务善、李梅羹、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基本上都是后来北京党组织的最早成员。1921年7月党成立后，根据中央关于迅速发展的方针，北京党支部决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活动，取得合法地位^②。于是1921年11月17日在《北大日刊》发布了启事，召开成立大会，建立“亢慕义斋”图书室。在启事中，李大钊这位组织者并没有列为发起人，“是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上考虑到，他是党的领导人，对外界说他还是以教授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身份出现，所以开始时李大钊同志并未出头露面，而只是在党内指导。”^③他曾以教授身份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1921年公开征求会员到成立大会时有六十多人，以后陆续增加到一百一十人，至1923年“二七”罢工之前已达三百人左右，其中有百分之二十工人会员，并有少数民族会员^④。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大力搜集德、英、法、日等各种文版的马、恩原著达数百部，进行编译、刊印，为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必要的条件。还组织会员就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专题研究，主办讲演会。李大钊曾为研究会作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专题讲演。研究会还经常讨论国内外大事，关注实际斗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如举行过马克思诞辰一百零四周年纪念会、发表启事支援唐山三万工人的罢工斗争、举行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殉难四周年大会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造就早期共产主义者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共产党小组就是

①②④ 罗章龙，《亢斋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

③ 朱务善，《回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时期的社团》，第二册第264页。

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①

1920年4、5月间，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出代表魏金斯基、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来到北京，通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会见李大钊（张太雷任翻译、陪同谈话）。他们共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讨论了有关工人运动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会谈之后，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李大钊则在北京积极展开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并不断来信与李大钊商量建党事宜，李大钊派张国焘专程去上海与陈独秀具体磋商。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召开建党小组会议，参加者有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他们不久即退出）等，李大钊作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的意义及今后任务的报告，张国焘作了关于与陈独秀会谈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一致通过决定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李大钊为小组领导人。不久北京共产党小组通过决定改为支部，推举李大钊为支部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分管职工运动，罗章龙负责宣传，主编《劳动音》^②。

继魏金斯基之后，少共国际派代表格林来华。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亦宣告成立。当时党组织的成员李大钊等均参加了团组织，直接领导团的工作。到1921年3月底，团员已发展到五十五人。^③

此外，山东的早期共产主义者王烬美、邓恩铭，在李大钊影响下，于1919年11月成立“励新学会”，这个学会与北大马克思

① 建党前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情况不完全一致，如当时在上海，对外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内即为共产党小组，两者一回事。

参阅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② 参照王幼樵，《中国共产党北京第一个支部的创建》，《北京日报》1980年7月9日。

③ 罗章龙，《亢斋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回忆李大钊》。

学说研究会建立了联系，李大钊派陈为人来济南协助，1920年9月建立了山东共产党小组^①。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大致经历了从民主主义性质的社团到过渡性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再到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其中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动力是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加深和参加反帝反军阀政治斗争的实际锻炼，而在这两个方面，李大钊都是一位最有影响的引路人。

三、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取得的伟大成绩，也是促进这种结合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

早在1919年初，李大钊就针对唐山煤矿工人的状况，指出必须建立工人团体和劳动补习教育机关，以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改变牛马不如的境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他便把注意的重心转向工人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以长辛店为基地，在铁路工人中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组织工会，进一步加强建党的阶级基础。

长辛店是位于京汉路北段的一个大站，这里集中了三千多机车修理工人。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爱国青年，曾在这里组织“救国十人团”，发动工人参加抵制日货的游行和罢工^②。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后，根据“注重乡村和工场讲演”^③的方针，逐渐把讲演伸延到长辛店、丰台的工厂农村中，建立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最初联系。共产主义小

^① 周子信：《山东共产党小组》，《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② 何长工：《五四运动在长辛店》，作家出版社：《北方的红星》。

^③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6日。

组成立后，便在长辛店租了房子，建立起长期固定的据点，不断扩大了工作的范围。1920年11月7日，向工人进行通俗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劳动音》创刊。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把它作为自己的机关刊物，表明了对工人运动的重视。在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指出它的宗旨是：“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同时“又登载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劳动者》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工人实际运动的结合，指出：“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运动，结果只是空谈”^①。强调要使刊物成为“阶级战争的工具。”^②该刊还用大量篇幅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报导罢工消息，如在第1期上，以“矿局年利八倍于资本”、“几十分钟内死工人五六百”、“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的醒目标题，报导了1920年10月唐山煤矿瓦斯爆炸，工人死亡五六百人的重大事故。第5期上，又报导了南京万余机织工人捣毁省议会的情况，并针对这些事件发表评论，指出斗争的目标和方法。因此《劳动音》成为启发工人觉醒的教科书，受到长辛店等地工人的热烈欢迎，到1920年底每期销售已达二千多份。

举办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方式。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1920年12月，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出面筹办，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主持人是邓中夏，李大钊和小组其他成员也都曾来视察和讲课。这所学校的日班教工人子弟，夜班教工人，最初的工人学员只有史文彬、杨宝琨等二十几人。课本由教员编写，上课时把课文抄在黑板上，先教识字、再讲解内容。如宣传“劳工神圣”的道理

^① 《劳动运动的新生命》《劳动音》第1期。

^②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劳动音》第1期。

时，便指出作工最光荣，劳动最伟大这就叫“劳工神圣”。教员用通俗的事例说明当时社会的不合理，指出“只要大伙心齐、结结实实抱成团儿，什么事都能办到，就有法子不受压迫了。”他们还讲解了：“工人为什么要有政党”，“为什么要承认苏俄”，“为什么要组织工会。”^①学校的教学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如访问工人家庭，个别谈心或把革命道理编成话剧，歌词表演。这里还备有《劳动音》、《共产党》、《工人周刊》等进步刊物，辅导工人阅读。经过宣传教育，工人的觉悟迅速提高，他们“正在进行劳动团体的组织，预备和上海及各埠的劳动者——他们最亲爱的朋友——联络一致并进而与全世界的劳动者握手。”^②这样，劳动补习学校成为我党团结教育工人，组织产业工会的有效形式，在各地普遍被采用。

1921年的“五一”劳动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组织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有一千多工人参加，并有从市内和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而来的工人代表出席。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工会的成立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工人的口号是：“工会是最好的法子！”

“最合理的事情是每人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一小时！”

“我们的仇敌是不劳而食的人！”“劳动万岁！”“五一节万岁！”^③这次游行使李大钊在一年前所寄予的，要使五一节由三五文人“纸面上的笔墨运动”变为劳工阶级“街市上的群众运动”的期望成为现实^④。长辛店工会是在我党领导下最早成立的工会。《共产党》月刊称赞它“办会很有条理”，“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⑤

① 《长辛店工人发起劳动补习学校》《劳动界》第15期。

②③ 《北方的红星》第57—69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24页。

⑤ 《共产党》月刊第6期。

经过一年的辛勤工作，在长辛店工人中形成了一批骨干力量，其中史文彬、杨宝琨等被介绍入党，他们后来成为京汉线工人运动和“二七”罢工的领导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实行了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而走上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

长辛店工人运动在我党历史上开辟了新的一章，这就是首先觉悟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运动中，促进工人阶级走上自觉的团结斗争的道路，从而直接推动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长辛店工人运动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不久在京绥、京山、正太各线都掀起了罢工浪潮，为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准备了条件，同时在建党以后，使党的组织，得以沿京汉线向东西南北扩展，短期内遍及北方各省，也为第一次大革命和整个中国革命奠定了组织基础。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收入全国党史研究会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论文选辑》第4集）

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 党的早期组织

刘昌玉 任武雄 常美英 庄有为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大钊同志的领导下，经过五四运动的锤炼，在深入工农群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一

1916年初夏，李大钊从日本回国，痛感辛亥革命“流产胎殇”，决心继续寻找改造中国的途径。他利用国内外的报刊资料，研究俄国二月革命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状况，并针对当时国内政治、外交、文化以及人力车夫等问题进行了尖锐的评论。

1917年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很快地就认清了这个革命的性质。1918年7月，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就论述了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他希望中国人民翘首迎接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以适应世界的新潮流。同年11月，他又写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著名的论文。大钊同志的这些文章向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方向，代表着中国的先进分子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观察国家命运的开始，标志着他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

变的开始。

李大钊不仅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而且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并与王光祈等人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年底又与陈独秀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1919年1月协助全国学生救国会出版了《国民》月刊，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了《新潮》月刊。2月，李大钊又担任《晨报》的编辑工作。李大钊这一系列革命活动和宣传鼓动，对于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五四运动中，他高举反帝的旗帜，揭露了巴黎和会是帝国主义强盗分赃的本质，喊出了“打倒强盗世界”的口号。他曾和北大学生一起到北京城南游艺园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陈独秀被捕时，李大钊积极设法营救。各界进步人士和团体也纷纷致电北京反动当局，要求迅速释放陈独秀，迫使军阀政府在三个月左右就释放了陈。

1920年2月，李大钊设法送陈离开北京。他们扮作商人，带了账簿，套一辆骡车，大钊同志坐在外面，陈独秀坐在里面，悄悄地把陈独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①。途中，大钊同志和陈独秀“讨论了有关建党的问题”^②。陈独秀离开北京后，北京方面的工作全由李大钊负责了。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出现了许多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其中一个。最早参加的人有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和罗章龙等。起初，这个会的活动是秘密的。1921年11月17日，邓中夏、高尚德等19人在《北大日刊》上登载启事，说明办会的宗旨和方法，公开征求

①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集第341页。

② 《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页。

会员。参加者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

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集马列著作的各种文本、共产国际活动家的著作、各国党的宣传品以及介绍十月革命和苏联现状的书报；组织有一定外文水平的会员翻译了德文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著作；组织演讲会，邀请教授、学者如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国际工人运动作学术报告。1922年1至5月间，学会举办了德国共产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殉难四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等出席大会并作了报告。与此同时，学会还筹集资金购买了一批中文、英文、德文、俄文书籍，设立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取名“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室）。直到现在，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盖有“亢慕义斋”图章的图书。这个研究会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党的成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1920年5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组织了国际劳动节的纪念活动，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纪念会上发表演说，并在《新青年》上发表《“五一” MayDay 运动史》，受到了各界广泛的欢迎。北大学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进行宣传，促进了和工人的结合。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部分会员还参加了其他社团的活动。例如邓中夏担任《国民》杂志社的编辑和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总干事。高尚德担任该团的文牍干事。他们利用星期天组织讲演团团员到北京四城和街头去讲演。1920年3月27日，邓中夏和高尚德亲自召开农村讲演筹备会，拟订“乡村讲演办法”。4月初，春假期间，邓中夏又带领着讲演团员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向工农群众学习。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在工人群众中的宣传活动，使他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提高了觉悟水平，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迫切要求，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来到中国，通过北京大学一个俄籍教授鲍立维会见了李大钊^①。李大钊邀集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同他们开座谈会，诚恳地交换意见。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回忆：“魏金斯基是以第三国际使者身份来的，是有工作准备和明确目的的。他到北京找到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先生。李先生曾召集我们几个到图书馆去开会。魏金斯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些经验，同我们交谈了不止一次。他把苏联革命的情况告诉我们，还送给我们一些外文书刊。他鼓励我们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②在国际代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4月间，他介绍国际代表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8月，李大钊得到陈独秀给他的信，知道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10月，继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后，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也宣告成立。最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以及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年末，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数人退出小组，同时先后吸收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李骏、宋介等，小组成员十余人。。

从以上事实看来，北京小组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前夕至1920年春，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1920年初至9月，李大钊先后与

① 据彭述之回忆，在魏金斯基到中国前不久，1920年初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荷荷诺夫金先到中国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鲍立维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荷荷诺夫金提出了建党问题，随后李大钊就和陈独秀通信商讨。不久，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见《彭述之回忆录》第1卷，1983年4月巴黎出版。

② 《罗章龙先生访问记》，上海师范学院政教系《中共党史教学和科研参考资料》之五。

陈独秀、邓中夏等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党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阶段 1920 年 10 月，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立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仍然存在。前者具有政党性质，是研究会的核心力量，当时它是秘密的；因此它经常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后者是公开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人数较多。研究会的会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所以两者不能等同。

二

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十分重视马列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结合起来。首先，他们创办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接着，他们在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通过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

1920 年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北京小组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出版了。它的主要编辑之一是邓中夏。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第一期和第五期。第五期出版日期是 12 月 5 日。这个刊物的宗旨十分明确：是要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对这个宗旨作了通俗的说明：创办《劳动音》的目的是为了提倡神圣的劳动主义，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排斥那种不劳而食的寄生虫，以维持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因此出版《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同时“介绍世界的知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

又登载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这样就克服了过去一些人只空谈理论而不从事实的工人运动的缺点，从而把马列主义的传播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劳动音》反映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出版以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到12月，每期的销售量达二千多份。

北京小组的同志在向工人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在总结到长辛店向工人宣传和组织人力车工人、印刷工人开展活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当时北京工人的骨干力量是铁路工人。于是他们以京汉铁路北段的大站长辛店作为工运工作的据点，大力开展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长辛店是一个很大的乡镇，有三千工人。五四运动期间，工人就开始觉悟了。他们积极参加救国十人团，每十人一组，大家互相监督，谁也不买日货；他们对公共的事是很关心的，热情支持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学生去宣传。根据这些情况，北京小组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进一步帮助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组织工会开展工人运动作准备。由邓中夏、张国焘与史文彬等几个工人商谈后就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由北大学生会和平民教育讲演团捐了一些钱作为开办费。1920年12月19日，邓中夏、张太雷、张国焘等人到长辛店参加了劳动补习学校的正式筹备会，讨论了学校的简章及经费预算等。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了。

这个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子弟’而设。”^①为了办好这个

^① 《长辛店旅行一日记》，《晨报》1920年12月21日。

学校,李大钊和北京小组组织了广大革命学生参加这项工作,还派去了常驻教员。邓中夏、杨人杞每星期去。张昆弟、何孟雄、朱务善等都去过。特别是邓中夏同志,“他在长辛店工作时,非常艰苦耐劳,终日号召奔走,埋头苦干,作具体工作的是他,作宣传工作的也是他。每天他吃两顿窝窝头或几个烧饼,用凉水送下。工作忙时,常常蓬头垢面、不加修饰。晚间不能回北京时,则用几条板凳当床铺摆在学校课堂里睡眠。”^①

学校有近二十个工人来读书,没有适当的课本,靠教员自己编。上课时,教员把课文抄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抄下来。教员讲课深入浅出,边问边讲。例如教员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的道理时,教员先教工人识字,然后解释说:做工最光荣,劳动最伟大,这就叫“劳工神圣”。通过上课和实际斗争,工人群众逐步懂得,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教员和他们的关系也融洽了。工人不再把教员当成“长袍先生”,教员也常到工人家里去。朱务善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记得我在那里几次讲演,得到工人群众的欢迎,讲毕还有人团聚在周围发问题,我很乐意和他们接触,有时还被邀请到职工家里喝茶。经过不到一年时间,我介绍几个人入党,到‘二七’罢工时,他们都变成了罢工运动的领导人。”^②

1921年“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出了纪念专刊。在长辛店也组织了工人示威游行,参加者在千人以上。不久成立了长辛店工会,领导工人向工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党成立后,进一步领导工人使工会组织完备起来,并将工会更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入会者日益增多,“影响所及,自北而南,蔓延到各站。”^③其

①② 朱务善《星火燎原》,《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集第404、405页。

③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他地方工人羡慕向往，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各处纷纷派代表到长辛店参观，回去后也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实践证明，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通过劳动补习学校，为铁路工人运动培养了第一批骨干，为长辛店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同时它又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有效的形式之一。这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党的组织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

三

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不但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而且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1920年8月，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宣告成立。党组织的成员李大钊等均参加了团的组织。李大钊和郑振铎担任团的教育委员。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团的活动。团曾组织、帮助青年赴苏参观学习，为赴苏同志筹集旅费。1921年3月16日，召集特别会议，决定派何孟雄为代表，携带《北京青年团致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书》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少年共产党大会。何孟雄出发后在东北途中被捕，未去成，后由李大钊等营救出狱。到1921年3月底，团的组织发展到55人^①。李大钊还派人去天津建立团的组织，并通过这个组织，在天津、唐山等地的工人中开展革命工作。北京小组也派邓中夏、张国焘到唐山，找邓培研究如何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建立组织。

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作

^①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大会情形报告》1921年4月2日，《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70页。

了斗争。1920年冬至1921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又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论战”。李大钊尖锐地驳斥了梁启超、张东荪的各种反动论调。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虽不象欧美、日本有发达的产业经济，但中国劳动阶级遭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处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保护资本家的制度，“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所以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世界的资本主义经济压迫。他的文章肯定了社会主义方向，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和鼓舞。在这场斗争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何孟雄也撰文参加论战，发表了《发展中国的实业究竟要用甚么方法？》一文。《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还发表了李达、陈独秀、蔡和森、陈望道、李汉俊等人的文章，对张东荪等人的反动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在努力争取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1日，总会设在北京。南京、成都和巴黎等地设有分会，会员曾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是五四时期最大的社团之一。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但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会员的思想分化也日趋明显。共产主义者正在酝酿正式建立共产党。他们的言行表现出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一些国家主义派分子越来越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大多数中间派的会员则表现出动摇不定。因此，少年中国学会决定于1921年7月1日至3日在南京召开大会，中心议题是关于确定主义和应否参加政治活动两个问题。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高尚德、刘仁静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他们为了开好南京大会，同在京会友一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和准备。第一次会是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召开的。会上邓中夏提出，本学会虽然定有宗旨，会员中感到它太空泛了，拟选择一种主义来充实它。会上决定“先将各种主义精心研究，同时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讲演，以备吾人参考。”^①大约两个月左右，他们又在来今雨轩前面开谈话会。到会的有邓中夏、黄日葵、刘仁静等八人。由于李大钊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使北京的部分会员很感觉“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②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刘仁静等被推举为出席南京大会的代表。他们在南京大会上坚持和宣传了确定主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虽然国家主义派分子曾琦、李璜等人竭力反对学会规定主义，反对学会参加政治斗争、促使矛盾表面化，因而大会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但是，邓中夏等人鲜明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有事实有分析的主张，给人以深刻印象，扩大了影响。

（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
收入本书时经作者修订。）

^{①②}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345、346页。

月异岁新，与时俱进

——学习李大钊关于辛亥革命的论述

黄 真

七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度的国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在列强的侵略和反动军阀的统治下，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依然处于艰难困苦的境地。怎样才能找到中国的出路？这是革命者殚心竭力探讨的核心问题。当辛亥革命后不久，革命先驱李大钊就发表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奋斗。以后，当他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夕，也已对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状况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特别是概括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的贡献。现对李大钊同志从青年时代到他壮烈牺牲之时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依照历史的顺序和他本身思想的发展，试作初步的探讨。



七十年前，李大钊正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上学。他在牺牲前写的《狱中自述》里，曾追述自己当时学习法政，是由于痛感“国势陵夷”，因思“深研政理”，以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

策”。在这一时期，他经历了辛亥革命。当革命后不久，他以亲历的见闻，和对全国情况的了解，针对中国历史上这一次民主革命的创举所引来的经验教训，及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国家的前途怀抱深沉的忧虑，为中国人民所处的境遇发出沉痛的呼声，迫切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1915年他写的“自传”^①里，曾描述辛亥革命前后自己的学习生活：“第二年（按：指1905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儿我度过两载光阴。然后我到天津进入北洋法政学校，有六年的时间，深入调查研究了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毕业后，我的同学们约我到北京同他们一起办报几个月。”

我们从这段简短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七十多年前“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背景，和一个在成长中的少年对科学的探求。这里所说的对政治经济学的调查研究，是指阅读当时严复译的《原富》和戊戌变法以来刊行的一些“新学”书籍，以及对社会经济情况的了解。

1910年11月，他参加了天津学界为要求清朝政府召开国会而举行的罢课活动。这次罢课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促使了进步的师生更为了解到清政府的欺骗手段！进一步开展了革命运动。李大钊的老师、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史地教员白亚雨，是同盟会在北方开展革命运动的骨干，于1911年秋到李大钊家乡附近的滦州一带，在准备参加清廷筹办的永平秋操演习的一部分新军中进行联络工作，为在清朝反动统治心脏地带的北方举行起义做准备。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霹雳一声”，“举国震动”，惶恐万分的

① 李大钊《我的自传》为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在英语班上交的作文，当时在该校教英语的美国人A. U. Robinson曾抄存。译文载《革命文物》1980年第3期。

清朝廷，“风闻秋操新军革命之计，因是愈恐”^①，下令停止举行永平秋操演习。年底，坚持在敌人统治心脏地带进行革命斗争的白亚雨，到滦州与驻守当地的新军第二十镇七十九协一营管带王金铭，二营管带施从云联络，于1912年1月2日至6日发动武装起义。白亚雨、王金铭、施从云和士兵数百人，均在起义中壮烈牺牲。在李大钊以后写的文章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他对辛亥滦州起义的描述，和对在革命中贡献出生命的烈士们的深刻悼念。如在《旅行日记》^②中，他写道：“过雷庄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军失败之地，白亚雨先生，王金铭、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士，均于此地就义焉。”“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关于北洋法政学校当时的进步青年的活动情况，大体上是从接受戊戌变法以来维新思想的影响，到进行请开国会要求立宪的运动，以至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投入革命运动之中。李大钊以后曾追记：“清季天津学生之与于请开国会运动、革命运动者以斯校徒为最激烈。卒以是为官僚所嫉视，屡谋所以破坏而未遂。武昌起义时，袁世凯由河南向武汉出发之前，即电天津总督谓宜注意防范斯校，其生徒精神之活泼有如此者。”^③

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就是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统治下，丝毫也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应得的幸福。年轻的李大钊，在革命后，就写下了《隐忧篇》，第二年又写了《大哀篇》。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李大钊的遗文，这两篇是最早的，表达了当辛亥革命后初期他的政治见解，对社会状况的分析，和深切地关怀劳动人民生活的思想。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339页。

② 1917年5月9—11日《甲寅》日刊。

③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1917年6月25日《甲寅》日刊。并参见刘瑛：《李大钊同志的一篇佚文》的说明，《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

他的《隐忧篇》，写于1912年6月^①。在这篇论文中他指出：新的共和制度的国家建立后，本应“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但是当前就有“边患”、“兵忧”、“财困”、“食艰”、“业敝”、“才难”等种种“隐忧潜伏”，“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彫厥”，并面临着“外敌伺隙”、“立召瓜分”的危险，而各政党之间相互倾轧，各省掌权的都督谋营私利，社会秩序颇为动荡，以致“迟迟数月”，如“敝舟深泛溟洋”，“固犹在惶恐滩中”。

从《隐忧篇》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对新建立的共和国的期望和担忧，而在《大哀篇》中，他则抒发了愤慨的失望心情，非常同情于劳动人民的痛苦遭遇。他满怀义愤地指出：“仁人义士”，“相率犇驰，昭揭真理之帜，以号召俦类，言之者瘠口哢音，行之者断头绝脰，掷无数之头颅、骸骨、心思、脑血，夙兴夜寐”，而得来“今日之所谓共和”，究竟是何样的状况？只见“骄横豪暴之流”，“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把自己装扮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他沉痛地说道：“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②

他鄙弃当时官僚、政客们组织的政党，责问“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购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这些人假称为百姓的代表，“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在这些政党中，“踞要津享大名者”，“充其极不过一总统，一都督”，否则就是“两袖清风之空衔伟人”，而“安得此矩金”？他庄重地告诉人们：“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

① 发表于1913年6月1日，《官治》月刊第1年第3期。

② 《李大钊选集》第1页。

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尖锐地指明在封建皇帝被推翻后，代替的是在“共和”名义下的反动军阀统治。他抱着对劳动人民惨痛生活的巨大关怀，深切地指出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菑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他探讨在共和制度的国家成立后造成这样状况的原因，是由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狴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狴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他认为这并非共和制度的国家“自身之咎”，期待能够建立人民“自主之政”，“自得之权”，达到幸福归于人民^①。

当《隐忧篇》、《大哀篇》等文发表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向帝国主义的五国银行团借款，以及谋杀国民党人宋教仁的案件上，更加暴露了反动的丑恶面目。李大钊在《暗杀与群德》^②一文中指出：“群有巨愆而容之”，是宋教仁遭暗杀的原因，点出袁世凯是这一暗杀事件的主谋。在《民权之旁落》^③中，他提出：“黎庶之患，不患于无护权之政制，患在无享权之能力；不患无为之争权者，患在为之争权者，转而为窃权之人”。在发表《隐忧篇》的按语中，他写道：“宋案发生，借款事起，南北几兴兵戎，生民险遭涂炭”，“环顾神州，危机万状”！还在青年求学时代的李大钊，对当时我国的政治社会状况已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对国际国内问题的敏锐的观察和探讨，而李大钊的特点，更是深刻地考虑了劳动人民的处境。

在辛亥革命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恳切地关怀和同情劳动人民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页。

②③ 1913年5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2期。

境遇的李大钊，对列强支持下的反动军阀统治做了尖锐的揭露，并沉痛地悼念为革命牺牲了生命的先烈。他满怀为国家为人民的心胸，迫切地探寻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二

李大钊于1913年冬赴日本留学，1914年考入早稻田大学，至1916年5月回国。他是我国留日学生中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反对国内袁世凯称帝的骨干，曾代表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阐论当时的国际形势，指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我国的野心，呼吁全国同胞奋起反抗；并在袁世凯变共和为帝制的一年以前，就写下了《风俗》、《国情》等文，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严防窃国大盗的讯号，对辛亥革命后我国的状况做了深刻的揭露和分析。在《风俗》^①中，他严正地指斥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写道：

“今以观于朝，执政之人，则如何者，政如疾风，民如秋草。施其暴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逞其杀也，盈廷皆争权攘利之桀，承颜尽寡廉鲜耻之客，钩心斗角，诈变诡譎”。他认为要发扬群力，使“群枢潜树于野，风俗默成于学”则“元恶大憝，必不敢披昌于吾群矣”。在《国情》中，他指出：“风云变色，五采旗翻，曾几何时？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共和政府之真义，尚未就湮”，而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却“谓国家即帝国其质，元首即终身其任”，其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则先已倡“总统内阁制”之说，如此“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②他根据自己所能掌握到的中外报刊资料，和对国内实际情况的了解，对外国侵略者支持下的袁世凯反动政府，做了尖锐的揭露，深切地

^① 1914年6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② 见《李大钊选集》第4—6页。

指明先烈们掷头颅、洒热血而造成的“共和”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发出了保卫中华民族生存的爱国正义的号召，满怀义愤地呼吁全国同胞们“挽狂澜于既倒”，以“吾民之意志”创造光明的前途！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护国军起义，讨伐破坏辛亥革命建立起来的共和制度而妄自称帝的袁世凯。不久，李大钊代表留日学生于春节期间暂返祖国到上海两周，联系反袁活动。1916年3月下旬，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李大钊“远从瀛岛，返顾祖邦”，及时地撰写了长篇论文《民彝与政治》、《青春》，对祖国的未来寄予了深厚的期望。

他为留日学生总会办的刊物《民彝》，于五月创刊，发表他撰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其中着重对国内辛亥以来的政治状况做了分析，对国家的前途进行了探讨。他阐论了“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的思想，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并严正指斥那些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之徒”，和策划清朝皇帝再度登极的“复辟之辈”，都是“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他认为“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但若是不行，起而代之者，“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而“决非退于专制政治”^①。

1916年5月间，他未等到学业结束，就离开日本返回祖国到上海，投入国内的反袁运动。不久，他到北京，于8月15日创刊《晨钟报》曾担任的主编。他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指出：“吾国最近革命运动，亦能举清朝三百年来之历史而推翻之”；但是，“袁氏逆命，谋危共和，未逾数月，义师勃兴，南天震动，而一世之奸雄，竟为护国义军穷迫以死”。他怀着推翻袁世凯反动统治后的兴奋心情，把创造“青春中华”做为革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56页。

命的理想，认为“今虽不敢遽断改革之业，为告厥成功”，而“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①。

他在归国前写的论文《青春》，发表于9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1号。他指出：“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濒洞，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阻碍着人们创造“青春之国家”、“青春之历史”的，一是过去“历史之桎梏”，一是“现代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他告诉青年们：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涤荡历史之积秽”，挣脱“僵尸枯骨”与现代“虚伪之机械生活”的束缚，摒弃营营扰扰追求“黄金”、“权势”的利禄之途，而“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求得中华民族的新生^②。

九月初，他辞去《晨钟报》的职务。1917年初，他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特别是对“欧洲各国社会党的平和运动”做了探讨，着重研究了列宁领导的俄国二月革命；并曾论及俄国革命与中国辛亥以来革命斗争的相互影响，认为“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③。

他深入研究新旧事物的矛盾，写了《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④，其中分析了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矛盾，并论述自辛亥革命以来，在矛盾生活中为人民增加的负担。他写道：“辛亥之役，武汉一呼，天惊石破，南部义师，北方将士，均以共和立宪要挟清廷，逊位之诏朝颁，统一之业夕就。其间使节轺车，南至沪渎，议和电报，各处交驰，结果以优待条文载在盟府。于是

① 《李大钊选集》第62页。

② 同上，第70—75页。

③ 同上，第82页。

④ 1917年1月10日《宪法公言》第9期。

一方则负皇室经费，一方则增公府经费、元首岁俸”，因此，“蚩蚩者氓”，“不知不识之间，又增一种之二重负担”！他期望我国人民以“奋斗之精神”，解除“二重生活负担”，使新生活新文明胜旧生活旧文明，打破“矛盾生活”！

这时，他对于未来的“新生活”，向往着较民主主义更为前进的“新形式”。在分析了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德等国的情况后，他指出：“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蜕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①

7月上旬，在北京发生反动军阀张勋拥戴清朝皇帝复辟的事变。李大钊离开北京赴上海。在纪念辛亥革命六周年的日子里，李大钊“淹滞沪滨”，“百感交集”，写了《此日》一文，抒发自己对中国前途的期望和对当时政治状况的“伤心之语”。他又曾撰写长篇论文《辟伪调和》，阐述社会生活的矛盾，并着重对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分析。

在《此日》这篇纪念辛亥革命六周年的文章中，李大钊深切地哀悼为革命牺牲的先烈们。他痛感：“黄花岗畔，汉水潮中”，“先烈之殉共和以死者，固不知其几千万辈”，而此日“招魂望祭”，“独不闻于殉国先烈之丘墓、遗族有所瞻顾”，只见争权攘利之辈，甚至违抗共和的“洪宪帝孽”，却“咸膺上赏”！他认为生于这“嫉贤妒能之社会”中，固堪为“风俗人心之坏”而痛哭，但应理解：“新命之诞生，新运之创造，必经一番苦痛为之代价”。他举“历八年之血战”而独立的美国，经“数十年之血以灌溉之”而诞育的法兰西“自由之花”，和“最近不惮高树赤旗”的俄国为例，告诉中国人民：我们以“老大衰朽之邦，风烛残年”，“所当尽之努力，所当忍之苦痛”，更须“百倍于美、法、俄诸国之民”，

^① 《自由与胜利》，1917年5月21日《甲寅》日刊第111号。

才能有“新中华之诞育”，应以“过去之此日为纪念”、“为陈迹”，以“未来之此日为理想”、“为前程”，“月异岁新，与时俱进！”^①

在这期间，他撰写了长篇论文《辟伪调和》^②，阐述社会生活的矛盾，并着重对我国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宇宙万象，成于对抗，又因对抗，而有流转。由是新陈代谢，推嬗以至于无穷”，而政治上也在于“解决此蜕演不断之新旧问题”。他对辛亥革命以来的“急进派”（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缓进派”（即资产阶级改良派）做了分析，认为：“辛亥革命，既告成功，急进派乘方兴之势，得以拓足国中，其实植基未厚，立足未安”，以“急进派”与“旧势力”相衡，离“得半之位”犹甚远，若将所谓“特殊势力”者完全推翻，“不惟未有是心，实亦绝无此力”。而“缓进派”则趋承缘附“袁氏之势力”，

“倚为抗制急进派之资”；他们这些“政客之运动”，“论士之言谈”，都是“注重于拥护强力排斥激进之一途”。在这种舆论鼓吹下，“未几而袁氏以兵力铲除民党矣。未几而袁氏以武力劫夺总统，随即解散国会矣。而癸丑之局以成。”又未几而“约法废毁、参议院成矣”；“而神武建号洪宪改元矣”，“帝制之祸以起”。在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称帝的情况下，“急进派”固然是“既归失败”，而“缓进派”竟“亦遭屏绝”，于是“缓进派诸公乃翻然变计”，一反过去所为，“护国军兴，或者驰入军府，躬参密勿，或者洁身海上，遥为声援”，在“倒袁之役”中他们的功劳“亦不可没”。但是，“梟獍甫就天诛”，“政争又复风涌”，“缓进派”夙抱“开明专制与贤人政治”之梦想，“一再犯援引特殊势力之嫌”，而“急进派”也并无“破坏旧势力”之力。“民国以还，政争迭起之

^①《李大钊选集》第90—92页。

^②1917年8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号。

真因，穷本溯源，固在新旧思想之冲突，官僚与非官僚之暗斗”。这时他对辛亥革命以来政争原因的分析，还处于他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前夕，还未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深入剖析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阶级实质。但是，他已经以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缓进派”也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做了较深刻的批判，对“急进派”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没有寄予根本的期望，而把“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寄托于全国人民“所不容委之努力”。

这时，卓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已是在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朴素的辩证法来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他从辛亥革命初期的“隐忧”、“大哀”到经历了两次严重的共和与复辟的斗争，他的思想已由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怀，进展到必须依靠“众庶”，也就是人民群众，一同“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索我理想之中华”。他期望着要为中国人民找到一条不但能冲决过去几千年来封建“历史之网罗”，而也足以摆脱现代资本主义“黄金与权势之重荷”的道路。他对国际国内状况的了解，特别是对我国辛亥革命以来经验教训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各国社会党状况的研究，使他不久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很快地为中国人民寻求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同志最早在我国播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种子，正是与他不断深入分析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紧密相连在一起的。

三

1917年11月，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胜利后，李大钊在研究俄国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惊天动地的事业，并继续分析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的国际国

内形势。1918年下半年，他于7月1日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并于11月底在北京大学举办的讲演大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随后写下了长篇论文《Bolshevism的胜利》，阐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意义，剖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指引中国人民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前进。他对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状况的研究，也由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观点，进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分析，从而对我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紧密结合，为我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巨大的努力。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对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状况进行了明确的分析，特别是对建立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有着突出的贡献。当中共中央确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后，他于1922年8月下旬与孙中山多次商谈，首先以个人身份由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为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奠基基础的作用。1924年1月，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以个人身份同时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发言，并印发“意见书”，明确指出：“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并严正地声明：“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动”^①，是要为国民革命运动有所贡献而来的。

1924年夏，他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7月1日的讲话中阐明：“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需要发起一个由集中的党所领导的民族革命

^① 引文据中国革命博物馆存《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运动，这个党须能联合一切群众的行动。”“我们参加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我们在国民党中间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①

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建立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活动，坚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我国革命的领导，尽力扩大和加强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当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写了上下联各一〇七字的长联^②，历述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我国近代革命历史上的作用，阐论工农群众的力量。上联从“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提起，阐论孙中山生于斯乡，继承了太平天国的传统，“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为要“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在“人间留正气”。下联先叙我国受侵略和压迫的处境，指出：“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夺，经济侵陵，甚至共管阴谋，急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在此时“建国山斗”孙中山与世长辞，“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答复是“亿兆有众，惟工与农”，他们会“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这幅我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幅挽联，极为沉痛地哀悼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并非常明确地表达能够完成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是觉醒了的工农大众。

第二年，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时，他又写下了《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详细阐明，自“一八四〇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洗净“那

①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年版。译文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② 《李大钊诗文选集》第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整理了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有仇洋采色的下层结社”，揭破清朝“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从而“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于立宪运动的民众”，“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然后，他又把改组后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明确地指出：孙中山“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因而使中国国民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很密切地联结起来^①。他的文章，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我国民族革命历史上的作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两年以后，由于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促使国民党所发生的变化，做了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结合亲身参加的实践，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提出科学的见解，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着指导的作用。

随后，他又撰写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等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着重阐论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的前身，便是太平失败后继续中国革命系统的团体。”当“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的压迫”日益增加，“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有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屠杀，就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对于压迫的回答，只有反抗”。他把中国革命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起来观察，提出：“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他还着重研究了我国的土地问题，指出“实远承累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7—538页。

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因而有“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诸实行”；民主革命的“耕地农有”的任务，完全“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①。

他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瘁精瘁力以赴之”，“虽刀锯在前，鼎镬在后，有所不顾”，直至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牺牲了生命，为革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当1927年4月他遭反动军阀逮捕后，在所写的《狱中自述》^②中，完全严守共产党的机密，只字不提；一共写了三千多字，完全以坚定的革命原则并结合巧妙的斗争策略，义正词严地讲述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张，阐论为“民族独立自由之统一大业”、“将国命民生进致于安康”而奋斗，把这一篇在敌人监狱中写的“自述”，作为继续宣传国民革命运动的宣言书。他严正地声称：“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概括地叙述了自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和以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经过。他论述自己“与孙中山先生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他指出：“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必将陷于无挽救之境界矣。”他的这篇正气磅礴大义凛然的临终前的“自述”，充满了革命者无所畏惧和鼓舞后人为求得民族解放而继续奋勇前进的巨大力量；对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情况，特别是二十年代中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最初商谈，从而建立以

① 《李大钊选集》第525页，553—555页，562—563页。

② 中国革命博物馆所存李大钊写的《狱中自述》共有三次稿，基本精神一致，以下引文据第二、三稿。

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先烈李大钊的革命斗争实践，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理论，是我国革命的宝贵财产，是革命史上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丰碑。

辛亥革命前后，当李大钊的求学时期，他“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辛亥革命以后，他不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当他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已经运用朴素的辩证观点，对辛亥革命以来我国的社会政治状况，作出了卓越的分析，在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开始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在党成立后深入开展工人、学生、农民、妇女运动，特别是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作出非常宝贵的贡献。我们从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和以后对辛亥革命的论述，也可看到他的革命思想的重要发展和在我国革命中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他永远站在时代的前列，和劳动群众心连心，具有远见卓识，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心全意地为中国的人民大众殫心竭虑，奔走操劳。他的一生，“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他的十几年来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述，是他以卓越的见解促进革命运动发展的明证，是他留给我们的极其丰富的革命遗产中的一部分，是我们学习我国革命历史的非常重要的文献。

当此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时候，为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继承先烈们的遗志，我们当切记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1917年纪念辛亥革命六周年时写下的格言：“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

郝维民 其其格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杰出领导者之一。他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领导中国早期的革命运动方面建树了伟大功勋，而且为党的民族工作，尤其是为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我们在这里所写的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并不只限李大钊个人的革命活动，而且也包括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党组织，以及邓中夏、赵世炎、黄日葵等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实践活动及其功绩。

李大钊等领导内蒙古革命的经验是极其丰富的，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值得认真总结的。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具体地指导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为内蒙古革命的胜利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内蒙古革命运动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就是内蒙古民族问题。李大钊等同志在开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时，首先是从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问题入手的。

内蒙古地处祖国的北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从久远的古代起，我国北方许多游牧民族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这块土地上，

创造了他们各自的文明历史，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泽。自从蒙古民族以震撼世界的气魄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祖国北疆的这块广袤土地便以蒙古草原著称于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蒙古草原曾有过光彩夺目的锦绣时代，但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争夺割据和无休止的民族战争的破坏，也曾给蒙古草原带来过无穷的灾祸。近百年来，内蒙古地区更成了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俄日帝国主义窥视的目标；也成了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北洋军阀大汉族主义蹂躏的对象。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还有少数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特权统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的牢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蒙古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脖子上还套上了一副沉重的民族压迫的枷锁，使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沉沦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深渊之中。这就是内蒙古革命和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由来和实质。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人民为冲破阶级压迫的牢笼，为砸碎民族压迫的枷锁，曾进行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有了希望，内蒙古的民族解放也有了希望。党成立以后，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国内少数民族的解放事业列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积极领导了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1922年7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二大”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时，从当时的认识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及民族问题作了初步分析，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在历史上不仅是少数民族久远聚居的区域，而且在经济上与中国本部各省不同；因为中国本部的经济生活，已由小农业、手工业渐进于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幼稚时代，而蒙古、西藏、新疆等处则还处在

游牧的原始状态之中，以这些不同的经济生活的异种民族，而强其统一于中国本部还不能统一的武人政治之下，结果只有扩大军阀的地盘，阻碍蒙古等民族自决自治的进步，并且于本部人民没有丝毫利益。所以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首先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因尊重边疆人民的自治，促成蒙、藏、维吾尔各民族地区联合到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来，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这是刚刚诞生一周年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平等原则和民族自决自治的权利，针对外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的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状况，参照当时俄罗斯联邦解决他们国内民族问题的方式，提出了解决我国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它虽然和我们党在以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经过调查研究，反复实践，逐步形成的适合我国实际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有所不同，但它旗帜鲜明地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决自治的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在当时，对于发动和鼓舞我国被压迫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方地区党组织，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二大”的民族纲领，认真研究国内民族问题。1923年1月，李大钊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许多重大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①他还极力主

① 《李大钊选集》第415页。

张各民族应该一律平等，实行各民族的平等联合，他说：“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①他坚决反对民族压迫，他说：“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②，“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③。李大钊还指出：“以欧战的结果，和中国的政情来看，凡是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论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④

“倘有悍然自大，不顾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的，那么他的扩大，即是别人的削小，他的伸张，即是别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别人的衰弱，他的增长，即是别人的消亡。一方的幸运，即是他方的灾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祸患。那扩大、伸张、雄强、增长、获幸运、蒙福利的一方，固然得了，然而在那削小、屈辱、衰弱、消灭、罹灾殃、受祸患的一方，其无限的烦冤、无限的痛苦，遏郁日久，亦必迸发而谋所以报复与抵抗。”^⑤固然，这些论述不完全是民族问题，但是可以看出民族问题也是他议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深刻地揭示了民族问题的实质，他所抨击的大某某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当然就是抨击大民族主义。他这些揭示社会现象的思想理论，对于人们观察民族问题，揭露民族压迫，唤醒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是何等重要呵！

李大钊等为了领导内蒙古地区的革命斗争，还深入调查研究

① 《李大钊选集》第 416 页。

② 同上，第 417 页。

③ 同上，第 427 页。

④ 同上，第 421 页。

⑤ 同上，第 422 页。

了内蒙古民族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蓬勃兴起，革命思潮广泛传播的形势下，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青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开始了各式各样的探索。1923年秋天，有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学生，从大青山下的土默川奔赴北京城，为民族的兴旺寻求知识，为民族的解放探索真理。同时，内蒙古其他盟旗也有一部分蒙古族青年来到北京。他们大都入了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开办的蒙藏学校，于是蒙藏学校就成了蒙古族青年比较集中的地方。李大钊等对于这批满怀民族忧虑而离乡背井，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奔走呼号的蒙古族青年，给以极大的重视。1923年秋天，李大钊派邓中夏、朱务善等到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中开展工作。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调查研究内蒙古民族问题。他们先是和这些蒙古族青年促膝谈心交朋友，谈学习谈生活，也谈及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进一步就讨论蒙古民族的解放，讨论中国革命。他们概略地讲述帝国主义侵略内蒙古，北洋军阀压迫蒙古民族的事实，以极大的同情心关注蒙古民族的解放事业。朴素可亲的语调，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特别是联系到蒙古民族的解放，使这些青年学生思想豁然开朗，他们也滔滔不绝地讲起内蒙古的历史与现状，诉说起蒙古民族的苦难情景。他们讲述帝国主义怎样把侵略魔爪伸到内蒙古，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他们揭露北洋军阀在内蒙古强垦牧场、掠夺土地，把蒙古族人民赶向死亡的边沿。他们还揭露蒙古王公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勾结起来，盗卖内蒙古土地的罪行。如安福系蒙古族议员张文、李芳伙同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把东蒙十五旗土地盗卖给日本人，是蒙古族青年学生疾首痛心的一件事。至于旅蒙奸商对蒙古族人民的敲榨勒索，高利盘剥更是比比皆是的事实。一个烟嘴换走一只羊，一盒火柴也要换上一张羔皮，一双马靴更要换一头牛或一匹马，把砖茶锯成二、四、八等分小块，代替货币分别换取牧民的各种畜产品。春来赊账，账是由奸

商记的，秋后结算，算也是奸商说了算。就这样，牧民们一年的收获除了交纳官差赋税外，剩下的一点也要被旅蒙奸商榨干。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唤醒了这些蒙古族青年，民族压迫的活生生的事实加深了李大钊等同志对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了解。

1925年3月，李大钊发表了《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一文。他深刻地分析了蒙古民族遭受民族压迫的历史与现状，明确地指出了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他首先揭露清王朝“外既不能抵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中国，内复以种种手段防制境内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其对蒙古民族，纯用藩属政策，以笼络其王公及喇嘛，沦蒙古民族于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帝国主义、蒙古王公的封建制度、喇嘛教的愚民剥削四重压迫之下，而未由解脱。”^①他指出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由于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继承清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于是蒙古民族，仍不免受与前日相同的压迫，或且更甚。”^②李大钊同志热情地赞扬了外蒙古革命的胜利；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领导的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他援引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国际平等，国家独立”^③的主张，宣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布的“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④的政策。李大钊指出“中华民国与蒙古民族结合，即以此数语为枢纽。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即以此数语为汇归。”^⑤他强调蒙汉两民族要实现自由联合，团结斗争，“两民族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提携共进”^⑥，“严密的监视顽暴军阀之以旧日藩属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以防诱起国内民族间的

①②③④⑤⑥ 李大钊：《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北京《晨报》1925年3月。

嫌怨与纠纷，而为虎视于旁的帝国主义者所利用。”^①

李大钊在民族问题上的思想理论，及其在革命实践中对待国内民族问题的立场，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在深刻分析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具体分析蒙古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蒙古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事实表明，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党最早关心民族问题，尤其是关心蒙古民族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二)

李大钊等在研究内蒙古民族问题的同时，为了开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工作，把培养干部，尤其是培养民族干部放到了首要地位。从1923年冬天开始，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邓中夏、赵世炎、黄日葵、李渤海、韩麟符、朱务善、刘伯庄等，先后到蒙藏学校向在这里的一批蒙古族青年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十月革命和外蒙古革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吉雅泰回忆：“正当我们在为自己民族的苦难焦虑的时候，1923年冬天，中国共产党象冬天的太阳一样照到了冰冻的蒙藏学校，党向我们伸出了温暖的手，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我们这一批内蒙古的民族青年，就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区）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领导者李大钊同志亲自培养和教导下成长起来了。”^② 邓中夏等还向其中一部分先进分子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讲解党的民族问题纲领。革命刊物《响导》、《新青年》、《政治生活》等也在这些先进青年中传播开来。

① 李大钊：《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北京《晨报》1925年8月。

②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这年冬天放寒假以后，云泽（即乌兰夫）、奎璧、赵诚、春和（即高博泽布）、佛鼎、康根成、常瑞、康济民、张士祥等数十人，因为没有路费回不了家，只好留校度假。李大钊等同志便组织他们到北京师范大学乐群补习班补习功课，还经常和他们一起围着寝室里的大炉子议论时局，探讨青年们的前途，而更多地还是讨论蒙古民族的解放问题。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寒假，就在这个寒假期间，云泽、奎璧、赵诚、春和、佛鼎、康根成等，由李渤海、韩麟符等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可以说，这是内蒙古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重大起点。

1924年春天开学以后，又有多松年、李裕智、吉雅泰、云润、孟纯、任殿邦、云霖等许多人相继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各种政治派别都很重视蒙藏学校，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到蒙藏学校宣扬它们的主张，争夺这些青年。什么江亢虎、吴稚晖等都去蒙藏学校发表演说，兜售他们的主义。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李大钊同志为了最大限度地把这批蒙古族青年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几乎每天都要派人到蒙藏学校活动。有时找这些青年个别谈心，有时几个人座谈议论，有时在东大寝室举办讲演会。佛鼎回忆：1924年上半年的一天傍晚，邓中夏把多松年、赵诚、佛鼎三个人叫到宣武门内的一座破庙里，参加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除了他们三个人以外，还有其他学校的五个青年。他们围着一张小方桌，在一盏小油灯下学习《共产党宣言》。吉雅泰也说：

“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局的其他党的负责同志，如邓中夏、赵世炎等，他们都异常重视和关心蒙藏学校的工作，并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这里的工作。他常常亲自跑来向我们讲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向我们说明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原因和背景，并指出蒙古族人民要推翻军阀、王公两座大山就要团结各族人民，因为军阀不仅汉族有，蒙古族也有……这些道理现在听起

来非常浅显，然而在当时给我们是多大的启发和鼓舞呀！”^①

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由于党的精心培养，这批蒙古族革命青年迅速地成长起来。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多松年、李裕智、云泽、吉雅泰、奎璧、赵诚、孟纯、佛鼎、云润等不少人相继转为中共党员；又有不少人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另外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的白海风，吴文献等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也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的东大寝室是个五间大的学生宿舍，住着近四十名学生，除了两名贵族家庭出身的学生外，绝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蒙古民族的革命力量逐渐壮大。

为了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锻炼这些年轻的蒙古族革命者，李大钊等经常组织他们参加北京的革命活动。他们参加过北京党组织举办的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大会，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以及李大钊赴苏回国后的报告会。纪念列宁逝世一周年大会是在北京大学三院礼堂举行的，蒙藏学校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大都参加了这次会，有的还参加维持大会秩序的工作。李大钊在会上发表演说，介绍列宁的生平事迹，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成就，使这些青年们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社会主义苏联国内的情况。吉雅泰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李大钊）去苏联参加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后回来的一次报告。那一次是在北京大学三院的礼堂举行的，我们蒙藏学校的几十个党员都参加了。这一天，李大钊同志还是那样简朴地穿着一件灰色粗布棉袍，浓眉浓髭，一头浓密而乌黑的头发，戴一副无边的眼镜，精神奕奕地向我们报告了苏联击败外国武装干涉后进行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当他谈到苏联如何逐步实现民族平等解放民族问题时，特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和兴趣，差不多一字一句都紧扣着我的心……这次报告会给我政治思想上很大的帮助和启发，从此，我逐渐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联系；懂得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联系和一致性，并坚信内蒙古民族的真正出路和彻底解放就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蒙藏学校这批蒙古族学生是当时北京革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召开国民会议运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要求关税自主运动中，他们不仅踊跃参加，而且有的担任北京学生运动副总领队，参加组织活动。孟纯同志就是当时北京学联的常委。1925年3月，奎璧、吉雅泰、赵诚、春和等以“缓远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参加了孙中山、李大钊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这些蒙古族青年学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5年初，蒙藏院竟决定取消蒙藏学校的官费，并派王维翰充任校长，镇压学生运动。于是大部分家庭贫困的学生马上面临着失学的危机。李大钊等北方区委的领导同志，识破了反动当局企图通过取消官费来扼杀这批革命力量的阴谋，立即发动学生开展反对取消官费和驱逐反动校长的斗争。学生们包围了蒙藏院，把蒙藏院总裁贡桑诺尔布吓得从后门溜走了。在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赶跑了王维翰、金永昌这两个反动校长。但是官费仍然不予恢复。党组织为了保护和继续培养这批蒙古族革命青年，经过与各方面联系，决定分批分期送他们到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广东等地学习。1924年，曾选送荣耀先、白海风、王瑞甫等蒙族青年到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上半年，先后派奎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璧、赵诚、佛鼎等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大学学习，同年冬，又选送云泽、多松年、云润、康根诚、荣照等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5年底和1926年初，陆续选送贾力更、春和、赵文翰、任殿邦、李春荣、麟祥、云继珍（以后叛变）等七名蒙古族青年，王建功、郭宝安、左天顺、郭宝山、马德照等十名汉族青年，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学习；还选送云继先、云星槎、荣崇仁、荣尚义（即勇夫）、云继章、朱实夫等数十名蒙古族青年到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另外又选派吉雅泰、李裕智等回内蒙古开辟工作。

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培养下，内蒙古当地的革命干部，特别是蒙古民族干部成批地成长起来，加入了中国和世界革命的行列，为内蒙古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干部条件。

（三）

李大钊等一面培养干部，一面积极创建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尤其重视在蒙古族中建立党的组织，以形成党的领导核心。

李大钊同志和中共北京地委，在蒙藏学校发展了一批蒙古族团员以后，于1924年初首先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多松年、云泽先后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下半年，在发展了一批党员以后就建立了党支部。据彭建华回忆，1924年末1925年初，赵世炎任北京地委书记，刘伯庄任团地委书记时，曾大力发展党组织，在各学校都建立党支部，决定由团地委将团员中表现好的，分别吸收入党。^①“那时，蒙藏学校的党组织，经常举行党的会议，李大钊同志和北方局（区）的其他领导同志们也常常来参加会议，他们在会上经常作时事报告”。^②在李大钊等亲切关怀和

^① 彭建华：《中共北方区委与内蒙古地区党的活动》（1980年12月21日访问录）。

^②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教育下，蒙古族中的第一批共产党人健康地成长起来，蒙古族中的党团组织也建立起来。蒙藏学校的党团组织，团结该校大部分青年学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成为北京地区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基层组织。

如前所述，李大钊等很早就关心内蒙古的革命事业。大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久，北京党组织相继派张昆弟、何孟雄、邓中夏、陈为人、王仲一等在京绥铁路开展职工运动，并注意调查了解内蒙古的情况。1925年，在张家口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支部，王仲一任支部书记。同年下半年，李大钊同志即派肖三、江浩等到张家口组建了中共张家口地委，肖三任地委书记，江浩是宣传委员，王仲一是组织委员。中共张家口地委领导的地区包括当时的热河、察哈尔和绥远三个特别区。1926年初，因为冯玉祥部下的一个军官排挤肖三，于是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调回肖三等，又派丁之之等重新组织了中共张家口地委，丁之之任地委书记，王仲一是组织委员，乐天宇是宣传委员，李怀才负责农民运动，张良翰负责国民运动，王一飞负责军事运动，卢继亭负责职工运动，另有姬明信、李叔香担任交通。在张家口形成了一个比较健全的党的领导机构；同时相应地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张家口地委。当时张家口的不少工厂、学校以及军队都有了党的活动，有的工厂和学校中还建立了党团支部；在大境门外的孤石村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据当时张家口地委的报告，在察哈尔、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等地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党的工作。另外在这些地方普遍地建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西北青年互助社。

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直接领导下，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包头四个工作委员会。热河工委负责人是杜真生、陈印潭（即陈镜湖）；察哈尔工委负责人是杨洪涛、张次平（即张良翰），以后是多松年；绥远工委书记是吉雅泰；包头

工委书记是李裕智（即李若愚）。这是李大钊指派于树德、韩麟符等指导组建的。当时公开名义是国民党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内蒙（指包头党部）四个党部，工委负责人也是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实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据于树德回忆：“李大钊同志派我到内蒙开辟工作，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的那一年，我和吉雅泰一同去的，我到呼和浩特（那时叫归绥），当时我们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在那里，打算在那里公开挂出绥远国民党党部的牌子。吉雅泰就是那里党组织的领导人，也是组织国民党党部的发起人。”^①这就是最初建立中共绥远工委的大致情况。工委机关就设在归绥旧城的巧尔齐召内，最初只建立了一个支部，不久扩建为工委，对外公开名义是国民党绥远党部。在工委领导下，又建立了萨县、和林、武川、归绥、土默特旗等五个旗县工委。党组织建立以后，在归绥工人、学生中积极开展工作，发展党团员。据李子光等回忆，当时仅归绥的党团员各有三十多人。以后吉雅泰同志奉调参加组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农工兵大同盟的工作，由彭振纲接任工委书记。1926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又派熊味根任中共绥远工委书记，路作霖任组织委员、麟祥任宣传委员（以后叛变），杨曙晓负责团的工作。中共包头工委设在包头召梁的一座喇嘛庙内，工委除了在工人、学生和市民中开展工作外，主要在“哥老会”会众中抓农民工作。热河、察哈尔工委在热察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有力地扩大了党的影响。

内蒙古地区党组织的建立，使内蒙古革命从组织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内蒙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开辟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内蒙古革命有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① 于树德，《内蒙古地区建党的情况及初期的活动》，1979年11月访问录。

(四)

内蒙古地区是蒙古族聚居，同时包括人数众多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一个多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内蒙古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注意了它同全国革命共同性的方面，另一方面更注意了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从这样的实际出发，制定了指导内蒙古革命运动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李大钊等在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实践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纲领，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开展民族工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主张。

首先，根据党的三大提出的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李大钊等十分注意在内蒙古地区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从1925年初开始，先后建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和内蒙古四个省一级的国民党党部，主要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到1926年，热河有县市党部八个、党员三千五百余人；察哈尔有县市党部六个，党员三千二百余人；绥远有县市党部十一个、区党部五十三个，区分部二百八十四、党员三千六百余人；内蒙党部设在包头，有县市党部六个，党员二千一百零九人。^①这对于扩大革命影响，开展革命运动，是一支可观的力量。

同时，李大钊等为了充分发动和组织蒙古族各阶层参加革命斗争，与当时蒙古族中的国民党员白云梯、恩克巴图等上层人士进行磋商，经中共中央批准，共产国际同意，参加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秋天，中共中央作出了“蒙古问题议决案”，决定同意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为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从思想理论上、方针政策上、以及组建工作方面都作了

^① 引自《中国国民党最近党部组织概况》，载《政治周报》第14期。

具体指导。据吉雅泰回忆：“1925年的秋天，因为请示一些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问题，我来到了他（李大钊）的家里……他对当时我们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他决定要我们参加这个组织，要在这个组织内部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并要我们多做一些实际的群众工作，努力发展和团结一切进步势力，来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和民族压迫；废除王公札萨克的封建特权利制。”^①当佛鼎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参加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大钊特地派多松年去张家口传达他的指示，要求佛鼎必须支持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李大钊还派云泽、吉雅泰、李裕智、吴文献、王瑞甫等蒙古族共产党员，参加了1925年10月12日在张家口举行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要求参加大会的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对北洋军阀民族压迫政策，废除王公封建制度等基本主张；要求他们在这个党内抓青年、抓群众、抓军队；要求同白云梯等上层人士搞好统一战线。这次大会基本贯彻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主张和统一战线方针；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王公札萨克制度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团结了一批蒙古族革命青年；团结了旺丹尼玛、锡尼喇嘛等蒙古族牧民运动领袖人物；联合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牧主出身的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的上层知识分子，在蒙古民族中结成了比较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代表奥齐罗夫、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江浩等，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丹巴道尔计、中国国民党代表李烈钧等参加了成立大会。这在内蒙古革命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坚持反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代表内蒙古蒙古族劳动人民利益的革命政党。在其内部虽然出现过激烈的两条道路斗争，发生了分裂，但是它在大革命时期，对于发动蒙古族各阶层参加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李大钊从民族特点出发，领导少数民族革命斗争的一个尝试。

在内蒙古地区领导革命运动，既要注意充分发动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起来革命，又要注意蒙汉各民族团结对敌，共同革命的问题。1925年秋天，中共中央在“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决定成立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李大钊亲自主持了组建工作。1925年冬天，在张家口召开了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热河、察哈尔、绥远各地代表约二百余人，李大钊主持了大会。农工兵大同盟的任务也是反帝反封建、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在农村中反对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压迫剥削，总之把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贯彻下去。大会选举李大钊、赵世炎、韩麟符、贾大容、郑丕烈、吉雅泰、李裕智、王仲一、陈印潭等为农工兵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任书记，赵世炎、韩麟符任副书记。

李大钊身着工人服装，出现在工农兵代表之中，他与工农兵群众一见如故，亲密无间。他那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领袖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在代表们的脑海里，一些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回忆起这种难忘的情景，总是赞不绝口。吉雅泰说：“那天，他穿着一身破旧的工人制服，一些工人见他穿着那样破烂，都要把自己的衣服换给他，他只是含笑的说，‘还是你们穿吧！还是你们穿吧！’他的态度温和可亲，和群众之间是那样的融洽自如，一点知识分子的架子都没有。”^①

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除了阐述我们党的民主革命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纲领外，还针对内蒙古地区民族问题的实际，“特别强调蒙汉两族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重要意义，并一再指出，蒙古族人民必须和汉族人民团结一起才能谋求自身的彻底解放。”^①

为了大力宣传农工兵大同盟的纲领和主张，广泛动员工农兵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李大钊主持下创办了《农工兵》革命刊物，由北京大学和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参加编辑工作，由中共北方区委和在内蒙古工作的一些同志撰稿。《农工兵》刊物在北京、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广泛发行，直到李大钊牺牲以后才停刊。

农工兵大同盟的组织在内蒙古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热河特别区的建平、赤峰、平泉、开鲁、林西、林东、围场、承德各县的农民、士兵中都发展了盟员，建立了组织；在察哈尔特别区的农民，洋车夫和警察中发展了盟员；在绥远特别区主要是同农民协会结合起来发动农民运动，尤其在绥西的“哥老会”中发展了大批盟员，据当时的文献记载，“哥老会”的大部分首领参加了农工兵大同盟，会众能听从农工兵大同盟指挥的约有五万人之众。

农工兵大同盟对于发动内蒙古地区的蒙汉各族工农兵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促进蒙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斗争等方面，起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蒙汉各族劳动人民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群众组织。它不仅是农工兵劳动人民的革命大同盟，而且是蒙汉各族人民团结斗争的革命大同盟。这是李大钊从内蒙古的实际出发，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创造性地领导内蒙古革命的又一次尝试。

(五)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蒙古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同全

^① 吉雅泰：《李大钊同志和内蒙古初期的革命活动》，载《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第10—12页。

国一样，蓬勃地发展起来。这是以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党组织领导下发动起来的。

李大钊派张昆弟、何孟雄、邓中夏等开展京绥铁路职工运动以后，京绥铁路的罢工斗争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1921年12月中旬，爆发了驱逐路贼陈世华的全线大罢工。京绥铁路局长陈世华，与日美等帝国主义洋行签订合同，出卖路权，负债达三千六百余万元。不仅如此，陈世华还借购客货车辆，停发工人工资，从中贪污肥私，激起工人愤怒。工人们团结一致，举行罢工，一举夺回会计出纳权，打开金库，发放工资，最后迫使交通部撤掉陈世华局长职务，罢工持续一周，斗争取得了胜利^①。不久，在张家口成立了车务工人同人总会，在集宁、归绥、包头等地设了车务工人同人分会。车务同人会领导工人展开了护路运动，反对交通部6月12日与美国太康洋行改订付款合同，反对允许太康洋行举荐会计，监督会计，出卖路权的“亡路合同”。并发表“京绥铁路同人会反对交部丧权之宣言”^②。8月19日，车务同人会召开工人大会，议决请愿救路。21日，集合六百余人，到北京政府参众两院请愿，要求废除“亡路合同”，宣布脱离交通部的隶属关系。反动当局出动武装进行弹压，但是在全国舆论的谴责和工人们的坚决斗争下，被迫取消了太康洋行监督会计的特权^③。接着，车务同人会为了改善工人待遇，提高工资，又于10月27日宣布实行全线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向交通部提出十一项要求，声明不达目的决不复工。经过两天多时间的激烈斗争，迫使交通部答应了九项要求。29日，车务同人会发表了“京绥路

① 《京绥路罢工风潮之续闻》，北京《晨报》1921年12月16日第3版。

② 载北京《晨报》1922年8月9日第3版。

③ 《京绥铁路救路运动经过情形》，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9月10日第10版；《京绥路员工请愿救路》，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4日第3版；《护路运动取得部分胜利》，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9月5日第3版。

罢工胜利宣言”，通电复工^①。京绥铁路这一系列罢工运动和护路斗争，是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组成部分，它在内蒙古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京绥铁路工人运动，激励了内蒙古的青年知识分子。1923年5月，归绥各学校蒙汉各族青年学生举行“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发动捣毁“盛记”日货洋行的反帝爱国运动。一大批蒙古族青年学生奔赴北京，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这些青年革命运动的兴起，与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

1925年初，李大钊派吉雅泰等回内蒙古开辟工作，发动革命运动。全国“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初，在中共绥远工委的领导下，归绥爆发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斗争是由党的外围组织绥远学生联合会出面组织的，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绥远女子师范学校、绥远五族学院、绥远农科职业学校、工科职业学校以及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的学生一千多人，还有部分工人、市民参加了这次斗争。在绥远学联的主持下，于旧城席力图召召开了各族各界群众大会，由学联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制造“五卅”惨案的经过及其暴行，与会者满腔义愤，反帝口号声响彻古老的青城。大会还发出通电，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会后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发动劝募，支援“五卅”惨案受难者。学生们还深入到近郊农村进行宣传鼓动，这次斗争持续了近两个月时间。

归绥的反帝斗争得到了上海、济南、天津、北京学联的支持。它们都派代表到归绥联络，进行宣传鼓动，演出反帝剧目，使内蒙古地区的反帝运动同全国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揭开了内蒙古地区大革命风暴的序幕。

^① 《京绥路大罢工详情》，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0月30日第6版；《京绥路罢工胜利宣言》，《新民意报》，1922年11月7日。

从1925年下半年开始，内蒙古地区的农民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特别是李大钊发表了《土地与农民》等重要文章以后，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大钊深刻地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广泛地组织以贫雇农为主的农民协会，发展农民运动。到1926年6月，热河特别区有区级农会五个，会员达二千二百人；察哈尔特别区有区级农会一个，会员六百人；绥远特别区以归绥为中心，周围各县也相继组织了农民协会。到1927年6月，农民协会又有了新的发展，热河有县级农会九个，区级农会十三个，乡农会三十一个，村农会三十五个，会员发展到五千四百二十三人，察哈尔也有县农会一个，区农会四个，村农会八十二个，会员三百六十人^①。在绥远已成立了省一级的农民协会。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毕业的内蒙青年贾力更、春和、王建功等也回到内蒙古地区，以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进一步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发动农民运动。归绥周围各县不仅组织了农民协会，有的农会还按照地主豪绅的恶劣程度，列名造册，准备区别情况进行斗争。归绥西郊的毕克齐一带已经斗争了个别罪大恶极的大地主。在热河特别区的不少县内，农工兵大同盟和农民协会配合，多次进行了反豪绅、反苛捐、反烟捐的斗争，还捣毁了税捐局。察哈尔农民以联庄会形式联合进行分粮斗争。1927年3月28日在归绥爆发的“孤魂滩”事件，是当时内蒙古地区最大的一次农民斗争。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绥远特别区民不聊生。可是绥远反动当局还要巧立名目，进行搜刮。1926年末，绥远都统府设立地亩清丈局，决定重新丈放所谓夹荒余荒。绥远地区经过清朝

^① 引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8—1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10月北京第1版。

末年的移民垦荒和北洋军阀掠夺牧场，可耕“荒地”早已垦种，所谓清丈无非是向农民勒索领取土地执照费的一个手段，是掠夺蒙古族牧民草场的一个借口。绥远都统府还决定开放烟禁，提倡种植鸦片，以图抽税自肥；还决定扣发救灾流通券，贪官污吏从中渔利。这些决定激起了蒙汉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中共绥远工委不失时机地引导农民、学生、市民和工人，反对绥远反动当局的上述决定；同时，充分利用地方绅士与绥远都统府之间的矛盾，争取一部分绅士参加反对绥远都统府上述决定的斗争。经过比较充分的酝酿准备以后，决定在归绥旧城城南“孤魂滩”举行群众大会，发动反对绥远都统府的斗争。事先，农民协会用鸡毛信火速通知归绥周围的农民，并通知工会、学生会、工人夜校。28日清晨，归绥周围的农民及城里的工人、市民、学生约五、六千人，陆续会聚到“孤魂滩”，在孤魂庙前挂起了“绥远难民大会”的横幅，与会者手执各色小旗，满怀兴奋地围着主席台，倾耳细听大会发言。露作霖、杨曙晓等党团负责人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农民、工人和学生代表也相续发言。他们一个个愤怒揭露绥远军阀当局及一些贪官污吏的罪行，揭露清丈余荒及开放烟禁的阴谋，会场气氛异常热烈，“打倒清丈局”、“反对开放烟禁”、“打倒贪官污吏”等口号声，震动了沉睡的“孤魂滩”。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举捣毁了地亩清丈局和归绥县衙门，并包围了绥远都统府，派“代表提出六事：（一）打倒地亩局；（二）打倒垦务督办冯曦；（三）打倒（政务厅长）屠义源；（四）打倒（归绥县长）冯延铸；（五）反对开放烟禁；（六）反对扣发流通券。”^①经过激烈的斗争，绥远都统商震被迫答应了上述要求，遂发布三条命令，以示兑现。“孤魂滩”斗争取得了胜利。

^① 梅山：《空前未有之绥远市民示威运动》，载北京《晨报》，民国16年4月7日第5版。

内蒙古地区的牧民运动，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到鄂尔多斯高原的广大地区蓬勃兴起。牧民运动主要是通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活动发展起来的。阿拉善旗的“小三爷事件”，乌拉特西公旗的兵变，呼伦贝尔暴动，都是以蒙古族牧民为主体发动起来的。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而且也存着一些局限性，但是它们对把蒙古族人民的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阶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锡尼喇嘛领导的伊盟乌审旗“独贵龙”运动，是内蒙古地区最大的一次牧民起义。

“独贵龙”运动，是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创造的一种传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独特形式。它从1858年开始，持续了几十年时间。五四运动以后，“独贵龙”运动的著名首领锡尼喇嘛在北京隐居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革命运动的强烈影响，并重新积极地投入了革命斗争。1924年初，他回到乌审旗，不久便带领十五名“独贵龙”战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察学习；1925年10月，回国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在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下，通过革命的实践，逐步从一个自发的牧民运动首领转变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民主革命家。1926年，他率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第十二团，回到乌审旗，一举推翻了封建王公制度，建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组织和人民革命政权，实行了一系列民主革命的政策，受到蒙古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值得指出的是，在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锡尼喇嘛率领百余人的蒙古民族武装，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的二千余人的反动军队战斗了两年多时间，开展沙漠丛林游击战，以少胜多，粉碎了井岳秀的数次围剿，保卫了人民革命政权。这是蒙古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征途上创造的光辉业绩，是鄂尔多斯高原上升起的一面革命红旗，它将永志中国革命的史册。

(六)

1927年春天，中国革命处在严重关头，中外反动派准备着借机扑灭中国革命的烈火。4月6日，曾经洗劫内蒙古草原的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同志；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4月28日张作霖惨无人道地绞死了李大钊同志。噩耗传来，内蒙古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内蒙古地区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的黑暗年代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悼念李大钊同志。

“在（绥远）五族学院礼堂还举行过追悼李大钊同志大会，由陈之的主持，杨绍萱作报告，讲李大钊同志的事迹，痛骂军阀残杀李大钊同志的罪行，参加的人约有二三百人左右。”^①另外，归绥职业学校、归绥中学、绥远师范学校、归绥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听到李大钊同志被害的噩耗以后，愤怒地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张贴“无产阶级的光荣战士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李大钊同志万岁”等标语，表示沉痛悼念李大钊同志，强烈抗议奉系军阀。内蒙古人民痛悼李大钊同志的史实虽然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李大钊同志为内蒙古革命建树的功勋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大钊同志，在反动军阀的绞刑架下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中对反动派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②历史的进程正像李大钊同志所说的那样，

^① 杨植森访问录（1979年12月）。

^② 《李大钊传》第220—221页。

由他和他的战友们亲自培养的革命干部，其中包括蒙古族干部，如同红花的种子，在内蒙古草原上发芽扎根，茁壮成长，肩负起了率领内蒙古各族人民继续革命的重任。他们在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赶走了帝国主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解放了内蒙古草原，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内蒙古各族人民将一代接一代地继承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辈们的遗志，为内蒙古各民族的繁荣兴旺，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对 社会主义思想的初步接触

吕明灼

任何事物的质变，都要经过长期的量变过程；任何人思想的新飞跃，都要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这已是定律。可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李大钊思想转变时，对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条件注意很不够，特别是对其在十月革命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竟被完全忽视了。这样，就不能解释清楚，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①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一起，对中国革命与中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李大钊思想的冲击也是很明显的。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既给人民带来“奇灾大祸”，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②并“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③，从而也必然迅速地提高了人民的思想觉悟与认识水平。当第一次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11页。

世界大战的冲击波以空前的强力震荡着中国时，一向关注世界形势、追求真理的李大钊首先被卷了进去。他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大战的发展，认真思考大战提出的问题，并积极研究与热心向中国人民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从而有机会使他较多地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促使他思想产生了新觉醒。

本来李大钊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就已开始接触了社会主义；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他这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接触并没有在文字上留下明显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到1917、1918年，一方面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迅速壮大；另一方面，也由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者的反战运动与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使李大钊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触，有了新的基础与深入一步的可能，从而使他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表明他思想中已开始孕育与萌动了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一）大战的结局将是民主主义 与社会主义的胜利

大战初期，德国帝国主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民主主义似乎大有“陷于危世之论”。一般人都认为，战争必将限制或削弱民主主义的发展，而与此相对立的“军国主义”、“官僚政治”，必将“大获全胜”。李大钊认为，这完全是“皮相”之见；“而察其实质，则‘民主主义’之潮流，仍有滔天之势，挟此横流之战血以俱至也。”^①他坚信，民主主义不仅不会“因战争而消亡”、“而衰退”、“而失其优长”、“而摇其旧基础”；反而将“因战争而觉醒”、“而发达”、“而补其缺陷”、“而开其新纪元”^②。因为战争以血的事实教育了人民，使他们纷纷起来反对本国统治阶级进行的战

^{①②}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甲寅》第77号，1917年4月16日。

争，并要求进行改革，实行民主主义。这股潮流的发展，必将给大战结局带来决定性的影响。李大钊满有把握地说：“战争之结果如何不可知，德国民主主义之势力，日趋于盛大，则为不可逃之数耳。”^①他又说：“此次战争告终，官僚政治专制主义皆将其与之俱终；而世界之自由政治、民主主义必将翻新锐化，以别开一新面目，别创一新形式，蓬蓬勃勃以照耀二十世纪之新天地。”^②他从战火之阴云中看到了民主主义的曙光，表明他对新生事物的必然胜利充满信心。

不仅如此，李大钊又认为，大战的结局还必将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不仅注意从事物的实质上去分析问题，而且还注意从事物的发展趋势上去观察问题。他以任何事物都具有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特点为指导来认识社会政治问题，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所兴起的民主运动、解放运动，都是多数人依离心力原则从少数专制者所依恃的向心力下解放出来、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他把专制主义与资本主义都看作是向心主义，而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则都看作是离心主义。他说：“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③在这里，李大钊第一次提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概念。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制度；它既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产生，也必与资本主义相斗争而最终取胜。他指出，“最近世界政治之趋势，向心主义之势力日见缩减，离心主义势力日见伸张”^④。向心主义必将为离心主义所取代。然而，向心主义一定要作垂死挣扎，极力伸张自己的势力。但是，“向心力之伸张愈亟，离心力之反抗愈烈，压制之程度愈进，解

①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 (Democracy)》，《甲寅》第77号，1917年4月16日。

② 《自由与胜利》，《甲寅》第111号，1917年5月21日。

③④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甲寅》第89号，1917年4月29日。

放之运动愈强，卒至向心主义为离心主义所挫，而身亦压毙于二力相扎之下焉。”^①如俄国就是向心主义极盛的国家，而今经本国政治革命之风云，离心主义遂在人民思想中扎下了根。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有“由向心主义一跃而入离心主义之势”。而大战后，“向心主义之颓衰，离心主义之盛大，可以预卜矣。”^②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

李大钊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寄希望在德俄无产阶级革命身上。俄国二月革命已经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如果德国无产阶级“再演一幕”，“或即为此次大战之收场，亦未可知。”^③1917年3月25日，李大钊写了《面包与和平运动》一文。他抓住了战争给人民、特别是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普遍饥饿灾难——面包问题，深入分析了面包对于和平的“莫大权威”作用。他认为俄国二月革命就是由于“面包之缺乏”这一直接原因引起的。最近德奥等国又爆发了“面包骚动”，“与我面包”之声日高，渐与俄国无产阶级遥相呼应，“似柏林全市亦将变为赤旗之世界”。这种“面包运动”必将成为“和平运动”，而促成大战及早终结。李大钊说：“和平之曙光，必将始发于面包问题。”如果面包问题果能解除人类旷古未有之战祸，则“吾人当为人类向面包而鸣其感谢，而为之狂呼曰：神圣之面包！权威之面包！和平之面包！仁爱之面包！”^④李大钊对面包与和平之关系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九个月以后，列宁写了《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指出，由于战争使最发达的国家都陷于严重饥饿状态，因而“和平与面包，这就是工人和被剥削者的基本要求。战争已经使这些要求极端尖锐化了”。“为了和平与面包、推翻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医治战争创伤，

①②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甲寅》第89号，1917年4月29日。

③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第84、85、92、95号，1917年4月24、25日、5月2、5日。

④ 《面包与和平运动》，《甲寅》第56号，1917年3月25日。

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就是斗争的目的。”^①李大钊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虽然还没有把面包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系起来，但却把面包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很可贵的了。

李大钊的这些认识，能够使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后，热烈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二）盛赞俄国无产阶级 在二月革命中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予以特别重视。他曾专门著文论述俄国二月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认为二月革命是民主主义反抗专制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大战之初，俄国沙皇政府曾阴谋以战争来压制与击破勃兴的民主主义，并认为俄国之敌不在其国外德皇，而在国内的广大群众；于是他便集中力量镇压革命人民，由此激起了二月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民主主义的基础，这是俄国民主主义的胜利。同时，李大钊又认为这也是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他说：二月革命使“工党势力达于政治矣”^②，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又说：“此次革命之成功，则泰半为社会党运动之效果”。“社会党及工人于此次革命立功甚伟”^③。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起了伟大作用。当革命发动之际，在全国各大城市，“赤旗飘扬一挥而蔽罗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会革命之帜，到处与国民以绝明之痕印，不啻为社会民主党建纪功碑于人人之脑中。”^④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二月革命一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6页。

②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甲寅》第89号，1917年4月29日。

③④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第84、85、92、95号，1917年4月24、25日，5月2、5日。

成功，“大权一操之由工党及下级士卒团组织之委员会”，遂本其主义发布了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宣言；只是由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对而未能实现。李大钊在这里所指的“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就是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而言；直到十月革命后，他还称布尔什维克为“急进社会党”^①。虽然他这时还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党”与滑向修正主义泥潭的“社会党”区别开来；但他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二月革命中伟大作用的充分肯定与热情赞扬的态度，却是完全正确的。

李大钊特别赞扬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际，不顾本国政府的失败，而大胆发动国内革命战争的精神与勇气。李大钊由此得到启示说：“俄国国民于此次大革命之风云中，以其庄严贵重之血，大书于其革命旗帜曰：‘自由与胜利’。此不仅为俄国国民之盟誓，且足为世界自由国民之教训。”^②他认为，在本国政府对外进行掠夺战争情况下，胜利与自由相比，争取人民的自由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自由民主才能保障人民的权益。这一认识便为他所主张的反对侵略战争的和平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俄国二月革命具有重要意义。李大钊对其予以很高估价，称它为“俄国大革命”，认为它“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极深。他曾说过：在“战端未息之时，俄国革命之风云，即蓬勃于欧、亚连毗之域界，德国国民亦因之生绝大之觉悟。夫俄与德国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绝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可以推知。”^③他把俄国二月革命看作是开辟了反对专制主义政治的新时代，认为，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1页。

^② 《自由与胜利》，《甲寅》第111号，1917年5月21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81页。

如果说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于反对“君主政治”、“贵族政治”的话，那末，“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①这种划分未必科学，但他强调二月革命反对专制政治的意义与作用，却是可取的。李大钊还把二月革命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它对政治前途影响极大。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复辟之说与“复辟运动”剪除未净，稍有适当气候，它便求其复萌。俄国二月革命的风暴，也将给中国专制主义复辟派以沉重的一击。他说：“今以俄人庄严璀璨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②他特别警惕那种“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主张‘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之，并‘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③坚决制止专制政治在我国重现。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李大钊对俄国二月革命意义的评价，而在他的“引俄为前车”，并把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这对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把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三) 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 本国政府对外的侵略战争

要正确对待战争，必须对战争性质有正确认识。李大钊这时已认识到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给资本家与广大人民带来绝然不同的结果。“盖有战争，则资本家因军需品之供给，军事公债之应募，而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

① 《李大钊选集》第81页。

②③ 同上，第82页。

场，以生命血肉为牺牲，结果，乃以益富者之势力，而长其横暴。”^①这就初步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动本质。这时李大钊虽然还没有明确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但他已开始引用“帝国主义”这一新概念。他在介绍英法俄比等国社会党伦敦协议会决议案时写道：“此次战争乃关系诸国之殖民政策，与帝国主义之结果”。他还引用李卜克内西的话说：“此次之战非各交战国国民之所薪，且非为德国或其它国民之福利而战，乃为产业资本家、银行家制世界之市场，获得于掠夺之领土之政治管辖权而战，全为帝国主义者之战争也。”^②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李大钊引用这些话，说明他已开始接触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并加深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反动性质的认识。

正由于此，所以李大钊认为：“凡社会主义者，莫不反对战争”^③，并为争取自身的自由民主而战。如俄、德两国人民，在战局危迫之际，不急于求对外的胜利，宁先索对内的自由；不急于疆场与敌国战，宁先于议会与政府战。李大钊解释这种现象时说，这并非俄德人民恶其政府之心胜于恶敌国之心，亦非其爱胜利之心逊于爱自由之心。“盖无自由之国民，纵令一战而俄胜，此之胜利亦只为罗曼那夫皇帝之胜利，大权政治之胜利，俄国少数官僚之胜利，非俄国国民之胜利也。一战而德胜，亦只为和汉卓伦皇室之胜利，独裁政治之胜利，德国少数官僚之胜利，非德国国民之胜利也。”^④他又说：“离于自由之胜利，乃为牛马之胜利，奴隶之胜利，其得之也不惟不足以蒙其福益，且以增长其主上之恣暴，故胜利之结果等于零度。”^⑤总之，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只能对本国统治者有利，而对人民却意味着苦难与奴隶地位的继

①②③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第84、85、92、95号，1917年4月24、25日，5月2、5日。

④⑤ 《自由与胜利》，《甲寅》第111号，1917年5月21日。

续。这些认识，已有阶级分析的意味，是很可贵的认识上的升华。在这一时期李大钊介绍李卜克内西等欧洲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时，已经接触了一些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有上述认识是不足为奇的。

由此，李大钊赞同那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并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政府实行民主改革或发动革命的行动。如俄国二月革命那样。他说：“官僚政治之国，无论外患若何危迫，其民终以内政改革为务，甚至乘机革命亦所不恤也。”^①这种支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观点，是列宁说的“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②，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的。而要达到这一认识水平，不冲破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念与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束缚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问题上，李大钊还对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批判。欧洲各国社会党，在大战爆发前，一般还都反对战争；但是，在大战开始后多数都转向支持战争。李大钊指责了德国社会党在议会一致赞同反动政府提出的五十亿马克的浩大军费案，及许多著名社会党人自请从戎愿效命疆场的行动，并批判了他们所鼓吹的所谓支持战争是爱国主义的谬论。他明确指出，社会党人支持侵略战争，是“大背其素所秉持之宗旨”的，是违犯了“社会主义者之理想非战态度”^③的。所谓支持战争是爱国主义之说，纯系偏激之言。他们“为爱祖国之群众心理所驱策，亦实与以无形之势力，但此究为情之冲突，而非理之确信，正如狂风骤雨之卒起于一朝，稍一静息即当复其初常。”^④这种出自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背于理念的所谓“爱祖国”，李大钊称其为“伪爱国心”^⑤。实

①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甲寅》第77号，1917年4月16日。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38页。

③④⑤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第84、85、92、95号，1917年4月24、25日，5月2、5日。

际上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是一致的。“‘民主主义’与爱国心不惟不相反，而且相成也。”^①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大谬不然”的。这就是说，要真爱国，就应先要求实行本国的民主主义，而不是去争取危害民主自由的对外侵略战争的胜利。

（原载《吉林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

^①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甲寅》第77号，1917年4月16日。

李大钊前期的民主思想

任建树

李大钊（1889—1927）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思想发展可以1918年6月为界限，分作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又可分作两个阶段：（一）1915年以前，他是一位坚强赤忱的爱国主义者，反帝爱国是他的思想主流。（二）1916—1918年的上半年，他是一位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期，他迅速地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只就他的前期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的特点，发表些粗浅的意见。

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但是政权落入了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的手里。辛亥革命唤起人们救国救民的希望，随着民国的诞生，“共和”的建立，完全破灭了。

“破碎神州日已曛”^①，在这没有光明，没有希望的年代里，李大钊怀着对国家民族的“隐忧”，踏上了革命征途。

李大钊早在民国元年就感觉到中国的“兵忧”、“食艰”、“业蔽”、“才难”等“隐忧”，尤其使他感到忧虑的是中国有被帝国主义

^①李大钊：《筑声剑影楼诗》，《言治》第1年第6期。

“立召瓜分”的危险^①。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免遭“瓜分”的命运，他渴望有一个统一强盛的中国。可是中国的现状却使他万分焦虑和不安。他哀叹“民权之旁落”^②和“吾民之失所”，“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但中国的病根在哪里？怎样对症下药？

李大钊认为“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③，国家败坏，人民痛苦，“推原探本”，“都督实为祸根”；并指责别人不认识他所指出的“祸根”的危害性，说“今人不察，徒断断于中央之是防，而不知跳梁违宪者，实不在总统，而在都督也；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也”。在他看来，为了“巩固国权”、“伸张民权”、“整顿吏治”，“当斯之际，舍首行裁撤都督”，是没有别的办法的。由袁氏政府进行由上而下的改良，通过“裁撤都督”，使“中央收回军政实权”^④，求得国家的统一和兴旺，这就是李大钊在1913年提出的救国救民的主张。

显然，李大钊这时还不认识袁世凯的真面目，也忽视了有些都督正是袁的鹰犬。历史的发展同他的预计恰好相反，证实“跳梁违宪者”首先“在总统”、“在中央”。

1914年，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炮制御用约法，进行祭孔、祭天等复辟活动，不仅使李大钊抛弃了“裁撤都督”的主张，并引起了他的愤慨：“居今而求治，断无毁新复古之理，虽人惟求旧，倚重老成，而世运嬗进，即有力量，亦莫能抗”^⑤。但是，谁是推动“世运嬗进”的力量呢？“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⑥。

① 李大钊：《隐忧篇》，《自治》第1年第3期。本文写于1912年6月，发表于1913年6月。

② 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自治》第1年第3期。本文写于1912年6月，发表于1913年6月。

③ 《李大钊选集》第2页。

④ 李大钊：《裁都督横议》，《言治》第1年第3期。

⑤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华杂志》第1卷第11期。

⑥ 李大钊：《风俗》《甲寅》第1卷第3号。

他开始把他的视线从上层社会转向人民群众，他朦胧地看到“群众势力有如日中天之势，权威赫赫，无敢侮者”^①。因此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青岛等地和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中特别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大义凛然、“泣血陈辞”，先后写了《国民之薪胆》、《警告全国父老书》等反帝爱国文章，振臂高呼“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②。教育人民要以“刚毅果敢之精神”、“百折不挠之志气”^③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他随时准备献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④。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英勇斗争、顽强不屈的伟大气概。这一时期，他虽然揭露伪共和，反对封建复古，要求民主，但由于他不认识民主共和的最大敌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代表袁世凯政府的阶级本质，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它们抱有幻想，只有当他的幻想有一天被无情的历史所毁灭之后，他的民主主义思想才能得到发扬。

二

1915年底，袁世凯在一批封建复辟派的簇拥下，登上了金銮宝殿，但顷刻之间，即树倒猢猻散。为什么刚刚赶走了一个满人皇帝，又来了一个汉人皇帝？中国怎样才能得救？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继续摸索前进。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民主主义者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认为要救中国，必须效法

① 李大钊：《政治对抗力之养成》，《中华杂志》第1卷第11期。

② 《李大钊选集》第27页。

③ 同上，第18页。

④ 同上，第19页。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李大钊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位著名代表人物。

1916年春，他写了著名的战斗论文《青春》，不久又发表了《民彝与政治》等论文，发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的革命号召，提出创建“青春之国家”^①的政治主张，尖锐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②。这两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从爱国主义者发展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现仅就李大钊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与同时代的民主主义者相比较），阐述个人的意见。

李大钊认为反对封建专制，实现民主制度，必须破除“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崇赖‘神武’人物之心理”，迷信个人的思想，是独夫“民贼之巢穴”，如不捣毁这个“巢穴”，“一紂虽诛，一紂又起”，“例证不远，即在袁氏”^③。这时李大钊虽然不懂得导致袁氏复辟帝制的社会经济根源，但是他明确地指出了复辟的思想原因，是崇拜个人和蔑视人民群众，这无疑是有积极的战斗意义的。他从多方面阐述“民彝”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他把“民彝”解释为国家的根本，“民宪之基础”，判断是非的“权衡”，是人民群众“心理自然之势”，“一部廿四史中，斩木揭竿，……不绝于书”。正是人民群众“心理自然之势”的表现^④。“民彝”“可以创造历史”，而一旦“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⑤。李大钊的人民群众观点的发展，达到了当时思想界的高峰。他努力挣脱千百年来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初步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李大钊宣传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迷信和封建专制；宣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迷信；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建立

① 《李大钊选集》第75—76页。

② 同上，第56页。

③ 同上，第47页。

④ 同上，第45页。

⑤ 同上，第48页。

“青春之国家”。什么是“青春之国家”？他曾经明确地指出“中流社会之有恒产者”为“国本所托”^①。可见他的“青春之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但是，他不象有些民主主义者一味宣扬和盲目崇拜资产阶级代议制，而是对它持有一定的怀疑。他认为代议制“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并相信将来替代议制的必定是“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②，他要“觅新国家，拓新世界”^③。特别是当他观察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妇女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工人问题、妇人问题皆成为社会问题”^④。以后，他的怀疑加深了。但怀疑并不等于否定，更不等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有的同志仅仅根据怀疑就论断他的“青春之国家”不是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代议制政治，这是不符合李大钊的思想实际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先进人物，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国家政权问题，是设计不出比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更为新颖的方案的。因此，对于怎样创建“青春之国家”，这个国家将实施些什么政治纲领，在他这一时期的著作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曾经制定了进步的政治纲领——临时约法，但不久就被袁世凯所废弃了。当时的民主主义者，除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把他们前辈们开创的革命事业，推向广泛深入的发展阶段，在政治上并没有超越他们的前辈。即使像李大钊这样的先进人物中的佼佼者，也无法摆脱历史条件的限制。

李大钊的《青春》一文，如果就其建立“青春之国家”的政治纲领而言，是贫乏的话；那么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却具有鲜明

① 李大钊：《中心势力创造论》，《甲寅月刊》1917年4月23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50页。

③ 同上，第62页。

④ 李大钊：《学生问题》，《甲寅月刊》1917年4月8日。

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丰富的辩证法因素。这是《青春》所以能给人以热情活泼、朝气蓬勃的青春感受的主要原因。

李大钊认为宇宙“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①“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②。世界是物质统一体的无限发展过程，他把这无限发展过程叫做“无尽之青春”^③。但“若由相对观之”，“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因此，“生者不能无死，毁者必有成”^④，“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⑤。他把具体事物的有限发展过程，叫做“青春之进程”。

他认为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于“对抗”，“宇宙万象，成于对抗。又因对抗，而有流转。由是新旧代谢，推嬗以至于无穷”^⑥。

他也初步认识到事物向它的对立面转化的规律。“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⑦。他深刻地阐明了“白首中华”与“青春中华”之间新陈代谢的辩证关系。他说：“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⑧。可见“白首中华”死亡之日，就是“青春中华”诞生之时。李大钊满怀着胜利的信念，勇往直前地投入埋葬旧中国，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革命洪流。

① 《李大钊选集》第66页。

② 同上，第95页。

③ 同上，第67页。

④ 同上，第58页。

⑤ 同上，第68页。

⑥ 李大钊：《辟伪调和》，《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6期。

⑦ 《李大钊选集》第66页。

⑧ 同上，第72页。

他认识到新中国的诞生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大凡新生命的诞生，必历一番之辛苦，即必需一番之努力”^①。使“白首中华”转变为“青春中华”，必须“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②。他为此不辞辛苦，不畏艰险，“断头流血以从之”^③。

李大钊爱憎分明，意志坚定。他愤恨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但并非单凭义愤去打倒孔家店和咀咒复古尊孔势力；他热爱科学和民主，但不是简单地把科学民主作为准则，去识别是非，决定取舍。他是站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上，以辩证法为武器，勇猛地杀向封建营垒，刺向形形色色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核心——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什么绝对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万世师表、万古不变的教条，都必将被“大实在的瀑流”所冲垮、淹没。李大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超越于其他民主主义者，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思想基础。

但是必须指出，这一时期李大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都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和片面性。他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而他的社会观却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他在论述社会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对立阶级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辩证法的片面性和不彻底性，就明显地表现为阶级关系调和论。

关于李大钊的调和论思想，迄今只有几个同志在研究李大钊的文章里，附带地提到几句，而且对于李大钊有没有调和论尚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这个问题，需要多引证几句原文，并提出我个人的意见。

只要我们读一读李大钊的《青年与老人》、《辟伪调和》、《调

① 《李大钊选集》第64页。

② 同上，第71页。

③ 同上，第64页。

和誉言》、《调和法则》等论文，就不难发现问题不在于李大钊是否有调和论，而在于对他的调和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他曾经多次指出“世界之进化，全为二种观念（指进步与保守或新与旧——引者）与确信所驭驰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①。把世界进化的动力看作是两种观念的相互作用，这显然是唯心的。如果我们撇开这一点来分析他所表述的两种观念的相互作用的关系，那么无可否认，他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到进步与保守、新与旧矛盾的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缺一”，则车不能行，鸟不能飞；另一方面他认为进步与保守、新与旧之间“绝无质之异”，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发挥同样的质的作用，只是作用量的大小不同，进步的、新的发挥作用的量“较丰”；保守的、旧的作用量“较啬”，并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进步与保守、新与旧一方“不可相竞以图征服或灭尽其他，盖二者均属必要，同为永存”。为了达到“永存”的目的，“新旧两种势力各守一定之限度以相对抗勿可驰于极端”，以免两败俱瘁”^②。这里他看到了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斗争性，但企图把斗争永远约束在“一定之限度”；他看到了矛盾双方的统一性，但是只看到矛盾双方互相联系着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忽视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互相转化，进步与保守、新与旧的统一性被描绘成永不分离地联系在一起。于是，旧事物的死亡，新事物的诞生都不见了。以这种片面的不彻底的辩证法观察人类社会，论述阶级关系，必然要导致阶级关系调和论。他说：“现代之社会乃调和之社会也，贵族与平民调和、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地主与佃农调和、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调和，惟其协力与调和，而

① 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新青年》第3卷第2期。

② 李大钊：《辟伪调和》，《太平洋》杂志第1卷第6期。

后文明之进步社会之幸福乃有可图”^①。李大钊当时具有调和论思想，是无可讳言的。

调和论，今天人们每当听到这一名词，不免会联想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向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作无原则的让步、妥协以致投降吧（这大概是某些同志回避论述李大钊调和思想的原因）。如果这样理解李大钊的调和论，那显然是违反他的原意的。因为：（一）他所谓的调和，是要贵族、资本家、地主对平民、工人、佃农实行调和，并没要平民、工人、佃农同贵族、资本家、地主搞调和。（二）他认为“调和之目的”，是“自他两存之事，非牺牲自我之事”。他似乎也预料到别人可能误解他的调和论，所以特别指出“调和主义，苟或误解即邻与牺牲”^②。（三）他所谓的调和，是各人应该“对于政治或学术，认定保守或进步为其确切不移之信念，同时复认定此等信念，宜为并存”，“相牵相挽以驰驱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也”。他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原则，揭露以梁启超为首的政治集团是一伙“以势力为重，以情理为轻，以成败为重，以是非为轻”，“翻雨复云”^③，朝秦暮楚，专搞伪调和的政客。可见李大钊的调和论同我们今天所说的调和论，在政治上是有显著差别的。

尽管如此，李大钊的调和论毕竟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他过分地片面地强调了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同一性。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害的冲突，它们之间的利害关系是无法调和的。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并存”的，但决不是永远“并存”的。

李大钊哲学思想的不彻底性，是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产物。调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果就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

① 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新青年》第3卷第2期。

② 李大钊：《调和之法则》，《言治季刊》第3册。

③ 李大钊：《辟伪调和》，《太平洋》杂志第1卷。

关系而言，是资产阶级面对强大的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的软弱表现。而就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而言，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不调和的问题，因此，与其说是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毋宁说是要“资本家与工人调和”。对于“调和”的内容，李大钊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但不外是要贵族、资本家、地主对平民、工人、佃农的阶级状况，进行某些改良。李大钊同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有类似之处，他们“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①。他们貌似超阶级的代言人，而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

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李大钊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言人，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条件，他才能实现这一场深刻的思想飞跃。在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下，李大钊长期淤塞在胸中的烦闷和苦恼，一齐冰消雪融，他迅速地把握住人类最新、最完备、最科学的无产阶级宇宙观——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崭新的装束和武器，踏上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历史从不偏袒任何一个人。新的历史条件对每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一视同仁地存在着。而为什么独有李大钊最快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本文的论述简单地归纳几句，指出他所以能够最早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

1. 李大钊忧国忧民，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的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8页。

命意志。“铁肩担道义”，他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生存，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2. 李大钊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尽管是不彻底不完备的，但毕竟含有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因素，这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我们从他在“五四”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所写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里，不难看到他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时，首先努力把握的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李大钊开始“以‘物质的生产力’为最高动因”^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认识到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很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那阶级竞争说”^②，“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人们的社会关系。他在论述妇女解放问题时，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因此，只有“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④，妇女的彻底解放才能实现。阶级斗争的理论，基本上克服了调和论。李大钊实现了立足点的转移。

3. 李大钊具有初步的人民群众观点，因此，当他一旦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全世界显示了无产阶级主宰大地沉浮的伟大力量和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便立即认识到埋葬旧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⑤。因此“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⑥。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9页。

② 同上，第186页。

③ 同上，第177页。

④ 同上，第144—145页。

⑤ 同上，第191页。

⑥ 同上，第146页。

4. 李大钊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就已经认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家“获丰厚之利益，其下级劳动社会，则为国家驱入凄惨之战场，以生命血肉为牺牲”^①。他透过对世界大战的本质认识，观察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才是最广泛的真正的人民民主。他要“觅新国家，拓新世界”，而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他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

(原载《社会科学》(上海) 1981年第2期)

① 李大钊：《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甲寅日刊》1917年4月24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李大钊对“好政府主义”的认识

——兼论其“平民主义”思想

吕明灼

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阶段。在这一时期，他既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平民主义”思想，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民主主义道路；又希求在不改变军阀反动统治情况下作某些政治改良，并在胡适等人提倡“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字，迎合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英雄人物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正确对待错误。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和任何客观事物的发展一样，决不会是直线前进的。我们研究历史人物、包括我们党的一些领袖人物，如果不去揭示他们思想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必然走上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对李大钊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不应隐讳；而应去研究它，分析它产生的原因，指出他是如何在斗争中认识与纠正错误，从而得出关于李大钊思想及其发展的全面结论。

—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国际上，以

新四国银行团的建立和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为标志，帝国主义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国内，一方面，封建军阀混战不已，直系军阀连续打败了皖系、奉系军阀，独自窃据了北京中央政权，与各地军阀矛盾重重。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压榨下的人民，生活日益贫困，觉悟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新火炬。革命与反革命正在准备新的大搏斗。

在这种形势下，社会各集团、各阶级都提出了自己解决时局的政治主张：窃据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叫嚷“武力统一”，以图统治全国；各省军阀则在另一些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高唱“联省自治”，以谋地方自保。中国共产党在发表了几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后，于1922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资产阶级代表胡适等人也于1922年5月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说“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他们提出建立“好政府”的主张，要求实行“宪政”，召开“国会”，“公开”财政及“裁兵”等，企图以改良手段“改革中国政治”，实际是维护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坚决反对胡适派的改良主义，率领中国人民英勇地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这时，李大钊的思想处在矛盾中。一方面他坚持革命立场，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英勇奋斗；另一方面，他又对新形势下的复杂矛盾认识不清，并幻想通过调和的办法解决矛盾。于是，他便在胡适派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这是他从五四运动以来所坚持的革命立场的后退，也是从他与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问题与主义”论战立场上的后退，背离了我党的政治主张与纲领。

与签名的立场相一致的，是李大钊在同时期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提出过类似的政治主张。与上述签名的同月，即1922年5月1日，李大钊在他《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一文中，为中国劳动阶级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按程序要求实现”。在“关于内政者”一条里，他提出：“（1）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2）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①。这些主张与胡适派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可见，李大钊在胡适派“政治主张”上签字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

可喜的是，李大钊在此一个月后，就对他的错误有所觉察，并力图纠正。1922年6月1日，李大钊与黄日葵、邓中夏等共产党人联合向“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提交了《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这一提案充分表明了他们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他们指出：要解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压迫这一厄运的“唯一”方法，就是“引导被压迫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用“革命的手段”，“连根带蒂”地“铲除国内的督军制和国外资本主义的这二重障碍”，以实现民主主义。他们坚定地表示：“为革命的民主主义，我们全体动员了。我们不要躲在战线后，空谈高深的主义与真理，我们要加入前线去与军阀及军阀所代表的黑暗势力搏战了。”同时，他们又尖锐地、激烈地批判了改良主义思想。他们宣称：“我们不是奴性主义者，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因为这就是说，军阀可以扑灭军阀政治，也就无异说君主可以废除君主专制政体，资本家可以废除资本主义了。”“我们不是改良主义者，也不相信不破坏这制度，加入军阀或官僚阶级中，即可将他改变过来，实现我们的主义。因为我们的敌人不是个人，而是制度的本身。”^②这是一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战

^① 《李大钊选集》第387页。

^② 《少年中国》第3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斗檄文。它与胡适派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根本对立的。李大钊在这一提案上签字，表明他决心与“好政府主义”决裂，也是对他自己在胡适派“政治主张”上签字的错误行动的彻底否定。

二

为了宣传党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继续自觉清算自己对“好政府主义”的错误认识，李大钊于1922年7月和1923年1月，又连续写了《平民政治和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长篇论文，着力论述了他的“平民主义”思想。所谓“平民主义”，就是民主主义。李大钊对“平民主义”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可以看出，他所理解的“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而是具有新的含义的民主主义了。

第一，他认为“平民主义”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途，现在的世界就是“平民主义”的时代。“平民主义”是“现代遍于社会生活种种方面的绝大的潮流”。它在现在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它“震醒”了数千年沉睡于专制深渊里的亚洲；“扫空”了一切阻碍它前进的反动势力。“平民主义”作为“风靡世界”的潮流，必将最终取得世界的胜利。“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①。他热烈地歌颂“平民主义”，确信“平民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历史的必然。

李大钊不仅把“平民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制度，一种社会潮流，而且还把它看作是一种哲学思想。他说：“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气，是一个生活的大观”，“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②。因此，他认为“平民主义”充满了人们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407页。

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社会、产业，到教育、美术、文学、风俗等，都著有“平民主义”的颜色，“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一切都在“平民主义”指导下，向着“平民主义”前进。

李大钊在1918年底，介绍十月革命时，曾这样热烈地歌颂过社会主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①现在他又以同样的语词来歌颂“平民主义”，这是因为在经过一段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具体现状之后，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虽然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但是目前不应作为中国革命的直接目标；现在应先经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二大”所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精神。由此，1922年11月，李大钊在纪念十月革命六周年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就不再提中国应坚持社会主义革命，而提应坚持民主革命了。他说：“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②李大钊在这里所说的反帝的、以建立“人民政府”为目标的、“民主联合阵线”的革命，显然是指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他还没有能明确区分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情况，因而把一切都归之于“平民主义”革命；这正如他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十月革命之后把一切革命都归之于社会主义革命一样。而这，是他这时还不能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原因。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7页。

② 同上，第401页。

第二，他明确指出“平民主义”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他说：“平民主义”政治，有“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他揭露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纯是欺人的方法”。它的在“人民代表”美名掩盖下的议会，“仅是饶舌的机关”，是为资产阶级“装璜门面”的；而“特权政治则在幕中施行”。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资产阶级的“特权政治”根本对立，它“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历史证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必将取代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现在的时代，正是“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①。

李大钊还明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要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独揽政权”；而“从宪法上、议会上着手”的“和平手段”，必“归于失败”^②。这种无产阶级“独揽政权”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他明确指出：

“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他反复强调，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实有“统治”的意味，而且“很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

李大钊又认为，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就是“工人政治”。“工人政治”就是社会主义。“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

① 以上均引自《李大钊选集》第397页。

② 同上，第429页。

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①“工人政治”完全实现时，由于阶级制度的消灭，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完成，它的“统治”意义将渐渐消泯，以“事务的管理”代替“人身的统治”。这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纯正的平民主义”；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②。

在李大钊看来，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18年底，他在《跋〈国体与青年〉》一文中，就指出民主革命成功后，“紧接着社会主义”。现在他又指出，平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不仅“在精神上亦复相同”，“有同一的渊源”，而且在目的上也有同样之处。两者都要“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打破擅用他人如器物的制度”。但李大钊往往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看作都是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程级”，流露出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发展的错误认识。但他又特别指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③这说明两者是有区别的，在实际运用中不容把两者混淆。

第三，“平民主义”的近期目标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李大钊把一切解放的运动都认为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如人民对封建国家要求解放，农民对地主、工人对资本家、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要求解放等。李大钊特别重视妇女解放在实现“平民主义”中的地位。他说：“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因为人民中的半数妇女。一个社会如果把半数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们参予社会政治活动，那个社会就“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精神”。在中国，妇女一向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男子专制的现象特别

① 《李大钊选集》第426页。

② 同上，第397—398页。

③ 同上，第400页。

严重。所以，“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①李大钊也很重视“联邦主义”的实行，认为“联邦主义”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形态；因而他主张用“联邦主义”来推动“平民主义”的实现。

“平民主义”也是与帝国主义不相容的。“在帝国主义下，断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一切反对侵略战争的企图“都成泡影”；一切国际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利分配的机关罢了”。李大钊主张建立“‘平民主义’的联合”，以“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由上可见，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思想，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它是无产阶级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将来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的新型的民主主义。这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对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

一种新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是对另一种旧思想的否定和铲除。但是，要铲除它，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过程。李大钊在论述“平民主义”时，虽然实际上是在进一步肃清“好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是仍不免流露出某些旧思想的尾巴。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他曾赞成过的“好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子。

第一，他的“平民主义”思想仍受某些旧民主主义的影响，没有完全与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他既指出了“平民主义”的阶级区分，又在某些问题上混淆了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别。如他在论述“平民主义”在世界的发展时，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

^① 《李大钊选集》第422—423页。

主义”，与俄罗斯等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的国家的“平民主义”混为一谈，说，“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只有程度高低的问题，没有可能不可能的问题”^①。这便使他不免有时陷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迷宫，看不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本质。

第二，他对“平民主义”的认识还受某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一方面指出将来真正实现了“平民主义”时，“强力”就失去了作用；一方面又在某些场合认为现在争取“平民主义”的斗争也不需要“强力”。他说：“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其中包括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平民主义”政治，其“真精神”，在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真正自由平等；“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②国家与人民间，没有强力的关系。”总之，“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的技术。”^③这些描绘显然应是指将来实现的“纯正的平民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图景；但可惜李大钊却把它用来说明“今日”应争取“实现”的“平民主义”的一些原则。

同时，李大钊在批驳威尔逊的“多数政治”就是“强力政治”的观点时，又说“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政治；而“自由政治”“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他认为“自由政治”的“精髓”与“真谛”，不在多数强剩少数，而在自由公平的讨论与商榷，以求得一个“共同的认可”。而“由专制向‘平民主义’方面进行，多数表决正是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的方法”。他在批判专制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大某某主义”时，把“大某某主义”与“平民主义”作了一个比较，认为

① 《李大钊选集》第410页。

② 同上，第410—411页。

③ 同上，第396页。

“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尚力，一个尚理；一个任一种势力的独行，一个容各个个体的并立。”^①在这里，李大钊又把“平民主义”看作“尚理”的“自由主义”了。

李大钊反对一切“强力”的错误观点，有其思想渊源。1920年1月，他就说过：“我们至高理想在使人间一切关系都脱去力的关系，而纯为爱的关系，使人间一切生活全不是争的生活，而纯是爱的生活。”^②由此，他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没有批它的否定“强力”的谬论。

第三，李大钊对“平民主义”的认识，还受了某些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李大钊原来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的一定影响，认为“互助”不仅是生物界，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因；并主张通过“物心两面改造”运动，建立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因此，他强调人类的“博爱”与“互助”，降低了对阶级斗争作用的认识。他在论述“平民主义”时，仍流露出了“互助”思想的影响。如他曾强调过妇女在实现“平民主义”中的作用；但不是通过革命手段，而是通过女性的“感化”作用来实现。他说：

“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平民的社会。”^③这比他在五四运动前（即1919年2月）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说的：“我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制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④，显然是一个倒退。

① 《李大钊选集》第421页。

② 同上，第304页。

③ 同上，第423页。

④ 同上，第145页。

李大钊在对待国家政权的改革问题上，也有许多社会改良的胡涂认识，如他对“联邦主义”的主张就有一些错误见解。1919年2月，李大钊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中提倡过“联治主义”，就是对历史上反集权反独裁主张的沿用。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方军阀势力已大大发展起来，并高唱“联省自治”以反对妄图控制他们的北京直系军阀时，再提倡什么“联邦主义”，就无疑是不合时宜的了。李大钊在论述“联邦主义”对“平民主义”的作用时，估价很高，认为它是实行民主主义的基础。他说：“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有了联邦的组织，那时行平民政治，就象有了师导一般。”^①同时，他还认为，联邦主义可以制止军阀混战并使各地服从中央。他说：“许多的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等的原故，起过多年多次的纷争，一旦行了联邦主义，旧时的仇怨嫌憎，都可涣然冰释。”而中国，自从建立民国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中央也都不肯服从，“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一个新联合”^②。李大钊这种认识，是把民主政治与民主形式的联邦制的关系弄颠倒了。实际上，不彻底摧垮封建政权，建立民主政治，任何有关民主形式的改革，都是行不通的；而在保持军阀反动统治情况下，行联邦主义，或只有利于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的“统一”，或只有利于造成各军阀的反动联合；而对民主政治的实现却无一点益处。

我党当时曾对胡适派及各地军阀的“好政府主义”和“联省自治”论，作了有力批判。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曾指出：“联省自治”关键在于看政权在谁手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也指出：“联省自

① 《李大钊选集》第416页。

② 同上，第417页。

治”与“武力统一”，都是想“延长武人政治”。中国人民应当反对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大一统的武力统一，要推翻一切军阀，由人民统一中国本部，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同时依经济不同的原则，一方面免除军阀势力的膨胀，一方面又尊重边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新疆三自治邦，再联合成中华联邦共和国，这才是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我党早期的卓越理论家蔡和森曾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论，如《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①、《在封建的武人政治下废督裁兵不可能的铁证》及《现在还是政治战争时代并不是‘法统’时代》^②等。特别是他的《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③一文，对“联省自治”论作了深刻批判。他指出现在：“一切政治问题，不是创法改制可以解决的”；“非继续革命，完全打倒军阀，解除封建阶级的武装不能解决”。陈独秀这时也发表了文章批判“好政府主义”。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不如蔡、陈。他不仅有错误认识，也没有公开直接点名批判“好政府主义”与“联省自治”论。

总之，我们从李大钊上述对“平民主义”的错误认识中，可以追查与了解到他所以要在胡适派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思想根源的梗概。

四

李大钊彻底抛弃上述错误思想，那是1923年以后的事。而这，是和李大钊对封建军阀本质认识的不断加深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① 《先驱》第9期，1922年6月20日。

② 《先驱》第10期，1922年8月1日。

③ 《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2日。

中国的封建军阀和一切反动派一样，它不仅野蛮残暴，依靠军事力量残酷镇压人民；而且它还善于玩弄欺骗手段，把自己的反动掩盖起来，使人们一时不易识破其真象。所以，我党成立之初，对某些封建军阀的本质认识是很不够的。我们从这里也可探讨李大钊上述错误思想、特别是曾赞成“好政府主义”错误行动的社会根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封建军阀及其舆论界对于“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的叫喊甚嚣尘上，但他们有的却用漂亮的革命外衣把自己伪装起来。广东军阀陈炯明，力主“联省自治”，以对抗“武力统一”。但他又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与苏俄来往联系，并先后任命共产党人陈独秀、彭湃等担任广东教育界的要职。因而，他被共产国际和苏俄认为是革命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这使陈独秀曾长期对陈炯明抱有幻想，并有“联陈”的政治主张。而高揭“武力统一”旗帜的吴佩孚，则把自己打扮成工人阶级利益的保护者，高喊“劳工神圣”的口号，高唱“保护劳工”的美调，企图利用铁路工人的力量以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吴佩孚的欺骗迷惑了不少人的眼睛，“以为吴佩孚不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和别的卖国军阀不同。”^①在北方领导革命工作的李大钊，曾想利用他的朋友、吴佩孚的政治顾问与亲信白坚武作吴佩孚的工作，以达利用军阀力量保护与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因此，李大钊也曾有过“联吴”的政治设想，并于1921年亲到洛阳与吴佩孚谈判，使吴发了“保护劳工”与“劳动立法”的通电。李大钊这样作是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的。

对于李大钊与吴佩孚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认为这是李大钊过于相信吴佩孚，对吴抱有某些幻想。如当1922年秋吴佩孚不能容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残酷镇压开滦煤矿工人罢工

^①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

示威时，李大钊还认为这是英国方面对吴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例外的特殊情况，还不能证明吴佩孚要根本改变保护劳工的政策^①。另一种认为，说李大钊当时思想有些右倾是不合乎事实的。恰恰相反，李大钊对吴佩孚早就不抱任何幻想。如1922年夏，李大钊就说过：“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我们对他不要有幻想，去年我到洛阳去同他会谈一次。他发了那样一个通电，就算不虚此行了。”^②我们认为这两种看法各有其片面性。上述两种矛盾现象从当时李大钊矛盾的思想中可以完全统一起来；不过以后一种表现为主，前一种表现为次罢了。李大钊的一贯革命思想，使他对军阀不会抱幻想；但当他思想中某些非马克思主义影响活跃时，特别是当某些封建军阀大唱“革命”高调时，也会模糊他对军阀反动本质的认识。我们认为，李大钊对军阀吴佩孚的认识，最初还不是那么清楚的。同时，也由于李大钊与当时北方党的领导机关，对吴佩孚本质认识不足，对其1922年镇压开滦工人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对吴佩孚缺乏足够的政治警惕性，在行动上也没有作防止突然事变的准备，致使工人阶级在“二七”惨案中遭到重大损失！

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联络，是出自他的战略思想的。但对这种战略观点他有时也是不清楚的。当孙中山还没有走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时，曾有过“联段”（祺瑞）、“联张”（作霖）的活动。对此，当时的一些革命者曾提出批评，说他是“放弃主义”，“屈服于军阀的武力”。李大钊反对这种批评，并肯定孙中山的作法，“承认他是一种战略，是可以容许的。”^③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看一个革命派与某一军阀采取“联合”行动，是不是“可以容许”的“战略”手段，主要看：（1）是不是主要依靠工农基本革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

② 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集第663页。

③ 《少年中国》第3卷11期“学会消息”，1922年6月1日。

命力量；(2)是不是对军阀有本质认识从而保持一定距离与警惕；(3)是不是从利用敌人矛盾的策略出发。在这三点上，我党与当时的孙中山有根本的不同。而李大钊把孙中山主要依靠某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的错误作法，看作是“可以容许”的“一种战略”，就和我党对某一军阀的利用策略混为一谈了。由此，可以反证，李大钊对吴佩孚的利用战略，在认识上还是有一定局限的。

由上种种，所以当胡适派利用北京大学教授的老关系（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十六人中，北京大学教授就有十一人之多），拉李大钊在其“政治主张”上签字时，李大钊也就自然地同意了。

这种认识到1923年“二七”惨案后，起了根本的变化。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叛变和吴佩孚对“二七”工人的大屠杀，使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他们从血的教训中最终认清了军阀的反革命本质，而决心与之彻底决裂。“二七”惨案时，李大钊正在到武汉的途中。他“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狼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①

“二七”后的几天，李大钊就愤慨地说：“我们早就认定了吴佩孚和中国其他军阀完全一样，我们从前接受了白坚武的意见，派我们的同志到各铁路上参加工作，并不相信吴佩孚的什么保护劳工政策……”^②，表示要与白坚武断绝关系，各走各的路！从此，李大钊便加倍努力地从事与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了。

但是一些旧思想的残余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直到1923年底，他还说了一些受“互助论”影响的话。他在论述历史的发展时又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人“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

① 《李大钊选集》第499页。

② 朱务善：《回忆守常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集第345—346页。

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①但是，这些旧思想影响的话语，只是回光反照，闪了一闪，就永远消失在茫茫的晚空中了。1924年以后，从李大钊的著作中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痕迹了。从此，李大钊的思想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李大钊对“好政府主义”的认识过程表明，其思想的发展，是在反复、曲折中前进的。1923年底他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一文中曾说：“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平原无际，一泻万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两岸丛山叠岭，绝壁断崖，江河流于其间，曲折回环，极其险峻。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②李大钊自己思想的发展，岂不也是这样？他靠着“雄健的精神”，“冲过”了思想的“逼狭”的境界，进到了“平原无际，一泻万里”的宽阔新境，并不断地在“艰难险阻”中前进；思想的进路是没有平坦大道的。我们不应该从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这一曲折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吗？

（原载《辽宁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7页。

② 同上，第497页。

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初探

杜 蒸 民

武仁同志在《五四前后李大钊哲学思想探讨》一文^①中，对李大钊同志在1915年至中国共产党创立这一时期，即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明确肯定了李大钊同志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奠基人的历史地位。并着重从他的哲学思想方面论证了他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来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第一个哲学家”，“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时代的开拓者”的历史功绩。这些论述，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是，武文把这一时期李大钊同志的哲学思想，说成“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和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论断，我们是难以同意的。因为这个论断，不仅与武文在开头提出的也是国内史学界公认的，李大钊同志作为当时进步分子的代表，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旧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的论断不合，而且也与李大钊同志哲学思想发展的事实不合。

我们认为，李大钊同志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密切地联系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在武文所说的五四前后时期，以十月革命为界线，显现为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一、第二两阶段。在第一

^① 见《哲学研究》1979年第5期，本书下册。

阶段他的哲学思想只能是以进化论为特征的旧唯物论；第二阶段，才逐步成长为有初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家；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才进入了他的哲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随着他政治上日益成长为一个成熟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哲学上确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下面，我们就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求教于武仁同志和专家、读者们。

—

如所周知，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是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一个热诚的爱国主义者，投身到以《新青年》为阵地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去的。从当时他发表的《民彝与政治》、《青春》、《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一系列充满哲理的战斗文章中，我们看到他哲学上所使用的武器是以进化论为特征的旧唯物论，而决不是如武仁同志所说的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首先，在自然观或宇宙观上，与宗教及各种唯心论相反，他认为宇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质存在，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不同形态。他说：“种种教宗哲派，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①他认为与这种“宇宙一切皆为神造”^②的观点相反，“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或者叫做无始无终的大实在^③，不仅宇宙本身是自然存在，而且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即万事万物都是“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④，都是“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⑤的。他还指

① 《李大钊选集》第79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④⑤ 同上，第79页。

出，宇宙或物质世界也是运动的发展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永恒的。他说：“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①但是从宇宙的“万象万殊”来观察，即从具体事物的相对意义来观察，那么又是“有限”的，“有初有终”的，是“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②。接着他分析了具体事物生死、盛衰、阴阳、否泰、消长等等现象，说“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有阳”，“质言之有而已矣！”^③显然这是对客观世界的唯物主义表述。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宣告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唯心论“非生于今日世界之吾人所足取也”^④。表示了与唯心论宇宙观的决裂。

其次，他指出客观物质世界不是静止不动、停滞不变的，而是“不断之轮回”，“刻刻流转”的。他说“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⑤。又说：“大实在的爆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⑥他认为“宇宙大化之流行，盛衰起伏，循环无已”^⑦。而“新生命之诞生，固常在累累坟墓之中也”^⑧。这就肯定宇宙是运动发展的，而发展是沿着不断更新，即“新生命之诞生”的方向前进的。他的结论是“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⑨。更重要的是他已经看到事物存在着矛盾对立的两面及其联系，特别是矛盾着的两面的“不均”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而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⑩这种新与旧

①②③ 《李大钊选集》第66页。

④同上，第79页。

⑤同上，第64页。

⑥同上，第95页。

⑦⑧ 同上，第58页。

⑨ 同上，第95页。

⑩ 同上，第79页。

的斗争，构成事物发展的规律，这就是“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又说：“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及其均平，天地乃毁。”^①应该说，这种从事物内部去寻找发展动力的看法，是一种自发的辩证法见解。

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生物界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都是新的战胜旧的，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他说：“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发展观，他著文宣布孔子“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③。批判尊孔复古派“言必称尧舜”，“义必取诗、礼”的谬论，无情地鞭挞腐朽的旧事物，热情鼓励青年一代，以不断改造自己和追求进步的精神，勇敢地冲决历史上一切网罗和破除一切陈腐学说，为“再造中国”而奋斗。这样，他就使唯物论和进化论的发展观直接服务于以批孔为核心的反封建新文化运动。

他还提出大冲“真理之权威”的有唯物论倾向的认识论。他说：“余信宇宙间有唯一无二之真理”。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④在肯定世界的客观性时，也肯定真理的客观性。他认为所谓真理就是洞明实体的认识，而实体是“流”动的，发展变化的，因而对实体的认识也必将发生变化，所以“古今来之天经地义，未必永为天经地义，“而邪说淫辞，则又未必果为邪说淫辞也”^⑤。因此，人们的认识就不能停滞不前，要不断探索真理。

① 《李大钊选集》第 68 页。

② 同上，第 70 页。

③ 同上，第 80 页。

④ 同上，第 86、87 页。

⑤ 同上，第 88 页。

他指出人们获取真理之方法有二，“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即接触实际“求其真实之境”^①。他认为用这种办法，经过曲折反复的探索，就可逐步地取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他提出“与其信仰孔子”，“毋宁信真理”的口号，从真理论上直接为批判孔孟学说和“民主”思想作了有力的论证。当时他虽然还不了解实践在认识和检验真理中的作用，但他肯定真理就是对“实体”的认识，真理是发展的。不能不说是一种杰出的有唯物论倾向的见解。

在社会历史观上，他批判了各种英雄史观，主张“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的“唯民主义”历史观。他指出：“圣智之与凡民，其间智能相去不远。”“吾民当知国家之大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②又说：“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③这样，他就从人与人之间的智能“相去不远”，引伸到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政治结论，这种认识是深刻的。他还把两种对立的历史观直接与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说：“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④正是这样，他提出反对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为基础的改头换面的政治主张，诸如“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等口号，坚决否定有“官僚政治存在于世界之余地”^⑤。应该肯定这种与英雄史观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唯民主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主宰历史的观点，是同期包括陈独秀在内的许多进步分子所不可企及的，是一种接近历史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46、48、50 页。

③ 同上，第 29 页。

④ 同上，第 49 页。

⑤ 同上，第 81 页。

唯物主义的进步观点。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看到李大钊同志对宇宙的本原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有着辩证法的因素，真理论有唯物论倾向，历史观也有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这是他较同期其他进步分子更为激进的地方，也是十月革命后，他能迅速地转变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良好基础。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时李大钊哲学思想并没有达到辩证唯物论，而是以进化论为旗帜的机械唯物论，历史观则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论。

他在阐述自己的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时，始终是打着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旗号，始终是贯串着进化论的观点。例如在阐述对宇宙的看法时，强调“宇宙为有进化者”，而宇宙的变化，就是“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他在阐述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时，强调的是“天演之迹，进化之理”，是“儒家日新之旨”。在谈到新兴战胜陈腐，青春战胜白首的历史趋势时，强调的还是“天演之公例”。在批判旧道德，宣判孔学“死刑”时，同样是以进化的道理来加以论证。他还十分推崇维新派思想家谭嗣同，大量引用谭嗣同的言论来进行反封建斗争。这一切表明，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进化论和中国儒家“日新说”的结合，外加一些老、庄、佛的哲学语言，他与维新派一样用的是进化论的思想武器，所不同的是他更为激进。可见，他的哲学就是维新运动以来，中国进步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的继续和发展。

他在阐述宇宙的发展观时，没有引入“突变”的概念，在社会观上没有突出“革命”的意义，所以实际上仍没有超出“进化论”的范围。进化论的发展观就在于不承认质变或突变在发展中的意义。他这时所宣传的正是这种发展观。他讲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是强调“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①，

① 《李大钊选集》第79页。

他否认“突变”，讳言“革命”，甚至想求得“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①他虽然也讲“矛盾”，也讲联系，但讲的只是新与旧的矛盾，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联系，显然还不是辩证唯物论的科学的矛盾观和普遍联系的概念。这一切说明他的发展观有明显的机械唯物论性质，还没有超出进化论的范围，所以他对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还不能作完全科学的说明。

从他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论述看，他的社会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例如，他宣传过“精神具万能之势力”^②，认为只要中国人“良知一念之微明”^③，就可以拯救中国于沦亡。因此，他曾主张教育救国论。又如，他主张“唯民主义”，一面强调“人”和“众庶”在历史上的作用，一面又说“群枢”（领袖），有“移风易俗的力量”^④，还保留有英雄史观的尾巴，还谈不上如武文所说“科学地批判了帝王圣贤偶像崇拜，充分地论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他的“唯民主义”，不过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和托尔斯泰主义在中国的翻版而已。

总之，我们在充分肯定李大钊同志哲学思想的进步因素的同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指出他思想上的某些消极因素，恰当地予以评价，而不要拔高。

二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同志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比威力。他的视线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始了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从旧唯物论向辩证唯物论的转变。他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5 页。

②③ 同上，第 17 页。

④ 李大钊：《风俗》，《甲寅》杂志第 1 卷第 3 号。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政治、哲学论文，表明他的哲学观点已经越出了旧唯物论和进化论的范围，成为一个初步具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努力学习，热诚信仰，积极宣传并开始应用历史唯物主义。

首先，他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流派不同的学说“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①。他说：“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以使“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这种史观“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唯物史观“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它对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是“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②。这样，它就把两种历史观的对立从阶级利益上加以考察，肯定了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划清了两种历史观的界限。

其次，他写了许多文章热情洋溢地宣传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

关于存在和意识、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唯物史观把世界上的“万殊”现象归结为“物质”和“精神”两种，也就是存在和意识两种。他认为“自然、物质和人类的生活要求”等都属于物质现象，而“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③社会意识则属于精神现象。在物质和精神，基础和表层之间，他认为“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精神现象是物质现象的反映”^④。肯定了经济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决定因素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6页。

② 同上，第337、338、339页。

③ 同上，第261页。

④ 同上，第178页。

和最后原因。他说：“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指出精神、上层建筑也有反作用（不是决定作用），他说：“一切表层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程的大势走的。”^①就这样，他对唯物史观关于物质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作了比较正确的介绍，既坚持了唯物论，又避免了机械唯物论。

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他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而“基础构造的变动，乃以其内部促他自己进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他说：

“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社会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他进而指出：“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②社会革命就是在这种矛盾发展的基础上必然到来的。这样，他就简明地概述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

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他指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对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③。他说所谓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在土地共有制崩坏以后，经济的构造都建在阶级对立之上。”这种对立的阶级“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④。他认为从奴隶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在阶级对立中依次“进化”而来的，而“这资本家的生产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3页。

② 同上，第185—186页。

③ 同上，第189页。

④ 同上，第188页。

方法，是社会的生产方法中采敌对形式的最后”^①。他还指出，阶级斗争不但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说：“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这样，“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②的阶级斗争，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与阶级是在历史上产生一样，它也必将在历史上消亡。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改造社会消泯阶级”^③的最后时刻就到来了。这些言论与前期用“贪”与“惰”的根性说明社会问题的唯心史观对比，确是一大进步，标志着在历史观上，已由进化论和唯心史观向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的重大转变。

此外，关于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的论述方面，与前期抽象地主张“唯民主义”，实际上寄希望于“中级社会”不同，他明确提出“人民”或“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肯定人类历史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历史，劳动人民的历史。他说：“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④又说：“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的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⑤因此，他认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以张用之。”^⑥这就较前更深刻地批判了英雄史观。

他还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说明历史，指导现实斗争，这是他哲学思想转变的又一个重要标志。例如，他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进一步开展对以孔学为中心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8页。

②③ 同上，第223页。

④ 同上，第340页。

⑤ 同上，第191页。

⑥ 同上，第330页。

封建文化的批判；他还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写了一系列分析战后世界形势，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政治论文；他还运用唯物史观反击了胡适派的改良主义，研究回答了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等等。

综上所述，这时李大钊同志不仅信仰唯物史观，积极宣传唯物史观，而且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来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做出了可贵的成绩。但是，对他的哲学思想发展水平也还不能估价过高。事实是，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和运用都只具有初步的性质，他还学得不深不透、宣传得也不全正确，运用也不够娴熟，甚至还会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面前，目迷五色，真假不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平素对于马氏的学说没有什么研究”^①。具体表现如下：

（一）他还不能严格区别唯物史观和资产阶级社会学。例如，他把法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孔道西说成是“唯物史观的开创者”^②，说实证论者孔德与马克思一样，是“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③的哲学家。又如，他拥护唯物史观，又表示赞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赞成唯物史观，又不喜欢这个名称，认为把唯物史观叫做经济史观“妥当一些”，说唯物史观一词，“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④。他有时还把唯物史观叫做“社会组织进化论”，把科学社会主义叫做“社会主义运动论”，把阶级斗争学说叫做“阶级竞争说”等等。

（二）对唯物史观的某些原理尚有保留，对唯心史观有让步。例如，他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与阶级、阶级斗争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73 页。

② 同上，第 178 页。

③ 同上，第 288 页。

④ 同上，第 334 页。

规律之间的联系不理解。他认为唯物史观一面肯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是生产力，一面又说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是“矛盾冲突”，“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①。又如，他肯定阶级斗争学说，又说“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②。甚至说阶级斗争学说有“偏蔽”。这样，他实际上看不到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陷入了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历史唯心论的泥坑。所以，他对未来社会改造，“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③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④。这实际上是一种二元论的社会历史观，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三）在应用上，还不能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例如，对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的说明上，他虽然正确地看到它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但对道德产生于原始社会的情况又不能正确解释，不懂得原始社会的道德，同样植根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根源于原始公社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竟说“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道德心是动物的本能”^⑤，把道德说成是人的自然本性，这样，他又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泥坑。

我们约略指出李大钊同志这时的某些“未必精当”^⑥的理论观点，只是说明他在由旧唯物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转变过程中，有一个不成熟的过渡阶段。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0页。

② 同上，第222页。

③ 同上，第175页。

④ 同上，第194页。

⑤ 同上，第259页。

⑥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四卷。

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一面积极参加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一面更加发奋研究马克思主义。从他先后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今”与“古”》、《土地与农民》等许多文章看，与他政治上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立场相应，哲学思想上他则彻底地抛弃了进化论，或“创造的进化论”，主张“创造的革命论”，更加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观察现实和解释党的路线和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对马克思主义已“稍微知道一点”^①了。表明他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家。

首先，他更加坚定地拥护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拥护“创造的革命”论，批判复古主义和历史循环论。针对当时的复古逆流，他强调指出：“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爆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②他说：“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③据此，他批判了“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④形而上学和复古主义思潮。与前一阶段不同，他现在“崇今”是在辩证唯物论基础上，是肯定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是经历着由进化到革命的路程前进的。他形象地比喻说：“‘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

① 《李大钊选集》第 378 页。

② 同上，第 433 页。

③ 同上，第 506 页。

④ 同上，第 433 页。

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①是经历着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②。这样，他就把量变与质变规律，用来说明事物发展的客观进程，论证了革命的必然性，表明他从进化论转变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是他在前二阶段都未达到的新的哲学高度。

表明他从进化论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飞跃的另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他对社会改良主义的批判。例如，他把当时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运动区分为两大潮流：社会党人的改良主义运动，他称之为“创造的进化”论；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国际领导的运动，他叫做“创造的革命”论。他这样用“创造的革命论”来否决“创造的进化论”，表明他世界观上已明确地肯定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重大意义，是对自己所曾赞赏的“进化论”和“日新说”的清算。

在肯定世界的辩证发展的同时，他更坚定了对唯物史观的信仰，更加强调唯物史观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他说，我们“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③。这段话表明他已完全去掉对唯物史观的误解，衷心拥护唯物史观作为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拯救中国的导星”^④。这是与前期不同的，是他发展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又一标志。

其次，他更加努力和更加娴熟地应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批判唯心史观，研究历史和指导中国革命，朝着马克思主义

① 《李大钊选集》，第375页。

② 同上，第375、376页

③ 同上，第502页

④ 同上，第503页

理论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上前进了一大步，这是他这个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标志，是与前期相比最大的特点。

例如在历史研究上，他针对以“史书”为历史的错误观念，指出：“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不但过去的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即是现在、将来，社会无一时不在变革中。”^①他指出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出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②。根据这样的要求，他提出“改作重作”历史的任务，希望把那些被唯心史观，“怪诞不经的话”伪造出来的历史著作，加以改写，删去其神学迷信和歪曲，使历史著作建立在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基础上。为了实现这样的任务，他写了许多历史政治论文。他研究分析了宗教的本质和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源，指出原始宗教是“强力的缺陷”，“身体的缺陷”，“生命的缺陷”，“品性的缺陷”^③，即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力面前无力反抗的表现。他还分析了原始时代的中国历史，剥去了旧史书中对它的种种神化、美化的光环。他还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指出：“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④此外，他还较系统地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巴黎公社的历史，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他还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形势，说明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尽管这些文章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其明显的特点是，由于较深入地钻研了历史唯物主义，因而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说明，就显得更加透辟、深刻。而且由于他把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斗争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0页。

② 同上，第484页。

③ 同上，第393页。

④ 同上，第525页。

直接联系起来，从历史上为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作了论证，就使这些文章具有更浓厚的现实针对性和战斗性。

又如，在应用阶级观点进一步清算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方面，他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流的社会哲学，为十八世纪启蒙派的社会哲学。”^①空想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合于理性的时代”，方法是“平和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要求一个“阶级消泯的时代”，主张“革命的方法”，主张在“革命时期”，“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时期”^②。只有经过这个阶段，阶级才能消灭，“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③。这样，他就正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流派，赞成科学社会主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前期想用“互助论”和“工联主义”来修补阶级斗争学说的“偏蔽”，是又一个重大进步，表明与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彻底划清了界限。

他还用阶级观点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路线、政策作论证。他指出：“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④他认为中国“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有光荣的胜利的终结。”^⑤因此，他十分重视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反复宣传中国革命是“世界的一部”的思想。他还专门分析了中国的土地问题这个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实行“平民政治”，打倒封建军阀、虚伪的议会制度和一切特权阶级，要求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⑥。

他还写了大量歌颂工农群众运动的文章，宣传相信群众，依

① 《李大钊选集》第464页。

②③ 同上，第398页。

④ 同上，第554页。

⑤ 同上，第538页。

⑥ 同上，第401页。

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起来参加国民革命的路线。他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①，肯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他还集中地研究分析了农民问题，分析了历史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阶级，充分估计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他满怀热望地说：“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②他还正确地分析了鲁豫陕等省农民自发武装组织红枪会，并主张用《国际歌》的精神教育农民和武装农民，彻底肃清唯心史观对农民的精神束缚，集中地反映了他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光辉立场。由上说明，在对工农群众运动的态度上，他与党内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等一样，代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正确主张。这是他牢固确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

总之，这个时期李大钊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摆脱和抛弃了前一阶段尚残留的各种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从理论上说明，特别在应用上表明他已牢固地确立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当然，这不是说他已经没有缺点了，问题是与他的基本方面相比已经显得更为次要了。这表明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他不仅政治上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也相应地成长为一个比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发展史的新时代的开拓者。

（原载《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0页。

② 同上，第535页。

李大钊在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重大贡献

傅绍昌

1924年，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结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迅速地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都尽了很大的努力，做了不少的工作，而贡献最大的是李大钊。他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决策者、积极宣传者和坚决执行者，为促进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行国共合作，呕心沥血，勋劳卓著，被全党誉为促成国共合作的“适当主角”和“理想人物”^①。

一、参与确定并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对于如何开展革命，还缺乏明确的认识。经过斗争实践，特别是“二七”惨案以后，懂得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与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是不行的。于是，在共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10页。

产国际的指示下，我们党从1922年下半年起，就开始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便建立国共统一战线。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社会上各派政治力量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提议由共产党邀请国民党等民主派及革命团体，共同建立一个反对封建军阀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李大钊看到这个文件，兴奋莫名，“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①。他的态度如此鲜明，决非偶然。通过五四爱国运动的实践，李大钊逐渐形成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1919年12月28日，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大联合》一文，指出：“‘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已认识到只有依靠民众联合的力量，才能战胜反动统治阶级，夺取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又不断探寻联合的对象，争取以公开合法形式来推进工人运动，扩大革命力量。由此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党的决策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制订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李大钊原定要参加的，“但卒因事未能赶到”）。这次大会不仅制订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通过了同国民党及其他社会组织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决议，并提出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当选为中央委员。

我党召开二大时，马林已返回莫斯科。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根据他同孙中山会谈的情况，正式提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建议。共产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333页。

国际采纳了他的主张，并责成他具体贯彻实施。1922年8月，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来华。这月下旬，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党内合作的决定，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李大钊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在会前由上海寄往北京的一封信中提到，将于次日与陈独秀由沪去杭；并提到：他正与陈独秀等“商结合‘民主的联合战线’，与反动派决战。”^①西湖会议主要讨论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会上大多数人都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②而李大钊则基本上赞成共产国际的意见。他认为：从国民党的历史来看，它的组织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国民党多年，依然宣传无政府主义，不受约束。国民党内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也都是各行其是，足见共产党员加入进去，“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也不可能牵制我们的独立政策；孙中山不赞成党外联合，如果我们坚持己见，则联合战线难以实现，因而只有“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通行的办法”^③。后来，他在一次报告中，回顾我党之所以接受“党内合作”的联合形式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国民党照老样子不行，必须加入新的血液，我们个别地参加国民党，其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并设法使它同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④。总之，他认为中共少数领导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去做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党的二大既定政策的好办法。根据这些看法，李大钊进行了疏通

① 《李大钊传》第150页。

②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243页。

④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见《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工作；同时中国党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也有个纪律问题。因此，会议最后还是决定同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时要求国民党实行改组，取消入党时要打手印，要宣誓服从领袖等封建会党的办法，改行民主主义的原则。可以说，西湖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中，李大钊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国共合作问题。讨论中对共产党员是否全体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否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大钊和毛泽东等坚持了正确的主张，认为共产党员一面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利用统一战线的组织来发展工农运动，壮大我们的力量；一面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认识，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正式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党的三大，最后确立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与组织形式，从而正确地解决了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这一重大策略问题。

然而，党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重大策略，不是一下就为人们所认识的。当时，还有不少同志由于受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影响，以及认识上的片面性等原因，对这个问题存在疑虑和耽心。为了统一党内认识，使同志们了解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1922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杭州召开，李大钊没有参加，但他与邓中夏、黄日葵等六人联名写信向大会提出了一个《为革命的德莫克拉西》的提案，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提案明确指出：任何主义者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在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的前提下，“共同认定一联合

的战线”。又说：中国国民党“抱民主主义的理想，十余年来与恶势力奋斗……从今以后我们要扶助他们，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①同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阐明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热情地呼吁“全体人民”必须深刻认识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1923年4月，他又撰写文章，再一次强调必须与国民党“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② 这年秋天，李大钊邀集北京地委的负责同志和应孙中山之聘任政治顾问的鲍罗廷一起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会上，对于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问题，又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里面有许多腐化堕落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针对这些思想情况，李大钊耐心地进行了说服教育。他首先对同志们所提出的保持共产党的阶级立场和纯洁性的重要意见表示肯定，接着深刻地阐明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说：“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而共产党为了进行这个革命，单靠自己孤军奋战是不行的，也需要同国民党合作，“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总之，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第265页。

② 李大钊：《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

“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① 我们的任务就是积极地促其实现。这些详尽而透辟的分析，清除了错误倾向的影响，使大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自觉性

二、促进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实行国共合作

根据党的决定，李大钊担负起联络孙中山的重任，他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不辞劳苦，四跨长江，三赴上海，两下广州，为推动和帮助孙中山确立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而奔波。

从1919年起，李大钊就和孙中山不断有所接触，通过林伯渠向他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的情况。1921年12月23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桂林拜访孙中山，双方进行了三次长谈，详细讨论了有关中国革命及中俄结盟等重大问题。会谈后，孙中山打电报给廖仲恺说：“见过马林，心上非常高兴。”1922年8月，即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受党的委托，专程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彼此仰慕已久，一见如故。李大钊很敬佩孙中山，称颂他是“中国的革命老祖”^②。孙中山也很赞赏李大钊，他早就读过李大钊写的《Bolshevism的胜利》这篇著名论文，十分赞成李大钊科学地评价十月革命的见解。两人就象久别重逢的知心朋友一样，具体地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③，从天下大势到国共合作，“畅谈不倦，几乎忘食”。这次会谈十分成功。当时，由于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不仅向他表示慰问，而且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坚决支持和真诚帮

① 包惠僧《回忆李大钊同志》，见《回忆李大钊》第155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515页。

③ 李大钊《狱中自述》，《中共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助。对此，孙中山从内心感到高兴，认识到唯有共产党人是他最可靠的朋友。通过会谈，他对李大钊的精辟见解和非凡才能极为赞赏，从他身上“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①，坚定了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过了几天，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最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对李大钊说：“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尽管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②当时，宋庆龄曾问孙中山为什么要这样做，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③不久，中共其他一些负责人也先后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后，李大钊和孙中山的交往更为频繁。1923年1月17日，苏俄代表越飞，由李大钊、林伯渠等陪同，在上海会见孙中山，经过几天会谈，发表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这个宣言既表示了苏俄对孙中山的全力支持，也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最后确定，从而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同年6月，即党的三大期间，孙中山又特地邀请李大钊与他在广州会面。他们商谈了国民党改组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等问题。在多次接触和会谈中，李大钊和孙中山的友谊与日俱增。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④

李大钊在联络孙中山的过程中，是本着又联合又批评的精神，对国民党和孙中山进行真诚的帮助。他在《向导》上发表《普

①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② 汪精卫：《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见《政治周报》第5期。

③ 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见《宋庆龄选集》，第109页。

④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2日。

遍全中国的国民党》一文，在赞扬和鼓励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同时，也诚恳严肃地向他提出了批评和劝告。文章指出：作为“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但是，“国民党应该有适应这种需要……的组织和宣传的觉悟”。过去国民党偏重军事活动，“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而出，去宣传和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发展普遍的国民运动”这是“国民党现在唯一要紧的工作”^①。孙中山读着这些言词恳切的文字，象一股清泉汨汨地流进心田，思想上受到很大的触动。

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和影响下，孙中山开始了迅速的转变。从1922年9月起，他便依靠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冲破各种阻力，沉着地，一步一步地进行各项改组国民党的工作。9月4日，即在李大钊同他会谈后不久，他便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11月15日，孙中山召开第二次会议，审查改组方案。12月16日，国民党召集了第三次会议，讨论修改国民党的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1923年元旦，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言明确指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从依靠少数地方军阀到依靠广大民众，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的这一飞跃，是和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对他的帮助分不开的。从这年下半年起，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改组事宜。11月29日，孙中山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年底，李大钊应孙中山之邀请，赶赴广州，积极帮助他完成改组国民党及筹备国民党一大的工作。孙中山当年的卫士范良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李大钊到广州后，住在孙中山先生的

^① 李大钊，《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

大元帅府的官舍……我当时看到他们会晤频繁，为国共合作，携手革命而操心。”^①

1924年1月，以改组为中心，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王尽美等出席了大会。党中央决定由李大钊负责领导参加这次大会的全体共产党员。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这次大会通过的宣言和党章，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从而推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蓬勃发展。

国民党一大之所以能开得如此成功，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李大钊是被孙中山亲自指派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他不仅在大会开幕前积极帮助孙中山完成大会的准备工作，而且在大会期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李大钊是主席团的五个成员之一，和孙中山一起主持了整个会议的进程；同时还担任了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和出版及宣传问题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大会上兼职最多的一人。大会的两个主要文件——宣言和党章，他都亲自参加审定，花费过不少的心血。此外，李大钊还特别注意联合左派，同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就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关于李大钊在这次会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何香凝曾有如下回忆：在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先生和我都是代表，他的和蔼与诚恳的态度，以及他的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

^① 范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见闻》，香港《文汇报》1981年9月19日。

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表了极伟大的理论。……他的一切总被我们大家忆念着。”^①

三、挫败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阴谋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国民党中一部分右派从一开始就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1923年11月，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对此，孙中山进行了批驳。但斗争并未停息。在国民党一大上，这个斗争更加尖锐，达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当大会在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时，广州市代表方瑞麟等公然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指控所谓“党内有党”，提出在章程第一章第二条后增加一条文：“本党的党员不得加入他党。”^②这个提议得到极少数代表的支持。

面对右派的挑衅，李大钊毅然挺身而出，代表共产党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并印发了《意见书》，据理力争，痛加驳斥。其主要内容是：（一）说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推进国民革命事业。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愿来加入本党”的目的，决不是为“个人的私利”，而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二）痛斥所谓“党内有党”的谬论。他说：“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

^① 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见《回忆李大钊》，第140页。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又说：“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三）声明共产党员跨党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指出：“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是几经商讨“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特别是“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 织。”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是执行国民党政纲，并非要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四）强调必须消除已经潜萌的危机。他指出，本党既允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怀疑，那种对于共产党员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 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① 这些开诚布公、义正词严的讲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国民党人黄季陆记述此事说，李大钊作上述声明时，说得声泪俱下，“全场似已全为李大钊的话所动”^②。李大钊既坚持革命原则，又很讲究斗争策略，他在同右派斗争的过程中，非常注意“和左派的联合”。会上，廖仲恺等发言支持李大钊的意见。大会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总之，李大钊的发言和《意见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真正的民族革命的观点”，挫败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阴谋，消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推动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和国共合作的实现。

四、坚持在统一战线中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

统一战线的关键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

①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见《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6期。

② 司马璐编著，《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三部，第59页。

的领导下，才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夺取革命的胜利。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是有缺点错误的，其主要表现就是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过低估计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当时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陈独秀不仅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这一错误估计，并从右的方面作了发挥，完全无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之需要与可能”^①，因而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统率”。

李大钊却不这样看，他在国民党一大结束后的第八天，即1924年2月7日，在《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的演说辞中，分析和估量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明确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②同年7月1日，他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报告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团结左派，反对右派，保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指出：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他们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说：“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派拉到我们这一边，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的存在而遭到极大困难，但是北方的工人组织仍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一支革命的先锋队。”^③这些表明李大钊已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

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担任了国共两党在整个北方的领导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他为保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

①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② 《李大钊选集》第500页。

③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权作了很多努力。国民党原在北方已经没有什么组织，只有少数几个上层人士的党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很快地建立了北京市党部、天津市党部、直隶省党部等各级党部，后来又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方分会。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一面派了不少得力的共产党员去指导和加强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工作；一面在国民党地方党部举行选举时，我们党组织进行周密的准备，努力使领导权掌握在进步力量手里。总之，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由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在国民党的发展工作中，也十分注意吸收大批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输送给共产党或共青团。为了加强党对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共北方区委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专管国民党的事情，由陈毅具体负责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揭露和斗争。在北方活动的右派，起初有以冯自由等为首领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后来又有西山会议派分子在北京组织的伪地方党部。他们到处与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公开对立，分庭抗礼，甚至不惜与帝国主义和军阀相勾结，从事种种卑鄙的反革命勾当。面对这种情况，李大钊领导着北方各级党组织，依靠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紧密合作，团结中派，向右派作了坚决斗争。当时，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发表许多篇文章，揭露了右派的反动面目和阶级实质。这些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右派与反动派是一家人”，“除了反对广东国民政府、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他们没有别的工作。”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商人”的利益，“而不代表几千万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因此在国民革命内部，向他们作斗争，是必不可免的。右派争夺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手法，就是常常撇开左派，另搞一套，擅自举行集会、游行等等。每当遇到

这种情况，党组织不仅发动进步力量去参加，而且依靠群众的支持，把领导权从他们手里夺取过来。如在五卅运动中，北京的右派团体单独在天安门召开所谓“第三次北京国民大会”，提出“对英政府单独交涉”的口号，并企图通过一个降低要求，缩小范围，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决议案，党发觉后，立即组织北京学联、沪案雪耻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团体及所属群众，冲破重重障碍，参加了大会。广大群众对右派的包办行为和妥协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慨。结果将他们驱逐出会场，由左派团体的代表主持大会，通过了具有鲜明反帝色彩的决议。经过这些斗争，在北京，右派孤立了，完全被搞臭了。

综上所述，李大钊在领导北方地区的工作中，表现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他充分运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形式，大力开展工、农、学生运动，坚持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依靠共产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团结中派，对右派进行坚决斗争，有力地扩大了革命力量，推动了北方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燃起了熊熊的革命烈火，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李大钊在开封

张 绛

我党创始人之一、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曾两次莅临开封，从事革命活动。多年来，对此重要史实研究不够，论述涉及不多，说法亦不尽一致。最近，我们在编写开封地方党史工作中，做了一些资料征集和调查访问，现草撰此文，以求教诸专家和党史工作者指正。

建党初期的开封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开封引起强烈反响。于此前后，随着新思想的传播，进步青年纷纷建立社团或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阅读《新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研究社会问题。同时，由于汴洛铁路的修筑，开封等地设立了一些修配厂，加上少数官办和私营的工厂企业，工人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这都为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1921年11月继陇海路首次大罢工之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直接关怀下，开封铁路工人中已经涌现了第一批共产党员；1922年夏，著名共产党员李之龙（后任中山舰舰长）曾在古城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并向中央报告，准备在河南建立共青团组织^①；1924年，第一师范英语教员、共产党员冯品毅（字庆升）

^①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及嵩阳中学国文教员、共产党员江梦霞都曾分别在学生、工人中秘密建党。但做为省、市一级党的组织，尚未建立。1925年元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明确指出：“在尚未有我们组织的其他工业区及大都市，如东三省、河南、重庆、九江、芜湖、福州等均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

就在党的“四大”召开前夕，河南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胡景翼（笠僧，陕西富平人）率国民二军进驻河南，在开封就任河南督办。这是十分有利的时机。于是，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一批共产党员如王若飞、肖楚女、李求实等先后到达开封，开创了党在河南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在开封地区活动的高潮。

团结胡景翼，发展革命形势

胡景翼十分敬慕李大钊。早在1924年他率军驻防京津时，听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由李大钊协助进行的，就极力设法想结识李大钊。于是，胡通过同乡、北京大学教授康醒浮的关系，认识了李大钊。此时，北方区委为广泛发展统一战线，也开始主动接近冯玉祥、胡景翼及其国民军。一些苏联顾问、共产党员先后到达国民军中工作。胡景翼来河南之前，李大钊就恢复京汉铁路总工会，曾对胡景翼提出了希望（此时，大钊同志已营救了“二七”以来保定、北京、天津等地被捕的工会领袖），胡表示将予支持。这样，著名工会活动家张昆弟等到了郑州。

胡景翼抱着“欲积极刷新，期成清明之政治”和“网罗人才，邀致名流，欲以豫省为始基，推行主义于全国”^①之目的，

^① 见胡景翼遗嘱。

1924年12月12日抵开封。在稍事安顿之后，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和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胡景翼期望孙中山和李大钊能到河南一行。此时，孙中山先生正病卧天津。胡景翼便派随国民二军到开封的屈武等人为代表，前往京津。一方面看望孙中山，一方面邀请李大钊莅豫。

屈武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是受李大钊命到河南协助胡景翼工作的。据屈武回忆，他大约是在12月20日左右在北京面晤李大钊。因工作较忙，李大钊表示到开封是否成行，尚需考虑。在此期间，屈武以他岳父于右任的关系，赴天津看望了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还委托屈武做为他的代表，赴陕西筹备国民会议。屈武返京后，李大钊同意立即动身到开封来，大约12月下旬，由屈武陪同抵达古城。

当时，开封出版的《新中州报》12月16日曾以“孙中山来豫传闻”登载“昨有自津来者，谓胡督办前派赴津欢迎孙中山先生之代表，日前曾以电话向北京传达，言中山先生业经面允。俟到京后，当赴豫一行云云”之说，这和屈武的回忆基本吻合。

李大钊到开封后，住督办公署交际处。屈武参加了最初李、胡会谈。以后，屈离汴赴陕，便由刘允臣（守中，胡景翼的心腹参谋）、胡景铨（胡景翼的三弟，时任国民二军旅长）等人参加谈话。

从屈武、胡景铨的回忆中，李大钊在开封的主要活动是：

首先，根据胡景翼的要求，李大钊同意增派苏联专家、顾问，帮助整顿国民二军（王若飞自传中还记述了拟建立类似黄埔军校性质的军官学校）；在苏联援助军火的分配方面，给国民二军以优厚，派一些青年（实际多是共产党员）到开封协助工作等等^①。

^① 《屈武、马文彦谈李大钊到河南》，《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版第4期。

其次，是做胡景翼的工作。胡景铨清楚记得有这样一次谈话：“李先生谴责吴佩孚在京汉铁路枪杀工人，还讲了工人力量大。我大哥胡景翼说，‘我就是要依靠工人，工人说话算数，他们不哄你！’我说‘工人不造枪，咱就没有办法。’李先生说，不光是那些，没有工人劳动，怎么养活我们。还说了些无产阶级的道理。”^①经过李大钊的工作，胡景翼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和以后河南工人运动的开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另外，李大钊还会见了随国民二军到开封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他在古城停留一周，便于1925年元旦前后返回北京。不久，创建河南党组织的任务，即酝酿进行。李大钊亲自派北京大学学生杨晓初（陕西人，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到开封，公开职务是河南印花税处帮办，实际上担任党内交通。杨在后保定巷六号侯宅，建立交通站，为以后王若飞的到来，以及李大钊与王若飞的联系，做了许多工作。李大钊派往开封的另一名共产党员刘天章（陕西人）任国民二军学生营营长。后曾任豫陕区委委员，分管军运。刘、杨等人都是河南建党初期的骨干。

争取岳维峻，力挽河南危局

李大钊再临开封，是在河南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重要时刻。

1925年4月10日，河南督办胡景翼患疔疮，不治身亡。军政职务由国民二军师长岳维峻继任。岳“这个人是思想落后守旧，孤独傲慢的人，对胡景翼在世时制定的各方面政策不能很好执行，对胡景翼时的主要工作人员不敢大胆重用，对开明的国民党元老疏远，对共产党冷落无情。”^②

^① 1981年11月23日胡景铨谈话纪要。

^② 《屈武、马文彦谈李大钊到河南》，《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

岳维峻上台初期，表面上愿意按照胡景翼遗嘱行事，但随着地位的巩固，他野心毕露，积极备战，不顾国民二军和后方实力，准备向外扩张地盘，计划东攻山东，南打湖北，北取保定，西战山西，即所谓的“杀四门”。不久，此事由在开封的苏联顾问报告给了李大钊。再加上，胡景翼死后，国民二军内部矛盾重重，当时《向导》周报曾深刻指出：“二军分子甚为复杂，岳维峻之才能，不足以驾驭，又加之信用马骥，忌斥胡景翼旧人，联络吴佩孚”等，李大钊深感河南形势十分严重。于是，李大钊与于右任一起，为争取岳维峻，又到了开封。

李大钊到开封后，次日上午由刘允臣、胡景铨陪同前往督办公署会见岳维峻。此时，岳正躺在床上吸大烟。李大钊风趣地说：没关系，不要急，你吸你的大烟，等会再谈事情。岳维峻尴尬地连忙起床，来到了会客室。

李大钊问岳说：“现在局势紧张，你准备打谁？”岳答道：“最近，张之江派人来找我，说是准备和吴佩孚联络，攻打奉军。”李大钊在分析了各方军情后说：“你不要弄着这一摊，又搞那一摊。目前，奉军的威胁暂时还不算大，你应该集中力量先打吴佩孚。京汉铁路工人我已经安排好了。”^①考虑到河南后方必须加强，岳维峻表面上同意李大钊不要“杀四门”的劝说，并乘机要求李大钊继续向国民二军派人，以加强实力。

李大钊还向岳宣传党的主张，希望他要支持工农运动。并具体提出了豫陕区委工作人员的交通问题。岳维峻满口答应同意解决，当即写了张条子：“马文彦（张注：陕西三原人，现任陕西省政协委员，当时在河南参加筹备总工会）要票就给，不论等级。”因马文彦当时不在开封，李大钊到郑州后，派人把马文彦从信阳叫回，亲自把岳所写条子交给了他。豫陕区委的交通问题暂时得

^① 1981年11月23日胡景铨谈话纪要。

到了解决^①。

李大钊在汴期间，住在郑州的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专程来到开封，向李大钊汇报了党的工作^②。

李大钊离开封之后，善于耍弄权术的岳维峻，把李大钊的劝告置之脑后，一意孤行，仍坚持联络吴佩孚，攻打山东，终于在1926年2月，国民二军失败，吴佩孚的魔爪重据河南。

目前，对李大钊第二次到开封的时间，说法不尽一致。曾经向李大钊汇报过工作并接受指示的马文彦回忆是1925年秋冬；曾在开封面晤李大钊的胡景铨记忆是同年夏天；《李大钊》（张静如、马模贞著）一书则说：“一九二五年四月，大钊同志曾应国民党中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对胡景翼的继任岳维峻作工作，解释和宣传我党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并在开封各学校及民众团体的欢迎大会上发表了演讲。事后，大钊同志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我们认为，对比诸说，胡景铨的记忆较为准确：

第一，胡景铨是李大钊两次开封之行唯一健在的见证者。他还提到，李大钊到开封，正是岳维峻暗地与吴佩孚代表举行鸡公山会谈前后，而鸡公山会谈是在是年7月30日。

第二，马文彦虽未直接介入李大钊开封之行，但他在郑州曾见到李大钊，特别是他作为早期派到河南活动的共产党员，所提供的史料很值得重视。但是，他把李大钊来开封的时间说为秋冬之际，疑记忆不尽确切，据有关资料说明，岳维峻是年秋季已开始反共。11月3日河南省会警察厅即通令各区警察署：“查散布传单，宣传赤化，早经布告严禁。”“嗣后各区队如果拿获散布匿名传单，暨破坏共产机关，即行酌予奖叙。”^③ 据此，《中州评论》（肖楚

^{①②} 《屈武、马文彦谈李大钊到河南》，《河南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年版第4期。

^③ 1925年11月4日《新中州报》。

女主编的党的刊物)当即以《异哉警察厅之所谓赤化》一文,予以有力驳斥。在这种形势下,李大钊来到开封,并提出要岳维峻解决豫陕区委工作人员的交通问题,似不大可能。同时,鸡公山会议,8月初各报均已披露;10月24日,岳维峻又派代表周愚夫到武汉面晤吴佩孚,11月初,国民二军要攻打山东已成定局,李大钊亦不可能再有战前分析和规劝岳维峻之举。

第三,《李大钊》一书提出是在该年4月之说,似乎时间过早,疑亦不大可能。因为胡景翼于4月10日死亡,19日岳维峻发表代督就职布告,27日才公布“特任岳维峻署理督办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的命令^①,岳在个人势力尚未巩固之前,就轻易改弦更张,向四方扩张,也恐时间尚来不及;再者,胡景翼死后,丧事之料理,亦需时间,直至五月三日岳维峻还以“胡督办治丧办事处总协理”名义,宴请治丧处人员,他岂有时间安排军事行动;特别是王若飞曾专程向李大钊汇报党的工作,而王若飞到河南的时间却是1925年5月以后的事。

说明李大钊是在夏季(估计七、八月)赴汴的另一个佐证,那就是1925年8月在开封出版的《雷火》小册子上,登载有署名李守常的一篇讲演稿,这是一篇李大钊的重要佚文。

《雷火》与李大钊佚文

《雷火》是1925年开封第一师范青年学社创办的进步刊物。青年学社是当时开封进步社团中成立较早、人数众多、影响较大的组织。1926年初与其他社团合并时,他们已有社员约三百人。领导人韩源波、裴光都是共产党员。可惜,《雷火》原件散佚,仅开封市图书馆藏有第八期一册。

^① 1925年4月27日《新中州报》。

《雷火》第八期发行于1925年8月6日，该刊注明为周刊，依时间推算，当创刊于是年5月底或6月初。第八期上共刊登三篇文章，即《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李守常）、《单独对英问题》（王若飞）和《陇海铁路总工会恢复宣言》。

李大钊在文章中，罗列了英帝国主义三百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热情讴歌了太平天国以来的革命运动，提出了“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口号。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诸位，全都起来，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孙先生死时，囑我们保存遗体，就是孙先生一眼望着我们的革命成功之后，他才安心的”。

《雷火》在李大钊文章后面，有几行引人注目的附注：

“一、此篇未经先生校阅，错误之处，想必极多，望读者诸君见谅！

二、原来此文甚长，因时间限制，李先生只能讲这些，唯闻先生言，他日当写出，供大家阅看，记者固极望能如愿也。”

这表明由署名“员生”笔记的李大钊讲演稿，是首先在开封发表的。此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大钊第二次抵汴的时间。

其一，李大钊、王若飞的文章同期刊出，而在王若飞文中有“我们不能不详细揭破其阴谋，指出其错误，使彼之宣传不在河南发生不良影响”字样，该文演讲于河南无疑。而据中央档案馆藏1925年7月15日共青团开封地委建立及活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出：“置各校暑假期间，留汴同学组织暑假讲习会，聘若飞讲演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每周两次。”李大钊、王若飞的讲演和此一活动有无关联？

其二，王若飞在文章中，有“自五卅惨案以来，北京学生不断的派出代表来豫宣传”的语句，那么讲话时间肯定是在“五卅”惨案之后，而李大钊亦是重点讲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时间亦应在五卅惨案之后。如果此文是李大钊4月在开封之演讲，

为何《雷火》在前几期上不予登载？当年曾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师范大学）六号楼，聆听过李大钊讲演的李瑞安，清楚地记得那是1925年6月沙基惨案以后，“李导师讲演内容，主要是说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史。”“今天不仅忆起导师讲话之大要，即如因他来时，适值炎夏，身穿一件白夏布长衫，从台之左侧走上讲台，那样的细节，在我脑海中今天犹有清晰的印象。”^①

遗憾的是，《雷火》刊登李大钊文章时，未注明讲演的具体时间、地点，我们仅能做上述一些简单的分析与推断。

从李大钊两次亲临开封的史实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大钊做为我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对河南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活动的开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不愧是河南党组织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中原地区所建树的革命业绩，将永垂史册。

（原载《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① 李瑞安，《革命导师李大钊在中州大学讲演纪要》。

李大钊与冯玉祥

杨荣华

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非常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他不仅在南方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而且在北方积极争取、帮助冯玉祥。这对当时冯玉祥倾向革命、同情中国共产党、发展北方革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中共北方区委分析、研究了当时政治斗争形势，认为这是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有利时机，遂确定了争取冯玉祥的方针。

李大钊根据党的决定，“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并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中下层官兵的工作”^①。因此，在国民军第二、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或其他职务。经过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冯玉祥结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为实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冯决定请苏联政府派人帮助训练军队。他在张家口办了军事学校，由苏联军事人员担任顾问、教官，其中也有中国共产党员参加工作，如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当时任俄语翻译。冯玉祥在同李大钊的接触和交往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两人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冯曾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来

^① 李葆华《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①。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对群众的革命活动采取了保护政策。他的大刀队在北京常以“维持秩序”为名，保护群众的集会、游行，对付段祺瑞军警的破坏和镇压。

1926年，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冯玉祥得知后，马上派兵解除段的卫队武装，对他们镇压群众表示抗议。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进攻北京，国民军准备撤离。冯的一个旅长到李大钊的住处，“恳切地要求保护李大钊出北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而李大钊为了革命工作，不计个人安危，不愿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后，委任共产党员刘伯坚为国民军政治部主任。李大钊又派石克宣、邓希贤（邓小平）、刘景桂（刘志丹）、陈延年、宣侠父、安子文等一批共产党员去做政治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在冯玉祥的部队中，《社会主义概论》、《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均可公开传阅，“许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国际歌》。”^②由于共产党员开展政治工作，宣传革命思想，使得国民军的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工作深为“钦佩”，称赞他们“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办事有精神”，“故工作有特殊成绩”^③。周恩来同志曾说：“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④西北军所以会“成为当时之雄”，这与李大钊对冯玉祥的影响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五原誓师”后，国民军“究应由南口攻北京抑应猛攻陕西而后出潼关？”冯玉祥举棋不定。正在这时，“李大钊先生派人送给

① 《我的生活》下卷第421页。

② 同上，第553页。

③ 同上，第505页。

④ 《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4日。

我密件，建议我们出长安会师郑州”^①。这是根据党中央对北方形势的分析，提出的正确作战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西北军既可取得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作为北进的巩固后方，又可与北伐军胜利会师共谋北进。冯玉祥欣然采纳李大钊的计划，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八字方针。这一方针的执行，对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李大钊的“密信”被冯玉祥视为永远具有纪念意义的“珍品”^②。

1927年5月，冯玉祥兵临潼关，惊闻李大钊同志惨遭反动军阀张作霖杀害，国民军广大官兵“悲愤万状”，冯玉祥“哭之甚哀”，他当即发出追悼李大钊电，深切哀悼李大钊同志的壮烈牺牲，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电文对李大钊同志革命功业作了高度的评价，称李大钊“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在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他的牺牲，“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为此，他提出：一、国民军全体官兵于潼关总部开追悼大会，并令全军一律戴孝；二、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大规模的追悼活动；三、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
动，使全军和全国人民认识“此种重大惨案，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和张作霖一手制造出来的”，同时应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打倒凶杀主谋的日英帝国主义”，最后，他号召军民“要完成李大钊等十二位烈士的未完事业”，实行他们“未竟的志愿”^③。

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在其潼关总部所在地树碑纪念李大钊等烈士（碑长1.12米，宽0.7米，现藏潼关县文化馆）。碑文如下：

① 《我的生活》下卷第495页。

② 同上，第495—496页。

③ 《冯玉祥追悼李大钊电》，汉口《国民日报》1927年5月21日。

何故被绞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响
为最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非为同志等之寿夭
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革命潮流终不被绞杀兮将更为之激荡而高涨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十二位同志之死兮为全世工农
革命者肉体虽可死兮其精神永留于被压迫者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冯玉祥

一六、五、九于潼关

1927年6月，冯玉祥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当时，蒋介石已背叛革命，北伐军面临危急的关头。冯玉祥由于对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缺乏认识，在郑州、徐州两次会议后，被蒋暂时地拉了过去。但是，冯玉祥毕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受过共产党影响的将领，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后，他逐渐认识了蒋介石的真面目并与之决裂，最后成为一个坚定的反蒋、反帝、接近共产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冯玉祥的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实与前期李大钊对他的帮助、教育有很大关系。

（原载《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

李大钊对新民主主义 革命道路的探索

韩 翼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在党成立后、特别是在“二大”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便逐步提了出来，在党的“四大”上已经初步形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这些基本思想。它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李大钊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实际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与道路，是李大钊首先进行探索的，并在党的“四大”前就作了重要论述，为“四大”初步形成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了重要理论准备。

（一）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认识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也是理解中国革命性质是否由旧民主主义飞跃到新民主主义的根本标志。李大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过程，但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人。

十月革命前，当李大钊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当然只能认为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并以资产阶级为社会之“中枢”。但是，那时他就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反对“神武”“英

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有了新的认识，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具有“雷霆万钧的力量”，是最“有实力”者。他宣称：“民众万能”，“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唯一的基礎”，而“其余的分子不过是攀缘他的一种附属品”。他号召人民群众认识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这种伟大力量。他说：我们的解放，“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而绝不应当“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①。

他又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毅然以张用之。”^② 强调无产阶级应该积极发挥自己的权威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决不能再走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而要走“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道路。他指出，我们应“竭力”把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加以“区分”，因为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已为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用烂了”，没有前途了。“现在的平民政治”，“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必定要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必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李大钊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看作是无产阶级的“新观念”、无产阶级革命的“真髓”，而给以很高评价。1923年8月，李大钊在论述圣西门的历史观时又指出：“产业者阶级（即工人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6页。

② 同上，第330页。

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①强调了无产阶级的越来越大的极端重要性。这些认识，为李大钊后来树立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来，党的“二大”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②的思想；但又认为目前无产阶级应“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李大钊继承了“二大”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的积极精神，经过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鼓舞与1923年“二七”惨案的教训，1924年以后，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逐渐有了认识。1924年2月7日，他在广州工会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行的“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大会”上的演说辞中就指出：“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③李大钊这段话明确指出两个重要思想：第一，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最坚决；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则没有这种彻底革命精神与行动。第二，在当时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只有无产阶级能充任领导阶级，排除了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是当时我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最早的、也是初步的认识与表述。

在此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即在1924年7月1日，李大钊便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进一步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他在向大会介绍中国革命情况时说：在帝国主义列强厚颜无耻地侵略行径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发展。“站在运动前列的是工人和知识青年。我们的同志在领导着这一运动。”而国民党在改组以

① 《李大钊选集》第472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③ 《李大钊选集》第499—500页。

前，“仅仅企图依靠武装力量扩大他们的地盘，并没有群众运动的概念。”只是在它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参加同群众的接触，并公布宣言号召打倒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这就是说，国民党的改组与新生，也是在我党的影响与推动下进行的，出自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总目标，我们党对国民党抱有很大企望，并为帮助国民党走向反帝反封建的正确革命道路作了大量工作。李大钊指出：“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殖民地国家，需要发起一个由集中的党所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个党须能联合一切群众的行动。”因此，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们党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了国民党。“目的在于改组它，改变纲领，并设法使它同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国民党“一大”后，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民族民主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事实证明，“我们参加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我们参加该党的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① 这些论述表明，李大钊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已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国民党走上革命的新生道路，也是在我党影响与推动下实现的。由此才推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李大钊这时还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应该争取领导权。实际上我党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就必然存在一个谁领导谁的问题。李大钊曾指出：“我们在国民党中间把左派拉到我们这一边，从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② 是我们在国民党中间工作的目的之一。同时，在对全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上也有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当时北方的工人运动与工人组织，已“掌握在

^{①②} 均见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6期。

我们手中”；但是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间有一定影响。因此，“我们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以便把它培养成一支革命的先锋队。”^①这种要在实际革命运动中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比只是认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更为重要，更为可贵！

李大钊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全新的观点。它不仅冲破了当时共产国际要中国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一切运动中只是“帮助国民党”的错误观点的束缚；也是对我党“三大”认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②的右倾观点的纠正；对全党于1925年1月“四大”上，最终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中国农民同盟军问题的认识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关键。李大钊对中国农民问题早已注意。还在五四运动前夕，他就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是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还揭露了中国农村的极端黑暗情况和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农民既占人口大多数，又最受压迫，所以他们是民主主义的“根底”与“源泉”。因此，李大钊曾热烈号召青年到农村去，发动与教育农民，建立民主政治。他说：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在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农村实现了民主政治，全国实现民主政治就有了希望。

①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②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五四运动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便亲自发动与领导了北方的农民运动。当1922年8月长辛店工人罢工时，李大钊就领导了北京郊区的农民，向北京军阀政府发出停止征收菜捐的“最后通牒”，停止给北京运粪送菜。斗争取得了胜利。李大钊高兴地评价这次斗争说：“这样，工人农民就联合起来了。”^①后来，他在领导北方工农革命运动时，曾亲自给党员干部讲授农民问题的课题，训练农民运动骨干，推动了各地农民运动的开展。1925年至1926年，在李大钊的领导与全国农民运动的推动下，北方的农民运动有了迅速发展。各地纷纷成立农民协会，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对封建军阀与土豪劣绅的激烈斗争。为了指导与开展农民运动，李大钊就农民问题的一些重要方面，从理论上作了深刻论述。

第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动力，土地问题是农民的中国农民的急切问题。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与其半殖民地的社会及落后的经济状况分不开。“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②特别是在“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情况下，广大农民逐渐走向破产的道路。这“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农民被迫反抗剥削，是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③因而，“工农阶级”成了革命的“主力军”^④。

李大钊正确地指出，要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必须解决农民的

① 转引自《李大钊传》第133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525页。

③ 同上，第526、535页。

④ 同上，第525页。

土地问题。李大钊总结了历史上关于土地制度的一些政策与农民战争中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些主张后，指出，他们都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甚至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的主张，也“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近代，农民破产的趋势日益严重，以至完全丧失土地，流入城市或为“兵匪”。因此，李大钊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他指出，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①。然而，要真正实行“耕地农有”，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②这样，李大钊便把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已察觉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土地问题。

第二，必须依靠贫雇农组织农民协会。李大钊认为，要发动与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③他具体地分析了农民的各阶层，指出，贫农和佃农是农民中最多数和最困苦者。因此，农民协会应以贫农为主，并坚决维护他们的利益。他说：“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农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④同时，他又指出，要建立真正的农民协会，必须坚决摧垮旧的所谓“农民团体”。因为“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⑤所以农民必须组织自己的协会以取代旧的组织。

第三，要重视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改造旧式农民组织的根本问题是对在旧式农民组织影响下的广大农民群众进行教育，使其

① 《李大钊选集》第 532 页。

② 同上，第 525 页。

③④⑤ 同上，第 534 页。

提高思想觉悟。李大钊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和一些历史原因，旧式农民组织中的广大群众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如迷信鬼神，狭隘的村落主义与乡土主义等等。因此，李大钊号召革命者“赶快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认识关于中国农民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李大钊的这些思想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看出，他是在尽力设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无产阶级同盟军的轨道，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同盟军的思想。

（三）对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认识

正确对待资产阶级民主派及其代表孙中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他一贯坚持民主主义立场，为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奋斗不懈。李大钊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予以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①。他说：孙中山先生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他的一生的事业在指挥中国民众向那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和自由的仇敌进攻”^②。这一认识，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对孙中山的评价是一致的。当孙中山在中国共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7、538页。

② 同上，第563页。

产党的帮助下，决心以俄为师，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时，李大钊赞赏说：“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①正是由于孙中山的这种努力，才使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②。

基于上述对孙中山的认识与估价，李大钊认为，我党对国民党“再不可取旁观的态度”了，而应“帮助他们”，“扶助他们”。

“任何主义者，我们以为都应该在这时抛弃一切武断的成见，客观的考查中国的实际情形，应该在此时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③这便指明了与孙中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同时，李大钊又认为，要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必须对国民党进行改组。1923年2月，苏联政府派来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到达北京，与在京的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讨论了国共合作问题，李大钊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说：当前的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发动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要求国共合作。但是，“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李大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缺点很多，它“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它还是大有希望的；如果不是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李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563页。

③ 《北京同人提案》，《少年中国》第8卷第11期，1922年6月1日。

大钊又强调了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阶级性与纯洁性的重要性”^①，主张保持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决不能因合作而丧失我党的无产阶级立场与特征。

李大钊的这些思想对我党广大党员起了极大的教育作用。当时有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里面有许多腐化堕落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来。因此担心如果我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会失掉我党的阶级立场，损害我党的纯洁性。李大钊上述的既要国共合作又要改组国民党、并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意见，解除了上述同志在两党合作问题上的疑虑，从而统一了认识，大大促进了两党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立。

（四）坚持与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李大钊以主要精力从事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对国共两党合作的建立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国共合作建立后，李大钊又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而斗争，有力地批判了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反动谬论。

国民党右派出于其反革命的阶级本性一直反对国共两党的合作，特别是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当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时，国民党右派分子就公开跳出来向我党发动猖狂进攻，并制造了种种谣言攻击我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革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拍案而起，当场发表了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声明，申明了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与政策，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我党的攻击，维护了国共两党的合作政策，使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形成。

李大钊这一声明，宣传了“我们对真正的民族革命的观

^① 均见栖梧老人：《回忆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上集，第366页。

点”^①它对粉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促成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极大的作用。后来何香凝在回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说：“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改组国民党与联苏、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发挥了极伟大的理论，现在想起来，那些话是非常正确的。”^②

国民党“一大”后，李大钊即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是权力最大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身份，领导了国民党在整个北方地区的工作。在李大钊的努力下，建立了国民党北京支部、天津市党部和直隶省党部，发展了大批党员，并建立了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政治委员会，使国民党在北方获得新生。李大钊在领导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注意扩大左派，团结中派，反对右派，并运用统一的组织形式，深入细致地作社会上层人物的工作。如采取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打倒段祺瑞和奉系军阀的策略，争取了北方的有利于革命的政治局面。他更以极大的注意力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公开组织工、农、学生运动，团结了广大革命群众，促进了整个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他还继续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特别揭露了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对抗和破坏中国革命运动的阴谋，认为这应引起我们“时时刻刻的注意和监视”^③。1925年10月30日，针对国民党右派林森、邹鲁、谢持等企图强占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阴谋活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与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的信致中国国民党员》，揭露了那些“想使国民党分裂，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的人的反革命面目，高举团结的旗帜，号召为“更坚固的巩固我们对付压迫中国工人阶级与压迫中国民众的敌人的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

①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② 何香凝：《众志成城不可摧》《大公报》1950年7月9日。

③ 《李大钊选集》第560页。

1926年元旦，针对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上述活动，李大钊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升旗典礼上又发表了《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说，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站在青天白日旗帜下，打破帝国主义及反革命的黑暗势力！”他还号召国民党团结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①同时，他又批判国民党右派只讲“青天白日”、反对“满地红”的谬论，而坚持我党的“满地红”的方针，并说“这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②。这些论述，有力地打击了“西山会议派”篡夺国民党的阴谋活动。李大钊就是这样在不断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打击了反革命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使左派势力不断获得发展。

李大钊坚持革命统一战线的斗争，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当军阀张作霖逮捕审讯他时，仍以国民党身份掩护我党的革命事业，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都具有必然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后人是踏着前人的肩膀才能达到科学的新高峰的。李大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无疑为后来集中国革命经验之大成的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形成，开辟了道路，并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这是李大钊对中国革命的巨大理论贡献。

（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①② 守常：《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国民新报》副刊第31号1926年1月8日。

试论李大钊的反帝思想

朱建华 何荣棣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思想理论财富，而他的反帝思想，则是这一理论财富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

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封建闭关自守的大门，从而使中国逐步地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自由，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和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一样，成为我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粉碎了帝国主义妄想灭亡中国的黄粱美梦。但是，中国人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帝国主义没有一个本质的认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的干涉、侵略，进行了英勇的反击；义和团运动掀起了一个席卷全国的反帝斗争怒潮，他们充当了反帝斗争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地位与特点决定，他们还没有

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因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不能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而是不加区别的提出了“灭洋”的口号，因而就使当时的反帝斗争具有笼统的排外性质。

1911年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来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的革命纲领，而是幻想在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轻而易举的获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在不彻底推翻封建土地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从而决定了他们领导的革命斗争必然遭到失败。因此，能否对帝国主义有一个本质的认识，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这是有关中国革命成败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开始还停留在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感性认识阶段，到了“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①这就是说，在这时，只是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才有可能从阶级的实质上来认识帝国主义的本性，才有可能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高举起鲜明的反帝斗争旗帜，从而把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李大钊同志就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最早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的杰出代表。

十月革命以后，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李大钊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的伟大的先行者，马克思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6页。

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李大钊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帝国主义，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而在中国先进分子当中，最早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明确地指出了彻底的反帝思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大钊同志最早正确地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原因，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阶级实质。

大钊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原因。他指出：“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①这也就是说，必须从经济关系中去寻找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原因，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这是它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大钊同志还严厉地斥责了帝国主义宣扬的“大日尔曼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反动谬论，指出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他认为“这回大战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②，这种“‘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③德国鼓吹“大日尔曼主义”，“要想在世界上得一个特殊地位，惹起了一场世界大战。”^④各国都有“大……主义”，“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结果必然是“战争迭起，连年不休”^⑤。大钊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是破坏和平的种子”^⑥。

这样，大钊同志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帝国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10 页。

②③ 同上，第 109 页。

④ 同上，第 126 页。

⑤ 同上，第 109 页。

⑥ 同上，第 163 页。

主义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榨、剥削的实质，启示了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二，大钊同志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及其反革命本性，明确地作出了国际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重要论断，第一次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口号。

1919年帝国主义操纵的分赃会议——巴黎和会充分地暴露了老奸巨猾的英法帝国主义和一向以比较隐蔽方式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他们不仅没有帮助中国收回失去的土地和主权，反而压迫中国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和山东的特权，以此为导火线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资产阶级从他们的狭隘的阶级利益出发，不敢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整个反动统治进攻，而力图仅仅把斗争的锋芒局限在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身上。

针对这种情况，大钊同志向全国人民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骗的真面目，指出帝国主义所标榜的“公理”、“正义”、“人道”、“和平”、“民族自决”等等，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假招牌。他写道：“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哪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①他无情地揭露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玩弄的和平宣言十四条的把戏。指出：“象这样的平和会议，哪有丝毫价值！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我实为你悲伤！”^②大钊同志进一步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212页。

质，指出：“挟国际猜忌，利权竞争的私心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论他是东方的、欧美的，绝讲不出公道话来”^①。

基于这种认识，大钊同志指出，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就不仅要反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和日本侵略山东，而且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整个统治。他说：“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日本所以还能拿他那侵略主义在世界上横行的原故，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的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②这样，他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敌人，不仅有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还有整个帝国主义的强盗世界，做出了全世界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的正确论断，响亮地提出了“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口号。这里所谓“改造强盗世界”，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所谓“民族自决”，就是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个口号喊出了中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它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正是在这种坚决的反帝思想的指引下，才能使五四爱国运动具有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彻底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才把中国的反帝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大钊同志阐发了亚洲人民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提出了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主张。

十月革命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使民族解放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才能取得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1919

① 《李大钊选集》第282页。

② 同上，第213—214页。

年元旦，大钊同志就强调指出，工人阶级要打破国界，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去打倒全世界资产阶级。同时，他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反动本质，指出它“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①它“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因此“防止这种危险的责任，不仅在日本以外的东亚民族，凡世界上的人类，就连日本的真正善良的国民也该负一份的。”^②他主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他提出，亚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奴役的人民要在“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的基础上，“结成一个大联合”，携起手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实现这种联合，大钊同志强烈呼吁要“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③他主张“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本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④

根据这种认识，大钊同志就把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区别开来，认为“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亚人的非亚洲人我们也是反对”^⑤。就是说一切压迫人的人，即帝国主义者，我们都要反对，一切受压迫的人，即殖民地附属国中的人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27 页。

② 同上，第 128 页。

③ 同上，第 327 页。

④ 同上，第 328 页。

⑤ 同上，第 280 页。

民和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我们都应该支持、合作。这样，大钊同志就在国际反帝斗争中，明确了斗争的对象与联合的力量，从而划清了敌人与朋友的界限，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它对于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大钊同志深刻地论证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作出了帝国主义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科学论断。

大钊同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结果，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从而论述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他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深刻地认识了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仅不是英、美、法等协约帝国主义的胜利，“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①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的新潮流，“象这股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②，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大钊同志看透了帝国主义列强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指出帝国主义是完全可以打败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和掘墓人，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③随着无产阶级不断地成长和壮大，资本主义也就一天天地走向坟墓。根据这一科学分析，面对着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大钊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庄言宣告：“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像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13 页。

② 同上，第 117 页。

③ 同上，第 210 页。

下面的工人掘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①

大钊同志认为，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帝国主义。他强调指出：“不要震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势力，轻视弱小民族和那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下的民众势力。”^②他认为一切强暴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得被群众革命运动所埋葬。他说：“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③

大钊同志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宣传，大大地扫除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心理和对革命的悲观情绪，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人民，鼓舞和坚定了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信心。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钊同志继续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革命问题，又写出了许多重要文章，其中象《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总结了近代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使他的反帝思想，在新的条件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第一，大钊同志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强调指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

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281页。

③ 同上，第117页。

从而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取得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可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胡适诬蔑党的二大宣言中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是“乡下人说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的根据。”他硬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危险了。”^①他歌颂美国所倡导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四国银行团”，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辩护，这就暴露他忠实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奴才相。

针对胡适派的谬论，大钊同志深刻地揭露了“四国银行团”的侵略性质，指出它“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②他指出：“美国外交家知道的很清楚，任各国自行在中国伸张势力，于他们是不利的。故极力主张一个列国一致的对华政策。”^③这就是成立新的国际组织，“把中国置于列强管理之下”。这个组织“不但要管理中国的财政与铁路，并且干涉到实业的发展。”它完全“是一个共管中国的国际的组织。”^④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凭藉其经济势力，用来吮吸中国人民鲜血的这一国际托拉斯的侵略实质。

对于美国所宣扬的“门户开放”政策，大钊同志认为，这是美国为了反对日本对中国的独占，要求瓜分中国的利益而推行的一种国际侵略政策。他指出“美国以为如欲在中国能与外国享有同等的权力与势力，非将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不可。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美国才能从开放的门户跑进中国来。美国并未想打破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与权利，不过要想打破英、日、俄、德的势力范围的局面，另开一种‘门户开放’的局面，使美国亦得与他们共享同等的利益。”^⑤

据此，大钊同志警告人们决不能被帝国主义冠冕堂皇的言词

① 胡适，《国际的中国》。

② 《李大钊选集》第406页。

③④ 同上，第404页。

⑤ 同上，第403页。

所迷惑，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策划召开的“一切国际的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利分配的机关罢了！”^①彻底揭露了华盛顿会议重新瓜分中国的侵略实质。

大钊同志还进一步地指明了帝国主义之间在侵略中国问题上，既争夺又勾结的事实，指出“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②这就是说，一方面要看到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他们在侵略中国这一点上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有力地揭穿了胡适派美化美帝国主义的谎言。

据此，大钊同志进一步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性，提出“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③。这就进一步指明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有力地捍卫宣传了党的“二大”所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二，大钊同志指明了援助中国反动势力，镇压中国革命运动，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进一步强调了必须把反帝和反封建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性。

华盛顿会议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斗争取得了暂时的妥协，表面上似乎有所缓和。但是，实际上，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和争夺，只不过是交换了新的手法而已。大钊指出“因为明目张胆的来管理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别寻一种避名取实的方法。”^④这就是说在中国，帝国主义各自扶植和利用一部分军阀为其代理人，镇压革命，争夺地盘，实现其掠夺的目的。而每个军阀的背

① 《李大钊选集》，第420页。

② 同上，第403页。

③ 同上，第503页。

④ 同上，第404页。

后都有不同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靠山。所以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封建军阀，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只不过是前台后台之分，直接间接之别，而且有时还互换其位置，充当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急先锋。

大钊同志揭露了帝国主义帮助满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罪行。他说：“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而且“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①这就揭示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相互勾结统治中国，共同镇压人民革命的事实，指明了反帝与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他号召“中国青年应该……去和那帝国主义及军阀战斗。”^②忽视任何一个敌人，革命都不会成功。大钊同志这些重要认识，对于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大钊同志指明了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进一步强调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必须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坚持国际主义，开展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除加深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外，在世界范围内，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除了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者以外，还要反对共同的敌人国际资本主义。大钊同志在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

① 《李大钊选集》，第542—543页。

② 同上，第515页。

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①。他说：“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②

基于这种认识，他非常重视十月革命提出的“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口号，强调必须把这一革命口号用来“唤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唤起他们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③，结成广泛的国际反帝阵线，开展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

为了实现这种国际反帝斗争的联合阵线，大钊同志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反对民族社会沙文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大钊同志指出：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因此，不能笼统地说“全人类都是兄弟”，而“只可以说，‘全人类的工人都是兄弟’”^④。这就是说，一切压迫别人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而一切受压迫的劳动群众，才是我们的兄弟。这样，就正确地区分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划清了敌我界限。它有助于促进被压迫民族与全世界的无产者在全世界革命的阵线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第四，大钊同志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发展前途。

1924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反帝斗争的大浪潮。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举行北伐战争的任务提上了革命的日程。在这时，总结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给中国人民指明革命胜利的发展前途，就具有非

① 《李大钊选集》第561页。

②③ 同上，第401页。

④ 同上，第420页。

常重要的意义。

大钊同志深刻指出，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经英法联军之战、中法战争、中日之战，直到1925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而从1841年广东三元里平英团起义，中经1842年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直到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①大钊同志的这一论断，就指明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过程。它是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历史的科学概括。

大钊同志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发生的原因、斗争的形势，并且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发展前途。他指出，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之所以发生，“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②，“是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③。因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④，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⑤这就指明了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的真理，揭示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发生的必然性和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从这种认识出发，大钊同志进一步作出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他深刻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7页。

② 同上，第503页。

③ 同上，第554页。

④ 同上，第543页。

⑤ 同上，第554页。

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①，它的发展是任何反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它已形成了“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这个革命洪流，尽管在其发展的道路上还会出现曲折，“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但是，“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②

大钊同志关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关于反帝斗争的发生、发展及其必然胜利的论断，极大地坚定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信心，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动员。

大钊同志的反帝思想，是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实践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当中，从科学意义上认识到帝国主义本质的第一人，最早地提出了彻底反帝思想，这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大钊同志的反帝思想，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它对于五四运动的胜利开展，促使五四运动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运动的发展，大钊同志的反帝思想也有了发展和提高，并为制定党的“二大”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二大”以后，大钊同志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宣传、捍卫和贯彻党的“二大”纲领，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最前线，并且总结中国人民近百年来反帝斗争的历史经验，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钊同志的反帝思想是他整个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① 《李大钊选集》，第543页。

② 同上，第537—538页。

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宝贵财富。学习他的反帝革命思想，对于我们现在进行的反霸斗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原载《史学集刊》1982年第2期）

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发展

吕明灼

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就其所经历的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来讲，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在1918年底就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但他曾长期被某些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所缠绕，直到1923年底才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本文试图就李大钊思想从进化论、互助论到阶级论的发展作一剖析，使我们从中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党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曾经历了多么艰辛的思想斗争途程，同旧思想的决裂及新思想的最终确立，又是多么不易！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一

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在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中，一般都经历了在哲学上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根本转变过程。

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将英国哲学家赫胥黎通俗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促进思想解放、推动民主革命运动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李大钊与陈独秀、鲁迅一样，都信奉过进化论，并用进化论

思想来激励人民，为国家、民族的振兴而奋斗。为此，他积极宣传进化论的发展观，坚信新的一定战胜旧的，新陈代谢不仅是自然界发展的基本法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有其生命，都经历由青春到白首或由白首再造回春的过程；一些国家原来“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变为历史尘土；而另一些国家则由落后“勃然暴发”，一跃而为新兴强国。究其原因，皆新旧之争所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①他警告人们，必须由“陈腐”走上“新兴”、由“死灰沉滞”走上“朝气横溢”、由“白首”走上“青春”，否则，“必败”无疑。由此，他进而号召青年们，“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以创造“青春之中华”。

进化论的新旧观，由于它是建立在只承认量变不承认质变的基础上，所以它的新旧之分，只是量的差异，而不是质的区别。李大钊赞扬一切新兴的国家与民族，但他还分不清这“新”是形式上的“新”还是本质上的“新”，更分不清是哪个阶级的“新”了。因而，他既支持和欢呼弱小民族的崛起；也赞扬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国家如德意志等的勃兴。他说过，在欧洲英法等国“声华渐落”之时，“其较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战血（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②同时，李大钊与鲁迅一样，也赞扬过十九世纪后期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他虽然也批评尼采“倡导超人哲学，鼓吹英雄主义，赞美力之享乐，高唱人格之权威，宣传战争之福音”的错误；但却又认为这些思想对我衰敝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70页。

之中华大有益处：“其说颇能起衰振敝，而于吾拘形式重因袭囚锢于奴隶道德之国，尤足以鼓舞青年之精神，奋发国民之勇气。”^①李大钊试图用尼采所鼓吹的“超人”学说，来鼓舞我受其侵略而待亡的中华民族奋起抗争，不能说一点作用不起，但这是一条死胡同，终究行不通！李大钊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激进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立场，与他的进化论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矛盾，并且日益尖锐：“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严酷事实，也不断教育了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革命的深入，李大钊逐渐认识了进化论的缺点与局限性，并对其产生了怀疑，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竞相争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妄图用动植物界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学说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人们间的相互关系，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作辩护。一些帝国主义思想家更利用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其侵略弱国与消灭“劣等”民族的反动政策服务。李大钊从反帝立场出发，揭露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性。他指出，日本侵略者所说的“地球之面积有限，人口之增庶无穷，吾人欲图生存，非依武力以为对外之发展不可。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天演之义，万无可逃者也。此其所据，全据于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②他以大量事实论证，以人口多、饥饿而引起战争的说法是荒谬的；恰恰相反，是战争给人类带来了饥饿。因而“以战争解决人口问题之迷梦，可以破矣。”他明确认识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助长战争之影响”，完全是为“近世侵略家”服务的。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发展来的。他说：“达尔文之天演论，盖深感于斯说而著也。”^③这便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反动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联系在一起；他并进而指出，一些“野心

① 《介绍哲人尼采》，《晨钟报》1916年8月22日。

② 《李大钊选集》第83页。

③ 同上，第84页。

家”把马尔萨斯之人口论“与达尔文之天演论并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①在李大钊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变成了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工具。

进化论的这种命运，与它过分夸大生存竞争在有机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关。进化论错误地断定种内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决定因素，这是违背辩证法观点的。恩格斯在论述到达尔文学说的这一缺点时写道：“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②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在进化论传入中国以前，思想界的主导倾向似乎一切都是和谐的、不变的；进化论传入中国之后，在先进知识分子中间这种情况又倒转了过来，几乎认为一切都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的斗争了。李大钊似乎觉察到了进化论的这一缺点，试图用“爱”与“调和”的观点来补偿进化论的这一不足。于是，在1916年下半年，李大钊在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同时，也宣传了托尔斯泰与达科儿的“爱”观。他赞扬托尔斯泰“生于专制国中，以热烈之赤诚，唱导博爱主义，传布爱之福音于天下”的精神；称道他是“举世倾仰之理想人物”；认为“人当有不惮为博爱而死之觉悟”^③。他在介绍达科儿的“爱”观时，对“爱”的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他称“爱”是人类“意识之顶点”，“人间能得之最高幸福”。他甚至更认为：“爱者宇宙之灵也，

① 《李大钊选集》第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1—572页。

③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晨钟报》1916年8月20日。

人天之交也。吾人当信仰真理，吾人即当尊重爱，故爱者神圣也。”^①他把“爱”提到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李大钊这种崇“爱”思想后来又发展为“调和论”观念。在1917年到1918年间，李大钊发表了一系列论述“调和论”思想的文章。他认为，“调和”是宇宙最美的境界，“美者调和之事，而调和者美之母也。故爱美者当先爱调和”。他进而又把“调和之道”看作宇宙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认为社会历史“遵调和之道以进者，随处皆是生机；背调和之道以行者，随处皆是死路也。”^②李大钊这样论述问题的目的，在于用“调和”思想去纠正过分强调“斗争”的片面性，但却又走上了夸大“调和”作用的另一片面性。

然而，在总的情况下，李大钊却尽力把“调和”放在对立统一规律中来认识，即认为“调和”就是对立统一中的“统一”。他认为，调和与对抗是宇宙的自然现象，两者相反相成，使宇宙得以存在与发展，犹如马之两缰、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牵相挽以驰驱世界于进化之轨道。他明确指出：“宇宙有两种相反之质力，一切自然，无所不在，由一方言之，则为对抗，由他方言之，则为调和。”^③社会历史也是一样。“政治不可一日无对抗，即亦不可一日无调和。”^④就“调和”本身来讲，也不是“自毁”、“牺牲”的，而是“竞立”、“两存”的。他批判了否认“竞立”“两存”的“伪调和论”，也反对把“调和”与“竞立”完全对立起来，“似一言调和，即当捐进竞争；一言竞争，即皆妨碍调和”的观点。他宣称：“余爱两存之调和，余排斥自毁之调和，余爱竞立之调和，余否认牺牲之调和。”^⑤可见，李大钊是力图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观点来观察与分析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原因的；这当中

① 《达科儿之“爱”观》，《晨钟报》1916年8月30日。

②⑤ 《调和之法则》，《言治》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③ 《调和剩言》，《言治》第3册，1918年7月1日。

④ 《辟伪调和》，《太平洋》第1卷第6号，1917年8月15日。

虽然有些观点有某些不正确之处，但总的发展方向是对的。

由此进一步发展，李大钊力图冲出进化论的轨道，探求新的哲学道路，而逐步树立了具有唯物辩证法思想因素的宇宙观^①，同时，他也逐步树立了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唯一史观^②。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抨击中，在介绍西欧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等对战争的态度时，他对帝国主义已有进一步认识，还开始接触到了一些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认识到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利害关系。这些思想与认识，使他进一步缩小与动摇了进化论的观点，为其在十月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

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上半年，李大钊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李大钊由进化论到阶级论的根本转变。

第一，阶级观点的树立。李大钊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以后，对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完全崭新的认识。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入中国并遭到反动派的恶毒攻击时，李大钊对俄法革命从阶级本质上加以区分，揭示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俄德等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终结、而中外反动派却在狂喊这是英美等联军的胜利时，李大钊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不是英美联军的胜利，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不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而是社会主义对军国主义的胜利。同样，德国的失败也不是德国人

① 详见拙著《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宇宙观》，《文史哲》1979年第2期。

② 详见拙著《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历史观》，《破与立》1979年第3期。

民的失败，而是德国皇帝、军阀等反动统治者的失败。他还进一步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各列强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阶级根源，区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种不同的战争观，指明了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等等。这样，李大钊便在中国人民面前第一次透过那些混沌迷离的社会现象与奥妙的诡辩，看出了社会事物的阶级本质，从而打开了迈向新的哲学世界——无产阶级宇宙观的金色大门。

李大钊还积极试图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中国社会现状，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他曾深入工矿，调查了解工人群众生活的疾苦，揭露资本家与封建工头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开展争取工人权利的斗争。他也经常深入农村，具体分析农村的阶级现状，指出佃户与雇工受地主的苛待与蹂躏最重，生活最苦；因而号召革命青年到农村去，宣传与组织农民，起来打倒那些掠夺农民的强盗。李大钊特别重视受压迫最深的妇女的问题，他认为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标志。但是，妇女运动“带有阶级的性质”，有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也有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①单纯的妇女运动不能使妇女获得完全的解放。假若有一无产阶级的妇女，因为卖淫被拘于法庭，只要求捉她的是女警官，讯她的是女法官，为她辩护的是女律师，这妇女问题就算解决了吗？显然不能。因为强制妇女去卖淫的社会制度仍然存在。所以李大钊认为：“妇人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②只有“根本改造”旧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144页。

② 同上，第145页。

社会制度，才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社会问题，同样，也只有推翻整个反动统治阶级，才能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五四运动中，李大钊进一步指出，中国之所以这样落后、挨打，其“作恶”的人，决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一班人，而是整个反动统治阶级。因而，中国问题的彻底解决，决不是“单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就能见效的；而必须采取“直接行动”，推翻这整个“强盗世界”，摧毁整个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些重要认识，使李大钊明确树立了社会革命论思想。

第二，对阶级斗争学说的系统论述与宣传。李大钊很重视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①同时，他还论述了阶级的产生与阶级斗争的发展，阐明了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观点，强调了阶级斗争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重大作用。他特别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科学论断，指出阶级斗争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主要手段。“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②可以认为，这时的李大钊已基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第三，批判了否定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散布一种自发论论调，认为既然社会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向前发展的，那就不用阶级斗争了，只等社会主义的自然到来就是了。李大钊批评了这种极其有害的观点，认为这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他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及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时，曾大声疾呼：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开展坚决的阶级斗争，以最后打倒资本主义；否则，

①② 《李大钊选集》第177页。

社会主义是不会自行到来的。如果只信这经济变动是必然的原理，而对“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①李大钊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能够这样尖锐而明确地批判修正主义观点，是极为可贵的。

由上可见，五四时期李大钊是努力坚持阶级斗争观点的；他对阶级斗争的论述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分析在当时也是很深刻的；他对社会矛盾是强调斗争、坚持社会革命的。因此说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由于这时李大钊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认识还不深；同时，他原有的进化论思想并没有完全清除，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正确认识。因此，他这时的阶级斗争思想虽然已确立为主导思想，但有明显的缺点或错误。

第一，他的阶级论深深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认为阶级斗争是生物生存竞争的表现形式之一。他把阶级斗争表述为“阶级竞争”，就有这个含义。1919年5月他说过：“就这阶级竞争的现象，我们可以晓得，这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都有毁损别的社会团体以增加自己团体利益的倾向。”^②他根据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理论认为，这个“倾向”就是“本于个人的利己心”——“自己发展”——“竞争”。而“‘自己发展’是生物学上、社会学上一切有机的进化全体根本的动机，是生物界普遍无敌的倾向。阶级竞争是这种倾向的无量表现与结果中的一个”^③。他不仅把人类社会中的阶级斗争与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混为一谈，而且还把阶级斗争与人体内各器官组织间的“细胞竞争”相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3—234页。

②③ 同上，第188页。

提并论，认为它们“原则相当”。这样，李大钊似乎又从阶级论退回到进化论去了。虽然李大钊在这样谈问题的时候，目的还是为了论证阶级斗争存在的普遍性与合理性；但这样论证的结果，势必在客观上走上否定阶级斗争的道路。这是李大钊在主观上所没有预料到的。

第二，他认为阶级斗争不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即它只能解决社会物质问题，而不能解决社会精神问题；因而他主张用“互助”思想来“补充”阶级斗争这一“不足”。

他的进化论思想残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转化为“互助论”思想。这一思想长期影响着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的正确认识。

三

进化论的发展观，或认为生物的发展只有竞争没有互助，或认为只有互助没有竞争。这都是片面的。李大钊似乎力图避免这种片面性，试图用对立统一这一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来观察有机界的发展。他认为生物进化有两个基因：竞争和互助。但在不同时间他强调的重点不同；有时两者同时强调，似乎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之意。但从总的发展趋向看，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和运动中，主要强调生存竞争；而在五四运动以后，则主要强调生存互助了。这和他受“互助论”思想的影响有关。

如上所述，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由流传较广到逐渐暴露它的局限性的由盛到衰的过程。正当人们对它逐渐产生怀疑的时候，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起来，一些先进分子常借用“互助论”来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互助论”也就是所谓“新进化论”。它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学说，不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原因；

而互助才是生物的本能，是一切生物进化的基因。这是近代社会生物学所研究的课题，完全可以讨论。然而，克鲁泡特金却用这种生物互助说来观察人类社会，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也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基本要素。因此，他主张用“互助”来取消阶级斗争，并用“互助”手段来实现他所谓的“正义”、“平等”、“自由”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却是完全反动的。李大钊很受这种思想影响。

1919年7月，李大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就流露了他这种影响。他认为“互助”是生物进化的“根本动机”，是生物界与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①因而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个向“互助”方向发展的长过程；人类生活的普遍法则应是“互助”，应把“互助”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生活”中去，并建立一个“互助的理想”社会，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②。此外，李大钊还把“互助”理想的实现，视为“大同的道德”^③与“大同的景运”^④的实现。这又把“互助”思想与中国古代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的“大同”主张联系在一起了。这一切，在客观上只能起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的消极作用。

但是，历史与客观现实均证明，靠“互助”是不可能实现社会变革的，应靠阶级斗争。而李大钊认为单靠阶级斗争也不能解决全部社会变革，于是他把“互助”思想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的位置上。1919年7月，李大钊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这最后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2页。

② 同上，第223页。

③ 同上，第273页。

④ 同上，第304页。

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①这就是他一再主张的“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他认为阶级斗争只能用来改造社会物质，而不能用来改造人类精神；而“互助”思想也只能用来改造人类精神，不会作用于物质改造。这种认识虽然含有精神力量不能代替物质力量、物质力量也不能代替精神力量的正确成分，但却错误地认为物质力量不能决定精神力量。这又从他原来坚持的只有用阶级斗争手段对社会实行“根本改造”，才有希望对一个一个具体社会问题、包括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都予以解决的正确观点上后退了。他虽然有时也曾强调过物质改造对精神改造的决定作用，但又不时地突出他的“物心两面”，“灵肉一致”的改造论。这就不适当地夸大了“互助”思想的精神改造的作用，具有唯心论成分。关于经济改造与精神改造应以那个为主的问题，一直是五四运动以来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李大钊的思想从总的方面来看，还是主张把这两种改造同时并举的。直到1919年底与1920年初，在他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两文后，才最终地确定了经济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基础的唯物史观。

李大钊这种“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是建立在他那奇特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的。1919年5月，他把现代的经济学分成三大系：个人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人道主义经济学。李大钊认为，个人主义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有两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一个是承认现存经济组织的合理性；一个是承认在这经济组织内“个人利己”、即竞争活动的合法性。李大钊赞赏人道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他认为，十月革命后，“以劳动者为本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学，即将取代“以资本家为本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4页。

位”的个人主义经济学而居于“正统”地位。现在“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①。李大钊既主张“组织改造论”，又主张“人心改造论”；既要“社会的革命”，又要“道德的革命”。因而，他提出了上述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改造社会组织、以“互助”原理为信条改造人类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等的“物心两面”改造的主张与计划。他的这种经济学观点是二元论的；他把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都看作是以劳动者为本位的，也混淆了两者的原则界限，模糊了无产阶级的视线。

可见，这时期在李大钊思想中，由进化论残余、互助论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经济观点相结合，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新旧思想相结合而以新思想为主，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相掺杂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的新的思想矛盾体。它表明了李大钊思想由进化论向阶级论转变的过渡性。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上的一些不甚精当之处，一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其理论上的依据。

思想的复杂，往往是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反映。李大钊所以在较长时间内存在进化论，特别是“互助论”思想的影响，不仅由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所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不多，理论水平不可能很快提高，而且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五四时期，面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与封建主义的残酷压榨，在资本主义日益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情况下，人们迫切要求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以“最公道”、“最平等”的社会主义来救中国。当时一些青年曾提出：“现在的社会是坏极了，不图解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会主义，因为他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

^① 《李大钊选集》第176页。

阔，无有种族国界，是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好。”^①于是“互助”的思想、道德便在青年中深入人心。他们是把“相爱相信”作为旧世界“相杀相欺”的对立物提出来的，是把“互助”作为一种社会主义理想来向往的。所以，当社会主义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的时候，“互助”思想也就随之广为流传了。

当时，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互助”成了时髦口号和口头禅。北京、上海、武昌、天津、广州、南京等地一些青年，纷纷组织起“工读互助”的各种团体，主张“本互助精神，半工半读”。他们还进而把“工读互助团”看作是“新社会的胎儿”^②，说“工读互助团是我们终身的团体，工读互助是我们终身的生命”，“希望将来的社会都变成工读互助团——就是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③他们幻想靠“互助”而不是靠阶级斗争实现理想社会。

这种观念不仅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比较流行，而且许多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和以后，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并宣传过“互助”思想，组织过以“互助”为原则的社会团体。尽管不同的人对“互助”概念有不同的认识。但它总还是被人们当作一种进步思想在社会上流传着。所以，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没有认识到“互助”思想的弊病；相反，却力求用它来补救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之“不足”，是毫不足怪的。然而，李大钊的思想之可贵，在于它的不断前进。理论学习的加深和实际斗争的教训，使他越来越认识到，进化论的“互助”思想不是先进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不能调和在一起；那种引人入胜的人

① 《工读的目的安在》，《工读》第5期，1920年2月。

② 《工读互助团》，《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15日。

③ 《“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第7期，1920年5月1日。

类互相友爱互相帮助的理想，只有到共产主义时代才能实现；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阶级斗争，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这样，到1920年秋后，在他的著作与言论中再谈论“互助”思想就较少了，也不再提什么“灵肉一致”的两面改造运动，而是经常地较多地宣传唯物史观，批判唯心史观，强调如何才能“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了。

四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进化有两种，如列宁所说的：“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①前者是进化论的发展观，后者是辩证法的发展观。1920年后，李大钊对进化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即从进化论的发展观完全转变为辩证法的发展观。

李大钊先是对进化予以唯物史观的新解。早在1919年5月，他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时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②。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1920年底他又指出，唯心史观的史书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而“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③这就是说要唯物地研究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进化”史。人类在由动物“渐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2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176页。

③ 同上，第338页。

渐的进化”来以后，又从茹毛饮血的生活“渐进”于游牧生活、畜牧生活，后又“渐进”于农业生活、手工业的生活与机器工业的生活。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进化过程，“我们现在根据进化论去解释这些记录，比在数十年前的观点（按：即神学观点）已大不相同了。”^①由上可以看出，这时李大钊对进化论与唯物史观还没完全划清界限；但他这时的进化论思想的意义已完全变了，即完全是一种发展进化的概念，并有借用进化论一词来说明唯物史观原理之意。

进化只能说明事物的量变过程，而要说明事物的质变，必须再前进一步。1922年，李大钊就明确地认识了量变与质变、进化与革命的辩证关系，并明确地把进化规定在量变范畴内，即进化就是量变过程。他以社会主义的发生、发展与革命为例说，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生了社会主义这一新势力，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产生一个新生命，一个新局面。“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②这就是说，进化是革命的必要准备，革命是进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李大钊便把进化与革命辩证地统一了起来。他还进而批判了只要进化不要革命的进化论观点，“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只要进化不要革命的观点，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鸡子在卵壳里，长了眼睛，长了头，长了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2页。

② 同上，第375页。

毛，既然非打破这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①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是完全正确的。关于进化与革命的关系，斯大林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进行自己的日常工作，使旧制度发生一些小的变化、量的变化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当这些进步分子联合起来，抱着一个共同思想向敌人的营垒冲去，以期根本消灭旧制度，使生活发生质的变化即建立新制度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②可见，李大钊关于进化与革命关系的思想，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李大钊还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888年，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文里指出：“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因为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那些信奉各种空想学说的分子，另一方面是指各种各样的社会庸医。李大钊在1922年论述社会主义运动时，引述了恩格斯的上述论点，并引申说：当今“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③他明确认识到社会党人是属第二国际的，即“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是属第三国际的，即“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在这里，李大钊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两大类型：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创造的进化”，搞社会改良主义；只有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的共产

① 《李大钊选集》第375—376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③ 《李大钊选集》第399页。

主义运动，才坚持“创造的革命”。他在进化与革命问题上，观点非常明确，批判与摒弃“进化”观点，坚持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论，与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划清了界限。

然而，一个旧思想的彻底铲除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大钊在消除“互助”思想影响时，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923年底，他在《桑西门的历史观》与《时》等文中，还提到“协和精神”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说过在历史长河中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好朋友，好弟兄，我们应该如何郑重的握着手，欢天喜地的亲爱着，互助着，共赴人生的大路”^①一类的话。直到1924年以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李大钊才彻底消除了“互助”思想的影响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即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前进。

（原载《哲学研究》1982年第3期）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7页

试论李大钊思想转变的 主观条件

王永义

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先把马克思主义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同志能够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最先实现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有主观方面的条件，也有客观方面的条件。本文试就李大钊同志思想转变的主观条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李大钊同志能够最先实现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走在同时代人的最前列，就其主观条件来说是多方面的。他虚怀若谷，勤奋好学，善于与人切磋砥砺研讨学问，善于析理论事，居意立言，这些无疑都是重要的。但是，促使李大钊同志最早实现思想转变最主要的主观条件还不是这些，而首先是他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深知人民的疾苦，始终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并随着学识的增进和社会实践经验的丰富，了解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从而完全寄希望于人民。

李大钊同志 188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父母早亡，生活贫困坎坷，使他自幼同情劳动群众，关心民

间疾苦。由于祖父的尽力维持和亲朋的资助才使他能够外出读书。他求知的目的，也是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当他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值帝国主义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践踏民主，窃国弄权。李大钊同志目睹这伙军阀的倒行逆施，造成遍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的惨痛情景，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大声疾呼，号召一切救国志士、学者文人，振作起精神，“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以“救人救世”^①。他下定决心，“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②，求索救世济民之良方。但是，这时的李大钊同志，在认识上还和当时一般爱国知识青年一样，认为解救人民苦痛的办法，只有通过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发展国民教育，启迪人民觉醒；而对人民群众本身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还受着资产阶级传统英雄史观的影响。在此之后，特别是在日游学期间，随着理论探讨的深入和社会阅历的丰富，使他的思想不断提高、升华。还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在社会历史观上就已经开始对资产阶级英雄史观产生怀疑，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批判，从而比较正确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之间的关系，初步树立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正确观点。他于1915年至1916年在《民彝与政治》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民彝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指出：“夫圣智之与凡民，其间知能相去不远”^③。“吾民当知国家之事，经纬万端，非一二人之力所能举，圣智既非足依，英雄亦莫可恃，匹夫之责，我自尸之。”^④这时的李大钊同志已经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力量，“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待吾民之实力辟之。”^⑤

① 《李大钊》，《文豪》，《言治》第1年第6期

② 郁巍：《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

③ 《李大钊选集》第48页。

④ 同上，第50页。

⑤ 同上，第18页。

李大钊同志在“研考民生凋敝之原”的探索中，也逐步认识到这完全是由于社会的组织不良，大多数劳动的人，所得的结果，都被少数不劳动的人掠夺一空。劳动的人，仍不免有苦痛，仍不免有悲惨，而且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①他怀着深切的同情，更加自觉地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在农舍的炕头上与老农促膝谈心，在阴暗的工棚里，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当他了解唐山煤矿工人“不如骡马”的悲惨生活后，立即在报刊上进行愤怒的揭露，指出：“他们终日在煤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每日“工银才有两角”，而“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②。他号召工人组织团体，起来斗争；号召革命的知识青年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去弄清“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以便“大家一齐消灭这痛苦的原因”^③，为劳动群众的解放而斗争。

李大钊同志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坚定信念，和在社会历史观上对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在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促使他在根本立场上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一边，为他实现思想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强烈深沉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李大钊同志能够最先实现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又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

① 《李大钊选集》第153—154页。

② 同上，第161页。

③ 李大钊：《狱中自述》。

1900年，刚满十一岁的李大钊同志，就遇上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胁迫清政府签订投降卖国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的蹂躏，清政府的腐朽卖国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在少年李大钊的心灵中打下深深的印记。为了“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以“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义”^①，他“慨然起而研究政治”^②。1906年，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后，“随着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造中国之思潮，亦日益腾高”^③，完全使自己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大量阅读各种政治著作，密切注视国内外政治风云的变幻，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在思想上逐步形成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渴望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此刻正值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神州共和之帜，亦既飘然高树”^④。他兴奋得挥笔作诗，赞颂“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⑤。但是时隔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又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⑥严酷的政治现实，强烈地刺痛着这位以拯救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青年。他以极大的愤怒和深沉的悲痛，写了《隐忧篇》、《大哀篇》、《原杀》、《论民权之旁落》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北洋军阀盗窃国权，侵蚀共和的罪恶行为，尖锐地指出：“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⑦此后，

① 《〈言治〉序》《言治》第1年第1期。

② 李大钊，《狱中自述》。

③ 《〈言治〉序》《言治》第1年第1期。

④ 《李大钊选集》第51页。

⑤ 《李大钊诗文选集》第9页。

⑥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8页。

⑦ 李钊：《原杀——暗杀与自杀》。《言治》第1年第4期（李钊即李大钊）。

孙中山发动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更使李大钊同志极度愤慨和苦恼。但是，这时的李大钊同志还不可能看到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中国革命需要新的阶级领导，需要用新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因此，他不能不一度陷入苦闷彷徨之中。李大钊同志正是怀着这种苦闷、彷徨、感慨、悲愤的心情，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决心在漫漫长路中去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日期间，他如饥似渴地研讨各种政治学说、社会思潮，探求救国真理，积极参加反袁斗争。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获取帝国主义支持，不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李大钊同志当即和留日进步学生一起成立留日学生总会，开展抗议袁世凯卖国行为的斗争。他以总干事身份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等文章，揭露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号召全国人民“值此千钧一发之会，当怀死中求活之心”，奋起自救，鼓励革命青年不畏强暴，展翅雄飞，“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为再造神州不失时机地勇敢奋斗。李大钊同志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严酷政治现实，又广泛地接触世界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对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逐渐产生了怀疑。他大胆提出，资产阶级代议政治“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①他开始密切注视世界局势，各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各种社会思潮的演变，并开始关注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李大钊同志努力探索“再造神州”道路的强烈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他实现从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页。

三

孜孜不倦地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不迷信偶像，不拘泥教条，不囿于成见，永不停息地向人生的最高理想迈进，是李大钊同志能够最早实现由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又一个重要的主观条件。李大钊同志认为，“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①要做到“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②。而探求真理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今日以为是者，明日复有说焉足以相胜，则今日之说可以立废；吾所持论深自信者，他人能举吾失而吾告，则复遽而赞同他人之说而无所容于心，不作感情之缚，意气之私”^③。李大钊同志少年时代，因有感于“国势之陵夷”，而开始致力于研究政治时，曾大量阅读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人士的著作和西欧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产生了很高的信仰。他坚信宇宙进化，总是新的战胜旧的，他说：“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④并由此导出一系列革命的进步的结论。他勇敢地抨击认为君主专制制度不可动摇和关于社会制度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坚持旧制度必须不断地为新制度代替的观点。他尖锐地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唯心论和腐朽不堪的纲常礼教，强调随着社会的前进，时代的变化，一切伦理道德，规仪法度，都必须随之变化。他针对当时袁世凯称帝和一切

① 《李大钊选集》第 87 页。

② 同上，第 91 页。

③ 《言治宣言书》，《言治》第 1 年第 1 期。

④ 《李大钊选集》第 70 页。

封建分子的复辟活动都打着尊孔旗号的情况，尖锐地指出，尊孔是“专制复活之先声”，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①。他以极大的热情，寄希望于青年一代，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活力“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②。

李大钊同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对达尔文进化论中关于新陈代谢这一普遍规律的大加发挥，突破了一切陈腐的观念，起了摧枯拉朽的重大作用。但是，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毕竟还有它的局限性，它虽然“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③，可以通过这个桥梁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但自然科学不等于社会科学，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不能套用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当时的李大钊同志还不能区别这种原则的界限，往往用生物进化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这就难免得出一些错误的或“未必精当”的结论。如他认为“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性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遵循这样的法则，则“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④，从而得出改良主义的结论。他还分辨不清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界限，认为“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⑤，从而得出反对一切暴力的错误结论。他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还存在一定的幻想，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也不能进行阶级的分析，等等。但是，李大钊同志从不囿于已成之见，也

① 《李大钊选集》第77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55页。

⑤ 李大钊：《原杀——暗杀与自杀》，《言治》第1年第4期。

不作脱离实际的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密切联系现实的实践斗争，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对自己提出新的问题。为了探求真理，李大钊同志也从不违心地屈从权势者的压力，在朋友之中，也只顾真理，不顾情面。“为其持诚以遭世厌绝，犹胜违心以博世优容”^①，是他毕生坚持的一项准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大钊同志进一步深入了解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他发现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竟以达尔文之进化论作为“文饰侵略之材料，奖励战争之口实”^②，又目睹西欧各国代议政治的种种反动虚伪的表现，深感“其良其否，难以确知”。这些怀疑，促使他更加自觉地去进行新的探索，这个探索的新领域，就是马克思主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一些报刊上已经有所介绍。但是，当时都还只是作为风行欧美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学说来介绍，还谈不上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李大钊同志。只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雄辩的事实证明，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真理。从此，先进的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李大钊同志在探索真理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欧洲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产生怀疑，就使他能够迅速地冲破急进民主主义者的眼界，冲破初期新文化运动的范围，迅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问题的第一人。李大钊同志1918年在《言治》季刊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可以说是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的开篇之作。它明确地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与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本质区别，说明十月革命后世界潮流已经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期。他

① 《李大钊选集》第87页。

② 同上，第84—85页。

说：“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①不久，他又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 的胜利》，热烈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之先声”^②，号召人们“为世界人类整体的新曙光庆祝。”^③他以铿锵之声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④李大钊同志的这些论述表明，他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初步实现了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同志能够最早实现从急进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上述三个主要的主观条件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的。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使他产生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他深切了解自己的人民和民族，坚信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他能够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确信未来，奋力勇进，不疲倦地批判现实，追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创造青春中华”之道路。他的思想愈前进，愈感旧的思想武器之不足恃，探索新的思想武器的要求就愈强烈，使他终于走在同时代人的最前面，最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比李大钊同志更早一些就起来批判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陈独秀，却因为在主观上存在某些突出的弱点，如脱离人民群众，自负傲慢，固执己见等等，使他虽然在后来也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和李大钊同志并列被誉为“南陈北李、两大星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他在思想境界上却远远落在李大钊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04 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 111 页。

③ 同上，第 113 页。

④ 同上，第 117 页。

同志的后面，后来更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歧路。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建设一个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是伟大的艰巨的。要完成这个任务，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全党理论水平的提高，是根本不可能的。研究李大钊同志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原因，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振兴中华的高度责任感，努力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会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原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韩一德

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我国形成滔滔滚滚的运动，这一思潮以其特殊的生命力，强烈冲击着政治和学术思想的各个领域，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在史学领域的进军从此开始了。

李大钊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他曾经以史学为重要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向一切因循守旧、悲观倒退的旧史观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他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形成和进步的史学队伍的建立，披荆斩棘，辛勤耕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五四运动前后，他写了大量专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著作，重要的有：《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专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历史的任务》、《历史与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清代通史序》等多篇论文。他还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多次作了以“唯物史观”、“史学概论”、“历史与哲学”为题的讲演。1920年后，他又在北大、女高师、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别开生面地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历史哲学”、“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在这些论著和讲学中，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历史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指出新旧史学的根本区别和马克思主义对历

史学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历史实际深入批判各种唯心主义观点；他还从史学思想史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热情介绍国际工人运动——巴黎公社、第一国际及马克思、列宁革命活动的历史。从而为我国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辩护。这些清新的思想，一扫史坛的沉闷空气，强烈地冲击着固执、守旧的传统史学，在当时就使“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①。今天我们更感觉到这种影响的深远。六十年前唯物史观之“广布于世间”，闪射出我国“史学界的新曙光”^②。现在我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位高举火炬的人，正是李大钊同志。

—

我国在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史学体系。它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封建主义史学，“其中所载，大抵不外帝王爵贵的起居，一家一姓的谱系”^③。那浩如烟海的史籍，陈陈相因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④。唯心主义的旧史观，“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拔除”^⑤。

在本世纪初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曾经举起史界革命的旗帜，宣传历史进化论，向封建的传统观念展开猛烈攻击，一度给史学论坛带来某些活跃的气氛。但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一样地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9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9页。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6页。

④ 梁启超：《中国史界革命案》，《饮冰室文集》卷八。

⑤ 《李大钊选集》第291页。

软弱。当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兴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梁启超等随着在政治上的堕落，史学思想也急骤倒退下来，所谓史界革命也就偃旗息鼓，他们抛弃了历史进化论，在那里“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陷入悲观论和循环论，而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同流合污。由于这班人的推波助澜，使本来就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旧史观，更有了“反动复活的趋势”^①。因此李大钊指出：“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②。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对象和任务？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提出：“史料即历史”的主张，认为“史学的对象就是史料，史学的工作便是整理史料”；又认为“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便是历史学的全部内容^③。因此他们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引导青年到古书堆里“考证一个‘了’字和一个‘们’字的历史”，实行繁琐考据的“小心求证”^④。

李大钊断然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历史“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⑤。那成千上万部的史书史籍，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材料，而不是历史。“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⑥。他进而指出：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同一吾人所托以

① 《李大钊选集》第488页。

② 同上，第291页。

③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

④ 胡适：《我的歧路》。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页。

⑥ 《李大钊选集》第484页。

⑦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页。

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①。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因此马克思称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人类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②。“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③。“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④。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长河中，探求其发展变革的客观规律。

既然“这活的历史，固屹然存在于这些故纸陈编的堆积以外，而有他的永续的生命”^⑤。历史的研究，就不应当局限在故纸堆里作孤立的考据，而应从中寻出“真确的证据”，得出“进步的真理”，明确前进的方向^⑥。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即一方面要对历史事实作记述整理的工作，同时又要进一步，对这些史实进行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从不否认史料工作的重要，认为可靠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恩格斯曾经指出：“既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⑦所以李大钊十分重视史料工作，把历史事实的“观察与征验”和对“特殊史实的精查”，当作“史学家的要务”^⑧。认为只有“个个事实的考察，比较的充分施行，而后关于普遍的理

① 《李大钊选集》第287页。

② 同上，第335页。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6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287页。

⑤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2页。

⑥ 《李大钊选集》第48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

⑧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20页。

法的发见，始能比较的明确”^①。为此，他要求对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民族关系，杰出人物，都应当有详细的考察、记录和整理，以为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但是史料的考订决不能代替历史研究。史料的考订至多只能把个别历史事实弄清楚，不可能揭示各个历史事实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史料作为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其内容和形式必然受到一定时代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观点的制约，具有许多局限性，我们必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之进行考订和鉴别，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这也正是历史学从“沿革的研究”进入“推理的研究”的重要特征^②。根据当时史学界的状况，李大钊特别强调了这方面。他指出：“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不把人事看作片片段段的东西；要把人事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去考察他。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在这种研究中，有时亦需要考证或确定片片段段的事实，但这只是为于全般事实中寻求普遍理法的手段，不能说这便是史学的目的”^③。

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人们对这种规律能否认识？这是决定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根本问题。从来的历史学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受到或者是“神权的”、“王者的”、“英雄的”、“个人的”、“精神的”、“宗教的”种种历史观的支配，对历史现象往往感到惶惑不解，对历史规律常常是茫然无知。某些资产阶级史学家为了阻挡人民革命的潮流，一向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胡适就把历史比作顺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由我们替他涂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26—27页。

② 同上，第18页。

③ 同上，第23页。

抹起来”，又比作一块大理石，任意“由我们雕成什么像”^①。李大钊明确指出：历史的发展，正如自然界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且人们对于这种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它，确定它了”^②。同时他又指出，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观察社会历史，才有可能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统一过程进行研究，以“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③。所以只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的“真正意义发明出来”。从而使历史学真正成为科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④。

李大钊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史学，推动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历史科学的建立，这也就为我国历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还应当指出，李大钊不仅指明了历史发展具有的规律性，并且充分运用这一原理来说明现实的运动，指导革命的实践。他深刻地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指出：“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⑤。从此“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⑥。因此，这种革命的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⑦。他坚信“社会主义的社会，

① 《胡适文存》第二卷第106页。

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25页。

③ 《李大钊选集》第465页。

④ 同上，第294页。

⑤ 同上，第118页。

⑥ 同上，第117页。

⑦ 同上，第110页。

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①。号召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②，以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准备必要的条件。正是根植于这一深刻的信念，李大钊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充满胜利的信心，他为此而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二

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因何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决定的因素又是什么？对这一问题，新旧史观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当时资产阶级史学家曾强调，决定历史发展的是所谓“人类心力”和“民族意力”；是“纯为个性发挥的制造品”，认为研究某些人的“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就可以“活现史迹的筋脉”^③。胡适则把人们的“欲望”看作一切存在的根源。宣扬“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④的不可知论。这样他们就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李大钊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⑤。他又指出，决定历史发展的，不是“心的势力”，而是“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

① 《李大钊选集》第465页。

② 同上，第40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文集》卷十六。

④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⑤ 《李大钊选集》第293页。

物的环境所支配”^①。

1919年5月，在他发表的第一篇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生产力在那里发展的社会组织，当初虽然助长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发展的力量到那社会组织不能适应的程度，那社会组织不但不能助他，反倒束缚他妨碍他了。而这生产力……仍是向前发展不已。……结局这旧社会组织非至崩坏不可。这就是社会革命。”^②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它指明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因此史学研究就不能仅仅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必须去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

李大钊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正确地解释了精神与物质的关系，说明“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④，从而为新思潮在中国兴起的深刻根源作了科学的论证。他指出：孔子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

① 《李大钊选集》第337页。

② 同上，第185—1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295页。

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此封建阶级的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①。这就令人信服地证明，我国近代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运动，思想上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和宗法的、封建的大家族制度动摇崩溃所引起的必然反映，决不是有谁能够阻拦得住的。

李大钊还批驳了地主资产阶级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提出的所谓“道德复旧”的复古主义谬论。指出“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②我国近代社会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动，旧道德正在失去其存在的物质基础。因此，地主资产阶级宣扬的道德永久不变的谬论，只能是没落阶级的一种梦想而已。五四以来人民群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思想运动，正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任何人也无法使它逆转。

既然经济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那么革命者在斗争中，就应当着眼于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说要首先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经济基础。李大钊在与胡适的论战中，驳斥所谓一个一个问题地解决，一点一滴的改良的主张时，强调必须实行根本解决，认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③。否则，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根本改变生产关系，要彻底解决这个那个具体问题是不可能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301—302页。

② 同上，第267—268页。

③ 同上，第233页。

李大钊在强调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注意到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指出：“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①。这就是说，革命人民在社会变革面前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可以在先进思想和学说的武装下，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通过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又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违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李大钊强调了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要素的意义。他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从来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固然在种种时代呈现种种形式——中进行的”等科学论断^②，帮助革命人民用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近百年中国历史错综复杂的形势。他说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联军之役、日俄战争、日德战争，一直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③。而自1841年广东三元里平英团起，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义和团的覆清仇洋运动，乃至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直至“五四”、“五卅”弥漫全国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一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3页。

② 同上，第187—188页。

③ 同上，第537页。

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①。从而明确、清晰地勾画出近百年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他预见到“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②。李大钊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这一正确的论断，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践证明了。这说明，先进的阶级和政党，能够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在推动历史的前进中发挥巨大作用。

三

谁是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还是神仙皇帝？在这个历史观的又一根本问题上也向来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一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史学家，都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梁启超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指斥旧史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反对把历史写成帝王的家谱，但他最终还是把历史归结为“英雄的舞台”，“舍英雄几无历史”。认为决定历史发展的，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个性和心理的扩大”^③。他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克里蒙梭、劳特乔治、威尔逊三人的头脑和个性，不仅决定了凡尔赛条约，而且还影响到世界的未来^④。在中国，袁世凯的性格则影响了十年来民国的局面。胡适更竭力鼓吹个人创造历史，诬蔑群众是“阿斗”、“愚众”和“没有思想的动物”，胡说“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⑤。在他们看来，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8页。

② 同上，第537—538页。

③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文集》卷四。

④ 此三人分别为出席巴黎和会的法、英、美政府首脑，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0页，《饮冰室文集》卷十六。

⑤ 胡适，《我的歧路》。

人民只有听命于那些“特立独行之士”的大人物任意摆布。

因此，李大钊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很多笔墨来反复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他指出：“旧历史观认历史是神造的，是天命的，天生圣人则世运昌明，天降鞠凶则丧乱无已，本着这种史观所编的历史，全把那皇帝、王公、侯伯、世爵这等特权阶级放在神权保护之下。使一般人民对于所遭的丧乱、所受的艰难，……不但不能反抗，抑且不敢怨恨，……只能发出‘昊天不吊’的哀诉‘我生不辰’的悲吟而已。在这种历史中，所能找出来的，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的自己”^①。人民群众只有“认定自己境遇的苦难，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忍受的一途”，“老老实实的听他们掠夺”。所以这种史学，不过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②。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告诉人们：“……社会生活的动因，不在‘赫赫’‘皇矣’的天神，不在‘天宣’、‘天纵’的圣哲，乃在社会的生存的本身”^③，“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④。这种历史观，它把人民群众从神权、圣哲、天命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站到历史主人公的位置，使之认识到，社会的进步全靠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推动，是“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而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⑤。“欢天喜地

① 《李大钊选集》第506—507页。

② 同上，第337—338页。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87页。

④ 《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⑤ 同上，第338页。

的”去“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①。这充分说明了李大钊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他深刻地认识到，人民是革命力量的源泉，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②。因此“五四”运动后，他向青年发出到民间去的号召，亲自带领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当中去，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引导工农群众走上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同时，并不否认杰出人物的作用。李大钊同时对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给予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③。但个别人所以能在历史上成为伟大人物，并不是由于他们“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热烈些，所以挺身而出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剧，壮剧”^④。他很推崇孙中山先生，认为孙中山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认清了世界潮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改组国民党成为普遍的群众性的党，从而推动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到来。这就说明，杰出人物不是圣哲，更不是神仙，他是和普通人一样的人，他们所以能在历史上起伟大作用，是因为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行动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人民革命运动中这样的杰出人物是不能缺少的。

四

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

① 《李大钊选集》第340页。

② 同上，第338页。

③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17页。

④ 同上，第88页。

变化。李大钊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①。他以孔子为例指出，作为实在的孔子，已不复存在，他的生涯、境遇、行为，已经不能丝毫变动，然而历史上对孔子的评价却不断在变化，“汉唐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象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象中的孔子，亦不同了”^②。这就说明：“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③因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可能一次穷尽，必须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历史上伟大史家的著作，在他那个时代，也许是尽善尽美，但不可能永远如此。“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楼，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④。因此李大钊强调对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⑤。不怕推翻古人的前案，不受现成结论的束缚。前人的结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所作的某些结论，“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⑥。列宁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⑦。每个时代都应当

①② 李大钊：《史学要论》第9—10页。

③ 《李大钊选集》第289页。

④ 同上，第290页。

⑤ 李大钊：《清代通史》序。

⑥ 《李大钊选集》第483页。

⑦ 《列宁全集》第四卷第187页。

出现超越前人的成果，对历史作出越来越合乎实际的理解和判断。所以李大钊要求历史学家要树立“史演无已时，即史业无已时”^①的信念，“精勤弗怠”地、“无一瞬间停歇”地“去追此滚滚不尽之史潮以进”^②不断地“把那些旧材料旧记录，统通召集在新的知识面前，作一个判决书”^③，写出更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篇章。

（中国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论文，
载《河北师院学报》1983年第3期）

①② 李大钊：《清代通史》序。

③ 《李大钊选集》第483页。

李大钊与蔡元培

姚维斗 黄 真

在北京大学燕园未名湖畔，李大钊和蔡元培的铜像巍然矗立在苍松翠柏之间。这是北大七七级、七八级毕业生和社会各界为纪念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和民主主义革命家蔡元培铸造的。六十多年前，李大钊和蔡元培，以北大为基地，在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下，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培育了一代青年。他们的光辉业绩，在我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们的战斗友谊，为人们永远传诵。

李大钊与蔡元培的友谊，是与开展新文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1916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论文《青春》。他寄希望于青年，期望着中华民族的新生，发出了“再造青春中华”的号召，在新文化运动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年冬天，从欧洲学习和考察归来的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他希望通过办教育，使国家富强起来。蔡元培在政学会欢迎会上，介绍了法兰西、德意志两民族分别具有“美”与“高”的特点，科学与美术发达，因而有道德心。李大钊认为蔡元培的论证很精辟，写了《美与高》的文章，进一步阐述“美”与“高”的精神与道德的关系，指出我中华民族素有“美”与“高”的条件，要使我们民族成为“美”与“高”的民族，是教育家、文学家、美术家、思想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个人之努力向上，益不容有所怠荒。他们一致勉励青年们立志向上，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

1918年1月，蔡元培聘请李大钊来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这时的北大，在蔡元培主持下，正在变为新文化运动的基地。蔡元培立志改革，首先着重整顿的是文科。他独排众议，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又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在蔡元培支持下，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蔡元培很欣赏和关心这个刊物。他在1917年1月《新青年》2卷5号上，就发表过《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等。以后，他更为《新青年》写过不少文章。《新青年》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欢迎。特别是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在我国点燃了光芒四射的火炬。

以北大为基地、《新青年》为中心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极端仇视。1919年3月，守旧文人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自称是清王朝的遗民“至死不易”，指责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文字”。蔡元培立即公开答复，批驳林纾的谬论，阐明自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提倡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林纾被驳得恼羞成怒，扬言要“拚我残年，极力卫道”。他竟编造了一篇文言小说《妖梦》，里面用“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又写了一个赞助毁灭圣人和封建伦理的大乌龟，叫做“元绪”，恶毒地影射蔡元培。他用的典故是《论语》注中“蔡，大龟”的话，借这个隐喻下流地骂人了。他又写梦见这些“毁圣非法”的新人，都被一个怪物吃掉了。显然他是在给军阀官僚出谋划策，要他们拿起屠刀，杀害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们。其用心是多么险恶啊！

在这以前，林纾还编造了小说《荆生》，恶毒攻击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等人，并写了一个“伟丈夫荆生”，来把他们杀掉。这也暴露了他妄图依靠封建军阀镇压新文化运动的狰狞面目。

对林纾之流，李大钊毫不留情地痛加挞伐。他写了《新旧思潮的激战》的文章，揭露林纾们已堕落到靠军阀势力打击新生力量，“真正可耻！真正可羞！”指出这些封建余孽讲不出道理，只好靠武力，“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他严正警告反动派，如果象俄国沙皇那样“摧残青年、压制思想”，只能落得个覆灭的下场！李大钊充满信心地说：反动势力断不能摧残真正觉醒的青年们的精神，滔滔滚滚的新潮流，是任何力量也挡不住的！

蔡元培为反对北大师生中腐化的风气，培养高尚的道德风尚，倡议组织进德会，规定了不嫖、不赌、不娶妾和不做官吏、不做议员等戒条。李大钊到北大后，加入了这个团体，后来还当选为纠察员。李大钊在蔡元培支持下，担任北大图书馆长，致力于图书馆的革新，把原来灰尘满积的藏书楼改造成现代的大学图书馆，馆址由马神庙迁到红楼。为扩充图书馆藏，蔡元培还组织向国内外募集款项。李大钊大量购进中外新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反映国外研究新成果的书籍，为师生们接受新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918年11月中，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北洋政府通知放假三天。蔡元培利用这个机会，在天安门前举行讲演大会。他的讲题是《劳工神圣》，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告诉人们：“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用体力或脑力，“都是劳工”，“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接着，又在中央公园内再次举办演讲大会，李大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明确指出这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同时，他写了《Bolshevism的胜利》，介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指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演说，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随后与《Bolshevism的胜利》一同刊登

于《新青年》5卷5号，影响极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我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李大钊在这次运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蔡元培也积极支持这一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反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后，他联络各大专学校校长并以身家性命作保，营救被捕学生。学生释放后，他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的重压，于5月9日愤然离校出走。反动当局趁机造谣说他是因为不满于学生们的举动而去，同时指派代校长，要想一箭双雕。李大钊驳斥了敌人的谣言；蔡元培也来信表示，他对学生们的爱国举动是完全支持的。李大钊等北大教职员代表，向北洋政府交涉，坚决挽留蔡校长，反对另派校长，并发动全校教职员和学生采取同一步骤，团结一致向反动当局斗争。由于李大钊为代表的北大师生的坚决斗争、社会舆论对蔡元培的支持，反动当局不得不表示“挽留”蔡元培。斗争胜利了，9月12日，蔡元培在师生们夹道欢迎下，重新回到北大。9月20日，他在全体师生的欢迎大会上，高兴地说：这次爱国运动，看到了同学们的自治能力、自动的精神。希望大家保持和发扬这种可贵的精神！

李大钊为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于1920年3月，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第二年决定将这个组织公开，由北大学生十九人作为发起人。他根据几年来蔡元培在斗争中的表现，以及他在五四以后曾表示过：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马克思主义者应赶快组织起来的看法，深信蔡元培会支持这件事的。并派人请校长批准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发展会员。果然得到他的批准。于是，1921年11月17日，“启事”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登了出来。这件事在当时确实是担风险的。李大钊十分感激蔡元培的支持，称赞他的明智，勉励同志们继续努力打开局面。“启事”发表后全校轰动了，报名参加的十分踊跃。接着，蔡元培又亲自参加了在校长办公室举行的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成立大会。会议于1921年12月举行，到会者达六十多人。李大钊作了报告，蔡元培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会后合影留念。嗣后，会员发展更快，为了便于活动，蔡元培不顾校内某些人的阻挠，又亲自决定把校内西斋两间宽敞的房子交研究会使用。这两间大屋备有家具、火炉等设备，并派有勤务员值班，这就是有名的“共产主义小室”——“亢慕义斋”。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李大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日夜操劳。党成立后，他担负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李大钊善于团结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展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蔡元培参加了许多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22年8月间，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书籍及待印书版均遭没收销毁。蔡元培和李大钊等于9月24日发表《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严正表示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抗议。蔡元培积极参加李大钊等发动组织的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文化侵略。他们都为这一组织出版的《非宗教论》撰写文章，宣传唯物主义。

在校长蔡元培支持下，北京大学各种社团纷纷成立。为了更好地指导各种学生社团的活动，1922年3月北大评议会设立了学生事业委员会，李大钊任委员长。这年12月，李大钊担任校长室秘书。自此，李大钊就常在蔡元培校长室里办公，处理校内的日常工作。同时，他也在这里进行党的地下工作。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蔡和森等著名共产党员常来这里聚会。李大钊又通过蔡元培的介绍，派去五名共产党员，到军阀政府交通部，分别在津浦、京绥、京奉、正太和京汉铁路任“密查员”（后改为“育才科视学”），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他们建立起工人俱乐部，进而成立工会，成功地开展工人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担任党在北方主要负责人的李大钊，在大学授课的工资每月有二百八十元之数，但他将大部分用于为党提供经费和接待贫寒的青年，自己却“茹苦食淡，冬一絮衣，

夏一布衫”，上下班每天步行……每到月底家里常揭不开锅。蔡元培看到后非常感动，特别关照会计科：每月发工资时，先为李大钊代扣下家庭生活费，免得李夫人难为无米之炊。

1922年11月，北洋军阀政府任命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蔡元培非常气愤，于1923年1月发表《不合作宣言》，指出耍弄权势陷害别人的彭允彝“人格卑劣”，“不能再与为伍”，并向反动当局提出辞呈，表示“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于是离京他往。北大师生决定“驱逐彭氏”，“挽留蔡校长”，展开了“驱彭挽蔡”的斗争。北大校内由李大钊等组成的教职员临时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李大钊注意把师生们的正义行动引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革命斗争。在北京学联举行的五四纪念会上，他明确指出，现在应做的事情有：“（一）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二）对现政府立于弹劾的地位。”

蔡元培离开北京后，李大钊仍留在北大。他长期坚持在北方从事艰巨的革命斗争，直到1927年4月28日，为中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牺牲于敌人的绞刑架下。当蔡元培在杭州听到这一惨痛的音讯时，十分悲哀，带头在寄至杭州的为李大钊家属募集贍养费的捐册上题名捐款，表达他对李大钊的崇敬和他家属的慰问。

这以后，蔡元培在认清新军阀蒋介石的反动面目后，在三十年代与宋庆龄等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掩护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拥护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

李大钊和蔡元培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他们在政治、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对祖国的巨大贡献，在我国近代史上建树了不朽的丰碑。今天，我们瞻仰他们的铜像，回顾他们的革命事迹和战斗友谊，更激励我们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继续前进。

1983年8月

论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历史观

曹木清

李大钊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研究家们对于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与贡献，作了较多的介绍。本文试图对他在五四时期历史观的转变过程和表现特点，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李大钊和当时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同中国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继续进行斗争。这时李大钊的历史观基本上是进化史观。从1915年到1918年初，李大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青春》、《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新的！旧的！》、《民彝与政治》等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进化史观的基本观点。

李大钊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宇宙间一切现象，看作一个自然进化过程。他指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自然存在，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产生。除了自然的真理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真理。人类的伦理观念，就是“基源于此唯一自然之真理”^①。李大钊据此认为，道德是一种宇宙现象，社会也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他这些看法虽然存在机械唯物论的毛病，但同

^① 《李大钊选集》第79页。

历史唯心主义比较起来确实前进了一大步。

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的法则一样，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渐次发生渐次进化。他说：“宇宙本相，为不断之轮回”^①，“刻刻流转，绝不停留”。“历史的现象”也和宇宙间其他现象一样，“时时流转，时时变易”^②。他认为社会的发展也是遵循自然的法则，“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③。李大钊还通过对道德进化的解释，进一步表明了对历史发展顺序的看法。他指出道德是一种宇宙现象，所以道德的“发生进化亦必应其自然进化之社会”^④。历史上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道德。孔子的思想，适应历代帝王专制的需要，只能产生和存在于中国的专制时代。如今中国进到了“现代国民自由”的时代，孔子的思想和道德，当然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很明显李大钊把“帝王专制”和“国民自由”是看作历史进化的两个不同阶段。

李大钊认为推动历史进化的原因是新与旧的矛盾，并且坚信“新的”必定战胜“旧的”。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⑤。他这一段话，说明宇宙间一切现象——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是内部存在的“新”“旧”两种因素不断进行“代谢”的结果。而代谢是新因素不断战胜和代替旧因素的过程。李大钊还认为历史的进化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更不是向下运动，而是向上发展的。他说：“‘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⑥。因此，“现在”比“过去”更

① 《李大钊选集》第64页。

② 同上，第93、96页。

③④ 同上，第79页。

⑤ 同上，第97页。

⑥ 同上，第93页。

丰富、更高。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坚信新事物必定战胜旧事物，青春的中华必定代替白首的中华。

李大钊认为人类是历史的主人，而不是历史的奴隶。他曾经热烈赞赏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柏格森是二十世纪初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崇奉达尔文主义。但柏格森认为人与其他动物有区别，其区别就在于“人是能造器具的动物”，具有创造的能力，能够不断给社会增加“新的分子”，主张“创造的进化论”^①。认为达尔文主义“只承认现成的，而不承认新的分子”，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在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李大钊当时还看不清这一点，而是从积极的意义来理解它的。所以，李大钊对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的赞扬，正好表明他自己主张积极的进化，反对消极适应环境的奴隶主义。他这个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李大钊的积极的、进取的人生观，洋溢在他的一切著作和言论中，在《今》、《青春》等文中表现尤为突出，给了五四时期的舆论界和青年极大的影响。社会效果也清楚说明了李大钊提倡“创造进化论”的积极意义。

五四前的一个时期，李大钊虽然和许多民主主义者一样，都采用进化论的观点解释历史，但李大钊的进化史观具有自己的突出特点。

李大钊历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本主义”同进化史观的紧密结合。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民意；这种共同民意是自然形成的民众的自然秉性。李大钊把它叫做“民彝”，进而把“民彝”看作人类社会的根本，把“民彝”的自然进化，看作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他认为历史上政治的好坏，全在于“民彝”的“彰”、“蔽”，而“为治之道”，就“在因民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版，第376页。

彝而少加庸育之功”^①。主张“因性以为法”，反对“立法以禁欲”^②，反对用强制手段束缚和阻挠“民彝”的自然发展，更反对用千古不变的圣人“垂诏”戕贼民意。李大钊认为真理都“从世运而变迁”，没有永恒的真理，只有“民彝”的洞察能力是永恒的^③。历史上凡是违背民意，束缚民彝的政治、法律制度，必定为民彝所毁弃。只有顺应民彝，才能得到不断发展。并且指出这是“天演之进，进化之理，穷变通久之道”^④，立国于天地之间，就不能逃避和抗拒天演进化的根本历史规律。李大钊在强调以民彝为变革政治、法律制度的根本依归的同时，批判了英雄史观，强调依民彝的自然进化推动社会进化。他认为历史上的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是集中代表了民意的结果。他说：“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⑤。强调只有民彝才是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因素。李大钊对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理解，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佼佼者，不仅以先知先觉自命的孙中山不能相比，就是作为青年导师的陈独秀也是望尘莫及的。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把人民群众看作历史进化的主体的思想，既是李大钊进化史观的突出特点，也是他的历史观能够突破旧的框框，向新历史观转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李大钊进化史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突变。庸俗进化论者只承认渐变，不承认突变，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上，则鼓吹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李大钊此时对历史的变革，虽

① 《李大钊选集》第36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同上，第52页。

④ 同上，第43页。

⑤ 同上，第48页。

然也主张“渐次进化”，还没有完全脱出庸俗进化论的窠臼；但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突变。例如他主张“复活更生，回春再造”，^①并且认识到了“成”与“毁”的辩证关系，主张寓成于毁，说“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②。

李大钊进化史观的第三个特点，是坚决反对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在《战争与人口》一文中指出，“近日世局大辟，学说争鸣，影响所及，有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人口论倡导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③，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表示了愤慨和谴责。李大钊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批评了达尔文主义本身的不完备，指出“斯说（指“进化论”一引者注）所有助长战争之恶影响者，半由其说本身之不完，半由野心家之利用”^④。达尔文创立进化论虽曾得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但他并没有企图用生存竞争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说明李大钊对达尔文的动机有所误解，但另一方面正好说明他的进化史观同帝国主义御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完全相反，而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民族解放服务的，是革命的战斗的历史观。

进化论从十九世纪末传到中国以后，曾经是中国一代先进人物用来推行社会改革的主要思想武器，其历史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进化论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它的某些观点，例如发展的观点，和广义上理解的新陈代谢等观点，用来解释社会历史的某些现象，也是正确的。但是用进化论来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则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指出：要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复杂多种多样的内容，都包括在“生存斗争”这个贫乏而片面

① 《李大钊选集》第71页。

② 同上，第68页。

③ 《言治》季刊第一册，1917年4月1日出版。

④ 《李大钊选集》第84页。

的公式里，“这是十足的幼稚之见”^①。李大钊的进化史观虽然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庸俗进化论的范围，带有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但毕竟没有脱离庸俗进化论的体系。从整个体系上看，他在五四前期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的。他对于社会的进化，只是从自然进化的一般意义来理解，还不了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如他把“民彝”看作民众的一种天然秉性，说：“天生众民，有形下之器，必有形上之道。道即理也，斯民之生，即本此理以为性，趋于至善而止焉”^②。可见李大钊这时候所理解的“民彝”，实际上是天生的，基本上是一个唯心的概念。同时“民彝”也是一个超阶级的概念，如他在谈到社会法制时，一方面抨击反动法制践踏民意，一方面又责备统治者的法制“但求其同，不容其异”^③。说明他还不知道用阶级观点看待社会法制。李大钊所理解的那种抽象的共同民意，在阶级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此外，他这时候对“民”的了解，也还不完全明白劳动群众是人民的主体。他有时还把劳动人民和一般民众称为“庸众”或“编氓”^④。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的巨大指导作用。当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武器，在实践中证明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立刻为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思想武器所吸引。同时，即将承担领导革命重任的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迅速成长和觉悟起来，迫切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科学思想。李大钊作为一个急进民主主义者和战斗的进化论者，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以后，他自然地很快成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拥护者和宣传者。在这时，他的历史观开始发生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2页。

② 《李大钊选集》第36页。

③ 同上，第39页。

④ 同上，第38页。

化。

这种变化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篇文章不但指出十月革命是带有世界色彩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了这个革命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文章说：“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①。李大钊的这些看法，说明他的革命观开始从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历史观开始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核心——“永远实在之大机轴”。当然，他这时还不了解“人类普遍心理变动”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看作李大钊新历史观的萌芽，那么，同年11月、12月相继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李大钊新历史观初步发展的重要代表作。这两篇文章阐述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第一次从经济上来解释社会矛盾和世界冲突的原因，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由于本国的界限以内，已经容纳不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家政府因此想依靠战争，来打破国界，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来建立一个世界大帝国，“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②。他也是第一次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矛盾现象，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不是那一国资本家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庶民的胜利；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德国皇家的失败，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文章还初步分析了阶级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指出“世间资本家占极少数”，“凡是不做工吃

① 《李大钊选集》第104页。

② 同上，第110页。

干饭的人，都是强盗”^①；无产庶民主张阶级战争，即“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②。并预见在当前开始兴起的这场伟大世界革命运动中，“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是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资本主义咧”，必将通通被扫除干净^③，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界。上述情况表明李大钊开始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

李大钊在开始转向阶级论的同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腥事实的教育，进一步看清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性。1919年初，他在《新世纪》一文中深刻指出：“看啊，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④。李大钊在这里对生存竞争学说的怀疑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一步批判，虽然其中还包含着一些模糊见解，但确定无疑的是，他在历史观上开始同进化论分手。

二、唯物史观的基本确立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最先表现在指导思想方面。前者是以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导，后者是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为指导。李大钊在为实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思想条件的活动中，起了旗手的作用。正是在指导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实

① 《李大钊选集》第110、111页。

② 同上，第114页。

③ 同上，第117页。

④ 同上，第120页。

践过程中，在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本人的历史观基本上实现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初步树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相继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重要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观点较为系统和集中，可以看作李大钊唯物史观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面一些基本观点。

李大钊开始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性。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指出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存在着一种“经济全进路的大势”^①，即具有经济发展规律的总趋势。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又指出：“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并且说：“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②。五四前期，李大钊把人类历史同自然界都简单地看作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到五四后期，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历史的发展如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存在着一种客观的规律性。这样，李大钊在历史规律客观性的问题上，就同历史唯心主义基本上划清了界限。

李大钊承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是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他把社会比作一座房子，具有基础构造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认为社会的基础构造，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③。这种“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3页。

② 同上，第294页。

③ 同上，第185页。

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①。并且强调“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②。这说明李大钊不但看到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物质性和客观“实在”性。李大钊还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基础构造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基础构造的依赖关系。例如他说：“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上层建筑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③。他对唯心史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指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④，然而“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个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⑤。正如列宁所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于“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做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础的原始的关系”，才有可能建立起来^⑥。李大钊既然抓住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这个基本观点，表明他已经同唯心史观分手，比较牢固地树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李大钊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了比较系统的概述，其基本内容有如下几点：（1）经济现象用他自己的模型，制定形成社会的表面构造；（2）表面构造的变化“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3）基础构造可以单方面影响表面构造，但表面构造不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93 页。

② 同上，第 178 页。

③ 同上，第 293 页。

④ 同上，第 293 页。

⑤ 同上，第 336—337 页。

⑥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118 页。

能给基础构造以任何的影响^①。李大钊做出的这个概括，大部分正确，只有第三点误解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原意。不过他接着作了补充。他说：“在经济构造上建立的一切表面构造，如法律等，不是绝对的不能加些影响于各个的经济现象，但是他们都是随着经济全进路的大势走的，都是辅助着经济内部变化的，就是有时可以抑制各个的经济现象，也不能反抗经济全进路的大势”^②。这个补充很正确，马克思的原意正是如此。但李大钊却认为马克思的原意正与此相反，这表明李大钊本身在认识上还存在着矛盾。这个问题放到下面去探讨。不过从总体来看，李大钊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力存在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他认为考察历史的发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③。明确指出社会变化的“最后原因”，是经济的原因，“物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他说：社会经济构造“按他每个进化的程级，为他那最高动因的连续体式所决定。这最高动因，依其性质，必须不断的变迁，必然的与社会的经济的进化以诱导”^④。李大钊这段话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学说的一些基本内容：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生产力的变化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性质必须同一定性质、一定发展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等原理。李大钊还通过生产关系这个中间环节，进一步认识到生产力的变化，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中，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随着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6页。

② 同上，第193页。

③ 同上，第337页。

④ 同上，第179页。

获得新生产力，变化其生产方法；又随着变化生产方法，——随着变化他们得生活资料的方法——他们全变化他们的社会关系。手白造出有封建诸侯的社会。蒸气制粉机造出有产业的资本家的社会。而这样顺应他们的物质的生产方法，以建设其社会关系的人类，同时又顺应他们的社会关系，以作出其主义、思想、范畴。”^①李大钊不但说明了生产方法、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的变化与生产力变化之间的必然联系，而且还分析了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的一般过程和爆发社会革命的必然趋势。他指出生产力最初同生产关系是互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渐渐地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了，非但不能促进反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于是两者发生冲突，最后引起社会革命，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但是旧的生产关系，非到完全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会被打破；新的生产关系，非到条件充分成熟的时候，不会产生。由此可见到五四后期，李大钊已经比较系统地掌握了马克思的历史动力观。

五四后期，李大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深化。他这时不再是笼统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些概念，而是把这个学说看作贯串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一条金线”，并且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内容。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所谓阶级，是“经济上有共同利害自觉的社会团体”^②；(2) 阶级的产生，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一个人的劳动“渐有裕余”，从而为社会上一部分持有生产

① 《李大钊选集》第182页。

② 同上，第183页。

手段的人，乘机夺取另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工”提供了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3) 阶级意识的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起初人们渐渐感到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利益的对立，于是“阶级间起了竞争”，阶级斗争最初只是经济上的，后来才发展为政治斗争，争取政治上的权力，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然后又开展新阶段的阶级斗争，这样推演下去，直到阶级完全消灭；(4) 阶级斗争必然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阶级竞争也将与这种资本家生产方法同时告终”^①；(5) 阶级和阶级竞争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现象，而是存在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李大钊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思想。不仅如此，他基于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深刻理解，还进一步看到了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在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关系。李大钊在评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时候，正确的指出马克思是“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变化以内”^②。并说：“自从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③ 尽管李大钊在这里也暴露了自己认识上的矛盾（这个问题也留到下面去讨论），但是，他认识到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把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者的推动作用科学地统一起来了。他这一理解，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是非常深刻的。马克思在谈到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说他自己的贡献仅仅在于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所论述的阶级斗争与社会生产方式运动的内在联系，正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他的认识已推进到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最高水平。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88 页

②③ 同上，第 190 页。

五四后期，李大钊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的观点，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五四运动以前，就非常重视“庶民”和“劳工”的历史作用，但是只有认识到生产力和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时，才真正懂得作为生产活动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一观点。《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深刻指出：

“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并明确指出这种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就是“没有生产手段”的“工人、农夫”^①。李大钊高度评价了《共产党宣言》的功绩，由于《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催告全世界劳工阶级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劳工阶级才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大家也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②。李大钊因此满腔热忱地对人民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③，号召人民联合起来，为创造“平民的新历史”而奋斗。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五四后期李大钊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基本上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观，只不过在某些环节上，他的认识还存在一些矛盾，还没有完全过关。

三、二元论的余影

五四后期，李大钊的历史观基本上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但我们又看到他在某些方面对唯物史观还存在怀疑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23 页。

② 同上，第 191 页。

③ 同上，第 340 页。

和误解，表明唯心史观或二元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怀疑和误解在许多文章中表现出来，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关于经济规律的作用与阶级活动的关系。当时资产阶级学者攻击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自相矛盾，说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经济的行程象行星的轨道一样不能改变”，一方面又说阶级斗争可以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很明显，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李大钊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辩护，说这两种提法在马克思本人看来并不矛盾，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资产阶级学者的责难，看准了马克思学说的毛病，击中了“要扼”，并认为自己的解释不够透彻，总觉得“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①。（二）关于经济规律同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唯物史观只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忽视人的作用，因而具有“定命论”的色彩。李大钊一方面根据事实进行反驳，指出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人的作用，正是《共产党宣言》唤起了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对自己历史作用的重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承认资产阶级学者指责的“定命论”，的确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流弊”^②。（三）关于经济规律同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反作用的关系。资产阶级学者歪曲马克思的观点，说马克思只承认经济现象对法律现象的决定作用，而不承认法律现象可以影响经济的发展。还说马克思为尊重经济规律的作用，就“全把伦理的观念抹煞一切”^③。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大致同资产阶级学者持相同看法。前面已经说到他误认为唯物史观只承认经济现象单方面给其他社会现象以影响。他还说：“基础构造的变动……属于人类意识的东西，丝毫不能加他以影响”^④。他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

① 《李大钊选集》第 190 页。

② 同上，第 191 页。

③ 同上，第 193 页。

④ 同上，第 185 页。

然而他却以此为根据，认定忽视上层建筑和人类意识的作用，确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偏蔽”，并对这一“偏蔽”提出了自己“救正”的意见^①。他的“救正”意见，已在前面作了介绍，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可是他却把自己这种正确见解看作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东西。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五四时期的李大钊，会在这些问题上陷入如此深刻的矛盾？这个问题有必要作深入一步的探讨。我认为李大钊在上面陷入矛盾的三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即客观经济规律同主观能动作用的关系问题。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但是李大钊当时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反而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重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忽视人类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他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缺陷，主张加以“补足”，并提出了补足的具体方案。他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②。据我看来，李大钊这个“物心两面”、“灵肉一致”的改造社会的公式，就是他认识上矛盾的症结所在。

“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作为一个笼统的提法，可以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对“物”、“心”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李大钊所说的“物”，是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社会的基础构造”，这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所说的“心”，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在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之上形成的那种社会意识，而是所谓“新理想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个“新理想主义”实际上是无政府共产主义。

① 《李大钊选集》第193页。

② 同上，第194页。

正如五四时期许多先进分子都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一样，李大钊也受过这种影响。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曾提出：“近来哲学上有一种新理想主义出现，可以修正马氏的唯物论，而救其偏蔽”。在同年7月发表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热情称赞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协合与友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把“互助论”同“阶级斗争学说”相提并论。李大钊宣布：“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①。由此可见，李大钊所说的“人道主义”，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协合互助思想。这种观点，在同月发表的《我与世界》一文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他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②。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个人的解放和国家与个人的对立，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特色。正如斯大林所指出：“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③但李大钊和完全的无政府主义者到底不一样，他不是要求一夜之间废除国家，而是主张逐渐废除。从这里，可以看到这时候在李大钊思想上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乱。

马克思主义属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无政府主义属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李大钊在自己改造社会的公式里，把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硬性地撮合在一起，结果自然免不了自相矛盾。这种矛盾的状况，说明唯心主义在李大钊思想上还存在着相

① 《李大钊选集》第224页。

② 同上，第221页。李大钊在国家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早在1913年写的《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中已有表现。如说：“今劳动者痛苦之原因，盖于他有掠夺彼等之劳动者故也。即彼等背后有奸恶之国家制度故也”。见《官治》第一期，1913年4月1日出版。

③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3页

当的影响。

在“物”与“心”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李大钊在上述公式里，实际上把“改造人类精神”和“改造经济组织”，看成两个并行的运动，把“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看成两个推动改造的并行的力量。这种看法，在1919年9月发表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白。他说：“我们‘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就是要作两种的文化运动：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应该把这两种文化运动，当作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用全生涯的努力鼓舞着向前进行”^①。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曾说过：“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②。李大钊的“物心两面改造”的公式，由于包含着两个并行的原动力，因而带上了二元论的色彩。当然李大钊同那些完全的二元论者有区别，因为他同时又承认“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并且指出：“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③。但是有人因此否认李大钊改造社会的公式带有二元论的色彩，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李大钊虽然承认“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但他的公式同这个正确观点是矛盾的，或者背离了这个正确观点。如前所述，李大钊所说的“心”（精神现象），不是“物”（客观实在）本身的反映或派生，实际上是一种超实在的主观自生的东西。李大钊的“互助”理想来源于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想，完全是超越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普遍的永恒的道德观念，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概念。李大钊把克鲁泡特金这个唯心主义理论概念作为改造社会的精神武器，甚至用互助论来排斥阶级斗争，说“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

① 《李大钊选集》第235—236页。

② 同上，第192页。

③ 同上，第267—268页。

进化的”^①。其中既否认了革命战争和正义战争的进步作用，也因此充分流露了他自己思想上残留着的唯心主义的影子。其次，李大钊在谈到人类“互助”道德的起源时，认为道德心是动物的本能，是人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权威的声音”^②。甚至把互助看成是人与动物共同的道德。这种看法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色彩，同马克思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时候曾经指出：“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还对杜林用猫的所谓虚伪性来解释人类性恶的谬论进行了嘲笑，说：“恶就是猫！这是不仅对于一切世界，而且对于猫也是适用的道德！”^③ 我们知道自然主义虽然带有庸俗唯物主义的色彩，但当它解释人类历史的时候，同庸俗进化论一样，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迷宫。

四、李大钊历史观存在二重性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五四后期李大钊的历史观存在着二重性，即既有历史唯物主义，又有历史唯心主义或二元论的成分。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唯物论是其主要方面，唯心论是次要方面，表现特点是两者一定程度的混和。

造成李大钊历史观的二重性，有多方面的原因。一般来说，这是事物处于根本转变阶段的普遍现象，任何新事物在它最初产生的时候，总会程度不同地保留着若干旧的痕迹。五四时期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转变时期，也是李大

① 《李大钊选集》第 222 页。

② 同上，第 256 页。

③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91—92 页。

钊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处在这个大转变的过程中，认识上残存某些唯心论或二元论的旧观点，是不足为奇的。

五四运动前夕，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兴起了共产主义思潮。这个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日益占着指导的地位。这时候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和民主思想，还能和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结成统一战线，同封建主义和唯心论作斗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战关系及其所造成的客观环境，使人们容易混淆两者的思想界限。中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既没有一个强大的持久的反封建的思想运动，更不可能有一个广泛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这种情况就更为加重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分清共产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难度。由于这些原因，使李大钊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还看不清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孔道西的机械唯物论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错误地把他看作“唯物史观的开创者”。还错误地把人道主义看作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更高深的思想与更合理的制度，把共产主义的科学理想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主观幻想等同起来。

五四以前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主要是从日本方面得到的。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幸得秋水与河上肇，对李大钊有很大影响，其中河上肇的影响更大。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仅绝大多数“译语，从河上肇博士”，而且文中许多论点，甚至包括阐述问题的方法，都是仿效河上肇的《唯物史观研究》的^①。

① 《唯物史观研究》一书，是河上肇1919年前后在京都大学的讲义，1921年日本正式出版（参看《河上肇自传》附录：《大事年表》）。1930年，上海文华书局出版了郑理镇翻译的中文译本。五四前夕，李大钊很可能看到过这本讲义或听课笔记。从《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5年5月出版）上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期刊登的一篇文章，渊泉翻译的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可以看出河上肇的文章观点对李大钊的影响。

幸得秋水与河上肇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对马克思学说有不少曲解的地方。李大钊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受了他们的影响，这不能不是李大钊对马克思某些论述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大钊在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一般是富于幻想和好走极端的，无政府主义的漂亮词句和天真幻想，对他们具有特大的吸引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就把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传到了中国。《互助论》的中心内容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专政，主张阶级合作，把互助协作看成人天生之美德，人类最高的理想，幻想通过焕发人类互助协作的天然秉性，即通过阶级合作的道路，来实现其最高理想。这种理论同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宣扬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及日尔曼人是天生优等民族，有权统治全世界的强盗理论，形式上处于两个极端，形成尖锐对立。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之苦的中国广大人民，对那个为帝国主义侵略说教的强盗理论，早已愤恨在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的那种空前野蛮和世界规模的强盗罪行，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动嘴脸。这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拥护“互助论”，用以对抗“竞争论”^①，从而大大加强了克鲁泡特金一派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李大钊当时是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他坚决反对“弱肉强食”的谬论，竭诚拥护“互助协合”的理想，使这个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在他思想上扎下了很深的根子。然而，李大钊不久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承认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依然承认协合互助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358页。

是人类的美德，并主张用它来纠正“阶级斗争说”的“偏蔽”。为了把“阶级斗争”与“协合互助”两种对立的理论统一起来，他又跑到他原先信奉过的“进化论”那里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终于“发现”互助的思想也是来源于达尔文。他说达尔文发现生物不但有互相竞争的本能，而且有互相帮助的本能；人类的互助精神比其他生物更发达。因而正是达尔文的学说给了“互助”道德的本质和起源以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则解释了这个道德的历史发展。既然“竞争”和“互助”是人类的两种本能。因此李大钊就认为马克思的“阶级竞争”同克鲁泡特金的“协合互助”可以统一起来，而且应该统一起来，互为补充，一块用来作为改造人类社会的武器。这样，他不但为自己“物心两面”的公式找到了理论根据，而且替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增添了“科学”基础。而无政府共产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结合，又给社会达尔文主义添了新装，这就是李大钊所赞赏的“新理想主义”。显然，这时候李大钊还不了解：既然运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竞争”现象是唯心主义的，那么，用达尔文这个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联合”现象，也同样是唯心主义的，错误的。李大钊的这种思想状况表明，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唯心主义本质还认识批判不彻底，思想上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唯心史观的影响。所以曾被自己摈弃了的东西，却又用另一种形式恢复过来。这是李大钊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本文全面探讨了五四时期李大钊的历史观，当文章谈到他认识上某些局限的时候，并没有对前人苛求的意思，只是为了弄清他当时在理论上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以及为什么只能达到那种高度的历史条件，以利于进一步全面研究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的思想状况。至于对李大钊理论活动的全面评价，还是鲁迅说的最恳切。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指出：“他的理论，在现

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①。

（原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1期）

^① 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四卷。

李大钊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王世儒

李大钊同志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促成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以及领导北方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同时，他还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图书馆专家，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大钊同志于1917年11月到北京大学任职，不久即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7月至1922年12月，改为以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在此期间，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讲授《图书馆教育》的课程，并担任过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的职务，总计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达五年之久。五年间，他以坚韧不拔的开创精神和讲求实效的工作态度，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此，在国外早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在《美国百科全书》中，就有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①的记述。然而在中国，由于图书馆事业落后，图书馆工作长期不被重视，因而对于大钊同志在这方面的功绩，尚缺乏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为了全面认识和评价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

^① 《ALA Encyclopa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第333页。

不断发展，回顾和总结大钊同志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无疑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在我国最早以图书馆为阵地， 传播马克思主义

大钊同志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勤奋地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终于找到了革命真理。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不断撰写文章，发表演说，编辑刊物，广泛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介绍，千方百计为中国人民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创造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

大钊同志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开创了以图书馆为阵地，利用书刊的借阅进行广泛传播的先例。

“五四”以前，我国还没有马列著作中文译本的出版，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介绍，主要地是通过报刊登载。因此，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应该重视报刊的作用。大钊同志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非常重视便利广大读者阅读报刊的问题。

北大图书馆原无报刊阅览室的设立。1918年10月，红楼（北大第一院）落成，大钊同志亲自设计了图书馆房屋布局。图书馆几占红楼第一层的全部，分设二十一个书库，六个阅览室。六个阅览室中，首先建立并向读者开放的便是报纸和期刊两个阅览室。1918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图书馆主任布告》谓：“本馆第一阅览室在新大楼第一层第二十九号，专备阅览中外杂志之用，现已布置完竣……启室办公”；10月26日的“日刊”所载《图书馆主任告白》谓：“本馆第二阅览室设在新大楼第一层三十一

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可随时入览”。六个阅览室中，先行开放陈列各种中外期刊报纸的两个阅览室，不难想见其目的在于为广大读者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各种新思潮，提供方便。这是图书馆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要形式和途径，收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当时，一批中华民族的精英和有志之士，如毛泽东、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劫、黄日葵、袁玉冰等，聚集北京大学，勤奋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真理，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走上献身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应该说是与大钊同志的引导和影响，与北大图书馆提供的学习条件分不开的。1918年10月，毛泽东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到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就是在红楼一层三十一号室的报纸阅览室工作。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利用北大图书馆的条件，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后来他曾经对美国作家爱德迦·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①。

为使图书馆真正起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首要的物质前提是积极收藏马列主义著作，而在当时还没有中译本的情况下，就只能靠采购外文书籍。北大图书馆在大钊同志任主任期间，外文书籍的入藏量发展很快，这一情况反映了大钊同志很重视马列主义书籍收藏。据《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所载，1917年底，北大图书馆藏书共147,190册，其中外文书为9,970册，至1923年9月，北大图书馆藏书已达184,008册，其中外文书为28,836册，五年多时间，外文书增加了一万九千册^②。这些外文书中，有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书籍，如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日文版

^① 斯诺：《西行漫记》1979年版第132页。

^②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图书馆》1923年版。

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及《马克思传》等^①。

积极收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只是手段，采取有效措施使书籍广泛地在读者中流通，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为此，大钊同志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到馆新书”的报导，公开推荐已经入藏的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开辟了专题阅览室，实行开架阅览，千方百计提高马列主义书籍和革命书刊的流通率。如1920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曾刊登一篇《图书馆典书课通告》，谓“兹将本校所藏关于俄国问题之参考书二十三种，陈列本课第四阅览室内，以备同学诸君披阅”。这二十三种书中，有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列宁和他的工作》、《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等等。由此不难想见，当时北大图书馆大力推荐和流通马列主义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是很有声色的，确实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传播阵地的作用。

二、建设了我国第一个大学图书馆

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五年间，使北大图书馆发生了深刻变化。

北大图书馆原称藏书楼，民国成立以后，始称北京大学图书馆，并开始设立主任职，先后有徐鸿宝、夏元璠、章士钊等以教授兼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兼任，往往只是挂名而已，他们对于管理一个大学图书馆实际上并无很多的热情和兴趣。如章士钊在回忆他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曾经说过：“其所以兼图书馆主任者，无非为著述参考之便”^②。由此可知，在大钊同志任职之前，北大图书馆的历届主任并未注重加强科学管理，提高服务水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26日、8月19日、22日。

^②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章序》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

平的问题，这是北大图书馆封建藏书楼色彩十分严重的主要原因。

大钊同志任职后，从一开始就表现了与所有前任完全不同的态度。他认为，“现在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①，必须加强科学管理，以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为此，他按照科学管理的要求，对北大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改革和整顿。

第一，改善服务态度 延长开馆时间

长期以来，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主要侧重在保管书籍的方面，而对于便利读者利用图书没有明确要求，所以，工作人员与读者之间无热情亲切的服务可言，甚而有时还会发生和读者争吵的现象。要改变这种状况，主要应该从教育工作人员，端正服务态度入手。大钊同志在耐心向工作人员讲清道理之后，还公开地发布《图书馆主任通告》，谓“迭接学生诸君来函，陈述办事员办事有不亲切之弊，除一面切嘱各办事员尽情待遇外，学生中有自感苦痛之实话，……尽可指名函告本馆，以期切实整顿”^②云云。这一“通告”反映了大钊同志对改善服务态度是十分坚决的。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中，如此重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问题，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一例。

接着，大钊同志又做出了关于延长开馆时间的决定。他曾经在1918年4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布告延长开馆时间的决定，7月9日，又在“日刊”上登出《图书馆主任告白》，谓“迭据学生诸君面陈，欲利用暑期阅览书籍，拟请将开馆时间延长。兹为尊重诸君好学之意向起见，自七月九日起上午七时至十一时，下午二时至六时开馆，汉文书复本书籍亦准借阅”。显然，这里所延长的“开馆时间”，系指延长读者能够使用图书馆藏书的

①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词》，《平民教育》1919年第10号。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25日。

阅览室开放时间，而不是仅仅延长见不到书籍的自习室的开放时间。

大钊同志在整顿工作中，首先满足读者的这两项要求，是无道理的。因为在图书馆的服务工作中，比较起来说，这两个问题显然是易于解决的，只要认识了它的意义，经过一定的工作，就能较快地收到效果，而使读者受益，明显地给读者以工作有所改进的印象。从这一点说，大钊同志为图书馆工作创造了一项很有效仿价值的经验。

第二，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这是实行科学管理的保证。大钊同志对这一点十分重视，并且力求作到制度一经建立，就要坚持执行。

北大图书馆在长时期中，没有成文的内部工作条例，各项工作各行其是，五花八门，距离科学管理的要求，相差很远。大钊同志为扭转这种局面，花费了很大气力。他经过两年多时间对工作的熟悉了解，参照国内外的管理经验，亲手拟订了《国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试行条例》(十三条)，于1920年5月7日提交北大第二次图书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并立即付诸试行^①。从而使北大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有了一定的章法，开始向科学管理的方向发展。

此外，北大图书馆虽早在1906年就制订过《大学堂图书馆续订章程》，以后又订出了《借书规则》和《阅览规则》等。但这些规章只是一纸空文，并未认真执行，以致少数读者借书逾期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了图书的流通。针对这种情况，大钊同志在1918年4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十四条)，规定借书逾期“暂停其借书权”。同时，还经常在“日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刊”上公布借书逾期的读者姓名，督促还书。这些办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1921年1月，大钊同志再次修订了《借书规则》，并于当月24日刊于《北京大学日刊》，申明借书逾期“征收违约金”。由于实行逾期罚款的办法，借书逾期的现象开始好转。

但是，在开始时，逾期罚款的规定只在学生读者中实行，对教员读者没有约束作用，而教员借书逾期现象更为严重。学生读者对此很有意见，邓中夏、刘仁静等曾因此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致图书馆长公开信”，提出“借书的条例，不要专门限制无钱买书的学生才好”，并附七条建议^①。大钊同志十分重视学生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如实地提交到北大评议会临时会议讨论解决。经这次会议研究，作出了教员读者借书逾期同样处以“征收违约金”的决定，而且对教员的罚金还多于学生的一倍。由于建立并执行新的“借书规则”，使借书逾期人数大为减少，因而提高了图书的流通率，缓和了图书供需的矛盾。

第三，设置卡片目录，健全目录体系

目录是读者了解利用图书馆藏书的钥匙。北大图书馆在1910年时，就以《千字文》为序编出了“汉文图书目录”，以后又编出了“出借书草目”和“西文书籍分类目录”。这些目录，都是书本式，编排方法陈旧，检索不便，而且不能反映全部馆藏，尤其不能及时反映近期入藏的新书，对于读者利用藏书有一定的不便之处，因而很有必要进行改革。大钊同志从1918年10月起，着手建立卡片目录，“其目录以杜威十进法为基础，而按本馆所藏书籍之情形，略有变通”。至1923年，分别编出了书名、著者、分类“三种简片目录”^②。这是北大图书馆设置卡片目录，形成多种检索途径目录体系的开始。卡片目录的建立及其体系的形成，对于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4日，12月7日。

^②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图书馆》1923年版。

读者利用全部馆藏起了简便的作用，广大读者评价卡片目录比原来的书本式目录更有“适用价值”。

第四，调整服务机构 设立教员阅览室

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大钊同志还对服务机构进行了调整。北大图书馆原设管理、阅览、理书、书目编订四个室，另附设讲义收发室和缮写室。这些机构设置，没有突出大学图书馆的特点，不能适应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因此，大钊同志于1918年10月，取消了附设的两个室，同时，把原来的四个室改为四个课，即设立了购书、登录、编目、典书四个课。典书课下设六个阅览室，主要承担为学生读者服务的工作。此外，在“各学系均设有分阅览室，可以随时调取图书馆之书籍，于一定期间存置该室，以供研究之用”^①。这种分阅览室，主要承担为教员读者服务的工作。新的机构设置，职责分明，任务具体，反映了改革的目的在于力求适应教学科研需要，满足不同读者的要求。

图书馆工作能否满足教员的需求，这是衡量其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大钊同志认为，北大图书馆应该设立教员阅览室，做好为教员服务的工作。为此，他曾经亲自选购中外文书刊，聘用助教充实工作人员，积极为教员阅览室的建立创造条件。至1920年10月，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他在北大第五次图书委员会议上，提出了“图书馆应设立教员阅览室”的建议。这项建议，在会上得到一致通过。自此，北大图书馆始有专门为教员服务的教员阅览室之设。这是大钊同志在工作中不断开拓新的服务领域的一项重要成果^②。

第五，藏书实行“兼容互需”，经费务求稳定

搞好藏书建设，是图书馆开展各项服务工作，发挥应有作用

①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图书馆》1923年版。

② 《北京大学评议会记录》1920年10月6日。

的物质基础。大钊同志非常重视并善于加强藏书建设工作。他在入藏图书时，很注意配合本校教学和科研的实际需要。如北大图书馆本来藏有一批词曲书，但在1910年刘廷琛任学校总监督时，他把词曲书看作“是淫词艳曲，有伤风化，一把火都烧了”。1918年，北大成立了国文研究所，图书馆便又“大买起词曲书来”，此举在当时颇为全校师生所注目，他们赞许这是校长和图书馆主任对北大的“又一贡献”^①。

在藏书建设方针上，大钊同志还很注意对东西方文化各类图书实行“兼容互需”。关于大钊同志的藏书建设思想，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第一手材料进行评价。但是，通过了解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实际入藏的图书，也可窥见一斑。

众所周知，大钊同志指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曾附设一个小型图书馆——亢慕义斋。它实际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许多藏书借自北大图书馆。据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亢慕义斋”已藏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另如，1920年12月，北大图书馆还开辟过专题阅览室，陈列馆藏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参考书二十三种。1918年9月，曾经设立过四百多册日文书的“阪谷特藏”，同年11月，还设立过一千多册西文书的“亚当氏特藏”等等^②。这些情况，明显地说明大钊同志在藏书建设上，实行的是“兼容互需”的方针。

此外，大钊同志还很重视开展国内外书刊赠阅交换的工作。在他任职期间，北大图书馆经常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鸣谢国内外赠书，因而使北大图书馆的藏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发展很快。

① 余毅：《悼蔡元培先生》，《贵善》1942年4月。

② 《国立北京大学概略》，《图书馆》1923年版。

为使藏书建设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必须有相应的固定经费保证。而在大钊同志任职之前，北大图书馆的购书经费很不稳定，全由学校有关部门酌情拨给，有时很多，有时很少，大起大落现象十分严重。据《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历年增添图书所需银两数目”的记载，1912年购书费为3,570（两）；1914年为68,802（元），起落之差几乎是20倍。这种情况，必然使有计划有目标的藏书建设难以进行。因此，争取有固定的购书经费便成为大钊同志的一个努力目标。他怀着极大的耐心，一方面向校长阐述固定购书经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向校内有关部门说明固定购书经费的必要性。经过三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1920年5月7日召开的图书委员会议上，讨论通过了“预算案内之添置图书费应定为每年六万元”的决议^①，从而使北大图书馆有了固定的购书经费，使有计划有目标的藏书建设工作，有了保证。

第六，在图书馆工作中聘用助教

大钊同志任职初期，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包括缮写、打字人员在内），仅有十二人。这十二人中，不适应工作需要、属于照顾某种关系的，在所难免。依靠这样一支工作人员队伍，是难以提高图书馆的服务工作质量的。而为了建设一个具有科学管理水平的大学图书馆，就必须整顿现有的人员队伍，充实忠于职守，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

首先，大钊同志对原有工作人员提出了坚守岗位，按时上班工作的要求^②，其次，为使聘用的人员适合工作需要，在聘用书记（初级人员）时，坚持经过考试；不合格者不予录用^③。

同时，他还提出了在图书馆工作中聘用助教的主张，以充实中高级工作人员。他说：“这班助教，不必上课堂授课，只在图书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5月10日。

② 《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1918年9月14日。

③ 《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2月4日，1922年2月8日。

馆搜罗书籍供学生参考”，指导阅读，解答咨询，“鼓励研究的兴趣^①”。他不仅提出了这个对图书馆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主张，而且于1920年9月，在北大图书馆开始聘用大学本科毕业生。至1922年9月，北大图书馆有工作人员21人，其中已有助教6人。他们是“编目课助教顾颉刚、登录课助教王峻、典书课助教马家骧、齐昌豫、滕统音、朱尚瑞”等，加上大钊同志，全馆有“助教”以上职称的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②。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由中高级人员组成的业务队伍，才使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进展顺利，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工作水平明显提高。

第七，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的管理经验

大钊同志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十分注意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图书馆的管理经验。

1918年3月15日，他曾率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到清华学校图书馆学习参观。主要学习了解了清华学校图书馆的目录设置情况、书刊借阅制度及过期罚款的办法等^③。1920年5月，山西大学图书馆馆长张藩臣到北大图书馆参观学习，大钊同志热情地“招待一切”，同时，也请张藩臣详细介绍了山西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经验^④。不难看出，大钊同志很重视具体了解兄弟学校图书馆的工作情况，虚心吸取他们的工作经验。

同时，大钊同志还很注意了解国外图书馆的工作状况和管理经验。1918年夏，他曾两次致函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殷汝耕，请他详细了解该校图书馆的管理情况和方法。是年7月24日，殷汝耕自日本复函李大钊，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目录设置情况和编制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且还提及关于东京帝国大

① 《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词》，《平民教育》1919年第10号。

② 《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北大编印1923年版。

③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19、20日。

④ 同上，1920年5月29日。

学图书馆“购置保管书籍之办法”，俟了解详细“再告”^①。1920年，还曾经请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的刘复，了解英国图书馆的管理方法。刘复曾将大英博物馆组织藏书的办法及图书标签的格式，介绍给大钊同志。刘复还根据他留学期间对英法两国图书馆的了解，专门写了一篇《对改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意见》，供大钊同志研究参考^②。同年，袁同礼赴美国留学，大钊同志也请袁顺便考察美国大学图书馆。袁同礼于次年1月曾致函大钊同志，报告他考察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情况^③。

由于大钊同志重视了解国内外图书馆的工作现状，发展趋势和他们的经验，并且善于进行研究比较，为我所用，因而，在五年时间内，顺利地完成了对北大图书馆的改革和整顿，使北大图书馆的工作，在主要方面，接近或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国大学图书馆事业从封建藏书楼时代过渡到近代图书馆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最早从理论上阐明学校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

在我国，从理论上阐述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关于学校图书馆的性质作用，很少为人注意。大钊同志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期间，第一次探讨了这一问题，为加强学校图书馆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时，人们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对于图书馆已不同于藏书楼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大钊同志明确指出近代图书馆与封建藏书楼有着根本的区别。他说：“古代图书馆和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

①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8月8日。

② 同上，1920年7月28日。

③ 同上，1920年1月20日。

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这里，大钊同志概括提出了一个区分图书馆与藏书楼的主要标准，即封建藏书楼只注重图书保管；而现代图书馆则不仅要保管书籍，而且要使书籍发生效用，重视图书的流通借阅。这一看法在当时的提出，对于克服封建藏书楼的影响，明确图书馆的办馆方针，无疑具有促进的作用。

大钊同志还指出：“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这两种的性质不同，所以形式也不一样。”他认为，学校图书馆“是研究室”、“为教育的机关”，具有传递知识的职能。它不仅要有目的的收藏保管书籍，而且要有目的的整理书籍，流通书籍，使书籍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求工作人员不但要保管好书籍，而且要在知识的载体和读者的需要之间，起到桥梁作用，充当知识导航员；它应该是学生求知识的“第二课堂”，是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说明，学校图书馆不是那种被动的提供一般借阅的场所，而是千方百计传播知识的阵地，是积极主动地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学术性机构。

在对学校图书馆的性质作用问题做出合乎客观实际的阐述之后，大钊同志又进一步地探讨了学校图书馆如何发挥应有作用的问题。他指出，学校图书馆“和教授法有密切关系。教授法若是变更，那么图书馆也不能不变”。这就是说，学校图书馆要紧密配合教学和科研的实际，主动及时地开展各项工作，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图书馆的对象主要是学生，他们的学习除了课堂以外，还需要阅读大量的参考书籍，图书馆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证满足学生学习参考的需要。为此，大钊同志认为，学校图书馆藏书的“复本不能不增加”。只有相应地增加复本量，才能保证学生学习参考的需要，这是学校图书馆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关键所在。

同时，大钊同志还认为，“图书馆就是研究室，阅览的能随时翻阅才好”。图书馆应该“给阅览的人一种选择的便利”，实行“开架式”。他承认，“开架式有一层弊处，就是损失较多”，但是，他指出“这是少数金钱的损失，算不得什么”，如果从读者得到的效益来看，“开架式所得利益比损失大得多”。因此，他大力提倡废掉“文库式”，实行“开架式”，并强调说，“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这些论述，明显地反映出大钊同志在探讨学校图书馆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时，把“保证”和“便利”读者利用图书资料放在了突出的地位。

为使学校图书馆的传递知识、培养人才的作用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大钊同志还提出，学校图书馆应“添聘些助教式”的工作人员。因为学校图书馆“是研究室”，它本身的管理工作和学术性的服务工作，需要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来承担。他对当时的学校图书馆的水平，很不满意。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职员虽然很多，但天天办的都是些借书的手续。所以这个图书馆不是研究室，变成借书所了”^①。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又不具备科学管理的知识，所以只能天天维持“借借还还”的工作而已。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局面，大钊同志于1920年9月，开始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中，聘用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使用助教，使一些学术性较强的工作，诸如指导读者查找文献资料，解答读者咨询问题等，得以开展起来，从而使图书馆的作用进一步地得到发挥。这是对大学图书馆事业，乃至对高等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的建设性贡献。

当然，在今天看来，大钊同志的这些见解，尚有不少值得讨论和补充的地方，但在当时，是起到了指导作用的。其基本出发点，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一定的现实意义。

① 以上所引均见《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说词》，《平民教育》1919年第10号。

四、发起我国第一个图书馆 协会和图书馆讲习班

大钊同志还为谋求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他曾经参加发起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建立了我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协作组织。

在我国，各图书馆之间彼此本无联系。大钊同志任职北大图书馆主任后，很注意吸取各图书馆的工作经验。他曾经率领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先后到过清华学校图书馆、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学习参观。自此，各图书馆之间往来逐渐频繁，一些图书馆提议建立协作组织。后由私立北京汇文大学图书馆馆长高罗题和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发起，决定成立北京地区图书馆协作组织，定名为“北京图书馆协会”。遂于1918年12月2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文科事务所举行成立大会。是日到会者有二十一个图书馆的代表。会上通过了“北京图书馆协会章程”及“附则”，选举了职员。选举投票结果，清华学校图书馆袁同礼票数最多，举为协会会长。次选副会长，高罗题与李大钊票数相同。大钊同志当即以事务繁忙为由，提议选高罗题任副会长，请众认可，于是高罗题为副会长，李大钊当选为中文书记，协和医学学校吉非兰当选为英文书记^①。

1919年2月15日，该会复在北京大学举行职员会议，就活动内容和进行方法做出决议。明确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图谋北京各图书馆之协助互益”，主要活动内容为“图书互借”和“互换出版物”等^②。至此，北京图书馆协会正式开始活动。中国图书馆

^① 《教育周报》第230期（1919年2月）。

^②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21日，1919年1月22日。

界破天荒有了互相协作、资料共享的联络组织。

然而，在那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代，北京图书馆协会欲谋各图书馆之间的“协助互益”，谈何易事！实际上，这个协作组织活动的^①时间很短暂，不久便徒有虚名了。但是，由此而开始的图书馆之间互借图书和交换出版物，却断断续续地沿传了下来。协会作为图书馆界的“协助互益”组织，毕竟起了开头的作用，有其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不仅说明了大钊同志关心重视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而且也说明了他的贡献遍及图书馆领域的多方面。

此外，大钊同志对于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工作也是非常关心的。1918年12月，他应邀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讲的就是“图书馆教育的问题”。在这次演说中，他强烈希望北京高等师范“添设图书馆专科或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且强调：“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后来，他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部开设了“图书馆教育的讲座课”，引起了学生对图书馆工作的“兴味”^①。

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普及图书馆学知识，在1920年暑期，大钊同志还参与了北京高等师范举办的“暑期图书馆讲习会”的工作，担任“图书馆教育”课程的讲授。这次讲习会自8月2日起至21日结束，历时三周。听讲者约百余人，均系各省选派来京有志研究图书馆工作的。举办这种讲习会，在我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收到的良好效果是发起者开始所未料及的。当时参加听讲的人谈其感受说：“中国自从开办图书馆以来，大家只知道图书馆，不知道什么图书馆学，到了这会讲演图书馆组织法、管理法、分类编目，以及图书馆教育科学，一切听讲的

^① 《晨报》1921年12月1日。

人，都知道图书馆是一种科学，大有研究的价值”。可见，这次讲习会，达到了普及图书馆学知识的目的。《晨报》在报导这次讲习会的消息时，曾称之为“中国图书馆界空前的大会”，“吾国图书馆教育发展之新纪元”^①。而在这次讲习会的工作中，大钊同志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积极热心的指导者和参加者。

总之，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专业教学工作方面，还是在实际业务工作方面，大钊同志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我国最终的结束封建藏书楼时代，并开始向近代图书馆阶段转变的历史进程中，他确实起到了一个开拓者，奠基者的作用。他的伟大功绩，在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应该占有光辉的篇章。他的坚韧不拔的开创精神和讲求实效的工作态度，应该成为图书馆界的光荣传统，永远地继承和发扬下去。

1983年8月

^① 《晨报》1920年8月8日，8月18日。

李大钊研究综述

韩一德 王树棣

李大钊（1889—1927）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卓越思想，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必将越加明显地反映出来。

纪念李大钊的文字，在他牺牲后的二、三十年代，就已散见于当时的报刊杂志。四十年代延安的《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过纪念和回忆文章。全国解放后，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和有关著作，发表了数百篇纪念和研究性质的文章。总的来说，对李大钊的研究逐步深入；但由于受到各个时期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一工作经历起伏和曲折，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只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对李大钊的研究，才真正在一定广度和深度上开展起来。

我们在编选《李大钊研究论文集》的过程中，查阅了五十余年来数百件有关对李大钊研究、评论和回忆的报刊、专著等资料，现将李大钊研究的发展概况作一综述，以供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考。

一

1927年4月李大钊牺牲时，北京正处于奉系军阀血腥统治

之下，当时的《晨报》和《京报》，虽也发了一些他被捕、遇害的消息，但召开悼念集会，发表纪念文章已无可能。只有在当时的武汉和冯玉祥国民军总部驻地陕西潼关，曾举行过群众性的悼念活动。5月4日，汉口《民国日报》曾以“五四与李大钊”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今年纪念‘五四’的第八周年，伴着一个极不幸的消息，即是‘五四’的领袖李大钊同志正于前五天在北京被害。”社论号召人们：“要从悲哀中生出更大的勇气，与反革命派决一死战！”^①5月16日，汉口举行万人追悼大会，张太雷代表中共湖北区委致悼词，指出李大钊是代表全中国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同胞谋利益求解放，与一切反动派和军阀帝国主义相反抗而死的。我们除追悼之外，当要加紧团结和武装，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作战^②。同时在潼关也召开了追悼集会。在冯玉祥于5月20日发出的唁电中，称李大钊“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是“北方指导国民革命运动，最忠实最努力和最有力量的领袖”。他“系为中国一切被压迫民众利益而牺牲，一切被压迫民众，应深深的哀此伟大的革命导师。”^③冯玉祥谴责了制造这一重大惨案的帝国主义和刽子手张作霖，号召军民要完成李大钊烈士未竟的事业。

同年5月出版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195期，发表了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以魏琴的笔名所写的《悼李大钊同志》一文。悼文指出：“李大钊同志是创立中国共产党之一人，又是国民党的政治会议一委员。他是最勇敢的战士，为推翻一切反动势力而奋斗。他的名字早就为全中国革命者所认识了。他及其他同志的名字将为几百万北方的群众牢记不忘。我们的英勇同志之死，愈加继起革命运动向前进展！”同一时期，孟冰、高一涵、胡人哲

① 武汉《民国日报》1927年5月4日。

② 同上，1927年5月17日。

③ 同上，1927年5月21日。

等在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李大钊的生平及被捕牺牲经过，对他的被害表示深切悼念。

李大钊就义后不久，大革命遭到失败。在国民党统治区，对李大钊的纪念和研究被视为非法，人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进行。当时在北京从事地下工作的李乐光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收集和保存了李大钊的部分著作文稿。1933年李乐光被捕，他所保存的文稿由其岳母赵老太太收藏下来。以后辗转送到上海交群众图书公司，准备出版《守常全集》，并约请鲁迅为之作序。为此，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文中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怀念和对新旧军阀黑暗统治的愤慨；并对李大钊的遗文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这本书到1939年北新书局才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本两千册，但一出版即为租界当局全部没收。直至上海解放后，于1949年7月，由北新书局重印出版，因书中所载仅是李大钊遗文的一小部分，改名为《守常文集》。与此同时，周建人、蔡尚思、方行等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故纸和余烬堆中”，“默默地”进行李大钊遗著的收集工作^①。到全国解放时，汇集的李大钊遗文已近三百篇。

1934年6月，在北平杏岩书屋发行的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中，载有李大钊的评传，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李大钊传记。该文引述日本人园田一龟的话，称李大钊“系共产党中国支部之代表。盖以新人物著闻。为中国思想界之重镇，中国共产党之中心分子也”。作者在介绍了李大钊的经历和被捕牺牲经过后指出，“先生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尤不治生产。生时仅可供家食，歿后则一贫若洗，棺槨衣衾，皆为友助。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临事不苟，

^① 方行：《先烈李大钊遗著编录经过》，《文汇报》1962年10月7日。

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贪贱不能移者也。”

“先生深思好学，博通群籍。游学日本，兼通英文。研究政治经济，有声当代。兼治哲史，取证极确。民九撰《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之原因》一文。民十撰《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一文。民十三又介绍《桑西门的历史观》及《孔道西的历史观》一文。开发青年思想，实非浅鲜。为文雅训详瞻，引人入胜。著有《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书。字里行间，均寓操履纯笃，志行坚洁。处今之世，实难能而可贵者矣。”作者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北平，能够如此评价革命领袖李大钊，是需要有非凡的胆识的。

毛泽东对李大钊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李大钊在宣传马列主义方面是有伟大的历史功绩的，有书为证。他还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关怀下，1943年4月李大钊殉难十六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发表了《李大钊革命史略》和张如心的署名文章：《纪念中华民族不朽的革命伟人——李大钊同志》。文章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号召人们学习“李大钊一贯为马克思主义而英勇顽强战斗的原则精神”和“他的高度共产主义的气节和操守”。1947年蔡尚思和杨荣国分别在国统区发表《李大钊的思想评介》^①和《李守常先生的思想》^②两篇文章，开始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李大钊的政治思想。蔡文指出，李大钊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思想的前进，应用的正确和实践的勇敢”，并指出“能够兼这三长的，在过去思想史上，几乎只有李先生一个人”。

^① 《文汇报》1947年4月26日、5月3日。

^② 《读书与出版》第2年第1期，1947年1月15日。

1949年4月28日，北京各界前往香山祭扫李大钊墓。《人民日报》发表吴玉章《纪念李大钊同志光荣殉难的二十二周年》和沈钧儒《纪念李大钊先生》两篇文章。文章追述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特别强调在解放了的北平，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之时纪念李大钊的重大意义。同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范文澜、王南合著的《中国早期的唯物历史科学家——李大钊同志》一文，首次从史学角度指出李大钊是我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先驱者。

总观1927至1949年发表的文章，主要内容多是介绍李大钊的生平，肯定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纪念他的英勇就义。由于全国大部分地区处在反动派的统治之下，李大钊的遗作散佚各处不能出版，受这些条件的限制，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展。

二

建国之后，李大钊作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他的研究受到重视，有了全面系统开展的条件。从1950年开始，几乎每年的4、5月，即适逢李大钊殉难纪念日和五四运动周年之际，各地报刊大都有纪念和研究文章发表。

1950年4月6日和5月3日，《人民日报》分别报道了北京市政府及各界代表祭扫李大钊墓和李大钊在五四时代工作室开放的消息。在这前后有邓拓的《谁领导了五四运动》^①和金毓黻的《李大钊与五四运动》^②刘弄潮《领导五四的主将——李大钊同志》^③发表，这些文章分别从五四以前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

① 《人民日报》1950年4月29日。

② 《新观察》1950年6卷13期。

③ 《大公报》1951年5月4日。

《Bolshevism 的胜利》，在五四运动中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等文章的深刻影响，他在五四前后的革命实践活动，论证了作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李大钊，怎样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并进而指出，正因为有了这种领导，才可能使这次运动成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从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51年2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刘弄潮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列述了在《守常文集》基础上，新收集的一百零一篇李大钊著作目录。同年5月《大公报》发表方行、蔡尚思的《关于李大钊全集目录》^①，在刘文基础上又补充了一百六十七篇新目录。不久，刘弄潮的《李大钊名著新纪元考》^②一文，以充分的根据证明：1919年1月5日《每周评论》的重要社论《新纪元》，确为李大钊所作。这些李大钊遗著收集和考证新成果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响应，从而使李大钊著作的收集、整理工作有了迅速进展，李大钊研究也有了更充分的条件。

还应提到的是，这一年北京宣文书店出版了张次溪的《李大钊先生传》一书。作者经多年搜集资料，写出了这本传记，它对提供史料和促进李大钊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作者世界观的限制和缺乏严格的史实考证，该书是有严重缺点的。

在李大钊殉难二十九周年的时候，《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发表王同策的《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③一文。该文从李大钊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坚定立场；从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的方

① 《大公报》1951年5月24日。

② 《大公报》1951年9月14日。

③ 《光明日报》1956年4月28日。

向；对党的事业的大公无私、鞠躬尽瘁以及他那谦虚和朴实的作风等方面，指明李大钊是知识分子学习的崇高典范，知识分子应该学习李大钊，以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1957年是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这一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据粗略统计有一百余篇。此后至六十年代初，李大钊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从当时文章的内容看，虽然纪念性的文字仍占有一定份量，但研究论文已占大多数。

发表的纪念、回忆文章主要有：陈毅的《纪念李大钊同志殉难三十周年》^①，朱务善的《回忆守常同志》^②，高一涵的《和李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③及包惠僧的《回忆李大钊同志》^④等。多年来，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在保存有关李大钊的史料，宣传李大钊的光荣事迹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她写的回忆文章有《为革命，他忘记了家庭》^⑤、《怀念》^⑥、《回忆出殡》^⑦等。贾芝在宣传李大钊方面也作了许多工作，他在这一时期写了《铁肩担道义》^⑧、《李大钊同志的故事》^⑨等文。这些文章都生动地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及其崇高思想品德，为李大钊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史实，丰富了历史资料。

从这一时期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可以看出，学术界已经开始对李大钊的思想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其中首先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是五四前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也即是他如何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张俊彦的

①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② 同上，1957年4月29日。

③ 《工人日报》1957年4月27日。

④ 《中国工人》1957年第9期。

⑤ 《工人日报》1957年4月25日。

⑥ 《教师报》1957年4月23日。

⑦ 《北京日报》1957年4月29日。

⑧ 《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⑨ 《中国青年》1957年第4期。

《李大钊与新文化运动》^①、戴鹿鸣的《五四时期李大钊思想的发展》^②、平心《论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③、匡裕从的《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④、高全朴、张岂之的《五四时期李大钊同志反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斗争》^⑤以及李龙牧的《李大钊同志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⑥等。这些文章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矛盾危机,考察了李大钊思想的变化,指出“研究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当时中国人民的新觉醒;会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李大钊同志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⑦。平心在文中指出:“作为五四运动一名主将的李大钊,……在他的早期思想中包含了一些纯度较高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积极因素,在青年时代就奋勇参加了民主运动和爱国运动的前线,使他超越了庸俗的温和的资产阶级思想水平。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感召下,在炽烈的时代熔炉锻炼之中,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实践考验和自我教育,他终于摆脱了资产阶级意识体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革命观。他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策略思想进行艰巨的革命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取得的密切结合,最初是经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介绍……李大钊正是在马列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之间起桥梁作用并为共产党创立坚持准备工作的一位卓越的思想斗士和革命活动家。”该文还指出,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性质和复杂的革命任务,决定了李

① 《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② 《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5期。

③ 《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5期。

④ 《史学月刊》1958年第5期。

⑤ 《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⑥ 同上,1957年第5期。

⑦ 匡裕从:《五四前后的李大钊思想》,《史学月刊》1958年第5期。

大钊思想发展中的某些特点：“在五四运动以前，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和工人运动的组织传统，在中国不可能培植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骨干；当时势需要的时候，这种骨干不能不从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中征发出来，这是中国革命转变的重要历史特点之一”^①。“应该看到，李大钊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曾经经过了一段艰苦的道路，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是一下子成熟起来的……早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残余影响和正确解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文献的不足……使他在理论的运用上表现了在当时很难免的一些不成熟的斑点。令人景仰不忘的是，随着革命实践和理论探讨的加深……他终于凭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锐利的科学武器，基本上克服了早期思想认识上的一些缺点，正式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宣告全面决裂，使他和同样从资产阶级营垒转变过来的陈独秀，从意识到实践都表现了根本的差别”^②。稍后的1962年，彭明在《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③一文中，通过对李大钊和陈独秀著作和思想的深入分析，说明李大钊和陈独秀为什么能在五四时期发挥如此重要的影响？他们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有哪些是共同的，又有哪些是不同的？揭示出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他们二人必然产生原则分歧的思想根源。最后指出：“坚定的唯物史观，充分估计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处在群众斗争之中并领导他们前进，这正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区别所在。”

这个时期的研究者还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等方面分别作了专门探讨。论述其史学思想的

①② 平心：《论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思想的发展》，《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4、5期。

③ 《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

文章主要有：《李大钊同志的史学思想》^①、《李大钊同志和历史科学》^②及《李大钊在历史科学上的贡献》^③等。这些文章通过对李大钊大量史学论著的分析，说明了他是我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回答什么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这一根本问题的人。他正确指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等等精神上的现象，都是社会的表层构造，它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变革。李大钊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中国社会历史，论证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运动的客观必然性。这些文章还介绍了李大钊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批判旧史学上“神权的”、“天命的”、“王者的”、“英雄的”等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同时，关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对象和方法，李大钊也有精辟的论述，他不愧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在哲学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④、《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⑤等。这些文章论述了与政治思想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发展相联系，李大钊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从唯心论到以进化论为特征的旧唯物论，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指出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他转向唯物主义的反映，因此使他在五四时期代表了一个新的方向。

论述李大钊文学思想的论文有：《李大钊的文学活动和文艺思想》^⑥、《谈先烈李大钊同志的译文》^⑦、《李大钊的诗》^⑧等，从

① 关振潮，《合肥师院学报》1963年第7期。

② 刘绍孟，《史学月刊》1959年第7期。

③ 刘绍孟，《开封师院学报》1963年第9期。

④ 邓桦，《北京日报》1957年4月26日。

⑤ 江海、王开，《前线》1959年第8期。

⑥ 张颂南，《浙江日报》1959年5月4日。

⑦ 高岱，《文汇报》1957年9月17日。

⑧ 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小组，《作品》1959年第5期。

文学创作、译文等方面探讨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李大钊同志的教育活动和教育观点》^①、《李大钊同志的教育思想》^②等，从他关于教育的性质、任务、青年教育、工人教育、农民教育的论述，以及他的教育实践，考察了李大钊的教育思想。

五十年代末，李大钊研究向深入发展的另一标志是，出版了《李大钊选集》和其他有关著作。李大钊生前没有出过著作集，遗文散见于当时的报章杂志。牺牲后由李乐光保存下来的文稿，仅是他遗文的一部分。在这之后又有更多的人努力收集，使李大钊文稿的篇目不断增加。1957年文操的《试编李大钊（守常）遗著系年目录》^③一文，开列自1912年至1926年（缺1925年）间的李大钊遗文共三百二十余篇，至1959年已达四百篇左右。在这一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的补充订正，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选集》一书。该书收文一百三十三篇，近四十万字，虽然这仍是李大钊著作的一部分，但却大都是他遗著的精华，并且经过了考订、研究和整理的工作。它为学习和研究李大钊提供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由贾芝编辑的《李大钊诗文选集》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这是建国后我国最早的一本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专著。该书对李大钊如何从一个青年爱国者到民主主义坚强战士再到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了李大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推动李大钊研究作出了贡献。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丁守和、殷叙彝合著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书，系统地论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

① 沈灌群，《华东师大学报》1959年第1期。

② 毛礼锐，《教师报》1959年4月26日。

③ 《学术月刊》1957年第1—6期。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和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历史过程。作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和主要观点及其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斗争，充分肯定了李大钊在这一思想运动中，所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作用。

对李大钊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六十年代初，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和个人崇拜的影响，使李大钊研究工作出现了很大的曲折。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宣传李大钊与宣传毛泽东对立起来，康生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指责介绍李大钊的事迹是“贬低了毛主席”。1969年后更是公开定调子，说李大钊只能是“民主主义者”，甚至诬蔑从容就义的大钊同志“晚节不终”，是“叛徒”。从事李大钊研究的同志及李大钊的亲属遭到残酷迫害。已经写出初稿的《李大钊传》书稿被诬为“大毒草”而大加挞伐。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只不过使人们被迫暂时搁下了笔，中断了研究工作，他们要想在人民心目中，抹灭李大钊的光辉形象，是万万办不到的。

正因为如此，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不久，报刊上就出现了宣传李大钊历史功绩，驳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李大钊诬蔑的文章。1978年初，《光明日报》发表张静如的《李大钊同志的历史功绩——驳“四人帮”对李大钊同志的诬蔑》^①一文。文章在肯定李大钊历史功绩的同时，驳斥了江青一伙对李大钊的无耻诬蔑。在此前后，报刊上发表的《先驱好肝胆、浩气贯长虹——纪念李大钊英勇就义五十一年》^②、《李大钊同志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③等文，也都从不同角度驳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蔑，宣

① 《光明日报》1978年2月16日。

② 马模贞、孙茂生，《北京日报》1978年4月28日。

③ 张宪文，《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传了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生的光辉业绩。这些文章的发表，推动了党史领域的拨乱反正。从研究水平看，虽较五十年代已经达到的水平，没有新的突破或尚有不济，但在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它为其后出现的李大钊研究的新高潮奠定了基础。

三

1979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又是李大钊诞辰九十周年。是年5月在北京举行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对五四时期李大钊历史作用的评价，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10月，又在北京、石家庄等地举行了李大钊九十诞辰的纪念活动。在北京的纪念大会上，李新作题为《研究李大钊，学习李大钊》的长篇报告^①，全面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对李大钊一生的主要活动作了历史的评价，号召加强对李大钊的学习和研究。《人民日报》刊登李葆华题为《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的文章，这是他多年来唯一公开发表的回忆文章，提供了他所了解的李大钊革命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在这前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总数也在百篇以上，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在李大钊研究上的体现。从1979年以来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和资料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继续挖掘出部分有价值的史料，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条件。北京市委党校及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部分同志在编写《李大钊传》和《李大钊年谱》的过程中，注意从当时的报刊资料和档案中搜集李大钊的佚文。中国革命博物馆

^① 此文摘要刊于《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有关同志，在搜集、考证李大钊著作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就使李大钊的佚文不断被发现。主要有：李大钊早年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俄罗斯文学与革命》、《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以及《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等。1979年，张静如等同志从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俄文速记记录中，发现了李大钊在这次会上以琴华的名字所作的关于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较重要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已收集到的李大钊著作共达四百五十篇左右，并不断有新的发现。1982年《史学月刊》刊登《李大钊在开封》^①一文，对李大钊在大革命时期，为争取国民军两次到开封的史实，提供了具体翔实的考证，并发现了1925年在《雷火》杂志上刊登的李大钊的演说：《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同年《天津日报》刊登《向着“黄金时代”一直奔去》^②一文，介绍了1923年底李大钊赴天津参加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校庆的情况，以及李大钊在这次校庆会上所作《十八年来之回顾》的报告，和在此之前他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上作的题为《历史与人生观》的演说。这一发现对研究李大钊青年时代的活动和思想具有重要价值。近年来一些同志对李大钊生年进行的考证及对李大钊《狱中自述》的考证和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③。1983年4月《光明日报》刊登《重见天日的一块李大钊墓碑》^④，介绍了北京市在重修李大钊陵园时挖出来的，1933年公葬烈士时地下党送的墓碑。当时由于处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这块载有红色碑文的石碑只好埋在地下，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今天终于重见天日。

① 张绛，《史学月刊》1982年第5期。

② 唐燕生、殷子纯，《天津日报》1982年10月19日。

③ 撰写这方面文章的有黄真、朱乔森、姚维斗、李义彬等。

④ 贾芝，《光明日报》1983年4月23日。

还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军中的俄国军事顾问的回忆录：《冯玉祥与国民军》^①及《中国革命纪事》^②。两书提供了李大钊为争取冯玉祥，和在国民军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的一些情况，为研究这个时期李大钊在军事方面的活动提供了资料。

第二，研究论文不仅数量多，而且达到了新的水平。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关于李大钊的文章，回忆和纪念的内容占有相当份量，那么进入八十年代，则大多为研究和考证方面的内容，涉及李大钊的生平活动及思想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一时期，根据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恢复李大钊在党史上历史地位的需要，有一批论述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地位的文章发表。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地位》^③一文指出：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他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积极活动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人民空前觉醒、斗争风起云涌的伟大年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换的时期，李大钊站在历史的前锋，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和优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无畏战士，在中国革命的各条战线上，进行过英勇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该文从上述各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探讨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仍然为众多研究者所重视。他们认为“研究李大钊思想转变的过程和特点，有助于了解五四时期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

① 维·马·普里马科夫著。

② A·B·勃拉戈达托夫著。

③ 肖超然、沙健孙、梁柱，《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6期。

想转变的规律”^①。这方面的论文比较多，也较五、六十年代更加深入。《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②一文首先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有不少反对封建主义的战士活跃在文化斗争的舞台上，为什么在当时同样的国际国内条件之下，不是别人正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这就只能从李大钊自身的革命经历和思想认识上寻找原因。该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首先是在他思想中已经树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所起的作用，还在1918年上半年，李大钊已认识到，宇宙是“自然的存在”，是“真实的本体”，而不是什么“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并认识到这种客观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这种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使他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上和观察世界的方法上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共同点。其次，李大钊对进化论的怀疑和否定，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最后，是李大钊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解放的强烈愿望，对人民在革命中作用的高度重视，以及为争取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实践，成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该文还分析了李大钊个人经历所处的具体环境，如他早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后来又工作和生活在那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等等，也为他较早地接触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条件。《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③一文指出：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同时，立即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在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关于反封建斗争和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关于人民群众即革命的依靠力量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作工具取得了新的认识，从

①② 张静如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③ 戴鹿鸣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而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就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实现了他自急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8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时，发表了一组探讨李大钊对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的论文。《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①一文指出：“李大钊的崇高思想和杰出活动，同我们党历史中最初的篇章是不可分割的。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处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关头，迎着席卷神州的革命风暴，高屋建瓴，所向披靡，一面传播马克思主义，一面发动工人运动，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奔走呼号，为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献身。”该文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原则、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方面叙述了建党过程中李大钊的贡献。《论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②一文，从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党的思想基础；培养共产主义干部，为建党作组织准备；以及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三个方面论述了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之一的历史作用。该文指出：“李大钊的建党活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又是领导革命斗争的杰出组织者和实践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工作，在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都为建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他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党成立后也没有象陈独秀那样担任主要领导职务，这并不影响他在建党历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

这个时期，还有许多论文继续探讨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文学思想。尤其在史学和哲学两个方面发表

① 周子信：《江淮论坛》1981年第8期。

② 韩一德、杨树升：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

的文章最多，研究也更加深入；在对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的评价方面并展开了不同认识的探讨。此外，在一些更具体的领域，如李大钊与辛亥革命；李大钊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内蒙古革命；李大钊与我国图书馆事业；李大钊与孙中山；李大钊与鲁迅；李大钊与冯玉祥；李大钊与蔡元培等，也都有专文进行论述与考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大都已收入本书。

第三、出版了一批研究李大钊的新著。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了《李大钊传》^①一书，该书运用大量史料，对李大钊的一生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价，它是解放后第一部正式出版的李大钊传记。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大钊》^②一书，该书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介绍和分析了李大钊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是又一部全面介绍李大钊生平的传记。由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组编写的《李大钊年谱》^③，曾查阅了二十年代大量第一手资料，具体地记述了李大钊生平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它为研究李大钊提供了较为翔实的资料。1983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吕明灼的《李大钊思想研究》，是又一部研究李大钊思想的专著，作者对李大钊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细致的分析。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李大钊》，收集了部分有价值的回忆文章。近两年还出版了《李大钊的故事》^④、《李大钊诗浅释》^⑤及李星华的遗著《回忆父亲李大钊》^⑥等。此外，《李大钊文集》^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收集李大钊全部

① 北京市委党校编写组，朱乔森、黄真执笔。

② 张静如、马模贞著。

③ 初稿发表于《河北文史资料》1981年第2期，修订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 黄真、姚维斗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⑤ 周红兴、李如鸾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⑥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⑦ 由北京市委党校《李大钊文集》编辑组编。

文稿的重要文献。将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史学论集》^①收集了李大钊专论史学的文章和演讲，它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的重要文献。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大钊研究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和伸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为今后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我们认为这仅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李大钊生平活动和思想的研究，五十年代后期一些同志曾经进行了比较有成效的工作，后来这种研究中断了，近年才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现有的文章也明显反映出许多不足，如有的缺乏认真的考证，基本史实不够清楚；有的还存有形式主义残余的影响等；在论文作者中，临时写出一、两篇文章的居多，进行系统研究的作者较少，这都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今后应更多地注意进行广泛深入地资料收集和汇编整理的工作，加深对李大钊生平活动和思想发展进程的具体了解和分析；注意对李大钊遗文的研究和考释，帮助人民群众阅读和学习李大钊著作。同时还应注意加强对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剖析，以紧密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实际探讨李大钊思想的发展，把李大钊研究的水平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1983年8月

^① 韩一德、姚维斗编。

附：李大钊著作系年目录*

(1921—1927年)

(一) 文 章

篇 名	发表时间及刊名	署 名
1912年		
隐忧篇	写于1912年6月，发表于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3期	李 钊
1913年		
大哀篇	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1期	李 钊
“弹劾”用语之解纷	同 上	同 上
朱舜水之海天鸿爪	同 上	同 上
更名龟年小启	同 上	同 上
暗杀与群德	5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2期	同 上
复景学铃君	同 上	同 上
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 争讼	5月1日《言治》第1年第2期	李大钊

* 本目录收入的李大钊著作，已经考证无误。另有若干篇署明明、冥冥、T·C、S·C等笔名的文章，因有争议待考，没有收入。

裁都督横议	6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 3期	李大钊 同上
论民权之旁落	同上	同上
原杀——暗杀与自杀	9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 4期	同上
论官僚主义	同上	同上
一院制与二院制	同上	同上
政客之趣味	同上	同上
是非篇	同上	同上
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 议	10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 5期	李守常
宪法颁行程序与元首	同上	同上
文豪	11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第 6期	李大钊
欧洲各国选举制度考	同上	同上
各国议员俸给考	同上	同上
游碣石山杂记	同上	同上
《自然律与平衡律》跋	同上	钊

1914年

风俗	7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 3号	李守常
物价与货币购买力	同上	李大钊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11月1日《中华》杂志第1卷第 11号	李守常
国情	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 4号	李大钊

我的自传（英文）

写于1914年，见1980年5月30日

《革命文物》第3期

1915年

警告全国父老书	2月	李大钊
《中国国际法论》译叙	4月（健行社发行）	同上
启事三则：	同上	同上
1、再版《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		
2、《蒙古及蒙古人》——蒙古丛书第一种		
3、《世界风云与中国》		
国民之薪胆	6月《国耻纪念录》	李大钊
欧洲战事谈	8月1日《通俗》杂志第1期	冥冥
厌世心与自觉心 （致《甲寅》杂志记者）	8月10日《甲寅》杂志第1卷第8号	李大钊

1916年

民彝与政治	5月15日《民彝》创刊号	守常
《晨钟》之使命 （青春中华之创造）	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	同上
新生命诞生之努力 “第三”	同上 8月17日《晨钟报》	同上 同上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	8月20日《晨钟报》	同上
介绍哲人尼采	8月22日《晨钟报》	同上
权	8月29日《晨钟报》	同上
政坛演说会之必要	8月30日《晨钟报》	同上

达科儿之“爱”观	8月30日《晨钟报》	守常
倍根之偶像说	8月31日《晨钟报》	同上
青春	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李大钊
奋斗之青年	9月3日《晨钟报》	守常
新现象	9月4日《晨钟报》	同上
别泪	同上	同上
祝九月五日	9月5日《晨钟报》	
李守常启事	9月9日《晨钟报》	李守常
国庆纪念	10月1日《宪法公言》第1期	李大钊
制定宪法之注意	10月20日《宪法公言》第2期	同上
省制与宪法	11月10日《宪法公言》第4期	同上
宪法与思想自由	12月10日《宪法公言》第7期	同上

1917年

矛盾生活之二重负担	1月10日《宪法公言》第9期	李大钊
《甲寅》之新生命	1月28日《甲寅》日刊	守常
调和之美	1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孔子与宪法	1月30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	2月1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二）	2月2日《甲寅》日刊	同上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2月4日《甲寅》日刊	同上
预定制宪期间案	同上	同上
论收毁制钱宜有准备	2月6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中国与中立国	2月7日《甲寅》日刊	同上
回春之北京	同上	同上
元宵痛史	2月8日《甲寅》日刊	同上
日本之托尔斯泰热	同上	同上

美德邦交既绝我国不可不

有所表示	2月9日《甲寅》日刊	守	常
我国外交之曙光	2月9日《甲寅》日刊	同	上
黄金累累之日本	2月10日《甲寅》日刊	同	上
可怜之人力车夫	同上	同	上
今后国民之责任	2月11日《甲寅》日刊	同	上
威尔逊与平和	同上	同	上
中德绝交后宜注意西北	2月12日《甲寅》日刊	同	上
战争与铜	2月14日《甲寅》日刊	同	上
德皇之欺世论	同上	同	上
爱国艺术家罗丹翁病笃	同上	同	上
学会与政党	2月15日《甲寅》日刊	同	上
诗人达阿儿之行踪	2月16日《甲寅》日刊	同	上
论国人不可以外交问题			
为攘权之武器	2月17日《甲寅》日刊	同	上
外交研究会	同上	同	上
北美之风云儿	2月18日《甲寅》日刊	同	上
新中华民族主义	2月19日《甲寅》日刊	同	上
一致与民望	2月21日《甲寅》日刊	同	上
“极东门罗主义”	同上	同	上
议会之言论	2月22日《甲寅》日刊	同	上
哭沈汉卿君	2月21、22、23、24日《甲寅》日刊	同	上
政论家与政治家（一）	2月25日《甲寅》日刊	同	上
蔷薇缘欤？蔷薇恨欤？	2月28日《甲寅》日刊	同	上
政论家与政治家（二）	3月2日《甲寅》日刊	同	上
中德邦交绝裂后之种种			
问题	3月5日《甲寅》日刊	同	上
爱国之反对党	3月7日《甲寅》日刊	守	常

立宪国民之修养	3月11日《甲寅》日刊	守常
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选不 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三)	3月14日《甲寅》日刊	李大钊
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选不 管部之国务员问题(九)	3月17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一) (二)(三)	3月19、20、21日《甲寅》日刊	守常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3月24日《甲寅》日刊	同上
面包与和平运动	3月25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 政纲	3月27日《甲寅》日刊	同上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3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战争与人口问题	3月30日《甲寅》日刊	同上
青年与老人	4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2 号、5月18日《甲寅》日刊转载	李大钊
战争与人口(上)	4月1日《言治》季刊第1册	同上
美与高	同上	同上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同上	守常
最近奥国政变之颠末	4月1、2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学生问题	4月3日《甲寅》日刊	同上
学生问题(二)	4月5日《甲寅》日刊	同上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讲演会之必要	4月7日《甲寅》日刊	同上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4月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	4月12日《甲寅》日刊	同上
真理之权威	4月16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大亚细亚主义	4月17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不自由之悲剧	4月18日《甲寅》日刊	同上
	4月19日《甲寅》日刊	守常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4月20日《甲寅》日刊	守常
罪恶与忏悔	4月21日《甲寅》日刊	同上
简易生活之必要	4月22日《甲寅》日刊	同上
中心势力创造论	4月23日《甲寅》日刊	同上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	4月24日《甲寅》日刊	同上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中)	4月25日《甲寅》日刊	同上
川局罪言	4月26日《甲寅》日刊	同上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4月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	5月2日《甲寅》日刊	同上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	5月5日《甲寅》日刊	同上
旅行日记	5月9、10、11日《甲寅》日刊	同上
自由与胜利	5月21日《甲寅》日刊	同上
乐亭通讯	5月28、29日《甲寅》日刊	同上
天津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教务长易人	6月25日《甲寅》日刊	(未署名)
辟伪调和	8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6号	守常
暴力与政治	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号	同上
此日 (致《太平洋》杂志记者)	同上	L.S.C生

1918年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	3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80号	李大钊
致北京大学日刊记者书	3月19、20日《北京大学日刊》 第95、96号	同 上
“今”	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同 上
强力(致高元君)	4月18日《法政学报》第1卷第2期	守 常
新的! 旧的!	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号	李大钊
强力与自由政治(答高元君)	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	同 上
调和之法则	同 上	同 上
调和誉言	同 上	守 常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	同 上	李大钊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同 上	同 上
胡适《美国的妇人》跋	同 上	守 常
雪地冰天两少年	同 上	剑 影
pan...ism 之失败与 Democracy 之胜利	7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10号	守 常
庶民的胜利	11月15日演讲《新青年》第5 卷第5号	同 上
Bolshevism 的胜利	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	李大钊
《国体与青年》跋	12月, 载《国体与青年》一书	同 上
俄罗斯文学与革命	写于1918年, 见1979年5月 《人民文学》第5期	同 上

1919年

新纪元	1月5日《每周评论》第3号 (未署名)	
北京的“华严”	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	明 明

新自杀季节	1月19日《每周评论》第5号	明	明
面包问题	同上	同	上
政客	1月26日《每周评论》第6号	同	上
国民仲裁	同上	同	上
平民独裁政治	同上	同	上
过激乎？过惰乎？	同上	同	上
乡愿与大盗	同上	同	上
放弃特殊地位	同上	同	上
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2月1日《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李大钊	
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	2月1日《新潮》第1卷第2号	同	上
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2月7、8、9日《晨报》	守	常
劳动教育问题	2月14、15日《晨报》	同	上
战后之妇人问题	2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		
		李大钊	
祝黎明会	2月16日《每周评论》第9号	明	明
秘密外交	同上	同	上
罪恶之守护者	同上	同	上
青年与农村	2月20—23日《晨报》	守	常
死动	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号	明	明
普遍选举	同上	同	上
光明与黑暗	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	同	上
过激派的引线	同上	冥	冥
新旧思潮之激战	3月4、5日《晨报》、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转载	守	常

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工人不如骡马)	3月9日《每周评论》第12号	明 明
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	3月14—16日《晨报》	守 常
强国主义	3月16日《每周评论》第13号	明 明
小国主义	同 上	同 上
致北京大学学余俱乐部	3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336期	李大钊
现在与将来	3月28日《晨报》	守 常
统一癖	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	常
白人阀	同 上	同 上
混充牌号	同 上	同 上
解放后的人人	4月13日《每周评论》第17号	同 上
宰猪场式的政治	4月20日《每周评论》第18号	同 上
汽车与邮片	同 上	同 上
废娼问题	4月27日《每周评论》第19号	同 上
“五一节”May Day 杂感	5月1日《晨报》	守 常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	5月18日《每周评论》第22号	常
黑暗的东方	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号	同 上
太上政府	同 上	同 上
第五师军人	同 上	同 上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6月1日《每周评论》第24号	同 上
牢狱的生活	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	同 上
不要再说吉祥话	同 上	同 上
新华门前的血泪	同 上	常
改造	同 上	同 上
哭的笑的	同 上	同 上
威先生感慨如何?	同 上	同 上
赤色的世界	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守 常

最危险的东西	7月6日《每周评论》第29号	守常
光明权	同上	同上
我与世界	同上	同上
阶级竞争与互助	同上	同上
忠告黎明会	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	同上
黑暗与光明	同上	同上
真正的解放	同上	同上
战栗	同上	同上
万恶之原	同上	同上
灰色的中国	同上	同上
是谁夺了我们的光明	同上	同上
日本人听者	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	同上
寄若愚、慕韩	8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	李大钊
五峰游记	8月30日《新生活》第2期	孤松
五峰游记(续)	9月7日《新生活》第3期	同上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	9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李大钊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9月、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	同上
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		
活	9月21日《新生活》第5期	孤松
赤色青色	9月28日《新生活》第6期	同上
大笑话	同上	同上
难兄难弟	同上	同上
秘密……杀人	同上	同上
新鲜名词	10月5日《新生活》第7期	同上

圣人与皇帝	10月5日《新生活》第7期	孤	松
黑暗运动	同上	同	上
文治国庆	10月10日《新生活》第8期	同	上
面包运动	同上	同	上
双十字上的新生活	同上	守	常
武装祭孔	同上	孤	松
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	10月15日《少年中国》第1卷 第4期		
时代的落伍者	10月26日《新生活》第10期	孤	松
应考的遗传性	同上	同	上
双十与五四	同上	同	上
东西村落生活的异点	同上	同	上
时间浪费者	11月2日《新生活》第11期	同	上
最有力的调和者——时代	同上	同	上
人与禽兽	同上	同	上
参战军呢?	同上	同	上
牺牲	11月9日《新生活》第12期	同	上
谁是“有实力”者?	同上	同	上
出卖官吏——蹂躏人格	同上	同	上
掠夺物品的遗迹	同上	同	上
妨害治安	同上	同	上
死	同上	同	上
寺内死了	同上	同	上
“鼓吹共产主义”	11月16日《新生活》第13期	同	上
那里还有自由	同上	同	上
圣裔的恤金	同上	同	上
联人社会	同上	同	上
被裁的兵士	11月23日《新生活》第14期	同	上

归国的工人	11月23日《新生活》第14期	孤 松
一个自杀的青年	同 上	同 上
“五星联珠”“文运大昌”	11月30日《新生活》第15期	同 上
“一心一德”	同 上	同 上
“用民政治”	同 上	同 上
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 上的演说	11月《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	李大钊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12月1日《新潮》第2卷第2号	同 上
青年厌世自杀问题	同 上	守 常
“中日亲善”	12月7日《新生活》第16期	孤 松
“裤子”	同 上	同 上
主义	同 上	同 上
欧文底传略和他底新村 运动	12月8日《批评》半月刊第4号	李大钊
什么是新文学	写于12月8日，发表于1920 年1月4日《星期日》周刊“社 会问题号”	守 常
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答高 承元君）	12月12日《国民杂志》第2卷 第1号	李大钊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 馆二周年纪念会的讲演	12月13日讲演，载《平民教育》 第10号	李守常
什么是歪史	12月14日《新生活》第17期	孤 松
禁止说话	同 上	同 上
互助	12月21日《新生活》第18期	同 上
工读（一）	同 上	同 上
工读（二）	同 上	同 上
大联合	12月28日《新生活》第19期	同 上
物质和精神	同 上	同 上

生活神圣 同 上 同 上

1920 年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2 号	李大钊
发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	同 上	同 上
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	1 月《星期评论》(新年号)第 31 号	同 上
哭冯国璋	1 月 4 日《新生活》第 20 期	孤 松
又是一年	同 上	同 上
忏悔的人	同 上	同 上
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	1 月 15 日《解放与改造》第 2 卷第 2 号	守 常
低级劳动者	1 月 18 日《新生活》第 22 期	孤 松
整顿学风	同 上	同 上
真是梦话	1 月 25 日《新生活》第 23 期	同 上
“特别体恤”	同 上	同 上
知识阶级的胜利	同 上	同 上
精神解放	2 月 8 日《新生活》第 25 期	同 上
山穷水尽的青年	同 上	同 上
好一对兄弟国家	同 上	同 上
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	4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	李守常
“五一” MayDay 运动史	5 月 1 日《新青年》第 7 卷第 6 号	李大钊
中国少年与社会之新潮流	5 月 15 日《少年中国》第 1 卷第 11 期	同 上

红萝卜党	5月30日《新生活》第37期	孤松
乱七八糟	同上	同上
自然与人生	6月20日《新生活》第38期	同上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8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李大钊
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	8月17日《晨报》	李守常
各团体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	9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	同上
变革的原动力	10月17日《新生活》第41期	孤松
人治与自治	同上	同上
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12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4号	李大钊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特点	北大讲义	李守常
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	北大讲义	同上
史观	《史学思想史讲义》	同上
鲍丹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鲁雷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韦柯及其历史思想	同上	同上
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同上	同上
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	同上	同上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	北大讲演之笔记	同上

1921年

自由与秩序	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李大钊
各国的妇女参政运动	2月19、26日，3月5日《北京益世报》“女子周刊”连载（全文未完）	李守常
民众的新年	2月20日《新生活》第45期	孤松
近来的倒戈运动	同上	同上
堕落的法兰西文明	同上	同上
北京平民生活的一瞥	3月5日《新生活》第46期	同上
黄昏时候的哭声	同上	同上
山西	同上	同上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3月20日《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期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3月21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上
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	3月《曙光》第2卷第2号	S、C
社会主义下之实业	同上	同上
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5月4日《晨报》	李大钊
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	6月28日《晨报》	同上
《西洋大历史》序	7月李泰棻《西洋大历史》第三版	李大钊
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3号	李守常
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	12月1日《晨报》	守常
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	12月15、16、17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1922 年

今与古（在北京孔德学校的讲演）	1月8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现代的女权运动	1月18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5期	守常
论自杀	1月30日《学艺》第3卷第8期	李守常
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	2月14日《晨报》	李大钊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2月21—23日《晨报》	同上
胶济铁路略史	3月5日《新生活》第55期	孤松
黄庞流血记序	3月23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失恋与结婚自由	4月1日《晨报》	守常
致晨报记者	4月2日《晨报》	同上
非宗教者宣言	4月4日《晨报》（据吴虞日记系李大钊执笔）	
宗教妨碍进步	4月9日《北京周报》第12号	李大钊
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5月1日《晨报》副刊	李守常
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5月6日《晨报》副刊	守常
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6月《非宗教论》文集	李守常
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	7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6号	同上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国际少年日纪念会”上的演说词（9月3日）	《学生杂志》第9卷第11期	李守常
李守常启事	11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	同上
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	11月7日《晨报》副刊	守常
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	12月1日《晨报》副刊	同上

为辞图书馆主任职启事	12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大钊
本校（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	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守常
社会问题与政治	12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李大钊

1923年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在北大经济学会讲演）	1月16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李守常
平民主义	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之《百科小丛书》第15种	同上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 （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	2月《申报之最近五十年》	李大钊
“今”与“古”	2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2号	同上
现在世界四种妇女运动之潮流及性质并中国妇女运动进行之方法	2月5日《江声日报》	同上
马克思经济学说	3月12日《时事新报》	李守常
演化与进步	4月17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	李大钊
史学与哲学	4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李守常
普遍全中国的国民党	4月18日《向导》第21期	李守常
工人国际运动略史	5月1日《晨报》副刊	T.C.L.
纪念五月四日（在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	5月5日《晨报》	
实业改造的中心势力	5月17日《北京周报》第66号	李守常

桑西门的历史观	8月《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	李大钊
中日俄三国关系日益接近	9月16日《北京周报》第80号	李守常
“大国民”的外交	9月16日《努力周报》第70期	S. C
社会主义释疑	11月1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李守常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		
研究历史的任务	11月29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 上
时	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	同 上
劳动问题的祸源	12月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同 上
王著货币论书后	12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商学》第33期	大 钊
《清代通史》序	12月11日《清代通史》初版本	李大钊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12月20日《新民国》第1卷第2号	李守常
历史与人生观	12月23日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上的演说	李守常
孔道西的历史观	12月《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	李大钊
十八年来之回顾	12月《直隶法政专门学校十八周年纪念特刊》	李守常

1924年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	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声明	李大钊
追悼列宁并纪念“二七”	2月16日《新学生》第14期《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号》	同 上
列宁不死	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会刊行的《列宁纪念册》	李守常
这一周	5月1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 | | | |
|---------------------------|---|------|
| | 第 24 期 | 守 常 |
| 史学要论 | 5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 李守常 |
| 新闻的侵略 | 6 月 18 日《向导》第 71 期 | T. C |
| 人种问题 | 6 月 20 日《新民国》第 1 卷第 6 期 | 李大钊 |
| 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
载 1979 年《教学与研究》第 6 期 | 琴 华 |
| 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 11 月 10 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 守 常 |
| 1925 年 | | |
|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 《“二七”二周年纪念册》 | 守 常 |
| 挽孙中山联 | 《孙中山哀思录》第三编 | 李大钊 |
| 蒙古民族的解放运动 | 3 月北京《民国日报》 | 李守常 |
| 上海的童工问题 | 4 月《中国工人》第 4 期 | 守 常 |
| 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 | 8 月 6 日《雷火》第 8 期 | 李守常 |
| 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 | 9 月 9 日《政治生活》第 50 期 | 猎 夫 |
| 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 | 11 月 18 日《政治生活》第 58 期 | 猎 夫 |
| 土地与农民 | 12 月 30 日—1926 年 2 月 3 日《政治生活》第 62—67 期 | 守 常 |

1926年

- | | | |
|-------------------|----------------------------|-----|
| 新帝国主义与战争的酝酿 | 1月6日《政治生活》第63期 | 守常 |
|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 1月8日《国民新报》副刊第31号 | 同上 |
| 在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 1月27日《政治生活》第66期 | 李守常 |
|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 3月12日《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 李大钊 |
|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 5月《政治生活》第76期 | 猎夫 |
| 日本帝国主义最近进攻中国的方策 | 7月22日《政治生活》第79期 | 同上 |
|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 8月8日《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 | 同上 |
| 守常政治报告 | 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3期 | |
|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 11月《政治生活》 | 李大钊 |
| 守常同志来信(12月5日) | 12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 |

1927年

- | | | |
|--------|----|-----|
| 狱中自述初稿 | 4月 | 李大钊 |
| 狱中自述初稿 | 同上 | 同上 |
| 狱中自述初稿 | 同上 | 同上 |
| 狱中自述 | 同上 | 同上 |

(二) 诗 词

岁晚寄友 (两首)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 1年第1期	李 钊
题蒋卫平遗像	1913年6月1日《言治》月刊第 1年第3期	同 上
登楼杂感 (两首)	1913年9月1日《言治》月刊 年1年第4期	李大钊
哭蒋卫平 (两首)	同 上	同 上
咏玉泉	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 1年第6期	同 上
有感	同 上	同 上
南天动乱, 适将去国, 忆天问军中	同 上	同 上
吊圆明园故址 (两首)	同 上	同 上
筱舫、寿山往阿尔泰 诗以赠之	1917年4月1日《言治》季刊第 1册	同 上
前意未尽更赋一律	同 上	同 上
送别幼衡	同 上	同 上
送别相无	同 上	同 上
太平洋舟中咏感	同 上	同 上
寄霍侣白		钊
复辟变后寄友人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3册	李大钊
山中即景 (两首)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 5卷第3号	同 上
山中即景 (又一首)	1918年8月19日《自坚武日记》 第7册	李守常

悲犬	1918年8月19日《白坚武日记》第7册	李守常
歌谣选（三则）	1918年10月3—6日《北京大学 日刊》	同 上
岭上的羊	1919年9月15日《少年中国》 第1卷第3期	李大钊
山峰	同 上	同 上
山中落雨	同 上	同 上
谚语（两则）	1919年9月28日《新生活》第 6期	守 常
欢迎独秀出狱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第 6卷第6号	李大钊
赠小峰	1957年7月24日《解放日报》	同 上

（三） 书 信

致霍例白	1916年	钊
致李泰棻	1917年	同 上
致革痴	1917年	同 上
致郁宪章	1919年	同 上
致胡适	1919年	大 钊
致李平白（4件）	1919年	钊
致胡适	1920年	守 常
致启明	1920年	大 钊
致周太玄	1921年	李守常
致胡适	1921年	守 常
致沈士远	1922年	
致胡适	1922年	李大钊
致胡适（2件）	1923年	同 上

致周启明（2件）	1923年	李大钊
致胡适	1924年	
致徐秀龙等	1927年1月	李大钊

（四）译 作

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	1913年4月1日《言治》月刊第1年 第1期	李 钊
中国国际法论	1915年出版	李大钊、张润之
精琦氏宪法论	1918年7月1日《言治》季刊第 3册	李大钊
世界观	同 上	S.C.生
国家与个人	同 上	守 常
哀音	同 上	同 上

1983年10月